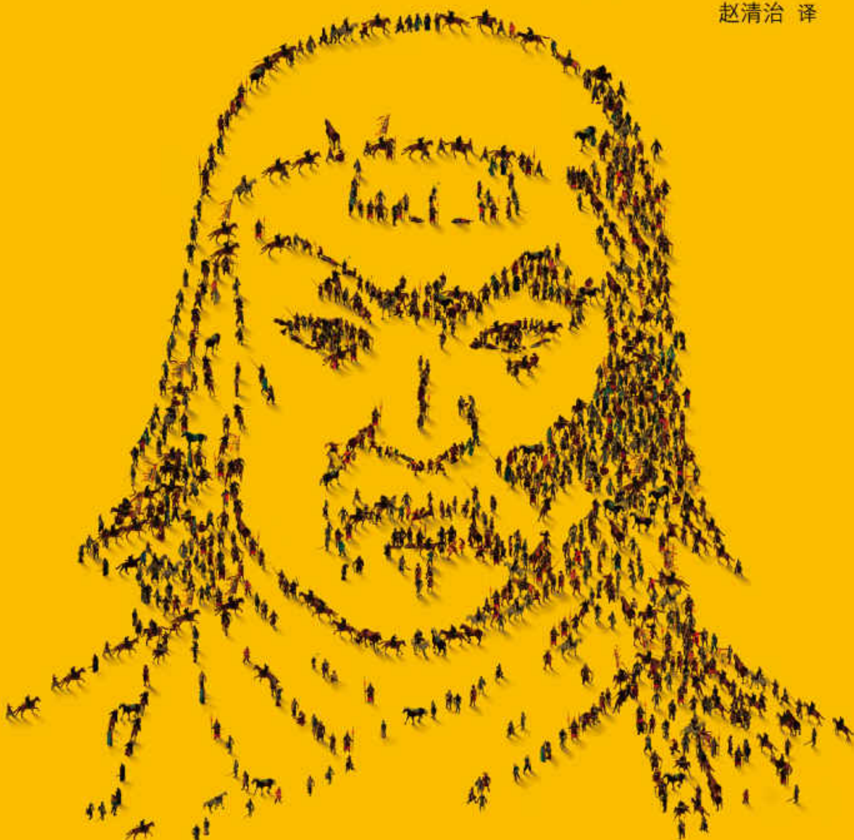
成吉思汗

比武力更强大的是凝聚力

[美] 杰克·威泽弗德 著
赵清治 译



GENGHIS KHAN AND THE QUEST FOR GOD

HOW THE WORLD'S GREATEST CONQUEROR GAVE US RELIGIOUS FREEDOM

人民日报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成吉思汗

比武力更强大的是凝聚力

[美] 杰克·威泽弗德 著
赵清治 译



GENGHIS KHAN AND THE QUEST FOR GOD

HOW THE WORLD'S GREATEST CONQUEROR GAVE US RELIGIOUS FREEDOM

人民日报出版社

成吉思汗

比武力更强大的是凝聚力

军事征服只是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头一步，把横跨欧亚大陆的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人凝聚在一起才是关键一步!

[美] 杰克·威泽弗德 著
赵清治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献给蒙古民族的精神向导脱邻苏勒德[1]，以及所有为精神自由而奋斗的人们。

[1] 脱邻苏勒德：即国旗。苏勒德即成吉思汗的灵旗，传说是用成吉思汗坐骑的马鬃制成的。——译者注

中译本序言

蒙古征服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随后建立的元朝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使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幅员最辽阔、最强盛的帝国，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成了世界文化、商业和文明的中心。成吉思汗和他的孙子忽必烈汗统一了金朝、南宋以及少数民族的领土，其帝国疆域涵盖从蒙古到西藏，从四川到满洲，从太平洋到天山山脉的辽阔地区。除此以外，蒙古人还使华夏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跨越西伯利亚进入俄罗斯，穿过中亚进入伊朗和伊拉克。

在元朝，中国制造的商品经过丝绸之路运往意大利，而中国海军则保护着从库页岛海岸到伊朗海港的旅行和海上贸易。中国军队在陆上扫荡土匪和叛乱分子，海军则清除海上的海盗，他们携起手来阻止了宗教狂热分子扰乱社会，威胁无辜的人们。

相形之下，21世纪一开始便发生了恐怖袭击，从纽约的双子塔和巴黎的咖啡馆，到小社区、大城市的商场及汽车站，恐怖分子到处肆虐。放眼全球，一些宗教组织彼此争夺优势地位，力求主导社会、控制政府。在一些国家，他们已经获得了成功，而结果是可怕的，他们迫害任何不严格遵守他们专横教法的人们。在另一些他们无法掌权的国家，宗教极端分子、叛乱分子和分裂分子肆意用暴力胁迫人民，给普罗大众带来痛苦，而受害最严重的是儿童、老人和其他无力自我保护的人们。

西方国家难以控制激进宗教，但成吉思汗并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他认为，国家的一个主要职责是把宗教置于公正的法律之下，以维护和平和正义，保护社会大众免受宗教极端主义和宗教狂热的伤害。成吉思汗宗教法规与美欧宗教政策之间存在的最重要区别其实非常简单，他认识到了保护社会免受宗教极端主义和狂热主义袭扰的重要性。国家既要维护和平并发挥宗教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保证社会大众不受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侵害。他认识到，必须保护人民，使他们免受那些自称替神的代言者的胁迫、欺骗和背叛。每种宗教的信徒都必须遵守法律。

成吉思汗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他使中国恢复了世界中心的历史地位。在后来的世代，中国也曾经遭受过其他许多国家的军事和经济侵略，但这些国家的目的无非是剥削、压迫，摧残中国和中华文明，压抑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而不是像成吉思汗那样努力帮助改进和统一中国。在中国历史上，成吉思汗带来的是社会的统一和进步，而19世纪的欧洲列强则一味地对中国进行掠夺，二者的反差是再显著不过了。

在20世纪，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终于从异族统治下获得了独立，重建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已开始恢复

自己世界强国和文明主体的传统角色地位。在元朝灭亡七百多年后，中国再次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以及商业、文化和文明的中心。现代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能反映成吉思汗帝国的辉煌。

世界需要再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尤其应该回顾一下成吉思汗的帝国和元朝，以史为鉴，明白在这变化莫测的时代应该如何向前迈进。成吉思汗在他的时代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在今天，他仍然可以成为世人的一位伟大导师。

杰克·威泽弗德

2017年12月

序言 成吉思汗、托马斯·杰斐逊与上帝

在1787年初夏的一个夜晚，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坐在洛桑的自家花园洋房里，即将完成他的罗马帝国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最后一卷。该书共六卷，包括170位皇帝，跨越25个朝代，时间跨度长达1500多年，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从公元前44年3月15日尤利乌斯·恺撒被刺杀开始，直到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落入突厥人之手为止。吉本对帝国和皇帝的理解比古往今来任何学者都要深刻得多。

在这个为期15年的研究项目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不仅仅沉湎于过去，也在展望未来。他的注意力从地中海的帝国越过大西洋，转向新成立的美国，这个注定要继承罗马帝国衣钵的国家。吉本被权力与宗教之间一直存在的奇特关系所吸引，因此他密切关注着美国社会关于宗教在社会、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所进行的热烈讨论。他曾在牛津大学读书，而一些年轻的美国反叛者也曾在此就读。吉本认为他们的理想过于激进，要付诸实践将非常困难。哲学家有时冥想着理想的宗教自由，但没有人知道如何创造一个能够实现这种理想的社会，也没有人知道如何执行法律以确保宗教自由。而美国人在托马斯·杰斐逊的领导下，决心要赋予公民完全的宗教自由，并实现彻底的政教分离。

吉本在欧洲大陆接受过教育，也做过国会议员，因此他对权力和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不仅用理智来探索世界上的宗教，也用心灵去感受它们的存在。他曾是一位天主教徒、新教徒和自然神论者。在他的关于罗马帝国和欧洲形成的历史巨著里，他细致地描述了宗教的兴衰以及宗教迫害，他发现其中很少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在穷其一生地研究之后，他得出了最后的结论：在政治与上帝的问题上，只有一位帝王出类拔萃，与众不同，那就是成吉思汗。

在他研究生涯的早期，当他在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前几卷时，吉本和同时代人一样，对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抱有偏见，对他们的野蛮行径深恶痛绝，对他们的领袖有些轻蔑，其中包括匈奴的阿提拉和成吉思汗(他称之为“增吉思”)。当他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学者以后，他越来越多地从这些所谓的野蛮人身上发现了他们比欧洲文明的统治者更加值得尊敬的地方。他写道，罗马皇帝“充满激情但无德行”，批评他们缺乏政治和精神领袖的素养。 [1] 他对罗马人荒唐的残酷行径进行了反思，他们首先迫害基督徒，然后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就开始迫害其他所有人。

在对西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吉本得出结论，欧洲并不是一个实行宗教自由的好榜样。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最后一章，他大胆地宣称：“但成吉思汗的宗教最值得我们惊奇和赞赏。”他解释道，在蒙古人的营地，不同的宗教“自由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只要他们遵守“大札撒”，即大法，那么成吉思汗就尊重所有“最敌对教派的先知和教宗”的权

利。相比之下，欧洲历史上经常上演的一幕是，宗教狂热分子“用残酷的手段捍卫谬论”。“这些人可能会对这个所谓的野蛮人的做法感到困惑不解，因为他早就明白了哲学上的教训，并按照他的法律，建立了一个有着纯粹信仰和完美宽容精神的制度”。

但是很少有欧洲学者有机会对吉本的观点进行评论，因为他的所有著作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被禁了。天主教会把他的名字和书名印在梵蒂冈的《禁书名单索引》上，阅读或印刷他的书是一种罪恶，在许多国家甚至属于犯罪行为。他的思想太激进了，因此他的书一直列在教会的禁书名单上，直到1966年才解禁。

吉本在讨论成吉思汗的生平时，插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小小注解，他把成吉思汗与欧洲哲学思想中的宽容联系起来，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把这位帝王和刚刚出现的美国的宗教自由联系起来。吉本写道：“成吉思汗的宗教法律和洛克先生的思想有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他还具体列举了约翰·洛克在卡罗来纳州宪法中所设想的乌托邦愿景，那是洛克在1669年受他的雇主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勋爵之托而设计的，其目的是治理新获得的弗吉尼亚殖民地南部的北美土地。

***

我是在撰写关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时首次读到吉本的精彩论述的。吉本著作中的那个小脚注只是这部150万字的巨著里大约8000个脚注中的一个，但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吉本是唯一一位把成吉思汗与我的故乡南卡罗来纳州联系起来的历史学家。他的说法令人激动，但也令人难以置信。尽管我很愿意相信吉本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即使对我这个成吉思汗的崇拜者和蒙古文化的爱好者来说，似乎也显得过于牵强。1206年建立的蒙古帝国和近六百年后建立的美国会有什么可能的联系呢？我没有发现其他学者把这个想法当回事。但是，哪怕只有一丝联系，我也不愿忽略。为了解决这个疑惑，也为了获得心灵上的安宁，我决定去寻找证据来支持或反驳吉本的观点。难道美国宪法中为人珍视的关于西式宗教自由的法律真的起源于亚洲？难道它不仅仅是启蒙运动思想家的遗产，也是一位目不识丁的中世纪勇士的遗产？[2]

我当时没料到，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将耗去我十二年的光阴。这本书是我受吉本的一个脚注启发而撰写的，可是我花费的时间几乎和他完成六卷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样长。

吉本认识到，欧洲思想界和社会大众都强烈地渴望宗教自由，但哲学家、理想主义者、宗教异议人士以及政客们对如何就此进行立法各执己见，充满分歧。人们是否必须首先信仰上帝才能获得这种自由呢？是否需要设立一个由国家控制的国教呢？宗教自由是个人权利，还是只限于已经设立的教会呢？个人是否可以拒绝隶属于任何宗教，但仍然当一个公民呢？当时大多数有关宗教宽容的立法尝试，涉及的主要是少数不

同宗派的基督教会。他们称所有信徒为一个共同体，但并没有真正考虑个人的信仰自由是不是属于任何宗教团体。

受吉本的启发，我在最初几年仔细阅读了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以及他的雇主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勋爵的相关著作，同时也研究了卡罗来纳州基本法，这部宪法的手稿原件保存在距离我家只有几步之遥的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 [3] 在卡罗来纳州殖民地建立的这个理想化的社会模式，赋予了少数教派成员一些公民权利，但也对他们设置了许多新的限制，同时这部基本法承认英格兰教会为官方唯一真正的宗教。该草案只允许教会享有有限的宗教宽容，而不允许个人享有真正的宗教自由，甚至规定只有那些支持政府的宗派才能享有宗教宽容。尽管这与成吉思汗总体的宗教宽容原则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我并没有发现具体的证据说明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启发了后人的灵感——没有相似的措辞或推论，甚至连一条能够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细小线索都没有。

我不太情愿地放弃了这种想法，即洛克曾受过成吉思汗所制定的法律的启发，或我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也曾受到过这种思想的影响。然而更大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美国的开国元勋是否曾经了解过成吉思汗的《大扎撒》，如果他们了解，他们是否借鉴过？于是我把注意力从洛克身上转移到美国开国元勋们身上。很快，一个发现使我深受鼓舞，玛莎·华盛顿曾送给她的丈夫一部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记小说——《成吉思汗：一个鞑靼人的身世》(Zingis:A Tartarian History)，这本书由安娜·德·拉·罗杰·圭尔汗创作，于1691年在法国出版，第二年便被译成英文。 [4] 乔治·华盛顿把这本书藏在他的弗农山庄图书馆里，直到现在仍在那里。

我以为挖到了黄金，但结果却是空欢喜一场。令人沮丧的是，虽然这本书已经躺在华盛顿的图书馆中三百多年了，但我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曾经读过它。乔治·华盛顿从未提到过这本书，在他的公文或信件中也找不到任何地方提到过成吉思汗。我以为自己快找到答案了，但迟迟未至的证据让我害怕自己只是在追逐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影。

几年之后，我的乐观情绪再次高涨起来。我偶然发现的证据表明，在查尔斯顿和波士顿之间往来的美国商人曾经进口并出售过关于这位蒙古领袖的书。除了乔治·华盛顿图书馆收藏的那本小说外，18世纪在美国殖民地最流行的书是《成吉思汗大帝传：古代蒙古人和鞑靼人的第一位帝王》(History of Genghizcan the Great: First Emperor of the Ancient Maguls and Tartars)，这部权威性的长篇传记由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蒂·德拉·克罗瓦于1710年出版。作为法国文化的鉴赏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为推广这本书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在他的报纸上刊登广告，通过在费城的邮局邮购渠道，将其分销到整个美洲殖民地。

那么，18世纪70年代谁买过这些关于成吉思汗的书？谁对他产生过兴趣？那些书又怎么样了？我再次一头扎进富兰克林的大量文献和著作中，我希望能寻找某种微妙的证据，能直接证明成吉思汗有关宗教宽容的法律曾经启发过美国的国父们，从而促使他们做出赋予美国这个新生

国家所有公民信仰自由的决定。当时的美国人和成吉思汗一样，正试图创建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国家。18世纪的美国学者由于没有自己的思想史，因此急于从一潭死水般的西方思想之外寻找政府和司法的模式。为了寻找更好的模式，他们广泛阅读，并对成吉思汗这位来自亚洲的领导者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是，尽管富兰克林对世界上所有话题似乎都有自己的看法，但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线索证明他的思想和蒙古人有联系。

最后，我终于在美国的开国元勋中发现了关键的线索。《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购买了许多本佩蒂·德拉·克罗瓦的成吉思汗传记。杰斐逊买了许多这本传记的法文原版书，并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他还送了一本给他的孙女——科妮莉亚·杰斐逊·伦道夫，作为她十七岁的生日礼物，并在书上题词，鼓励她好好研读这本书。 [1] 他留下了两本成吉思汗传记，一本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另一本存放在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而这两个图书馆都是托马斯·杰斐逊创立的。直到1795年5月26日，杰弗逊还写信给巴黎书商让·弗朗索瓦·福楼乐，想要再订购一本成吉思汗传记，并要求这本书要“包装精良，最好用皮革包装，或者干脆用海豹皮做封面”。 [5]

我小心翼翼地阅读了由杰斐逊收藏过的成吉思汗传记的复印本。这本书强调了成吉思汗的宗教宽容政策，并转载了一个关于宗教自由的蒙古法律文本，佩蒂·德拉·克罗瓦曾强调，这是成吉思汗的第一个成文的法律条文。这本传记指出，蒙古法律是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写就的，是为每一种信仰的每个信徒赋予信仰自由的普通法。在1777年，也就是《独立宣言》起草一年后，托马斯·杰斐逊在为他的故乡弗吉尼亚州起草美国第一部关于宗教自由的法律时，把他高尚的言辞写进了法律。他在阅读关于成吉思汗的书时已经接受了宗教自由的思想，还在成吉思汗传记中发现了一个具体的方法——把他对宗教自由的渴望变成法律。宗教自由是一项个人权利，而不是教会的特权。

蒙古法律禁止任何人“因宗教原因打扰或骚扰任何人”。 [6] 同样，杰斐逊的法律规定：“人不能……因宗教观点或信仰而受迫害。”成吉思汗的法律坚持“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喜好表达自己信仰的自由”。与此相应，杰斐逊的法律则规定：“所有人应享有表达信仰……以及表达对宗教事务意见的自由。”成吉思汗第一大法和弗吉尼亚法规虽然措辞不同，但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精神相似，其中规定：“国会不得通过立法确立国教或禁止人们自由行使宗教权利。”

***

蒙古帝国境内生活着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这种情况是以前的帝国从未遇到过的。这些人群包括穆斯林、佛教徒、道士、儒士、琐罗亚斯德教徒、摩尼教徒、印度教徒、犹太教徒、基督徒和各种万物有灵论的信徒。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统治过如此众多的宗教，而自己却不信仰其中的任何一种宗教。这些大宗教又细分为无数教派，相互激烈竞争，经

常发生恶斗。成吉思汗一生的最大难题并不是征服部落、城市和国家，而是如何使它们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和谐共存。

我从1997年开始研读《蒙古秘史》，我试图在书中找到所有的情节，分析在蒙古本土、中国和中亚地区所发生的有关事件，并对此作出评估。头一年，我以为用一个夏天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把蒙古人从喀喇昆仑到巴尔干半岛的征服全面梳理一遍，然而我用了两个夏天仍未完成。而现在，近二十年过去了，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之中，靠步行、靠骆驼、靠马匹或乘坐汽车进行研究。开始时是我一个人独自行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参与者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由敬业的蒙古学者和牧民们组成的团队，他们把自己关于当地的独特知识贡献给了这个研究项目。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从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扩展到成吉思汗死后才被蒙古人征服的缅北地区，以及从未被蒙古人征服但与蒙古大汗建立了合作关系的高棉帝国的残余部落。后一阶段的研究远超出了《蒙古秘史》的范围，但它仍是我的研究指南。

蒙古征服战争所造成的恐怖已经在书籍和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记录和描写，但是成吉思汗作为宗教立法者的作用却鲜为人知。在他的晚年，他延请宗教领袖从四面八方来到他的营地，旨在使相互仇视、争斗不已并困扰人类的各种宗教实现持久和平。一开始他竭力寻求自己的精神核心，但却逐渐变成了寻求理解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在仔细研究了相互争斗的不同宗教派别的法律和属性之后，他相信，只要人们可以因为自己的信仰而杀人或被杀，那么没有任何帝国能够保持稳定。

成吉思汗对现代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我以前的想象，这种认识促使我撰写第二本书。从研究一开始，我便认识到成吉思汗的精神追求以及他处理宗教问题时所采用的独特方法的重要性，但当时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观念和信仰的传播与技术创新(如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传播)相比，更加难以追踪。我已经花了近二十年时间研究成吉思汗的生平和他的蒙古帝国，现在，我觉得可以把自己粗浅的研究发现呈现给大家了。

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遵照和我相濡以沫生活了四十四年的妻子沃克·皮尔斯的吩咐而写的，她觉得我以前的作品忽略了成吉思汗和蒙古人丰富而独特的精神生活。她也给这本书起了书名。在撰写过程中，我曾把手稿读给她听，她对可能会产生的结果比我看得更清楚，可惜她却没能活着看到这本书的完成。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我的编辑卓伊·德·梅涅曾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和及时的引导，查尔斯顿图书协会的斯蒂芬妮·亨特也帮助我编辑此书，使我获益匪浅。

成吉思汗的思想观念在他生活的13世纪是革命性的，而在18世纪，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重新发现了他，因此他的思想至今仍在发挥着影响。他当时面临的很多问题和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社会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别无二致。在全球化社会中，宗教多元主义往往会导致极端主义和冲突的发生。如何在信仰自由和宗教狂热行为之间取得平衡？当这些宗教狂热

分子摆脱了公民社会的控制并反过来控制了社会，会发生什么？如何防止某种宗教的信徒攻击另一种宗教的信徒？如何才能迫使自称唯一真正信仰并互相竞争的宗教在社会中和谐共存？宗教的界限是什么？八百年前，成吉思汗曾竭力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今天人们仍在这条路上苦苦求索。

[1] 杰斐逊在送给他的孙女科妮莉亚·杰弗逊·伦道夫(1799—1871)的法语版《成吉思汗》一书上题词，作为她的十七岁生日(1816年7月)礼物。这本书后来赠给了弗吉尼亚大学。

目录

中译本序言
序言 成吉思汗、托马斯·杰斐逊与上帝
导言 众神的愤怒
第一部分 成为铁木真
　第一章 吃人的牙齿
　第二章 上天的金鞭
　第三章 草原的智慧
　第四章 冲突的自我
第二部分 成为成吉思汗
　第五章 光明的使者
　第六章 草原的耶稣
　第七章 缔造蒙古帝国
　第八章 火焰的卫士
第三部分 成为世界征服者
　第九章 飞鸟的双翼
　第十章 上帝的全能
　第十一章 命运的拇指
　第十二章 山野来的人
　第十三章 儒士与麒麟
第四部分 成为神
　第十四章 最后的战役
　第十五章 内外的战争
　第十六章 燃烧的书籍
　第十七章 死后的来生
　第十八章 未完的法律
尾声 上帝的霹雳
参考资料和进阶阅读
译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导言 众神的愤怒

在军营里，夜晚的光阴属于狂欢的年轻士兵，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则属于逐渐凋零的老兵，他们默默地拨动着记忆的灰烬，等待着新一天的来临。而此时正是躁动不安的灵魂在地上四处游荡的时候，它们会去纠缠那些懊悔过去、恐惧未来的人们。成吉思汗已经六十岁了，他的一生有很多记忆值得细细品味，也有很多记忆值得深深懊悔。

1222年，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成吉思汗还在外出征战。他一生经历过无数的战事。现在，在他的指导下，他的一个儿子正在伊朗北部作战，另外两个儿子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花剌子模汗国作战，还有一个儿子在阿富汗的山谷作战。他的将军们在前往进攻俄罗斯在欧洲的薄弱地带的路上，逐步扫荡高加索山脉。他一生东征西讨，征服和毁灭的城市和国家难以计数。

波斯编年史家术兹札尼说："据信得过的人说，他身材高大，腰板挺直，体魄健壮，胡须稀少，长着一双猫眼，精力充沛，明察秋毫，天资聪慧，料事如神。"对他的敌人来说，他"令人胆寒。他是一个屠夫，公正，果敢；他摧毁敌人，无畏，嗜血，残忍"。[7] 敌人一看到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武士的外貌，立刻就会感到恐惧。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刚扎克(Kirakos of Gandzak)写道："他们的样子就像地狱里的魔鬼一样可怕。"南宋使者赵珙记述："其面横阔，而上下有颧骨，眼无上纹，发须绝少，行状颇丑。" [8] 这位特使惊讶地发现，大汗并不像皇帝一样蓄发，而是留着和其他士兵一样的独特发型：剃光头顶，只在额头上留着一撮刘海，以保护灵魂，两条辫子搭在双肩上。[9] 这种发型非常怪异，但对控制虱子很有作用。到了晚年，他稀疏的长胡子已经灰白了。

与其他人相比，成吉思汗的一生成就卓著。虽然出生在蒙古草原上一个偏僻的地方，家世并不显赫，但他逐渐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对手。他不是王子，也不是有权有势的大家族的继承人。不仅如此，他和他的母亲还曾被部落驱逐，在草原自生自灭。然而在四十五岁时，他却完全控制了有着近百万人口的游牧草原部落。他的早年生活局限于蒙古高原，但此时他决定对外征战，开疆扩土。在征服邻近的西伯利亚、中国西北部地区以及天山脚下的西辽后，他着手进攻花剌子模汗国，该汗国统治着从里海到阿富汗的大部分中亚地区。他的军队继续西进，准备入侵伊拉克、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南部。

在他的指挥下，只有十万人的蒙古大军击败了百万敌军，并征服了数以亿计的人口。他的一位后裔尹湛纳希自豪地写道，成吉思汗"甚至征服了人们从未听说过的土地"。他的帝国"扩张到了世界上的人们从未踏足过的遥远的角落"。他"征服了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奇妙国度"。[10] 他所征服的土地和人口比罗马帝国整个历史时期所有皇帝所征服的还要多。他把敌人埋葬在飞驰的蒙古战马卷起的冲天烟尘里。

他身上综合了猎人的智慧和牧人的机敏。猎人知道如何追踪猎物，而牧人则知道如何巧妙地引导着山羊、绵羊、牛、马、牦牛和骆驼长途跋涉，保护它们免受野兽和天灾的袭击。他的军队行进的速度和技巧令人称奇，许多观察家一再将之比作风暴、洪水或其他来势凶猛的灾难。攻城拔寨就像他的战马践踏花草一样轻而易举。他摧毁敌军，并把成千上万的人迁往他方，就像把他的牧群迁往一个新牧场那样轻松自如。对他的手下败军，他会迅速决定他们的生死，就像在冬季开始时决定应该屠宰哪些动物一样不费吹灰之力。

蒙古人的入侵范围之广难以想象。在大约七十五年间，成吉思汗和他的直系后裔曾与众多国家的军队交战，这些地方的领土面积相当于四十个现代国家的大小。从1209年他发动第一次入侵开始，直到13世纪末他的孙子忽必烈去世为止，蒙古人成功入侵过的地方包括了现在的俄罗斯、中国、韩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斯洛文尼亚、摩尔多瓦、立陶宛、匈牙利、希腊(色雷斯)、阿尔巴尼亚北部、波兰、缅甸以及几个较小的地区(如中国西藏和克什米尔等)。他们还收到了一些王国的进贡，这些王国便是如今的越南、泰国和柬埔寨。他们的战线从布达佩斯到首尔，绵延五千多英里，差不多相当于从河内到布达佩斯的距离。

蒙古人的征服战争也遭遇过失败，这也许正显示了他们的野心之大、征服的范围之广。他们在维也纳郊外曾打过败仗，在西方，蒙古军队受到了埃及马穆鲁克军队的阻击；而在东方，蒙古军队被日本军队击败过；在南方，则遭到爪哇王国(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打击。除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时对德国和日本作战之外，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够做到在如此漫长的战线上同时展开如此大规模的战争。

***

当成吉思汗横空出世，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正是众神涌现、宗教统治世界的时代。从太平洋上的日本到大西洋上的爱尔兰，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到处都回荡着宣礼员宣召祈祷的声音、教堂里悠扬的钟声、僧人的诵经声，以及朝圣者的吟唱。艺术、文学、建筑和哲学无不着力表现宗教虔诚的主题，无论是在中国的宋朝首都、巴格达的哈里发宫廷、罗马教廷、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的宫殿，还是在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德里苏丹的堡垒、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的清真寺。在宗教的黄金时代，在东亚和东南亚，又高又细的宝塔不断拔地而起；而在穆斯林世界，宣礼塔则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在欧洲，大教堂冲天的尖塔星罗棋布。它们把人类的思想提升到天堂，它们是宗教胜利的标志，宣告着新的宗教权力似乎将处于永恒的统治地位。

宗教战胜了世俗生活。牧师、喇嘛、僧侣、毛拉 [1] 控制了历法，

为相互争斗的对手划界设限，并收缴税款。他们掌握着法院，安插狱吏，建立大学，开办医院，管理酿酒厂、银行、妓院和酷刑室。他们奢侈地花着贫富不一的信徒们自愿和被迫的捐款，攀上了艺术、文学、音乐和建筑的历史高峰。通过书法作品中真主的话语、山上和寺庙中的佛像和壁画以及描绘耶稣生活场景的画作，艺术已成为灌输宗教思想的工具。

许多组织宗教的领导者声称自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但他们却傲慢地忽视上帝的意志，违反他们自己在经文里写下的精神，专注于他们最喜欢的事情——聚敛财富，惩罚违反他们随意制定的有关膳食和性的法律的人们，建造规模宏大的建筑，设计奇特的服装仪式，不厌其烦地为经文应如何断句、印刷用什么颜色而争来吵去。当皇帝软弱、国王年迈、贵族忙于狩猎或吟诗作对时，宗教就变得愈发强大。

在欧洲，教皇自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压制国王和异教徒。在穆斯林世界，摇摇欲坠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作为世俗的皇帝和穆罕默德的神圣继承者，仍在巴格达统治着这片土地，而帝国境内大大小小的毛拉则在城镇和乡村强制性贯彻安拉的话语。在伊朗的山地活跃着阿萨辛教派，这个邪恶的教派是什叶派的狂热崇拜者，他们不断骚扰穆斯林、基督徒和异教徒，不时出来刺杀任何批评他们或拒绝他们强硬进贡要求的统治者。

宗教的盛行既没有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繁荣。每一个教派都在忙于巩固自己的地盘、强化自己的权威，并与其他教派激烈竞争，每种宗教都声称自己是神在人间唯一的代言人。三场激进的宗教运动——基督教、佛教和新兴伊斯兰教的追随者相互激烈厮杀，试图主宰世界。一些佛教教派的僧侣发明了武术，而基督徒和穆斯林则组织了大批圣战士，致力于传播他们的神的话语，在地上建立他们的神之国度。相互竞争的宗教控制了历史并声称掌握着未来。每一种宗教都有自己的一套程序和仪式，保证能带来永恒的和平，并声称自己掌握着唯一的灵魂救赎之路。

宗教并没有创造艺术、慈悲和美的理想王国，却使世界充满了仇怨。人类历史上早期的战争大都是因欲望和贪婪这些简单粗暴的人类情感而引起的，而世界宗教的兴起却鼓励仇恨并杀戮无辜的人们，只是因为他们敬拜神的方式不一样。由宗教引起的战争或以宗教之名进行的战争是对世界和平与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如今，以相互竞争的神的名义而进行的战争已经超过了贪婪、嫉妒和种族，成了暴力之源，而事实证明这些引战者是贪得无厌的。一场冲突刚刚平息，有信仰的人便轻易地找到另一个借口发动战争迫害非信徒、异教徒和其他异端分子，或者任何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以和平和怜悯的神的名义，虔诚的宗教信徒心安理得地对他人施暴，或用酷刑、抢夺、击打、致盲、强奸、火烧、水淹、受饿、肢解等血腥的手段，或通过奴役残害他人。只要有人对宗教产生了真正的威胁，那么从杀婴到种族灭绝，任何一种惩罚就会变得不算过分，也不算邪恶。这样的杀人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神圣的责

任，一个得到准许的杀手将得到永恒奖赏的圣礼。

就在精神混乱和暴虐盛行的13世纪，一支可怕的军队骑着毛发蓬乱的战马，突然从冰封的北方地平线冲杀下来，冲进寺庙、清真寺、修道院、堡垒、宫殿和教堂。从未有一支军队行动如此迅速，刹那间便跨越大洲。蒙古军队只有骑兵，没有步兵，也没有辎重车延缓行程，因此他们可以连续骑行几天。行军途中他们不断变换坐骑，如果需要，可以在马背上吃饭睡觉，而不用停下来扎营或生火做饭。蒙古人似乎从天而降，杀进处于交战中的诸国，宣称自己是神的惩罚，并声称要打破君王的统治权力，利用它们为人类服务，恢复上天的意志，执行上天的命令。

上天曾派出过许多使者来到世间：孔子、佛陀、耶稣、摩西、琐罗亚斯德、摩尼、穆罕默德以及许多不太知名的先知。他们的经文用波斯语、梵语、汉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亚拉姆语以及其他现已消失的语言记录下来。这些经文一开始都引起过人们巨大的热情，但是很快便被滥用，不再被重视。成吉思汗并没有宣讲从上天领受的新经文，也不打算建立一个新教会。他相信上天启示的经文已经足够多了，每个人基本上都知道是非对错。相反，他着手惩罚那些恣意妄为的国家，引导现有宗教履行其帮助人类顺服神的旨意的使命。如果劝诫、奉承和贿赂都不足以说服有组织的宗教当局以及以宗教名义行使权力的统治者，他会用鞭子击打他们，强迫他们回头，使他们重回道德之路。

成吉思汗重视所有宗教里包含的道德真理，他只是不信任那些自称拥有宗教权柄但却往往滥用其权柄的人。他让那些干了坏事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他处决和囚禁了一些人。对一般大众，他承诺，只要他们履行自己对社会和上天的职责，他们就会获得自由和财政支持。

成吉思汗的军队最初完全是由蒙古人组成的，但它很快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联军。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钦察人和奥塞梯人走下高加索山脉加入了联军，来自中亚地区几十个不同民族部落的突厥人也加入了联军。中国工程师组装了可怕的战争机器，用它可以击穿城墙，并改变整个河流的走向，而中国医生则负责包扎伤员。来自俄罗斯的斯拉夫人、来自萨克森的矿工，甚至还有一名英国贵族叛逃加入了这支国际联军。一位阿拉伯作家描述这支军队就像蝗虫一样遮天蔽日。[11]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和孙子们继续他们针对腐败的宗教和政治机构的战争。1257年，他们粉碎了阿萨辛教派，摧毁了他们在叙利亚深山中戒备森严的巢穴，并把他们的头目送到蒙古处决。然后，蒙古人策马奔向巴格达去制裁哈里发。

巴格达于1258年陷落，阿拉伯人漫长而逐渐暗淡的黄金时代终于结束了，但蒙古骑兵并没有止步。在那个世纪余下的几十年里，他们继续扩大他们的帝国。他们摧毁了基辅及其宏伟的大教堂，从而摧毁了东正教斯拉夫世界的文化中心。他们轻而易举地吞并了西藏，并击败了武艺精湛的高丽武僧。在匈牙利和波兰的战场上，他们一举摧毁了发誓把自

己的财富和生命献给教会的基督教圣殿骑士团的势力。蒙古人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诺言，并杀死了他们的领袖——西里西亚的亨利公爵，剩下的俘虏被送到西伯利亚的矿井和哈萨克斯坦的山区。

蒙古人一路扫荡到大马士革，接受基督教十字军领袖博希蒙德六世(他是安条克公爵和的黎波里伯爵)的投降，然后向西推进到与埃及接壤的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占领了中国南部，并染指东南亚，轻易地征服了大理的白族王国，这个王国的国王总是放弃世俗权力，想要成为一名僧侣。他们还占领了缅甸的蒲甘，那里的国王挥霍大量财富建造佛塔，而不是构筑防御工事。 [2]

蒙古人针对宗教中心发起攻击，一是因为它们保护与蒙古人为敌的当权者，二是因为那里藏着成堆的宝藏。他们抢劫寺庙和宗教古迹，把抢到的黄金和白银切割或熔化以作新的用途。他们只带走有价值的东西并把剩下无用的东西全部毁掉。从基辅大教堂到巴格达清真寺，蒙古人对宗教建筑的处置和对华丽宫殿或日常市场的处理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把依靠宗教搜刮的大量财富归回商业流通之中。这些财富成为他们振兴丝绸之路、打开国际贸易网络的第一笔资金。他们建造旅馆，设立银行，以便于客商自由旅行；他们镇压土匪和海盗，建造桥梁，清理港口，降低税率，并试图引进一个全球性货币系统。成千上万的商人，包括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和叔叔，很快踏上了蒙古人的道路，从欧洲来到亚洲，又从亚洲返回欧洲。他们打破了狂热宗教的控制，从而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繁荣时代。

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汗宣告：“仰赖神的美德，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一切都赐予我们了。如果没有神的命令，人能做什么呢？” [12] 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贵由汗的继承者蒙哥汗告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这是长生天的命令：在天上只有一个永恒的神，在地上只有一位君主成吉思汗。”蒙古人认为上天把权力赐给他信赖的人，借他的口向世人说话，并把这项使命委托给了成吉思汗，以保证“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都享有幸福平安”。 [13]

几个世纪以来，成吉思汗的敌人及这些敌人的后裔一直认为他与神为敌。在他死后，人们只记得他的征服和破坏，不承认他取得的所有成就。书籍、戏剧、歌曲和电影描写了他强大的军队，但他们的胜利通常被描绘为肆意盲目的破坏，他们所到之处血流成河，他们焚毁书籍，把人耳装进麻袋，把人头垒成金字塔。如果说成吉思汗在历史中发挥过任何作用的话，他的作用也只是上天的惩罚——他是上帝抽向世人的鞭子。

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看法与外国人的理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蒙古人一直视成吉思汗为精神和信仰上的导师，和菩萨、耶稣和穆罕默德一样。蒙哥汗不只把他看作蒙古民族的奠基人，还把他视作“甜美可敬的天子” [3] 。神的诫命很简单：每个国家都必须服从蒙古人。蒙古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在给路易九世的一封信中解释道，只有投降蒙古人，地球上那

些“用四肢走路”和“用两条腿走路”的生灵才能享有和平。[14]

我们对成吉思汗早年生活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一部叫作《蒙古秘史》的史书，这部书是在他去世两年后写成的。可能是蒙古大法官失吉忽秃忽收集了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这位蒙古帝国缔造者的资料。成吉思汗的话语具有某种力量，因为他征服了世界，所以人们认为控制他话语的人也可能会有这样的魔力。这本书写成之后便被当作一个具有神秘力量的宝藏严加看管，并且很快就被锁起来了。这份手稿属于皇室，他们小心翼翼地看护着它，甚至经常为此彼此猜忌，只有在必要时，比如当一位皇室成员需要带上一本踏上征程时，才允许复制。本书原稿是用畏吾儿蒙古字写成的，属于汗室，他们小心翼翼地看护着它，甚至经常为此彼此提防，只在必要时，例如当王室成员需要带上一本踏上新的征程时才允许复制。随着时间的流逝，用蒙古字写成的原稿丢失了，但在十九世纪，发现了一个用汉字标注蒙古语音的复杂的副本；用了近一个世纪才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和蒙古语。

谁拥有一本《蒙古秘史》，谁就拥有权力，因为人们认为，这本书和成吉思汗的灵魂相通，谁拥有它，谁就能威慑对手和外敌。这本书的拥有者可以根据需要从中抽取一句话或一个故事来支持自己当时想要采取的策略，只有幸运地拥有一个副本的远亲才可能提出异议。因此要辨别究竟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有人一时心血来潮编造出来的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几个传世的版本可能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后来又有人故意进行了删改，出于某种政治考量，书中不利于某些人的部分消失了，也有人又加进了新的内容。

这些相互交叉重叠的不同版本最终形成了几本不同的书，在中国叫作《圣武亲征录》，在蒙古叫作《蒙古秘史》(在波斯的伊儿汗国叫作《蒙古黄金史》)。一般而言，成吉思汗的话语、智慧、法律和训词是因蒙古词语“札撒”(Yasa)的各种变形而广为人知。札撒的意思是法令、命令或法律，它会写成 Ikh Yasa， Yasa-nama， yasa-yi-buzurg， as-Si-yasa， yasaq， zasag，或 jasaq。

当成吉思汗离开蒙古开始他的征途之后，他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很多语言的史料对他都有记载，包括汉语、拉丁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等，这些史料反映了穆斯林、基督徒、儒士、佛教徒、道士和犹太人各自不同的观点。这是史无前例的，之前很少有一个人受到过如此广泛的从不同文化视角投射的关注。

***

当他征服敌人，掳掠了他们的城市，并控制他们的市场之后，成吉思汗开始思考他们的行为和他们所宣称的信仰是否符合。那些宗教权威们一直习惯于发号施令决定他人的罪与罚、生或死，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正在接受一个非信徒的审判。成吉思汗对刚刚征服的城市布哈拉的领袖大喊：“你们犯了大罪。”他解释说，“你们中间的大人物犯

了这些罪……如果你问我这样说有什么证据，我告诉你，因为我就是上天的惩罚。如果你没有犯下大罪，上天不会给你这样的惩罚。”[15]

他停下来让译员翻译他的话，然后告诉人们有关他“与上天亲密交流”的事，宣称“他从上天那里获得灵感和权柄，统治地球上的所有王国”。[16] 正如他让被打败的领袖对误导他们的社会负责一样，他也让宗教领袖对自己及其追随者的行为负责。他对经文的准确性和先知的真实性不感兴趣，他也不管他们相信什么。他只根据他们的行为作出判断。

成吉思汗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人们怎么把他和其他征服者作比较，他对此也不感兴趣。他更多的是把自己成功的优势当作一个沉重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一种荣誉。他正在履行上天赋予他的使命，他在向他的臣民尽他应尽的职责。徜徉在阿富汗宜人的气候里，他的注意力开始转移，他不再思索作战计划的细节，因为他现在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凭借实力轻松取胜。他很喜欢阿富汗高纬度山谷清爽的气候和肥沃的平原，而他的注意力也从过去和现在转向未来。如果他去世了，会发生什么？他的家庭将如何？他的蒙古百姓将如何？他伟大的帝国将何去何从？

成吉思汗坦率地承认，自己突出的优点并不多，但他有能力发现周围最优秀的人才并激励他们。作为一个武士，他并不像他的弟弟合撒儿那样孔武有力；作为战略家，他不像速不台那样出类拔萃；他没有妻子孛儿帖那样果断，也不像母亲诃额仑那样坚定。然而他承认他们的优秀品质，并将其吸收。他最亲密的谋士都是他的蒙古同胞，尤其是他的妻子和将军们，但当他走出蒙古大草原，进入南方民族的定居地后，他马上便采取同样的策略，在当地寻找有技能的人为他服务。每当征服一个城市之后，他就会下令全面清查当地人口资源，包括他们拥有的本领。因此，他从中国招募了工程师、文员和医生，从穆斯林国家招募了会计师、审计师和金匠。

成吉思汗的晚年生活在阿富汗度过，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想请教有学问的人，听听人类文明中拥有最渊博知识的人的高见。他召见最优秀的穆斯林和中国学者与他会面。他从新征服的领土上请来了毛拉，也从中国宁静的道观里请来了道士，让他们长途跋涉来到阿富汗仍然烟雾缭绕的城市，听他们讲论自己的宗教信仰，问一问他们有何建议。

成吉思汗最初对宗教机构和定居文明深表怀疑。他怀疑那些拥有宏大寺院、财富和盛大场面的大宗教可能是一场骗局。然而，他想要听听这些奇怪的宗教组织的领袖们有什么话说。13世纪著作等身的学者、编年史家把·赫卜烈思写道，成吉思汗曾召见“智慧的主人”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朗读他们的圣书，让他们当着他的面讨论他们的宗教，并互相辩论。[17] 僧侣、祭司、占星师、魔术师、先知、炼金术士、占卜者、圣人、算命先生和江湖术士往往要长途跋涉好几个月，渡过最宽的河，爬过最高的山峰，穿过最遥远的边界，才能到达他的游牧营地。

他一次只和一位自封的神人谈话，听他们的教导，质疑他们的做法，审查他们的成就，并稽查他们的道德。他仔细检阅他的帝国境内所有著名的宗教，包括基督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儒教以及其他较小的世界性宗派。他白天作战，那些智者会在晚上见他，讨论道教和穆斯林神学、生命的意义、命运，还有天堂和尘世的关系，战争、暴力、和平、法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成吉思汗一生都是一个战士，为权力和统治地位而战，但他也是一个人，竭力寻求并理解精神的作用。这些历史上最奇怪的哲学论辩是以阿富汗的血腥战场为背景的，其影响在今天仍然以可见与不可见的方式回响在世界各地。

成吉思汗的这种追寻开始于许多年前，在蒙古最神圣的不儿罕合勒敦山上。

[1] 毛拉，即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编者注

[2]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为耶利米·卡尔亭的《蒙古人》一书所作的前言中写道："他们处死了哈里发，洗劫了巴格达，正如他们袭劫俄罗斯和匈牙利城一样。他们彻底摧毁了胆敢奋起抵抗他们的突厥部落，他们在对付欧洲的任何抵抗时也是如此……他们征服了中国，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蒙古王朝。他们的后裔征服了印度，同样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伟大的蒙古帝国。以同样的方式，波斯也落入他们手中……他们一举击溃了俄国人，他们的马蹄践踏着被鲜血浸透的土地。他们一战便粉碎了马扎尔人，使匈牙利浴血千里，迫使匈牙利国王仓皇出逃。他们占领了波兰，摧毁了德国北部西里西亚的骑士军团。"

[3] "甜美可敬"似乎是摩尼教概念，耶稣是甜美的。在一首摩尼教诗篇中这样写道："品尝可知主甜美，基督是真理之道；听道之人有永生。我品尝甜美，主的真理最甜美。品尝可知主甜美。"

第一部分 成为铁木真

当佛陀涅槃三千二百五十余年之后，世上出生了十二个暴君，苦害众生。为了制服他们，佛陀授记而诞生了成吉思汗。

——罗卜桑丹津《黄金史》，约1651年

第一章 吃人的牙齿

1162年秋天，成吉思汗出生于斡难河源头一个小小的游牧营地。秋天是繁忙的季节，牧民们忙着泡制乳品，宰杀牲畜，贮藏肉类预备过冬。人们采集雪松果、野葱头、森林里的蘑菇以及做药用的种子，也采集干花以备在冬季煲汤泡茶。在秋天，牧民们可以尽情畅饮源源不断的发酵马奶，享用最后一茬野草莓、山莓和羊酸奶做成的美味饮品。总之，秋天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关于成吉思汗的出生，已确定的事实不多，那些已知的部分也并不吉利。他出生前不久，他的母亲诃额仑被蒙古武士也速该从她的丈夫手中抢走，而也速该此时已经有了妻子和儿子。尽管也速该费了很大力气才抢到了他的新娘，但他很快就再次上路袭击塔塔儿部。该部与宋朝关系密切，是草原上富裕的游牧部落。诃额仑在新婚丈夫外出时生了一个儿子。据记载，成吉思汗出生时右手抓着一个小凝血块。后来，人们对这个凝血块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蒙古人把它看作吉兆，预示这个男孩命中注定要征服世界，但他的敌人则把它看作他野蛮本性的标志。

我们对成吉思汗童年的了解都是基于几种蒙古史料，而这些史料都是从同一本书《蒙古秘史》演绎而来。《蒙古秘史》是在成吉思汗死后立即撰写的，里面有一个家谱、有关他家族起源的神话，以及他一生中重大事件的重要见证人和参与者的集体回忆，而这些记录往往是当时当事人的原话。 [18] 《蒙古秘史》的叙事风格是平铺直叙的，很少修饰，但后来的作品对故事进行了加工润色。

任何值得讲述的故事都是值得加工改善的，因此关于成吉思汗出生的简单事实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被修饰渲染。在某些版本中，凝血块变成了圣石、玉印或珍宝。按照佛教《珠史》的说法，成吉思汗出生时伴有“吉兆”，“手握红色夜明珠，当日彩虹现于天空”。 [19]

也速该与塔塔儿人作战结束归来后，给他新生的儿子取名叫铁木真，因为他杀死的一个塔塔儿武士就叫这个名字。 [1]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铁人。也速该作为一个武士，以热爱冒险著称，他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具有同样的品性。虽然他是部落可汗的后裔，但他自己并没有称汗。他拥有一些牲畜，但《蒙古秘史》一般把他描写为一个猎人和战士，而不是牧人。

关于铁木真与他父亲的亲子关系，史书上的记载很少，这很令人困惑。在一个游牧武士社会中，孩子出生时父亲常常外出不在家，但也速该的缺席可能并不完全是意外。这个问题似乎涉及对亲子关系的疑问：铁木真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按照18世纪的一个蒙古史料的说法，当诃额仑被绑架时已怀有身孕，因此铁木真的亲生父亲实际上是诃额仑的第一任丈夫——篾儿乞部的赤列都。 [20] 后来的书，特别是那些佛教徒所

写的书，则根本不提他父亲的名字，或者干脆把他的出生说成是超自然的现象，说他是佛教神灵转世，但在他的家族中很少有人把他提到如此的高度。

蒙古社会看重社会性的父子关系，而不是生物性的父子关系。如果一个男人接受一个孩子是自己所生，那么他的部落也会同样接受这个孩子。在也速该的祖先中，有很多次亲子关系的生物链条显然断了，但孩子仍然得以成为家族正式成员，但是也速该却选择拒绝接受铁木真，或者说对他一直漠不关心。

蒙古孩子出生时，父亲通常会送给他第一份礼物，一般是用他自己羊群的羊毛做成的人偶，但铁木真出生时他的父亲正在远方作战，不可能送他礼物。不过另一个神秘男人碰巧在场，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猎人叫札儿赤兀歹。虽然他肯定不是铁木真的父亲，但他在这个男孩的童年时代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札儿赤兀歹来自兀良合部的一个小部落，生活在圣山不儿罕山附近的森林里。兀良合部猎杀狼、狐狸、紫貂、野山羊、鹿和羚羊，和游牧人不同，他们不搭建圆形的用毛毡做成的蒙古包，而是住在用木头和树皮做成的小圆锥形帐篷里。兀良合部有很多小部落，虽然他们不牧养草原牲畜，但一些人牧养驯鹿，用于挤奶，并驾着驯鹿穿过森林狩猎。当雪下得太深，无法使用驯鹿时，他们便踩在木板上，用两支木棍向前推进。他们还可以把骨头绑在靴子下面，滑过江河湖泊。人们看见他们飞快冲下山崖或掠过冰面，还以为他们在空中飞舞。这些不可思议的技能使草原牧民感到又惊又怕，怀疑兀良合部人的身上有看不见的魔力。

按照传统，蒙古人会在孩子出生时请一位智慧的老者预测孩子的未来。根据《青史》记载，札儿赤兀歹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能观兆，而他在很多重要时刻都出现在铁木真的生活中。[21] 据说他是第一个看出这个男孩将大有出息的人，也是第一个解释凝血块意义的人。但他太穷了，连一匹马也没有，他是徒步翻过高山来看这个孩子的。他是一个猎人，没有羊，也没有羊毛，因此无法拿羊毛做礼物，于是他带来了一个最宝贵的礼物：一张厚厚的黑貂皮，可以当作毯子用。

铁木真出生后，他母亲又生了三个儿子：合撒儿、合赤温和帖木格，最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帖木仑。也速该的第一任妻子速赤吉勒也生了另一个儿子别勒古台，比他哥哥别克帖儿小几岁。到了1170年，也速该的家庭共有两个女人和七个不到十岁的孩子。由于家庭人口多了，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每个女人都有她自己的蒙古包，但这两个女人住得很近。在那个时候，所有日期都是大致估算的，因为蒙古人没有日历。他们凭月亮以及森林或草原变绿多少次来计算年龄。如果新的植被出现在每年的短暂夏季，就意味着另一年已经过去了。没有多少人需要计算长达几年的时间跨度，也没有人想这样做。他们用“奥义”来计算孩子的年龄，可以是林子变绿三次、四次或五次，但在下一个孩子出生几年后，家里便不再这样计算了，因此，这个词不用于年龄较大的儿童或者成人。

亚美尼亚历史学家海屯(Hethum)对蒙古人比较抱有好感，但在写于1307年的《东方史精华》(The Flower of History of the East)一书中他却说，蒙古人活得“像野兽，既不会写作，也没有宗教。他们照料牧群，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为他们的牧群寻找饲料。他们不会熟练使用武器，大家都嘲弄他们，任何人都可以拿他们当附庸”。 [22]

蒙古男人经常不在家，总是外出狩猎、放牧或掳掠。妻子在家里用羊毛、毛皮、皮革做衣服或者造墙壁。毛毡是他们最精细的材料，她们把羊毛一层层地打在一起，做成虽然粗糙但又厚又暖又防水的料子，可以用来做靴子或帐篷的衬里。有时，男人劫掠回来，会带回中国纺织的布，但蒙古人从不织布。

蒙古人缺乏制造锅的金属，他们做饭是先把石头在牛粪火上烧热，然后把石头放进碗中或皮革制成的装满水和肉的袋子里，或者用同样的方法，在动物的皮中把动物的肉煮熟。这样什么都不浪费。在吃肉之前，他们互相传递烧热的石头，这样石头上沾的每一点油水都被刮去，或涂在身上抵御寒冷干燥的空气。因为天气寒冷，洗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蒙古男子把身上大部分毛发剃掉，以免生虱子，只留下面部的毛发和帽子盖不住的两个鬓角。

***

终其一生，铁木真都和他母亲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有时也会发生争执。他母亲比较喜欢她的次子合撒儿和小儿子帖木格。铁木真在这个家中似乎不受欢迎，这通过几件事可以看出来。在他还很年轻时，他父亲把家搬到一个新营地，却把铁木真留在废弃的老营地。很难确定这是纯属意外还是也速该有意为之，但幸运的是，这个男孩被泰亦赤兀惕部的首领塔里忽台汗发现了，塔里忽台汗把他领回家中。那时他就说铁木真“目中有焰，面上有光”。虽然蒙古文献没有透露铁木真在泰亦赤兀惕部住了多久，但是时间应该不短，因此塔里忽台汗说他曾经养活过铁木真。他后来解释道：“取来教之学，则似能学；故教之如训二三岁之驹焉者矣。” [23]

最终，铁木真回到了他的家人身边，但并没有生活多久。大约在1170年，当时他才八岁(按照蒙古算法是九岁)，他的父亲决定送他去和他母亲的家族弘吉剌部同住，据说是为了相亲。通常一个男孩要与他未来的妻子家人同住几年，侍候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训练和测试他，然后他们才会把女儿交给他。不过八岁时就做这种安排还是有点太早了。

这个故事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通常情况下，长子别克帖儿应该首先被送出去。再说，也速该为什么要去他所绑架的女人的家族呢？ [2] 他想把孩子送给他们作为补偿吗？还是他相信这个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要把他送还回去？他这样做，是不是为了化解与其他家庭成员的某种紧张关系呢？是不是诃额仑要求把孩子送到自己娘家以保护他的安全呢？

无论情况如何，也速该和铁木真从来没有到达诃额仑娘家的牧场。离开家几天后，他们停下来在一个名叫特薛禅的陌生人家的蒙古包里过夜，特薛禅有个女儿叫孛儿帖，比铁木真大一岁。《蒙古秘史》描述孛儿帖和铁木真都是“眼中有火，脸上有光”。特薛禅主动提出让铁木真做他的上门女婿，也速该虽然只在这人家里住了一晚，但冲动之下便把儿子给留下了。二人给这两个孩子定了亲，也速该把男孩留给特薛禅，还留下了一匹马。

两个孩子见面几个小时便匆匆定下了这门亲事，他们不会知道，这件事该有多么重要，不仅对他们二人，而且对世界历史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虽然定亲时他俩都还少不更事，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们最终结为夫妻，并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夫妇。他们的后代将统治庞大的帝国，而他们的基因也将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和欧洲的皇室、贵族与精英的血液之中。

就在也速该把铁木真留在特薛禅的蒙古包时，他说了些令人费解的话：“可留吾子入赘，而吾子善惊狗者，亲家休令吾子惊狗者。”[24] 这是什么意思呢？《蒙古秘史》中从来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提到过铁木真怕狗。也许因为特薛禅一家住得离也速该不共戴天的仇敌塔塔儿人很近，他可能是指他们。另一种可能性是，也速该是指铁木真的弟弟合撒儿，他的名字的意思是野狗。不管原因是什么，这句话有点奇怪，因为也速该的家族自称是一道金光的后裔，而这道金光后来变成了一只狗，很久以后，铁木真在晚年一直称呼最亲密的伴当为狗。

铁木真似乎并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但也速该却正在冒着完全不必要的风险。他曾经在战斗中杀了几个有名的塔塔儿人，而且他用其中一位被杀武士的名字给他的儿子起名，然而他却选择穿过充满敌意的塔塔儿部领地。尽管存在明显的危险，但当他路过一个营地时，看到那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宴，他仍然决定加入畅饮。饥渴战胜了理智。他以为，或者希望，他能以匿名身份参加宴会。正在欢宴的塔塔儿人马上就认出了他，但是在庆祝时流血会把厄运带给所有的参与者。根据《蒙古秘史》记载，为了不破坏庆祝活动的气氛，塔塔儿人给他的酒里投下了慢性毒药。此后三天，在骑马回家的路上，他毒性发作，病得越来越重。刚刚抵达自家后院，也速该就死了。他们家庭信赖的朋友蒙力克前去寻找铁木真，把他带回家。虽然铁木真在孛儿帖家里只住了一个多星期，但这已经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父亲去世后，铁木真在尚小的年纪里学会了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永远不要相信你的亲属。通常情况下，一个已婚男人死后，他的兄弟或另一个男性近亲会把他的遗孀娶过来，养活他们的孩子。但铁木真的叔叔伯伯们拒绝了这个约定俗成的义务。他们不愿娶也速该的两个寡妇，也不愿收养他的七个孩子。他们不想要那两个女人，而那些孩子年纪太小、人数太多，对他们没有益处。

也速该死后，他的家族让他的遗孀和他们一起度过了第一个冬天，

但随着春天来临，他们已经吃光了前一年储存的乳制品和肉类。周边地区的动物已经被猎杀殆尽或被吓跑了，饥饿和饿狼正在向这群羸弱不堪的人逼近。只要一场暴风雪、寒流或者严霜，就可能给这个家族带来灾难。突袭敌人抢掠食物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战马瘦弱，战士营养不良。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弱者会死去，而家庭成员会转而互相攻击。最弱的被牺牲掉，以便最强者能生存下来。

也速该死后几个月，为了甩掉累赘，他的家族把他的两个遗孀和年幼的孩子抛弃了，任由他们在草原上自生自灭。诃额仑是抢来的女人，是从她的第一任丈夫那里偷来的，她不是两个家族立下婚约明媒正娶的，因此这个家族觉得他们不欠她什么。他们对待也速该的另一个妻子速赤吉勒也是同样的态度，她也可能是刚出嫁时被绑架来的。一年一度的春祭需要用烤肉祭祀祖先，但在这个仪式上，他们宣布了抛弃这个赤贫家庭的决定。控制祭祖仪式的那位老妇人明目张胆地把两个女人和她们的孩子排除在外，不允许她们参加祭祀仪式。 [25] 当诃额仑坚持参加时，那两个老妇斥责了她，一个说："汝有邀而弗与之道乎？"另一个说："汝有遇则食之理乎？"

祭祖仪式结束后，她们决定带领幸存的牲畜寻找能解决燃眉之急的牧场。在整个家族参加的会议上，老妇人几乎宣判了也速该的遗孀和孩子的死刑。祭祖仪式上被排除在外只是这个死刑判决的第一步。她们命令家族成员："计不如弃此母子于营地而徙之。汝等其勿偕行。" [26]

对一个游牧民来说，被遗弃在草原上是再悲惨不过的结局了。正如17世纪的《黄金史》解释的那样："抛弃亲戚骨肉，将为外人之食；诸国破亡，将为流氓之食；行国易得，骨肉难寻；国人易得，亲族难觅。" [27]

他们自己的家族离开了，去寻找夏天的温暖，把这个多余的家庭留下来自生自灭。为了确保他们活不下去，以免将来再去纠缠他们，他们离开时偷走了他们全家的牲畜和家产。整个部落只有一位老人反对如此不公正地背弃这些妇女和儿童。他谴责他的同胞，结果被刺伤了。他们把他撇下，让他和被遗弃的寡妇和孩子们等死。《蒙古秘史》说："深水已干涸矣，明石已碎矣。" [28]

***

蒙古高原的自然风光高寒干燥，越往南气候越温暖。三条生态带自西向东绵延。南方是干燥的岩石沙漠，称为戈壁，中央带是绿色草原，蒙古语称为tal(草原)或kheer(原野)，而北部则是杭爱山以及周边的山林区。铁木真的家族生活在草原带和杭爱山区的交界地带，在这里，游牧人总是和林中猎人发生冲突。这些猎人会在夏天冒险走出森林，到草原上放牧，冬天则退到山里。

即使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草原上的生活也依然是严酷的。夏季短暂，但酷暑炎炎，紧接着便是漫长的冬季。沙尘暴、暴风雪、旱灾、水

灾的威胁不断袭扰着这片土地。尽管困难重重，诃额仑仍苦苦挣扎着竭力养活她的孩子。她不愿在空荡荡的草原上等待死亡，于是带着家人逃入森林。速赤吉勒和她的两个儿子可能和诃额仑一起逃难，也可能不久之后和他们会合一处。他们前往的是境内最高和最神圣的山。因为蒙古人极为崇拜大山，因此给山命名被视为禁忌，于是蒙古人便用各种简称或别名指称大山。诃额仑避难的山叫肯特汗，意思是肯特地区的国王，更常见的叫法是不儿罕合勒敦，即神山。札儿赤兀歹就是从这座山出发给刚出生的铁木真送去了一块貂皮。

大草原上光线明亮，一匹马和一位骑手出现在地平线上，方圆几英里内都可以看到。对于习惯了这种环境的游牧民来说，森林中恍恍惚惚的阴影肯定让他们产生一种令人敬畏但也阴森可怕的感觉。正如《蒙古秘史》所描述的，这个地方“左右皆陷泥险林，乃饱蛇亦不能钻之密林也”。[29] 然而山腰上也有着成片的土地，点缀着纤细的雪绒花、织羽草、紫苑、紫丁香、勿忘我、大婆婆纳，以及美丽的火草。在夏天，田野上五颜六色的蜂蝶飞舞，蜘蛛在花丛里忙着织网。当风渐停，肥胖的苍蝇马上便会聚集，而杜鹃清脆的啼鸣在山崖回响。

第一个夏季很美丽，秋天也迎来了丰收，可惜太短暂，转眼间无情的寒冬已经到来，小溪和小河冰封了，动物消失在地下。绿色的针松变成了黄色，落叶铺满地面，犹如覆盖着金色的地毯，很快就被落雪覆盖。凛冽的寒风吹打着悬崖的边缘，力量如此猛烈，能把暴露的皮肤撕裂，把脚趾冻伤。漫漫长夜唯闻狼嚎，如此寒冷的夜晚，月光似乎已经冻结。

诃额仑面临着无数艰难险阻，她把这片阴影笼罩的神秘土地作为她孩子们的避难所。在森林里，她拼命寻觅一切可以食用的东西。她用一根黑色的木棍在地里挖掘块根植物，她的儿子则去捕捉地鼠、小鸟、小鱼和其他牧人通常不屑一顾的不洁食物。兀良合人很会捕鱼捉鸟，这些被遗弃的男孩们很快就从山民那里学会了这些技能。这些难民躲在悬崖边的一小块开阔的土地上，设下路障，防止男人骑马闯入森林捕获他们。

诃额仑聪慧机智，在她的不懈努力下，铁木真和他的兄弟姐妹活了下来。她竭尽所能教导他们，但她是一个来自遥远草原上另一个部落的年轻女人，并不了解她亡夫的土地上特有的传统或神灵，也不了解这个陌生地方曾发生过的故事。对于草原部落来说，他们的土地就是他们的宗教。他们敬拜山川、山路、圣石和树木。他们离开自己的部落和家园被迫流亡，意味着他们也离开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漂泊流浪。铁木真没有父亲、祖母、姑姑、婶子、叔伯或家中其他长辈，他被至亲抛弃，他被认为不配活在世上，因此他必须寻找自己与精神世界的联系。

诃额仑努力用《古谚》教导她的孩子们，包括谚语、神话、谜语和诗歌等。这些古代名言含有智慧的种子，但并没有统一的教义或原则基础。谚语能够激发思考，但是并不太具有约束力，也不太适用于教导。

它们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指导性原则，也很容易适应新的情况，从而形成了一种灵活的知识体系。蒙古人识字的很少，他们的故事由母亲传递给女儿，由父亲传递给儿子，但主要是通过身教，通过模仿他人的行为，而不是把他们的所有信条诉诸言辞。

被遗弃的家庭最迫切需要的是食物、温暖和安全。生存是第一要务，无用的好奇心，乃至复仇的渴望，都将不得不等待很多年才能实现。铁木真并没有做错事，但却被放逐，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他把自己的情感深深埋藏在内心深处，但因自己遭受不公而激起的愤怒一直折磨着他的心灵。正如一句古老的蒙古谚语所说的："嘴里的牙齿吃肉，心中的牙齿吃人。"[30]

随着铁木真遭受到的每一个新的羞辱、每一个无端的伤害，随着每个新的冬天来临，他心中的牙齿也变得越来越锋利。

***

谁都没想到，有一天，正当诃额仑和她的家人在布奇悬崖安营的时候，老猎人札儿赤兀歹再次在森林中出现，他的背上还绑着一面鼓。[31] 鼓是一个传统的纽带，富有灵性的男人和女人通过鼓与神灵世界对话。 [3] 从那时起，铁木真的道德和精神教育自然地受到三个人的影响：他母亲诃额仑、后来加入他们阵营的一个"耳朵像鼬鼠，眼睛像貂"的老妇人以及老猎人札儿赤兀歹。[32]

在不儿罕山上，这位老人教会了铁木真一些有关精神生活的基本知识。我们尚不清楚札儿赤兀歹是他出生时就起的名字，还是后来的尊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引路人、使者和道德原则。 [33] 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札儿赤兀歹都是铁木真的精神向导，指引他采取正确的生活方式。

他教导铁木真，宇宙之母存在于太虚之中，那是一个没有时间或空间的深渊，那里无人、无灵、无光，也无有形质的东西，不分上下，不辨善恶。她是最原始的爱，一直在寻找可以寄托她情感的载体，为此她需要一个孩子。她在自己无限的灵魂中创造了天空，因为天空中没有光，于是她拿出自己跳动的心脏，做成太阳，照亮天空。以天空为伴，她在自己金色的子宫里孕育了孩子，但因为世界没有地方生孩子，因此她把自己的身体融入了大地。为了让大地有生机，她的胸部变成了源远流长养育万物的河流。作为一个好母亲，她献出了自己的身体，这样她的孩子才可能有生命，茁壮成长。 [34] 她和所有慈母一样，为了自己孩子的生存，甘愿献出自己的身体。

铁木真的家族和部落的男人不愿保护他，但这座山保护了他。在他母亲和札儿赤兀歹的教导下，他已经学会了敬畏大山，把它当作世界的中心、生命之源头。宇宙的三个维度在山顶上相交，山顶之上是光的海洋，称作腾格里或天堂，山顶之下是海洋，称作达赖。雄性的天空和雌

性的大海在地球上相遇，在光和水的海洋中漂浮。在山顶上地母与天父相遇。在这里，阳光融化坚冰，水从岩石和泥土间流下。在鄂尔浑河附近的石头上有一条一千多年前的石刻如此写道："当蓝色的天空和红褐色大地被造时，人类亦被造于天地间。"[35]

杭爱山林区是富饶的生命之母，但在高山的树木带以上，只有巨大的冰砾和犬牙交错的石崖突出向上，上面是终年不化的冰雪，这里似乎没有生命。这种雄性元素提供了地球坚硬的骨骼。雌性的森林和雄性的岩石一起形成万物的起源。它们形成了一个由三个灵魂构成的宇宙，分别是雄性的、雌性的和不朽的灵魂。所以每一种生物都获得了一个不朽的灵魂和两个必死的灵魂。根据蒙古人的信仰，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获得生命时骨子里是雄性的灵魂，血和肉里是雌性的灵魂，而在他们的头脑和心中则是永恒的灵魂。

***

冬天是在山上狩猎的季节，但也是一年中最神圣的季节。蒙古人认为，像牛奶一样的雪拥有净化心灵的魔力，可以让灵与肉都变得洁净无垢。猎人们用初雪用力擦洗裸露的皮肤，直到雪完全融化，皮肤被冻得通红为止，这样他们的身体便可以做好准备迎接雪后的严寒。与此同时，如果他们最近有不当行为，也可以借此得以净化。这个仪式一般是在冬日的第一场大雪落下时举行，而且参与者主要是男人，只要身体或精神有恢复的需要，这种仪式就可以随时举行。

像札儿赤兀歹这样比较有经验的猎人则鼓励年轻人用其他方法把自己的身体推到体力和耐力的极限。每一天都会有新的危机降临，每一天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严寒、酷热、饥饿、干渴、孤独或疼痛随时都可能发生。要是哪一天没有新的挑战，蒙古人便会主动制造挑战。他们经常手里拿着热石头擦拭自己的身体，或者坐在灼热的火焰旁边，竭力表现出若无其事没有疼痛的感觉。每一个挑战都是征服的机会，一次征服自我的机会。

波斯历史学家拉施德丁曾从犹太教改信伊斯兰教，但他忠实地服务于蒙古人。他写道，在成吉思汗的斡难河和克鲁伦河流域的家乡，萨满习惯于"裸体坐在冰冻的河里，从他的身体发出的热气使冰融化，蒸汽会从水面升腾"。[36] 还有人记载，圣人会在大雪纷飞时裸体而行。[37] 中亚神话经常把裸体与精神力量联系在一起，而精灵都很少穿衣服。[38]

蒙古人不崇拜人格化的神。他们不承认有胳膊有腿、有头有脸有人形的神，也不承认能和人对话的神。他们只简单地承认，在宇宙之上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神圣力量，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神圣存在，无形，无语，却无所不在，环绕着我们的地球。他们不相信神来到人间表演神奇的把戏，在燃烧着的火舌中对人说话，或者与人类做爱。他们不认为天上的神会有人类的嫉妒和愤怒等情感。同样，他们觉得神没有必要和他们说话，或为他们制定法律。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宇宙神圣精华的一

部分，因为这种神性，每个人的灵魂都拥有了基本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是超越一切的，是人类的语言无法表达的，也是无法被写进法律的。

人们可以在山顶上看到天空，通过天气判断其心情，但大地是通过森林中的树木传达自己的情绪的。 [4] 在蒙古语中，森林除了可以用来计算孩子的年龄外，它还蕴藏着大地的智慧。“森林”这个词在蒙古语里念“oi”，意思是“心”和“记忆”。当地球母亲为她的人类孩子感到高兴的时候，树木就会茁壮生长，各种果类出产丰富，香味四溢。当人类行为不端时，树木便不再蓬勃生长，果实枯萎，失去生机。游牧人崇拜本地最高的山，也以同样的方式崇拜本地最大的树，他们会向它献祭、祈祷，并举行特殊的庄重仪式。波斯历史学家术外尼曾和蒙古人一起生活过，他写道：“他们走到树前下拜，就像孝顺的孩子向他们的父母所做的那样，他们也尊崇周围滋养树木生长的泥土。” [39] 树木可以把水变成火，因为它吸收雨水，把它变成可以燃烧的木材。用相似的方式，树木也能产生香味，当它们燃烧时，便把祈祷变成青烟，带上天空。土、水、火，这些生命的雌性元素，在树上得以统一。

***

《蒙古秘史》生动地描述了铁木真的青少年时代草原上到处存在的混乱和动荡，其中一段文字写道：“星天回旋焉，列国相攻焉，不入寝处而相劫焉，大地翻转焉。” [40] 蒙古人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毫无目的地厮打在一起，谁也得不着好处。在一个邪恶无缘无故肆意横行的世界上，人们“未尝思而行之也，乃所遭使然焉，未尝背而行之也，乃相战使然焉”。铁木真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有组织宗教的影响，也远离他的部落和祖先，而在他的余生中，他对二者都抱有深深的怀疑。

铁木真青年时期在遭遇“众水回旋”和“熊熊火焰”的苦难中度过，不儿罕山成了他的避难所。 [41] 被自己的部落放逐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惩罚，而是一个锻炼身心的独特机会，这种磨砺将他与世上的其他弱者区别开来。像他之前几代的儿童一样，他学会了把大山当作老师、把岩石和树木当作经文。马鞍带子松动了，岩石滚落了，树木奇怪地倒在地上，都是大山从上天那里传递给他的某种信息。他慢慢学会了阅读并理解这些信息。有几次在山上，铁木真从马鞍上滑了下来，从此他明白了不断保持平衡的重要性。他懂得了，不管他做出多大的努力、他的意志多么坚强，只要在马背上失去平衡，一切都将化为乌有。骑士必须不断地调整绑在骆驼和牦牛背上以及车上的行囊，也要调整他们背上的包裹。要学会如何把每个物件放在合适的地方，绑紧扎牢，保持平衡，这是生存必需的一项技能。

在大自然这所严酷无情的学校里，铁木真学会了通过确定方向来找到正确的道路。在空旷的草原上，骑手很容易就能找到道路，因为道路显露无遗。他们可以在危险来临前几个小时就发现它。白天的太阳、夜晚的北极星能帮助牧民确定方位，从而找到安全的道路，但在山中，很少有一览无余的通道。任何地方都可能潜伏着危险。铁木真学会了通过

观察树木的形状和动物的足印寻找道路，通过观察动物的粪便确定什么动物曾在什么时候从这里经过。

这个男孩的生存取决于能否学会分辨马蹄声和其他正在到来的野兽的声音有何不同。正是在这座山上，他的“智慧突然迸发，他的大脑开始开窍” [42] 。尽管大山非常强大，但它不会强迫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任何事。它只是指明方向。在这么小的年纪，他就不得不自己作出选择，而他也经常作出错误的选择。蒙古人认为一个人要犯七次错误才能学会一个教训，铁木真担心其他草原勇士的袭击，也担心自己不断犯错。

不儿罕山的峡谷和凸出的岩石为他提供了遮风避雨之所，同时也为他提供了精神上的避风港，在那里，他可以轻声诉说他的恐惧，他可以坦白他的欲望和愿景。这个男孩与大山之间的亲密关系弥补了他失去男性亲戚的缺憾，那些亲戚已经抛弃了他，不顾他的死活。这座山成了他的知己和向导。他很少信任别人，也不对人透露心事，总是很难放松自己，郁郁寡欢，但在他心爱的不儿罕山上他却感到放松和愉快。他生活中的重要原则和关系都起源于此，或在山坡上，或在密林中，或在大山的阴影下。

铁木真认为，他能活下来，都是因为这座山的祝福和庇佑，因此他发誓一生都要尊崇它，并向它祈祷。《蒙古秘史》记载道，他爬到山顶，“挂其带于颈，悬其冠于腕，以手椎膺，对日九跪，洒酒而祷祝焉”。在世界秩序中，他的生命并不比一只虱子或一只蚱蜢更重要，然而，尽管他微不足道，又命运多舛，但这座山拯救了他，也养育了他。他发誓：“每朝其祃之，每日其祷之。我子孙之子孙其宜省之。”[43]

第二章 上天的金鞭

《蒙古秘史》很少交代在重大冲突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记载成吉思汗家人的想法，往往突然之间便开始描述一场意外的、莫名其妙的暴力事件。当铁木真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时，他和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别克帖儿发生了冲突。别克帖儿是速赤吉勒的长子，可能只比铁木真大两三岁。冲突的起因似乎是别克帖儿抢走了铁木真钓到的一条小鱼，这说明他比铁木真年长，也更有力气，由于他们的父亲不在了，他打算承担起持家的责任。

当铁木真向母亲抱怨时，她却偏向别克帖儿，而不是铁木真，她告诫儿子：“影外无其友，尾外无其缨。”按照蒙古部落传统，如果一个女人亡夫的兄弟不愿收继她，那么亡夫另一个妻子所生的儿子就应该这样做，不管他多么年轻。别克帖儿可能正打算收继诃额仑，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偏向她的继子，而不是她自己的儿子。无论紧张关系的起因如何，母亲的责骂只会使铁木真心情阴郁、怒气冲冲。

最后，铁木真横下心来，决定把别克帖儿杀掉。一旦他拿定主意，很快便采取了行动。他和弟弟合撒儿悄悄跟踪着别克帖儿，好像猎杀一只野狼或鹿那样。他们发现别克帖儿坐在一座小山丘上，便前后夹击他。别克帖儿手无寸铁，没有反抗。他重复着诃额仑的话，先是嘲笑铁木真没有朋友，只有自己的影子；没有鞭子，只有马尾巴；然后恳求他的兄弟们，他们应该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而不是自相残杀。

铁木真和合撒儿联手射死了别克帖儿。他是成吉思汗崛起过程中的第一个受害者。

当诃额仑意识到发生的一切时，她被激怒了，她对她的儿子破口大骂，骂他是一只老虎、豹子、蟒魔、豺狼，她尖叫道：“毁矣!”但不管她有多么痛苦，流了多少眼泪，别克帖儿已经死了。铁木真不为所动，他年轻的兄弟姐妹很快就意识到，激怒了他后果将不堪设想。只有和他一起杀人的合撒儿从来不怕铁木真。尽管家里发生了谋杀事件，但别克帖儿的亲兄弟别勒古台仍保持着对家庭的忠诚，后来活得比家庭所有其他成员都长寿。

铁木真在童年时代遭遇了一系列危机，他被人抛弃，父亲去世，在荒山上为了生存长期苦苦挣扎。他还是一个孩子，不得不应付危机，但却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他还太年轻，难以抵抗周围成人的势力。杀害别克帖儿是一个转折点，他第一次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戏剧性的一幕显示了他的坚韧和勇气，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件事引起了他的敌人的注意，他们认识到，一个年轻人既然能杀死自己的兄弟，将来也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泰亦赤兀惕部的首领以前曾救过铁木真的命，现在却感受到了他的威胁。他淡淡地说：“雉雏每其退翎乎!涎羔每其长成

乎!”他指的就是铁木真和合撒儿。他命令他的部下来抓捕铁木真。[44]

铁木真从泰亦赤兀惕人手下逃脱，躲进了森林里。又累又饿地度过了几天后，他以为应该安全了，可以从森林里出来了，寻思着抓他的人可能已经累了，应该不会再找他了。可是正当他试图从藏身的小沟爬出去时，却发现一块白色的大石头落下来堵住了出路。他想把它挪开，但灌木和树木碍手碍脚。他认为这些都是上天不让他离开的启示，但他仍决心反抗命运。连续九天不吃不喝后，他意识到，除非他愿意放手一搏，和对面酒足饭饱手持武器的人打一仗，否则他的命运就是一个死在山上的无名男孩。他问自己：“岂可无名而死？计不如出。”[45]

他手中只有一把削尖的小刀，他开始慢慢用它砍断挡路的树枝，直到能逃出去为止。在林子的另一边，泰亦赤兀惕的士兵正等着他，他们“见之，遂执去”。[46] 把他锁在枷上，俘虏他的人奴役他，羞辱他，他随时都会丧命。在生死关头，他忍受着难以忍受的一切，但没有忘记他唯一的目标：活着，逃走，出人头地。

等了很久，逃生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抓他的人正在庆祝，喝得酩酊大醉。枷锁把他的头和双臂牢牢锁住，以防止他逃跑。这本来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但他却把它变成武器，袭击了其中一个看守士兵，将其打昏，然后逃走。他戴着枷锁跳进冰冷的河水里躲了起来，而抓他的人正在找他。夜深了，他得到与先前结交的一家人的帮助，设法挣脱枷锁，逃离了他的仇敌，回到家中，随即逃进不儿罕山以保安全。

***

还在孩提时代，铁木真就亲眼看见母亲终日辛劳，挣扎着养活自己的孩子。从她身上他学到了一点，尽管人生中会遇到最艰难的时刻，会发生最痛苦的悲剧，但命运从来都不是邪恶或歹毒的。它不是一种惩罚，命运会制造某种障碍，但靠着坚强的意志，这些障碍都会被一一克服。尽管诃额仑曾被绑架，失去了丈夫，随后又被亲族抛弃，但她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救活她的孩子。这种决心增强了她的勇气与智慧。她能从每一次挫折中吸取教训，铁木真也从她那里学到了这一切。

蒙古人认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上天注定的。如果神不想让人们奋斗，它就不会赐给他们梦想的能力。和其他孩子一样，铁木真也受着命运的限制，命运决定他何时何地出生，父母是谁，是高还是矮，是富有还是贫穷。命运决定天气等诸多无法控制的因素，但他的精神决定了他在这种情况下能做什么。

蒙古人说，地母和天父赐给每个人一匹风马(khiion)——一个激励人的神灵。有时沿着命运注定的道路飞驰，但有时它也会制造新的挑战，指向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为了赶上风马，年轻人不得不赤脚穿越冻土去追赶它，忍受它所带来的任何艰难困苦。虽然每个人都有一匹风马，但只有最勇敢的人才能抓住它，学会驯服它，并骑上它驰骋。虽然

风马很像古希腊思想中的“克里斯玛”[5] 和罗马思想中的“革尼乌斯”[6]，但它并不是完全外在于人的。如果善行越积越多，那么精神的力量也就会越来越强大。反之，如果一个人懒惰、行为不端、居心不良或者违反传统，那么这种精神力量也会萎缩凋敝。

据说宇宙之母在每个儿童的内心都留下了一根闪耀着金色光芒的脐带，一直绵延到北极星，而北极星又系在宇宙上。这根脐带是一条金色的绳子，就像放牧时拴在牛身上的长绳子一样，牛可以在一定空间活动，但不会走失。它使每个人直接与上天相连，给予每个人不断向上攀登的手段。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成人，他保留着选择的权利，也保留着那条看不见的金色纽带，把他的思想和灵魂永远与宇宙之母连接起来。

从年轻时起，铁木真就认为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他知道，一个人可以获得力量以克服最不幸的命运。一个人面对干旱可以选择认命，也可以选择去寻找水源；面对恶狼，可以选择屈服，也可以选择对付它；在敌人面前，可以畏缩不前，也可以努力战胜他们。[47] 对那些接受失败的人，更多的失败会落到他们头上，因为那是他们应得的，而上天对他们也越来越漠视。对那些极少数仍然决心取胜的人，更多的胜利会眷顾他们，而上天也会赐给他们更多的爱和奖励。神的意念是让人类思考，而不是盲从。很久以后，这种思维方式在蒙古武士向巴格达发射的一支箭上所带的信息中得到了表达：“如果上帝想要实现它的意志，它将废掉聪明人的智慧。”[48]

草原游牧民在骑马时会用一个小马鞭策马快跑。通常马鞭一端有一个短木柄，另一端用牛皮条编成，短木柄上还会有一个皮革环，可以挂在骑士的手腕上，不影响他的手拿别的东西。骑士只能用鞭子从身后抽打马的臀部，绝不能抽打前面，因为抽打马的脸或脖子是死罪。正如骑普通马的骑手需要这样一条鞭子一样，骑风马的骑手也需要一根特别的鞭子，它能驱邪辟灾。鞭子用于加速，但它也象征着政治权力和精神感召力。一个没有马鞭的人会被认为是在生活中毫无方向的人，但有了马鞭，他哪儿都能去，什么都能做。

铁木真知道，他需要找到自己的马鞭。他的母亲的责骂只是坚定了他的决心。没有一条马鞭，他怎么能骑上他的风马呢？

***

蒙古谚语说：“成长过程中学到的知识犹如朝阳。”[49] 铁木真在不儿罕山周围的森林中受到了严格的身体和精神训练，但他在山上的避难岁月并没有让他学到关于世界的广博知识。在不儿罕山与世隔绝地待了九年之后，他渴望人类的陪伴，也渴望接受命运的挑战。这种渴望促使他走出自己安全的世界。十七岁时，他准备离开这座山，去开创他的未来，但他从没有忘记对心爱的不儿罕山许下的诺言。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他多次回到这座山里，来思考他未来的道路，来寻求慰藉从而作出艰难的决定，并梦想着任何草原男孩所不曾梦想过的事物。

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去寻找孛儿帖。他八岁时就和这个当时九岁的女孩定了亲。定亲后不久，他父亲就被人谋杀了。他第一次看到她，就发现她“脸上有光，眼中有火”。他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就找到了她，而他高兴地发现，她还没有和别人结婚。《蒙古秘史》说，她的父母很高兴见到他，但他们一定感到惊讶，这个奇怪的年轻人竟然没有忘记他多年前定下的婚约。铁木真并不是她家里的一分子，但铁木真和她家里人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也参加了她们家族的祭祖仪式，而铁木真自己的家族曾拒绝让他参加这样的仪式。孛儿帖最终将把铁木真从深山避难之处带进一个更广阔的富含文化和精神土壤的世界。

孛儿帖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铁木真家和他的家人同住。他依然一贫如洗，而她肯定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丈夫：没有财富，没有朋友，也看不出他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对于这位过惯了拥有大群牛羊和富足生活的女孩来说，铁木真生活的半森林地区肯定是过于荒凉了。那里牧场有限，他的家庭主要以狩猎为生，而野生动物并不总是很丰富。当孛儿帖母亲回家，把她留在这个被人遗弃的陌生家庭后，她肯定感到有点孤独。但事实证明，孛儿帖对铁木真忠贞不渝，铁木真也同样对她忠心不二。他们的爱情成为他生命中最坚固的力量之一。

爱或对爱的幻想能够消除一个人多年遭受的穷乏和痛苦，爱可以使心灵忘却这一切不幸。铁木真和孛儿帖的后代后来纪念他们时，抚过记忆的浪漫面纱，把他们描写成美丽的神仙眷侣。孛儿帖被描绘为长着一双像晨光一样明亮的丹凤眼，有着像抛光玉石一样的鼻子、犹如珊瑚纽扣一样的嘴唇。她就像一位九天女神，她是民族之母。[50] 铁木真面如满月，长着一双龙眼，鼻子似圣山，双唇如绿松石。他有一双硕大的耳朵，有一个宽阔的胸膛，身上散发着茉莉香味。十步之外，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将统治一个王朝。

童话故事的结局可能是这样的：主人公冒着重重危险，历尽艰辛，九死一生，只为了活下来并在爱人的怀抱中找到真正的归宿。然而，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并没有这样美好的未来。对铁木真和孛儿帖来说，找到对方，坠入爱河，只是冒险生涯的第一步。

消息很快在草原上传开，一个美丽的女孩嫁到了不儿罕山后面一个被遗弃的小家庭。尽管铁木真以残忍闻名于世，但他的新娘太出类拔萃了，就像一个诱人的奖品一样让人不住垂涎。在游牧社会，男人什么都争，尤其是争夺对妇女的控制。诃额仑的第一任丈夫是个篾儿乞人，当她的一些亲戚听说孛儿帖嫁给她儿子后，就决定把她抢过来，作为对绑架诃额仑的报复。

孛儿帖来到这里几个月后，篾儿乞的突击队突然扑向这个孤零零的营地。诃额仑跑向马群，命令她所有的孩子，包括铁木真，骑马快速逃离。她知道篾儿乞人要干什么，于是她留下了速赤吉勒和孛儿帖，还有一位一直帮她家剪羊毛的老妇人。作为母亲，诃额仑唯一的目标是救她的孩子，就算牺牲她的儿媳妇也在所不惜。铁木真听从了母亲的命令，

也没有考虑后果。他才十七岁，与其说是一个男人，不如说还是个孩子。他还没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后来亲口承认：“我极其害怕。”[51] 在年轻的时候，他很叛逆，居然一怒之下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别克帖儿，为此他的母亲非常厌恶他，但当他害怕的时候，他本能地服从母亲作出的抛弃孛儿帖的决定，根本没有意识到失去爱妻的痛苦。

他的家人都逃向不儿罕山，而孛儿帖和那个老妇人试图驾着牛车往相反的方向逃跑。速赤吉勒并没有跑掉，她只是在等待。士兵们先抓住了速赤吉勒，把她双脚朝上扔在一匹马上，然后出发去追另外两人，她们正在匆匆穿过树林，牛车的轴断了。士兵们很快便找到了她们。这三个女人转移了突击队的注意力，使得诃额仑有足够长的时间带着她的孩子逃进山中。

篾儿乞人未能抓住诃额仑，也没有抓到她的六个孩子，但很满意他们的丰富收获，他们把这三个女人作为战利品带回了营地。也速该曾把诃额仑从赤列都手中抢走，现在他们抢到了孛儿帖，报了一箭之仇，弥补了他们的损失。孛儿帖被许配给了赤列都的弟弟赤勒格儿。

铁木真意识到现在他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正像一怒之下杀了他的哥哥一样，现在他又在恐惧中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如果他被恐惧和愤怒所支配，他将会永远屈从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但如果他能把握自己的情绪，集中精力，那么一切都将在他的掌握之中。

铁木真知道，无论他有多么坚强、勇敢、坚定，他绝不可能独自对付一大帮武士。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盟友，夺回他的妻子看起来是件希望渺茫的事，于是铁木真开始祷告。他爬到不儿罕山顶，站在那里，面对着太阳母亲。他摘下帽子，解下他的皮带，把它挂在脖子上，这是一个完全降服的动作。他握紧拳头，击打自己的胸膛，向太阳跪拜九次，然后开始祈祷。

就在此时，铁木真作出了平生第一个成年人的决定。他发誓要找到他的妻子。他绝不允许别人把他心爱的女人从自己身边夺走，他发誓要救孛儿帖，即使为此而死也心甘情愿。他宁愿像一个战士那样战死，也不愿屈服于残酷的命运。

但是，当时他所能依赖的只不过是一两个人的帮助，比如他的兄弟合撒儿或札儿赤兀歹，要袭击篾儿乞部并救出他的妻子，他需要更多的盟友。当时的蒙古草原被两大部落所控制，西部是克烈部，东部是塔塔儿部。这两个部落曾经一度联合起来，但克烈部已经脱离了塔塔儿部，因此这两个部落如今势如水火。

塔塔儿人曾经杀害他的父亲，一直是他家族的死敌，因此，铁木真唯一可接受的选择是和克烈部首领王罕恢复关系并乞求帮助。虽然作出这个选择很容易，但它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塔塔儿人和克烈人虽然生活方式相似，但文化上的差异很明显，塔塔儿人和其他东方部落向往中

国，并效法中华文明的模式，而克烈部则向往西方，用闪米特人字母系统写字，并以基督教为其官方宗教。当铁木真作出自己的选择，决定把赌注下到克烈部时，他可能并不清楚这两个部落之间的差别，当然他也不会关心这种差别，但这后来将成为他一生中的重要因素，并影响到他即将创建的帝国。

就在孛儿帖被绑架后不久，铁木真、合撒儿和他忠实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勒古台骑马从不儿罕山出发，越过博格达汗山，来到了王罕在图拉河畔黑林里的营地，营地驻扎在现代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以南不远处。当铁木真到达王罕的营地时，他恳求王罕“望我父汗罕，为之救还妻子而来焉”。[52] 虽然王罕和他的人民住在蒙古包里，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王罕的营地和诃额仑的营地是截然不同的。诃额仑的营地生活很简单，而王罕的营帐很大，是用毛皮制成的，他的妻子穿着丝绸的衣服。他们同样喝发酵的马奶，但王罕的部民是用银碗喝，他们骑的马配有铁制的马镫。他们不是简单地祈祷天父和地母，而是由穿着华丽的基督教牧师手捧圣书高声呼喊主祷文神秘的开头语“我们在天上的父(Abui Babui)”。[53]

铁木真的父亲在王罕同克烈部汗室的内讧中曾竭力帮助王罕，且在对塔塔儿部的几次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王罕意识到如果能收纳也速该的儿子为自己的扈从，将受益无穷，于是他急忙答应帮忙：“尽灭篾儿乞惕，救还汝孛儿帖夫人。”[54]

对王罕汗廷的访问给了铁木真一个启发，也给了他新的信心。正当他鼓起勇气奋力一搏时，命运便突然赐予他意外的祝福：他发现了一条鞭子。他从王罕营地骑马返回时，经过博格达汗山北面一条狭窄的通道，来到了图拉河南岸一片肥沃的草原。近五个世纪前，这个地区曾是突厥部落的远东边界，正是在这里他们集结起来攻击鞑靼人和南方强大的中国文明。过了博格达汗山不久，铁木真很快便会看到一串越来越大的石头矗立在古老的官道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元716年建立的两个刻有突厥文的纪念碑。

这里是伟大的突厥帝国政治和精神的发源地。据蒙古人的传说，铁木真在这里的一座名叫长金博尔多格的小山上发现地上有一条鞭子。对蒙古人来说，如果有人发现别人丢失的动物或物件，就一定要还给它的主人。这个规矩尤其适用于像鞭子这样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个人用品。根据13世纪波斯历史学家术外尼的记载，成吉思汗的法律特别指出，对于蒙古人来说，“无论何人，不可捡起落在地上的鞭子，除非这鞭子是他自己的”。[55] 然而，铁木真捡起了鞭子，这个鞭子从此将属于他。他的命运已然降临。

这是铁木真掌握自己人生的时刻。这条鞭子在他一生中都是一个特有的象征，不仅在蒙古史中，也在外国史中一再记述。正如术外尼(Juvaini)所写，铁木真“运数极旺，他的幸运之星在上升”。他用“灾难之鞭和毁灭之剑”打得敌人魂飞魄散。[56]

王罕同意从他的营地出发，但他命令铁木真招募另一个战士札木合，从东部发起攻击。札木合是铁木真的一个远房表亲，两人在童年时代曾是朋友。札木合一家曾在铁木真一家居住的斡难河畔附近扎营，这两个男孩经常在冰冻的河上一起玩耍。他们两次起誓要一生为友，成为结拜兄弟。第一次盟誓是通过交换小男孩用来玩游戏预知未来的公麅髀石完成的。后来在青年时代，当他们即将成为猎人时，他们再次相逢并重申誓言，札木合送给铁木真一个用牛角做成的箭头，铁木真送给札木合一个用木头制成的箭头。现在他们将在生命中第三次相遇。

铁木真重新获得了信心，语气也发生了变化。当他第一次见到王罕时，他犹犹豫豫地乞求王罕帮他营救孛儿帖，而现在他说话的语气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和决心。他提醒札木合："彼三篾儿乞惕来，使我居处空矣。俺非同气者与？何以报我此仇乎？"

札木合回复道："知帖木真安答居处为空，我心痛焉。知寝中为半，我肝痛焉。"他发誓要率领他的战士参与营救行动，"救汝孛儿帖夫人乎!"

***

篾儿乞人住在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的交汇处附近，但因为冬日未至，河流没有结冰，所以在冬天蒙古人常常来抢劫。札木合答应制作木筏渡河，进入篾儿乞部领土。"破彼轻惊之拖黑托阿!突袭其天窗之上，撞塌其尊门之楣，尽掳其妻孥也乎!"在选兵点将时，他又给铁木真传了一条消息，"祭我遥望之纛矣，檑我牛皮所幔……搭我具扣之箭矣!欲与巫都亦惕篾儿乞惕决一死战矣!"

札儿赤兀歹听说孛儿帖被绑架，铁木真正准备前去营救她，也来寻找铁木真。这位老人把他的儿子者勒篾带来，交给铁木真，作为他的第一个随从。者勒篾和铁木真年龄相仿。根据《蒙古秘史》记录，札儿赤兀歹说："今可使者勒篾备汝马，开汝门。" [57] 铁木真出生时札儿赤兀歹送来了第一件礼物，现在又给他送来了第一个战士，加入到他即将开始的征战中。很快，他的追随者从许多部落蜂拥而来，后来，者勒篾的两个表弟——速不台和察兀儿罕也来加入他们的阵营。虽然铁木真自己的亲戚都背叛了他，但这些人从来没有背叛过他。他们之间有一条比血缘和骨肉更紧密的纽带相连接。他们也通过札儿赤兀歹老人在精神上与不儿罕山相连接。速不台最终成为俄罗斯和东欧大部分地区的征服者。他是最伟大的蒙古战略家，而且可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

铁木真和他的兄弟，加上者勒篾，与札木合派来的突击队和王罕的战士顺利会师。但是，当他们过了河以后，一些正在钓鱼和捕貂的篾儿乞人发现了他们，这些人赶紧跑去向其部族发出警报。篾儿乞人来不及拔营，也来不及招来援兵，惊慌失措的人们唯有在深夜四下逃窜。

孛儿帖当时已经怀孕，但突击队到达时，他们发现她被遗弃在营

地，而她的新丈夫赤勒格儿已在恐惧中逃跑了。也许他知道，不管谁来，都是为了抢走孛儿帖。他哀叹自己的愚蠢，竟然抢了孛儿帖作为自己的妻子。用《蒙古秘史》的话说，他只不过是个癞蛤蟆，却妄想吃天鹅肉。如果他和孛儿帖在一起，现在他的生命将是“粪球之性命矣”。如果他不幸被抓到，他可能难逃一死。

正当突击队横扫营地时，孛儿帖看见了铁木真，便逃到他身边。“值月明也，(帖木真)视而识孛儿帖夫人，猛相扶而相抱焉”。 [58]

铁木真救了孛儿帖和那位老女人，只有速赤吉勒不见踪影。她的儿子别勒古台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营地纵马疾驰，到处寻找她。他听说她住在另一个营地，但当他接近她的蒙古包时，速赤吉勒身穿“褴褛羊皮衣”逃离了。 [59] 她希望陪在新的丈夫身边开始新生活，并不想回到铁木真的营地，因为他曾杀死了她的长子。她急匆匆跑进茂密的森林，而她的儿子看见人就射鸣箭，并大声尖叫：“还我母来!”但没有人理他，速赤吉勒就这样消失在树林中。别勒古台从此再也没见到过他的母亲。

铁木真第一次品尝了战争的真正滋味。在他的一生中，他曾经常逃避攻击他的人，但从此之后他将不再逃避。现在他成为了一个攻击者、一个战士，他对此满心欢乐。孛儿帖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他也有了一位新父亲王罕和新兄弟札木合，他可以欢庆胜利了。“蒙皇天之题名，得厚土之相济，报丈夫之仇于篾儿乞惕百姓，俺已尽空其怀矣，已悉灭其族类矣，俺已尽掳其所余矣。” [60] 尽管这个年轻的新战士如此吹嘘，但大部分的篾儿乞人都成功地逃跑并活了下来，并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与他作战。

第三章 草原的智慧

在不儿罕山上，一个像札儿赤兀歹这样智慧的老者可能无所不知，但在繁茂草原上的草丛里仍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人类活动遗迹。这些人曾在此建立帝国，其幅员之辽阔远超出铁木真的想象。这些人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及对未来居民的忠告诉诸文字，刻在遍布草原的石头上。铁木真无法读懂这些石刻题字，但他被它们迷住了，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从前人那里学习宝贵的经验教训。

过去几个世纪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游牧民和猎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名字，吉利吉斯人、鞑靼人、乃蛮人、篾儿乞人、回鹘人、鲜卑人等，但最重要、最著名的当属匈奴人，他们于公元前209年在领袖冒顿的领导下在蒙古创建了第一个草原帝国。 [61] 根据传说，匈奴也有一个关于狼的神话。他们统治者的名号叫作单于，单于同时也是一位精神领袖，这个称呼可能源于狼的代名词。

游牧民族需要草和水，因此匈奴人在逐水草而居、四处漫游时，总是试图与变幻莫测的当地神灵建立和谐的关系。按照汉文记载，匈奴人一年会举行三次聚会，用来祭祀天、地和祖先。铁木真的父亲被谋杀后不久，他和他的家庭就被排除在这样的部落祭祖仪式之外。 [62] 每年最大的聚会在秋天举行，经过一个夏天的牧养，此时的牲畜最肥壮，也最健康。单于精心控制仪式的进行，因为这也是课税的时候。 [63] 他会按照一个牧人所拥有的牲畜数量和前一年夏天的天气来估算所课的税额。

铁木真在王罕汗廷看到的活动非常类似于一千多年前匈奴人举行的仪式。在匈奴人的集会上，单于坐听诉讼并作出裁决，解决纷争，行使管理的实际职责。接收和分配物资是政治和宗教领袖最重要的工作内容，而这两个角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匈奴人在仪式上用牲畜献祭，向众神祈祷、焚香，准备大盆的水煮肉、烤肉和丰富的奶酪。大型仪式往往吸引数千人参加，使得围绕税收而进行的仪式具有强大的振奋精神和感官的戏剧效果，同时也使得政府管理能够顺利进行。

在匈奴帝国的早期，国家崇拜的迹象已经显现。和冒顿同时代的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记录了匈奴崇拜“天、地和鬼神”的情况，每一天，“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 [64] 他们往往把太阳和弦月的画像与死者同葬。匈奴帝国建立伊始，他们的宗教信仰便将荣耀归于统治者。在一封给西汉宫廷的信中，单于声称，他和汉朝皇帝一样，也是被上天选中的。

由于草原上几十年风调雨顺，饲草繁茂，因此匈奴人的牧群膘肥体壮，繁衍众多，随着牛奶和肉类的增产，人丁开始兴旺，孩子们也更健壮。由于牧群扩大，牧场不敷所需，因此，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年纪较大的便带着一些牲畜离家到远方寻找新的牧场。成功的牧民不断要求

更多的土地，而这种需求形成了一股推动力，从杭爱山谷和草原不断向外推进，直到他们离开蒙古高原进入中国和欧洲的农场和村庄。一路上，匈奴人偶尔突袭定居的村民，若有必要，他们便用他们宝贵的牲畜做交易。

匈奴人是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前身，他们横跨欧亚大陆，南抵印度，西至法国。从中国到罗马的学者、士兵和官员开始记录他们的行踪，而他们总是用贬损的语言评论这些神秘而又暴烈的人们。随着匈奴人朝着遥远的欧亚地区逐步推进，他们分裂成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部落，逐渐与蒙古本土失去了联系，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小的游牧王国。

匈奴人没有留下书面文字记录，因此我们如果要了解他们的历史就只能从他们敌人的记录里入手，并辅以现代考古学的相关发现。在记录关于匈奴的信息时，要做到毫无偏见是不容易的，这可以通过公元前99年那位中国宫廷史官司马迁的命运来说明。当时匈奴刚刚击败中国军队，但这位史官恳求愤怒的中国皇帝——汉武帝刘彻饶恕打了败仗的将军。[65] 这项建议使得汉武帝怒不可遏，他把这位史官判了宫刑。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学者在描写有关野蛮人部落时往往要非常小心。

到了5世纪，在最臭名昭著的匈奴王阿提拉的时代，这个部落已扩张到欧亚草原的西部边缘，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国名叫匈牙利。由此出发，匈奴控制了大部分东欧国家并侵袭了整个欧洲，从巴尔干到莱茵河。他们在平原上建立的新基地靠近欧洲文明的中心，从这里出发，匈奴人恃强凌弱，四处掳掠财富，在5世纪，连腐朽的罗马帝国也弥漫着这种难以抗拒的腥膻之气。

4世纪的罗马战士(同时也是位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是这样描述匈奴的，他们来自“冰封的海洋……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野蛮种族”。草原部落艾伦是现代奥塞梯人的祖先，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匈奴人相似，也以游牧为生，而且属于同一政治派别。他在描述这个部落时惊讶地说：“在他们的国家见不到任何寺庙或神社，他们甚至不用任何稻草覆盖屋顶。”[66]

虽然阿提拉并不是最重要或最成功的匈奴领袖，但没有哪个领袖会比他更著名，他对罗马以及整个欧洲城市的侵袭使得历史学家感到既惊恐又迷惑，因此他往往被看成野蛮人突袭的典型。到那个时候，西匈奴已经远离蒙古本土几个世代之遥，在他们的征服过程中，他们吸收了许多被征服地人民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他们从斯基泰人那里学会了崇拜宝剑，也吸收了基督教元素并使之融入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核心信念。

希腊观察家和中国特使都报道过匈奴人采用占卜术的事，他们通过阅读羊肩胛骨的裂纹预测未来，这个习惯到了铁木真的时代仍然保留着。匈奴人会咨询像札儿赤兀歹这样能观兆预测未来的预言家，他们也请教萨满，在希腊语中，萨满被称作教士。[67] 匈奴语言保留下来的很少，因此没人知道这些巫师当时究竟是怎么称呼的，但是在突厥语中出

现了一个词“kam”，意思是萨满，它总是出现在人名中，表明这个词的起源与此有关。在草原民族历史上有“Khan”和“kam”两个词语，前者意思是国王，后者意思是萨满，二者的相似性和可互换性反映了当时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密不可分。强大的军队领袖被认为在灵性上有天赋，因而是强大的。只有精神上强大的人才能在战斗中取胜。这种强悍的领袖通常是男子，但在草原上女人往往也具有同样的精神，也拥有军事和政治权力。 [7]

拉丁历史学家把阿提拉描述为上帝的神鞭，用来惩罚和祸害人类。这个描写后来应用于许多草原征服者，包括成吉思汗和跛子帖木儿。

草原游牧民族并不认为自己是土地的征服者，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土地看起来近乎无边无际。他们征服水，因为水属于比较稀缺的资源。他们试图控制河流和湖泊，通常用他们居所附近的水名互相称呼对方。阿提拉要占领的不仅是多瑙河，而是地球上所有的水，他是第一位有此野心的匈奴统治者。他认为自己是四海之内所有一切的统治者。他的名字阿提拉，意思大概是“大海之父”，和突厥语的“塔莱”或蒙古语中的“达赖”源自同一词根。 [68] 罗马历史学家把他的名字译成拉丁文的“Rex Omnium Regum”，意思是万王之王 [69] ，并形容他“是匈奴人的主，也是几乎所有塞西亚部落的主……他是世界上唯一的统治者”。阿提拉给他的儿子同时也是他的继承人起名腾吉斯，在突厥语和蒙古语中是“海洋”之意。 [70]

虽然匈奴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但他们同他们的故土蒙古高原却很少保持直接的联系。在成功的扩张完成之后，他们未能维持一个统一的世界帝国，而在此后的一千年中，一系列的草原联盟接连出现，并不断地交相更替。阿提拉于公元453年去世后，匈奴帝国在欧洲迅速瓦解。这时候他们所控制的蒙古领土已经分裂成相互敌对的许多国家，匈奴逐渐消失了，融入了许多不同的部落、国家和帝国中。匈奴在草原上开始了第一帝国时期，在他们消失后，有关他们的神话和记忆还保持了很久。

***

在8世纪之前的某个时候，突厥汗的后裔开始以杭爱山脉为中心，统一周围的部落。这里是匈奴民族的原始中心地带。他们在鄂尔浑河附近建造了第一座草原城市，即他们的首都牙帐城(城名含“黑城”之意)。 [71] 突厥汗采用了一种自称为乌德犍(Otukan)的意识形态，把自己完全孤立在自己的家园之内，这几乎是对匈奴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反叛。

突厥人成为第一个非常详细地记录自己历史和思想的草原民族。当铁木真离开他在不儿罕山的避难处时，发现草原上到处都是突厥人的题字。草原游牧民族不会拖着沉重的书籍、卷轴或木板从一个营地迁移到另一个营地，相反，他们把他们的信息刻在石头上，数以千计的石刻今天依然遍布在草原上，峭壁上、巨石上、山巅上也随处可见。 [72]

许多个世纪以来，没有文字的猎人和牧民费力地把图像雕刻在石头上，从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我们可以看到的图像包括：长着精致鹿角的鹿优雅地向着天空弹跳，巫师敲着鼓在恍惚中舞蹈，骆驼和马在拉车，等等。草原上还有来自更早世纪的与真人形状大小相近的雕像，装点着神圣的草原风光，虽然历经风雨，但在将近四个世纪之后仍受到蒙古人的敬畏。

后来，大约在6世纪的时候，原有的图像被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所取代，其中有汉字、粟特文、梵文和突厥的神秘符号。在铁木真出生五百多年前，这些早期的游牧民族已开始记录他们的思想。草原滋养了一个古老而强悍的文明，这个文明用多种语言响亮地告诉后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这类铭文很多都是非正式的，要么是炫耀某次大有斩获的狩猎，要么只有短短一句话，或赞美一匹漂亮的马，或歌颂心爱的人，或者只是感叹“哦，我的家”“啊，我的土地”。有的石刻用来记载这个地区的生活和历史，较长的文字则用来纪念某位重要的领袖。草原居民通过在岩石和山崖上雕刻铭文与上天交流。铭文所在之处必须是光线充足、面向天空的开阔地带，而不是隐藏在建筑物内或埋在书页里，好像要隐藏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

最古老的由国家所立的官方纪念碑出现于6世纪，其中有用印度的神圣语言梵文和粟特语写成的。粟特语是一种与波斯语有关但用闪语字母书写的贸易语言。这块双语石碑底座安装在象征着国家权力的中国龟龙上。石碑从其原始位置移到了一个叫车车尔勒格的小山城上，如今仍然安详庄严地矗立在一个宝石般的寺院里。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曾毁掉了许多宗教建筑，但这座寺院侥幸逃过一劫。这块石头之所以得以幸存，是因为它被收藏在一座博物馆里，成了历史文物，因此保留了一条一千四百年前的信息。汉语、印度语、波斯语、突厥语、犹太语元素交汇在一起，说明远在铁木真出生五百年前，草原上的文化蓬勃发展，就已经呈现出复杂和多元化的态势。

这些初期的题字被称为“律法石”(nom sang)，词源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来自希腊字的nomos，意思是法律，一个是来自波斯语的sang，意思是石头。蒙古人最终吸收了这个词，意思是“图书馆”，在现代蒙古语中仍保留着这个意思。 [73] 铭文宣称大汗具有神圣权威，他支持石刻铭文，证明了历史对他的祝福以及神灵世界对他统治的认可。如果没有这种支持，天、地、风、雨可能早就把这个纪念碑掀翻在地，打破它，并把它掩埋。石刻铭文不仅仅代表了国家的统治，它们更是“律法大石”。 [74]

这些石头大部分出现于从公元552年到742年的两个世纪之间。当时一系列的突厥帝国控制了周边大片领土，氏族之间相互争夺，各自建立了短命的王朝，权力更迭十分频繁。在此之前的一千年里，有关草原游牧民族的信息都来自于他们敌人的记载。从突厥人开始，草原游牧民族

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话语记录自己的历史。

虽然突厥汗最早竖立的石头是用粟特语书写的，但是突厥人很快便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记录信息，表达丰富多样的突厥生活、文化和思想。他们所用的突厥符文有三十八个简单字母，很适合雕刻在石头或木头上，这种在中亚大草原上使用的书写符文比维京人使用的符文早了几个世纪。突厥字母很有特色，每个字母看上去都很像马的形状，类似于那些直到现代仍在蒙古使用的字母。他们自称天突厥，但字符的书写方法和闪语风格相似，都是从右向左。

铁木真在暾欲谷碑附近发现了他的鞭子。铭文中第一次在书面语中用突厥这个名字称呼草原部落。暾欲谷是一位将军，在铭文中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记录，并对后代的游牧民族及其领袖提出忠告，他在石刻中用充满权威的口气直截了当地说："我，暾欲谷。"题词以骄傲的权威语气开始，并清楚地确定了铭文的阅读对象，"你们，我的弟弟妹妹，我的孩子，我的姐妹以及所有亲戚的孩子们"或者"你们，我的突厥同胞"。

我们对刻在石头上的铭文也要像对所有历史书写一样持怀疑态度。因为其作者总是想把对某些事件的特定观点强加给人们，为当代人和后代人所袭用。这些铭文，不论是出于政治性、宗教性或个人的目的，都有一种宣传性质。其创作往往先把竞争对手刻在石头或木头上的信息毁掉。铭文旨在限制真相，只让人们了解那些经过精心修饰的部分真实。这些铭文常常是土地契约，或是索赔财产，或是荣耀的记录，或是要求获得某种别人不认可的权利，或向上天和人类夸耀帮助者的功德。

然而，尽管这些铭文记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它们显示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他们所珍视的东西。这些铭文要么夸大某项军事行动，要么是宣扬所做的善行，要么是爱情或性征服的宣言，从而揭示了统治者最看重的是什么。省略的内容往往和记录的内容一样重要。历史的谎言仍然是文化的真理。它们告诉我们，这些人希望我们相信什么，他们担心什么，他们所尊重的、所鄙视的或者所渴望的都是什么。石刻铭文清楚地显露了那个时代的理想。

暾欲谷强调了部落统一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如果他的人民要战胜周围的敌人，当务之急是部落的统一。他写道："纤弱者易折，娇嫩者易裂。然若纤弱者变厚重，则非大力者不能折也，若娇嫩者变粗粝，则非大力者不能裂也。"只要各个部落团结起来，就可以变得强大，更难"将之分开"。

突厥石碑散落在蒙古各地，其中两个最大的坐落在鄂尔浑河附近，靠近哈剌和林，蒙古人最终把帝国的首都建在那里。一块石头是在公元731年，即第二突厥帝国或汗国统治期间树立的，是为了纪念阙特勤将军的生平；另一个建于公元734年，是为了纪念他哥哥毗伽可汗。他们曾一起在公元721年打败了唐玄宗李隆基，取得了草原部落战胜亚洲最大军事强国的惊人成就。

这些纪念碑并不只是历史标志，它们由超过十二英尺 [8] 高的大石碑构成，四边都有铭文，彼此相距大约有半英里 [9] 远。突厥可汗毗伽命令道：“吾弟，吾儿，吾至亲，悉听我言，细听我言。”“无地良于乌德犍山也。” [75] 它是世界的中心，谁控制了它，谁就能控制一切。“可控制诸部落之地乃乌德犍山也。”这一点被反复地强调，“若汝居于乌德犍山，由此差遣商旅，汝将无往而不利也。”

上天从整个人类中选择了突厥人居住在这个理想的地方，在那里，美丽的河流浇灌着大地，繁茂的草原滋养着动物。铭文解释，第一突厥帝国违抗它的宿命，当时的部落选择定居在唐朝的城市附近，那里的甜食和语言诱惑了他们，从而使得整个民族都变得十分娇弱。上天惩罚他们，摧毁了他们的帝国。现在突厥人建立了第二突厥帝国，使他们再一次获得在这个世界中心发展壮大的机会。铭文肯定了法律将超越任何一个部落的风俗习惯或个别可汗的命令。不管由谁来统治，某些道德原则必须坚持。刻在石头上的突厥法律和宗教思想很简单，也很直截了当。

这些石头表明突厥人相信强大的神圣律法将取代任何个人的法令。毗伽汗宣布，自从人被创造以后，“超越人类的最高法律就被创造”。[76] 这种法律被称为托罗(Toro/T怈r怈)。突厥人自称是法律的百姓。蒙古人采取了相同的概念并使用同一个词：tor/t怈re(礼法)。尽管在习俗和语言方面存在地区差异，但他们都承认一套指导生活的终极原则。要成为文明人，就必须遵循这些道德原则，这些是自然法，是神圣的法律，不是人为制定的。“托罗”在蒙古语中和“出生”这个词很接近，这表明，这些原则在宇宙之母创造生命那一刻就存在，在每个人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存在。它们是每个婴儿出生之时就具有的内在之光的一部分，这可以从婴儿的眼睛中闪耀的光芒看出来。

术外尼曾和居住在这些突厥石附近的蒙古人一起生活了一年，他亲自考察并证明了这些石刻对蒙古人的重要性。据他描述，有一次，当一块新的石头被发现时，“在大汗(指窝阔台汗)统治时期，这些石头被移开，然后人们发现了一口井，在井里的一块大石碑上有铭文刻在上面。大家都收到命令要来解读这些字的含义”。 [77] 在那块特别的石头上刻的是汉语，除非从宋朝请人来，否则无人能够翻译。

***

虽然一些草原部落吸收了基督教、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某些元素，但天突厥坚决拒绝外来宗教以及其他的外部影响。 [78] 相反，突厥人发展了源于他们古老的万物有灵论的国家宗教，但没有祭司，也没有经文。他们依靠萨满和占卜者与祖先沟通，以控制天气、预测未来，并与上天交流。与其他宗教的祭司不同的是，巫师并没有经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萨满就是一种不同的宗教，他们用极为特殊的方式把故事、仪式、服装和圣物混杂在一起，他们的表演越奇特，越与众不同，就越能引起敬畏之情。他们所共有的仪式动作是敲鼓、跳舞、唱颂、进入恍惚状态。他们的宗教是一种行为的宗教，而不仅仅是为宗教

而宗教或为信仰而信仰。

官刻突厥石上的信息多为政治性的，而非灵性的，它们鼓励牧民“逐水草而居”，免受定居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 [79] 突厥石刻清楚地把草原描绘成世界的中心，太阳东升西落，北部是大森林，南部是大唐帝国。这些石刻透露了有关其他民族的重要信息，不只包括其他突厥人和汉人，也包括藏人、阿瓦尔人、吉利吉斯人、粟特人以及他们称作朗姆(Rum)的遥远的拜占庭人。

石刻铭文的撰写者明白外来物品和外来宗教思想的诱惑有多么大，他们宣称这些东西对草原民族有致命的危险。这些信息一再警告他们不要离开草原，偏离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牧民应该留在草原上，服从他们的可汗，并崇拜天空和大地。

毗伽汗除了称颂他的阿史那氏族，吹嘘自己的权力之外，也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和道德信息。他看到了在他之前的突厥王朝被中土的定居文明所诱惑，和前往欧洲的匈奴人一样，一去不复返，因此警告他的同胞，一定要避开定居文明。 [80] 他清楚地警告说，他的突厥先人前往中土定居，结果自取灭亡。“你的血像河水一样流淌，你的骨头堆积如山，你的儿子本应成为主人却成了奴隶，你的女儿本应成为贵妇却成了仆人。”另一个突厥人后来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警告突厥人不要与其他文明接触，“剑生了锈战士就要受苦，突厥人接受了波斯的道德就开始腐败。” [81]

尽管石刻文字对外来的一切都表示强烈谴责，但这些记载清楚地表明，突厥人已经吸收了许多外来观念，尤其是汉人和粟特人的观念。早期的突厥石刻显示了复杂的宇宙观。天父腾格里统治着上天，地母乌马伊统治着大地，大汗则统治着百姓。突厥人的主要精神力量是长生天。腾格里并不是蕴藏着巨大精神能量的最高神，并不能把权力和财富赐给人们，或者把权力和财富从他们那里夺走。天空是一片光的海洋，像宇宙的伟大精神那样发挥着作用，给予人类生命，恩赐他们灵魂，决定他们的命运。长生天赐给每个生灵(包括动物)各自的命运，他也以同样的方式赐给部落、部族和国家各自不同的命运。

有人认为，腾格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神圣概念，并不只限于天空。伊斯兰教学者穆罕默德·阿尔·喀什噶尔(Mahmud al-Koshgari)曾于1075年写了一本关于突厥人(他称之为异教徒)信仰的书，提出了这一观点：“这些异教徒——愿神毁灭他们——称天空为腾格里；他们也把看到的任何宏大的事物称作腾格里，比如一座大山或一棵大树，他们敬拜这样的东西。” [82]

***

突厥人的腾格里和铁木真敬拜的腾格里是同一个长生天。腾格里在某种程度上是宇宙中超然的神圣存在，很少干预人类的日常事务。 [83]

他指定一个人在地上管理人类的世俗事务，这个人就是汗。百姓能通过他们统治者的行为辨别神的思想和言语。只有在有必要加强他所钦定的汗的权力时，腾格里才会对人说话。为了解释为什么突厥人在早年受了那么多苦，暾欲谷纪念碑上的铭文写道，长生天肯定说过：“我把汗赐给了你们，但你们却抛弃了你们的汗。”[84] 碑文清楚地说明，并没有任何人实际上听到这些话，暾欲谷是根据百姓遭到的惩罚推导出这个意思的。这是上天的意志，并不是神的声音。

遍布草原的石刻碑文表达出当时人们对宿命论的强烈认同，他们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没有必要用超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人死后，血肉之躯必将腐烂，而灵魂的不朽部分将飞离或升上天空。人们可能会以为灵魂离开身体，去了天堂，但去向何处其实并未说明。即使当时的突厥人相信来世或轮回转世的说法，但他们并没有在书写的文字中透露这层意思。

生则生矣，死则死矣。当阙特勤于公元731年去世后，他的哥哥毗伽可汗记下了自己的悲伤：“哀哉!吾目尝能视，今若盲矣；吾思尝清醒，今若昏矣。”他传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这个信息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一直是草原精神哲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天神主宰寿命，人类全都为死而生。”面对这种痛苦，突厥人不得不依赖自己饱经磨炼的心灵寻求指引，“泪水从眼中淌出，我勉强忍住；哀情从心底流露，我尽力抑制。”[85] 尽管毗伽可汗感受到了明显的痛苦，但是并不意味着上天应该或能够干预个体的生活，即使是对可汗的兄弟这样地位崇高的人物也不会例外。正是同样的宿命论渗透到铁木真的为人处世当中，行动总是比哀悼或抱怨更为重要。

***

历史证明，世上的国家在覆灭之前，总是穷奢极欲，忙于为自己建造最雄伟的纪念碑。令人印象深刻的突厥纪念碑不是记载草原上的突厥人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记载他们伟大帝国的覆灭，因为他们的统治者不是通过自己的成就而是通过话语来宣告他们的伟大。刻在石头上的大话留下来了，但阿史那王朝的帝国统治却灭亡了。他们昔日的臣民回鹘人推翻了他们，并在公元742年宣布一个新帝国的诞生。[10] 为证明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他们宣称，神圣的土地乌德犍已撤回了对旧王朝的祝福，废掉了原来的大汗所拥有的感召力，并把它们赋予了回鹘人。在未来几个世纪里，这些早期突厥部落的后代将在印度和现代土耳其建立起更大的帝国，但它们在蒙古高原的全盛时期已经终结。

铁木真看不懂突厥石碑上的文字，但有时他会召来能读懂的随从为他解释。突厥统治者的重要经验教训已经进入口述历史和草原传说。铁木真能够从中吸取许多宝贵经验，同样重要的是，从他们的失败中学习教训。这些早期突厥统治者在创建帝国和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比他所知道的可汗都更加成功，所以他非常留意他们的信息，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一定要服从他们的指令的意思。

虽然这些石刻文字中的建议很有意义，也很重要，但在他看来，它们并不属于上天的永恒法则的一部分。它们只是针对某些特定的问题提供了临时解决方法而已。铁木真决定，他可以作出选择，他可以接受某个建议，也可以忽视另一个建议。他认同石刻文字中关于大地与上天的灵性教导，以及对部落统一的强调，对城市腐化所带来的恶劣影响的警告，但他拒绝了它们的孤立主义和排外情绪。有时他觉得，如果没有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的货品，草原部落就不可能过上好生活。他的帝国建立在军事实力和丰硕战果的基础之上，但为了帝国的安全和扩张，他决定鼓励并促进贸易。

草原上的石刻文字以及早期匈奴人和突厥人的经验向他显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完全分散在欧亚大陆的匈奴人的道路，另一条是执著但不切实际地坚持隔离主义的早期突厥人的道路。铁木真要在二者之间寻找一条新途径。他想在征服世界的同时保持蒙古的传统特色。

第四章 冲突的自我

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个自我，这些不同的自我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一个人性格的某一部分似乎在出生时就确定了，但渐渐地，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新的性格特征会渐渐显现，并为取得优势地位展开斗争。这种斗争昭示着独立人格开始形成，我们会主动选择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相互冲突的自我所形成的“群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同的自我争先恐后，希望脱颖而出，而较老的自我要么逐渐消失，要么顽固地坚守其原有的重要地位。在这些合纵连横的竞争中，人们有时能听到自己过去的声音，包括童年学到的短语、故事、神话和歌曲，这些声音在成年以后仍作为已被抛弃的昔日的记忆碎片不断浮现。

铁木真的部分自我依然是被世界遗弃的充满苦毒的男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成了不儿罕山的精神之子，成了札木合热情而忠诚的朋友，成了孛儿帖的男子汉大丈夫，也成了一位侠意恩仇的勇士，他将不停地惩罚那些曾折磨过他或抢走过他东西的人。他是一个草原上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人，他以此为傲，但他也承认，有人憎恨他，觉得他无非是一个为了活命不得不捕捉老鼠的野蛮弃儿。他成了战场上一位坚定果敢的指挥官，但在蒙古包内，他仍是一位优柔寡断，时而忧心忡忡的一家之主。

在他内部的性格特征不断挣扎的同时，他的生命画卷开始展开了。一个爱哭又怕狗的男孩是如何成为不屈不挠的世界征服者的？作为他矢志不渝的爱人，年轻女孩孛儿帖能否管得住这个正在崛起的征服者不向其他女人求欢？对童年时代朋友的忠诚是否将高于家庭的需要？对铁木真来说，实际上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内在的冲突往往比外在的冲突更加明显。

***

在1179年左右营救孛儿帖后，铁木真尚不到二十岁，但他正在走向独立。除了在孛儿帖那里找到他的浪漫爱情之外，他似乎也找到了永远的盟友札木合。他们对青春时代的友谊非常乐观，这两个男人举行了第三次结拜兄弟仪式。这一次他们不再像儿时那样只交换公麅髀石，或像少年时那样交换箭头，他们已经成人，要严肃地立一个坚定的誓约。每个人把金腰带绑在对方的腰间，并互相交换坐骑。他们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绝不背弃对方。[86] 他们在追随者面前举行这样的仪式，意在表明，他们的结盟既是政治性的，也是个人之间的。札木合后来声称，他已经被铁木真的魅力征服了。[87] 《蒙古秘史》的话语简单而又朴实，铁木真和札木合“结为安答而相睦之”。[88]

两个年轻男子吃饱喝足，作为结拜兄弟同床共寝。离开不儿罕山，

铁木真成了一个牧人和猎人，两个结拜兄弟在他们的联合部落的众人前一起策马而行。铁木真平生第一次有了一个忠实的伴当。他不再独自挣扎，虽然命运剥夺了他归属家族的权利，但他终于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除了和札木合结拜兄弟外，铁木真还认王罕为自己的父亲。蒙古人把这类可选择性亲属关系称作“干爸”或“衣子”——和赤身裸体出生的自然之子相对。

铁木真同时建立了两个新家庭。在结拜兄弟仪式结束后不久，大概在1179年到1180年的冬天，孛儿帖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也是他的第一个儿子，铁木真给他起名叫术赤，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客人。铁木真给他儿子取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他和孛儿帖当时是作为客人与札木合住在一起的，不过这个名字起得实在有些古怪，因此后来出现了不同的说法，有的说铁木真就是这孩子的生父，有的则说孛儿帖的绑架者才是这孩子的生父。虽然他一直是他父亲最爱的儿子之一，但这场争论最终妨碍了术赤被列在继承人的人选当中。铁木真不会忘记自己的童年遭遇，因此一直公开坚持说术赤是他的儿子，但往往“成家易，持家难”。

在术赤出生后还不满一年，札木合与铁木真的伟大友谊就开始产生了裂痕。孛儿帖认为札木合感情善变，说：“今其厌我之时矣。”[89] 札木合要么厌倦了铁木真，要么察觉到他们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已经开始了。有一天，在一起骑马巡视了长长的牛车和牲畜队列之后，札木合告诉铁木真，要他把他的营地分开，到另外一个地方扎营。他对待铁木真像对待一个弟弟或下属，而不像对待他的兄弟。

札木合如此居高临下，使铁木真感到困惑和羞辱，于是他征求母亲和妻子的意见。孛儿帖似乎从来就不喜欢札木合，她讨厌他对自己丈夫的影响，于是竭力主张铁木真离开札木合，到远处寻找新的牧场。她主张不在札木合建议的地方支搭帐篷，而是全家连夜行动，走得越远越好。铁木真同意了，并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举动，全家带着牲畜星夜启程逃离。而他只带走了一些当场决定跟随他的人，后来又有一些人抛弃了札木合来找铁木真，加入了他的阵营。

随着这场决裂，永远的朋友变成了长期的敌手。在未来的八年里，札木合和铁木真之间的对抗逐渐恶化。他们都是王罕的封臣，然而，王罕没有控制他的两个下属之间的敌意，反而故意激发这种敌意，一会儿偏向这个，一会儿偏袒那个，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王罕需要他们二人来帮他进行部落内外的许多战斗。札木合和铁木真仍然忠于王罕，称他为父亲，在他的权位受到威胁时一再保卫他，但他们互为对手，互相竞争。

在铁木真和他的战士为王罕而战的同时，他的营地已发展成了一个游牧小城，随着季节变换和事变的发生而不断移动。1183年冬天，孛儿帖又生了一个儿子察合台。三年后，在1186年初冬，她又生了第三个儿子窝阔台，这孩子生来就体弱多病，孛儿帖悉心乳养他，直到他变得健壮为止。可能因为窝阔台从小身体孱弱，她总是喜爱他，事实上，他注

定要成为铁木真所有儿子中最受宠爱的那个，最终他成为了他父亲的继任者。孛儿帖生第三个儿子的时候刚过二十五岁，而铁木真才二十四岁。按照现代标准，他们仍然很年轻，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绝大多数人都活不到四十岁，所以他们已经是一对有三个孩子的中年夫妇了。

***

铁木真的游牧团队不大，而且处于经常变动之中，其中包括自愿加入的随从和俘虏的牧民，所以成分很杂，里面有许多来自多个部落家族的牧民和猎人，包括乌良合部、塔塔儿部、泰亦赤兀惕部、札剌亦儿部、八鲁剌思部、斡儿浑部和弘吉剌部。他们构成了一个草原多民族的联合体，同时也是一个精神和宗教习俗的混合体。虽然深受周围许多文明的大宗教影响，但他们总是以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把他们的信仰和习俗同万物有灵信仰结合在一起。在那时候，可以说他的追随者当中没有一位是现代意义上世界宗教的真正信仰者，没有人是佛教徒、穆斯林、道士或基督徒，然而草原社会吸收了周围所有这些宗教的元素。

尽管铁木真效忠王罕，但他并不是克烈部人，当然他也不是基督徒。他不是他们民族的一部分，爱慕虚荣且有点狂妄自大的王罕似乎并不想让铁木真手下那帮粗鲁怪异又不信教的人太靠近他精致考究的贵族宫廷。王罕觉得他们最好是驻守在边境，抵抗塔塔儿人和其他散兵游勇的袭扰。铁木真和他的手下就像看门狗一样守卫着王罕领土的外围。

铁木真想被承认为一帮追随者的首领，而不只是一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边防军的头目。当他请王罕承认他为汗，以便他能成为自己部落的领袖时，王罕同意了。那是在大约1189年左右，铁木真约二十七岁。他在距不儿罕山不远的黑心山附近的蓝湖一带召集他的追随者。他的百姓拥立他为汗，向他宣誓效忠，他们发誓："于争战之日也，若夫违汝号令，可离散俺家业妃妻，弃俺黑头于地而去。"[90]

铁木真的追随者分为十三个主要营地，每个营地都有自己的牧区和附属营地。他们按照万人分成三个单位，但他的属下总数可能不到三万人。当男人都去参加战斗的时候，妇女负责看管营地和照顾牲畜。孛儿帖把她的中央营帐作为一个移动的总指挥部，她的帐篷成了部落的营帐或宫殿，因为她的丈夫是汗。铁木真的母亲和他最小的弟弟另住一处，她有自己的宫殿，有分配给她照管的百姓。

大约在1190年至1193年的某个时候，孛儿帖生了她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儿子拖雷，当时她的丈夫正在外作战。她现在有了四个儿子。蒙古人称最小的儿子为斡赤斤，即守灶者或火王子。兄长应该到远方游牧并建立单独的家庭，而最小的儿子则会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

铁木真为他妹妹帖木仑包办了婚姻，但当她未来的丈夫保证将用十五匹马做彩礼时，他生气了，大声说："婚姻而论财，殆若商贾矣!"他引用一句古老的蒙古格言说："同心实难，何以财为？"他想通过这个婚姻

得到的是忠诚的友谊。[91]

作为一位崭露头角的汗，铁木真开始慢慢地制定新法律。他的法律最初只是他所了解的自认为最好的风俗习惯，但渐渐地，这样的法律越来越多，而且不断需要为了适应新的情况而作出改变。他按照每个人的才能分配责任，从而使他的军队组织和行政人员实现了正规化。他宣布："遂各委任付之。"然后他任命了厨师、背箭袋者、指挥官、信使、马厩总管、牧马人和牛车夫。[92] 在大多数方面，他的组织就像一个大家庭，而不是一个新国家。虽然每个追随者和行政人员仍然属于一个独立的支系和氏族，但他们已经被统一进了一个新兴的部落，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不过这个身份还没有名称，直到十五年之后铁木真才正式宣布蒙古民族的诞生。

在登基典礼上，铁木真感谢上天和大地赐给他这样的荣耀，记录中没有提到他曾举行过其他的宗教仪式。王罕送来一条口信，鼓励铁木真的追随者保持忠诚，同时表达了相当明确的训诫，要求新汗对他保持忠诚，称："勿毁汝此议，其勿解汝此盟。"草原人经常把他们的领导人称作领子，他警告他们："勿撕汝衣领可也。"[93]

铁木真感谢他的追随者选择他而不是札木合，但他登上汗位只是激化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竞争。铁木真派出使者去向札木合通报他已称汗，似乎意在请札木合承认铁木真为他的汗，但札木合不会接受这个请求。札木合指责信使在两个领袖之间挑起敌意。他们是在"戳安答之腰，刺(安答)之肋"。[94]

两个拜把兄弟很快又打了起来，借口是札木合的一个"弟弟"偷了铁木真领地百姓的一群马，然后这个人就去追那个小偷，用箭"射断给察儿之腰而杀之"。[95] 以此为借口，二人分头召集自己的兵马，展开了一场厮杀。

草原勇士在战斗中展开非常激烈的对战，但他们憎恶肆意虐待对方，怜悯和勇猛一样受到高度称赞。当战斗结束时，胜利者往往会收养战斗中剩下的孤儿。但札木合在对付铁木真的过程中并没有在慈悲和凶猛之间保持平衡。有一次，在出人意料地击败对手之后，札木合采取了恐怖统治，用空前残忍的手段处置俘虏。他砍掉了被俘的一些人的头，剩下的那部分则放在大锅里活活煮死。[96] 这两种处决方式令蒙古人深感震惊和厌恶，不只是因为这种虐待肉体的行为骇人听闻，还因为这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他们相信，被斩首男子的灵魂会随着溅出的血渗入泥土，因而注定永不超生；同样，身子在水里煮时，身体中所有承载灵魂的液体，包括血、胆汁、黏液、精子、汗等，都被毁坏了。札木合的残酷说明，他急切地渴望对那个自己曾深深信任过的人实行情感报复。

这场战斗及其可怕的结果并没有解决谁将成为蒙古人真正领袖的问题。几年以后，两人之间的争夺更加激烈。可能是在王罕的敦促下，札

木合的支持者也拥戴他为汗。他们给他加冕为古儿汗，这是一个古老而常见的称呼，在草原历史的各个时期都由不同群体使用过。[97] 王罕现在有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汗，都在声称对他的蒙古部属拥有领导权，而他错误地相信，他能在这两个自我和野心极度膨胀的无情对手之间找到平衡。

***

尽管札木合战胜了铁木真，但更多追随者抛弃了他，来到铁木真阵营。蒙力克便是其中的一个，当也速该被害时，他曾被派去孛儿帖家中把铁木真叫回来。蒙力克还带来了他的七个儿子为铁木真效力。不久后，他开始和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住在一起，此后人们通常称他为“蒙力克父亲”，这使他和他的儿子在铁木真正在扩张的部落内有了一个特殊的位置。铁木真后来回忆道，与蒙力克父亲结盟是“有庆有福”的，并答应每月每年作决定前咨询他的意见，但这个保证的措辞在之后将被证明是非常不当的。

铁木真面临着许多更大的危险，因为他还有比札木合更重要的敌人。铁木真当时三十多岁，在未来的十年里，他的追随者在蒙古大草原纵横驰骋，人数时多时少，变化不定，战事无休无止，时而结盟，时而背约，所有的联盟都很脆弱。这些战事大多是为了克烈部首领王罕而进行的，但铁木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王罕是一个无能、小气且贪得无厌的首领，除了一次次劫掠以外，并没有宏伟的目标。他常常骗人，并对他年轻臣属的成功心怀嫉妒。

克烈部的宿敌塔塔儿部仍在东方威胁他们。王罕发动了一场战争征讨塔塔儿人，由铁木真领军。每一次都和同一个敌人战斗，铁木真觉得厌倦了。他在战斗中捍卫王罕的利益，但当他赢得这场战斗后，王罕也不可避免地与和平失之交臂，他在重新燃起宿敌仇恨的同时，又制造了新的敌人。

铁木真开始采取更加独立的行动，他不再向王罕请示，也开始审视与他有关的行动。1202年，在击败塔塔儿人后，他召开了他的高层会议，来决定如何避免与塔塔儿人的长期战争。他选择了两个果断的看似矛盾的解决办法来一举结束这场战争。为了一劳永逸消除任何未来的威胁，他杀死了大多数与他为敌的男人，特别是他们的领导人，但他也收纳许多没有与他为敌的塔塔儿人进入他的部落，包括所有的妇女和儿童。

这个时候，铁木真已经四十岁了，他和孛儿帖结婚已经将近二十五年了。为了加强他的部落与塔塔儿部的联盟，他娶了被击败的塔塔儿汗最小的女儿也速干为妻，但在她的催促下，他也答应娶她的姐姐也遂为妻。得知这一消息，孛儿帖很淡然，说：“男人生来就需要共纳姐妹为妻，两层夹袄可防寒，三股绳子不易断。”[98] 这对塔塔儿姐妹永远无法取代孛儿帖，但也遂后来作为一名幕僚将发挥重要作用，并在很久以

后，居间调和了铁木真的孩子们之间的矛盾。尽管成吉思汗歼灭了她们的部落，毁了她们的家庭，但这两个女人仍然一生忠于他。

除了娶了两个塔塔儿姐妹外，铁木真还率先树立了榜样，收养了塔塔儿望族的一个儿子。铁木真给这个男孩起名叫失吉忽秃忽，把他交给自己年迈的母亲抚养。诃额仑最终共收养了四个儿子和数目不详的女儿，因为她的儿子后来又征服了更多的部落。这些领养的子女一直忠心耿耿，最终都担任了高官要职。其中，被遗弃的塔塔儿男孩失吉忽秃忽将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

在《蒙古秘史》中，最初几年的历史记录断断续续，很不完整。对事件的描写有时很详尽，甚至连亲密交谈也记录下来，然后整个叙事突然断开，好几年时间甚至连只言片语的记录也没有。造成这种记录中断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至少有一些似乎是故意的。要么是有些信息可能在记录之初就被故意省略了，要么记录的文字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在元代，被人审查并修改过。那么后来的蒙古人为什么不希望我们了解铁木真早年的事迹呢？

不管是谁审查过这份文稿，这个人还是毫不犹豫地留下了一些非常详细的记录，诸如铁木真杀害了他同父异母的哥哥，皇室内部发生的通奸，有关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所发生的争议，等等。然而，被删除的章节却在外国的第一个关于铁木真和蒙古人的报告中无意间被提到了。这份报告是由宋朝大使赵珙撰写的，他的见闻在铁木真生前就曾被抄录。他在提交给皇帝的报告里，对蒙古人及其最近的民族历史作了全面概述。

他的观察和报告总的来说非常精彩(尽管他也犯了几个明显的错误)，其中有一个在任何其他史料中都见不到的故事。他写道，铁木真“少被金人掳为奴婢者”。[99] 金人即女真人，是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部落，曾统治过中国北方。这段所谓的为奴时期正发生在金朝试图发动一场全歼黑鞑靼的战争期间，金人试图杀死蒙古男子，并把妇女和儿童掳往中国为奴。据说在中国北方，即使是最贫穷的家庭也有几个这样的奴隶。铁木真可能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赵珙认为，通过这次经历，铁木真近距离了解了金朝，然后描述了他“逃归”的情景，表明他不是被释放了，而是逃脱了。

铁木真在金国为奴的故事可能是真实的，但这似乎难以解释铁木真后来与金朝结盟发动对塔塔儿的战争的行为。正是在这次战争之后，金朝皇帝授予铁木真招讨使的军阶，负责守卫边境。[100] 铁木真当然很了解汉人的生活和文化，而且他更多的是通过亲身经历，而不是从道听途说或传说中了解到的。虽然他很欣赏汉人的很多东西，而且后来也采用了许多汉人的技术和管理方式，招募了汉人幕僚和工匠，并对汉人精神传统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但他对金朝及其盟友塔塔儿人终身都保持着

敌意。

虽然塔塔儿人杀死了他的父亲，但铁木真从没有提到过这是他仇恨的原因。相反，他把他的仇恨归因于1150年，也就是铁木真出生十几年前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候，铁木真的先祖是由俺巴孩汗统治着，他们和塔塔儿部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俺巴孩汗以为与塔塔儿人的婚姻已安排好了，于是就把女儿带到他们那里。但是，在他抵达之前，另一股塔塔儿人，大概是金朝的边防军，抓住了他。尽管俺巴孩汗没有犯法，但是据说当地不久前有人谋杀了金朝皇帝的使者，因此他们抓住俺巴孩汗作为报复。这个借口似乎站不住脚。更可能的解释是，许多世代以来，黑鞑靼人第一次开始团结起来，而俺巴孩汗是其中的一个领袖。中土所说的黑鞑靼是住在最北边的草原游牧民族，被称为最野蛮的部落。与塔塔儿人的婚姻联盟有可能让草原部落走向统一，具有危险性，他们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金朝。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金朝官员想要灭了他。他们决心使金朝的影响深入大草原，因此试图消灭任何拒绝成为附庸的人。

在被俘期间，俺巴孩汗设法送了一个口信给他的族人，说："我为塔塔儿百姓所擒矣。"蒙古人经常使用和谐押韵的特殊诗歌形式尽可能准确地传达信息，这种诗歌类似于英语中的打油诗，但语气更严肃。这种诗歌不仅使信使，也使所有听到的人可以很容易地记住。他用这种形式要求对塔塔儿人施行报复："至秃尽汝五指之甲，至磨尽汝十指之甲，试报我此仇也。" [101]

然后《蒙古秘史》就陷入沉默，俺巴孩汗已被俘虏，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解释。对于蒙古人来说，沉默胜于言语。他们知道俺巴孩汗的遭遇很悲惨，不仅仅是被俘和监禁那么简单。蒙古人不愿提及死亡的可怕细节，害怕会招来受害者出现。想到这些他们心中就难受，因此记录陷入可怕的沉默。

但穆斯林史家并不在乎描写这种骇人的血腥细节，事实上，他们似乎乐在其中。 [102] 伟大的波斯历史学家拉施德丁补充了一些遗漏的细节。他写道，酷刑开始于俺巴孩汗被刽子手钉上特殊的刑具，这刑具通常被称为"木驴"，然后他慢慢地死去。也有记载写道，刽子手慢慢剥掉他的皮，直到完全剥下来，或者对他用了一种叫"千刀万剐"的刑，一步一步地执行死刑，首先砍掉他的手指和脚趾，然后割掉更多的小块，直到最后，他一命呜呼。 [103]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就可以解释他给后代的命令——即使磨掉手指也要复仇。无论采用哪种处决形式，大约在同一时间，他的另一个男性亲属也被俘了。通常情况下，执行死刑后，受害者的头会被砍下来挂在市场的一根杆子上，以警告所有人。

胜利者兴奋地夸耀着他们的胜利，但失败者只能把伤痛强咽下去，难以摆脱失败的羞辱和愤怒，他们用历史来煽动仇恨。历史滋养着对宿敌的记忆，强化了复仇的渴望。虽然这个故事令人毛骨悚然，但俺巴孩汗并非铁木真的直系亲属，而且那些事件是在他出生前发生的。此外，在那年春天祭祀俺巴孩汗和祖先的仪式上，正是俺巴孩汗的两个寡妇把

诃额仑和速赤吉勒连同她们的孩子赶走的。是什么让铁木真下如此大的决心要为她们的丈夫复仇呢？除非未来学者能在中国或波斯史料中发现与这些事件相关的记录，否则铁木真青年时代神秘的空白将继续困扰着我们，而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推测。

***

铁木真的儿子在成长，而现在他也开始了个人政治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他认识到婚姻的价值，联姻既可维持部落间的和平，也可建立持久的友谊和联盟，而他打算巩固自己的权力，并赋予其更合法的地位。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向他的领主求婚：他希望他的儿子娶王罕的女儿，也把自己家里的女孩嫁给王罕的儿子。

王罕拒绝了。铁木真卑微的家庭不配得到与克烈部王室家族通婚的荣誉。早些年，铁木真一直是王罕忠实的封臣，死心塌地地服侍他，当他的“干儿子”，但他只不过是利用铁木真而已。尽管铁木真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王罕维持权力，但他依然只是一个实用的工具而已。铁木真在战场上的胜利以及在他追随者中越来越高的威望只引起了王罕的轻蔑和忌惮。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忠于他的主人，但随着他的力量和信心的增长，他越来越觉得没有必要保持这份忠诚。

王罕对铁木真的野心和声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心。王罕曾经推翻过自己部落的统治者，因此他非常明白，今天看似忠实的下属明天就可能成为篡位者。他哭哭啼啼的儿子桑昆憎恨蒙古暴发户式的军事成就和声望，更强化了他父亲的偏执。佩蒂·德拉·克罗瓦描述桑昆是“一个顽固的人，只要他心中相信什么，或者决心要做什么事，他就决不会相信自己是错的”。 [104]

虽然铁木真曾服侍王罕这么多年，王罕最后仍背叛了铁木真，并试图杀死他。他为自己的阴谋辩解说“只能如此”，并使用了一个词“啊尔尕”(arga)——当年那两位老妇人把铁木真一家从部落中赶出去时也使用了同样的词语。铁木真聚集他忠实的追随者，并告诉他们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发动起义反抗王罕了。 [105] 据佩蒂·德拉·克罗瓦的说法，他第一次对他的追随者发出了宗教呼吁。“他知道宗教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最后，他向他们保证，他提出起义的建议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全能者启示了他这些想法，并派他去拯救他们脱离奴役的重轭。” [106]

铁木真准备起义，许多克烈人抛弃了王罕，甚至王罕的弟弟札合敢不也站在铁木真一边。 [107] 经过漫长艰苦的斗争之后，铁木真击败了王罕和他无能的儿子，两人从战场上逃跑，死去了。史家巴·希伯来斯(Bar Hebraeus)试图解释一个基督教的国王被非基督徒击败时写道：“上帝把他的王国夺走了，赐给了一个比他好的人，他的心在上帝面前称了义。” [108]

铁木真决定不像他对待塔塔儿人那样毁灭克烈部。相反，他鼓励他

的追随者收养战败之敌的遗孤，并和他们通婚。他接受了王罕的整个警卫团，作为自己的私人卫队，以表扬他们对被击败的主人的忠诚。铁木真没有像对待塔塔儿人那样拆散他们的家庭，摧毁他们的氏族，而是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允许绝大多数克烈部人住在一起，并作为一个部落留在他们原来的领地。

***

王罕战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草原，最终传到了欧洲。直到这个时候，在蒙古高原以外，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位蒙古武士正在连续不断的战争中统一草原部落。消息之所以会传到欧洲，并不是因为他的成功，而是因为他击败了当时西方世界所知道的最遥远国王。很久以来，欧洲人一直希望有一位亚洲的基督教国王会从东方入侵伊斯兰教世界，摧毁这个相对较新的宗教。一些西方基督教徒希望成吉思汗就是那位国王。

这个梦想可以追溯到12世纪，当时有一封可能是十字军伪造的信寄到了欧洲，希望从他们的基督徒兄弟那里寻求更多的承诺和支持，信中讲述了一个亚洲富裕强大的基督教王国的离奇故事。[109] 似乎每一代人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发现一位新国王被当作基督教世界的救世主。这个神秘的基督教国王，有时被称为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有时是大卫王，有人说他就是耶稣出生时从东方前来朝拜的三个博士的直系后代。

没过多久人们便发现，传说中神秘的祭司王约翰就是基督徒统治者王罕。十字军并不知道谁击败了他，但他们希望这个新的征服者是另一个更强大的基督徒国王。他们从没有听说过铁木真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他后来的头衔——成吉思汗。一代人过去之后，欧洲人才知道了有关蒙古人的真相，此时他们把注意力从亚洲转到非洲，并把希望寄托在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皇帝身上。

***

一旦铁木真把克烈部纳入自己的部落，他的昔日兄弟、今日劲敌札木合便和乃蛮部联合起来。乃蛮部是蒙古中西部由八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他们年迈的基督教国王太阳汗既害怕铁木真，又憎恨他的成功。乃蛮部很久以来就是一个足以和东方的塔塔儿部、克烈部相抗衡的强势部落，对他们来说，蒙古人只不过是野蛮的暴发户。太阳汗说蒙古人是“带箭袋的百姓”，并调侃地问：“他们现在真的想要统治自己吗？”在他家人的催促下，他计划先发制人打击蒙古人，以免他们变得过于强大。他说：“我往而取彼蒙古来乎!”显而易见，太阳汗几乎没有意识到他的对手究竟是谁。

乃蛮女王告诫他要重新考虑。她问道：“焉需彼辈？”然后又自己回答说，蒙古人太粗野了，几乎什么也不会做。他们有体臭，穿着脏衣服。即使她想要用他们的一个女人给她的牲畜挤奶，她也要让那个女人在碰她的羊或牛之前“俾盥其手足”。[110]

太阳汗聚集了一支军队，但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他的气势很快就消失殆尽。看到了塔塔儿人和克烈人接连败于声势赫赫的新的征服者，战斗还没有开始，这个太阳汗就把自己打败了。他把自己和军队困在一座山上，以为这样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当铁木真晚上在草原上燃起数以百计的篝火时，乃蛮人以为大军压境，因此高估了铁木真的实际军队数量。乃蛮士兵趁着夜色逃遁，由于慌不择路，互相推挤，许多人死于下山途中。

太阳汗无法控制他的军队，心中充满了无奈，一时间万念俱灰，说了一句似乎像墓志铭一样的咒语。他叹了口气说："命休矣!"他的话和四百年来那些突厥石刻上的话语很相似："一身遭难，众身痛苦。" [111] 第二天早上，铁木真发起进攻，太阳汗被杀。蒙古人迅速锁定胜局，太阳汗被埋葬在那座山上，他在那里犯了战略性错误，由此失去了他的王国。

刚刚结束对乃蛮部的战役，铁木真就发起对该部残存的盟友篾儿乞部的打击。当篾儿乞部绑架孛儿帖后，铁木真曾与他们作战。他迅速扫平了他们，处决了他们的很多领导人，然后将绝大多数篾儿乞人纳入他的部落。他把他们分置于许多不同的领导人的指挥下，因此，他们不能在一块领地形成一个统一的派系，但他允许他们保持篾儿乞人的身份。这些人因此成为忠诚的追随者并在未来的帝国中发挥重要作用。

到1204年铁木真四十二岁时，他已经消灭了周围的三个部落联盟：塔塔儿部、克烈部和乃蛮部，以及大部分小部落。自从近五个世纪前回鹘帝国崩溃以来，整个蒙古大草原第一次处于一个男人的统治之下。他控制了整个突厥人的家园、古代城市的废墟以及曾经伟大的游牧文明的中心。

现在，铁木真已经掌握了草原上所有的权力，他决定对那些在他早年生活中曾背叛过他的人实行报复。他抓到了当初把他母亲和兄弟姐妹遗弃在草原上的两个人。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但愤怒仍然折磨着他的心。牙齿在他的灵魂里已经变得更加坚硬和锋利。 [112] 特别是针对他的叔叔，他宣布："我永远不要再看见他!"然后他以违反对亲属保持忠诚的神圣原则宣判两人死刑。 [11]

草原上的三个部落帝国都没落了，那些背叛他的人被处决了，只有札木合仍然在逃。札木合的追随者一个接一个离他而去，他几乎失去了所有仆从，最后留下的几个人也背叛了他，把他抓起来送给了铁木真。1205年，经过公开审判，铁木真下令处死札木合和背叛自己的军人。铁木真曾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哥哥，以保证对他的家人和未来的控制。现在他已经推翻了他称呼为父亲的那个人，处死了他曾爱如兄弟的人，再也没有人对铁木真统治蒙古草原所有部落持任何异议了。

[1] 《蒙古秘史》记载也速该用他所俘虏的一个塔塔儿人的名字给儿子起名，但本书作者采用波斯史料，认为也速该用的是他杀死的一位武士的名字。他认为，《蒙古秘史》中有些信息可能被后人审查并编辑过。——译者注

[2] 诃额伦是弘吉剌部人。——编者注

[3] 有人把这个物件翻译成打铁用的风箱，而不是鼓。

[4] 地球也被称为母神乌迈(Mother Umay)。

[5] 希腊文中意为“恩赐的礼物”，是神授的力量或才能。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格魅力(如美丽、创造力)来源于神。——编者注

[6] 罗马神话中男性的守护精灵，它无处不在，伴随人的一生。——编者注

[7] 这些女强人不是在蒙古包做饭的老妇人，而是活跃在权力中心的女性，而且似乎是更年轻漂亮的女性。6世纪初，柔然领袖丑奴汗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女萨满，但是他的情事打乱了他母亲的计划，于是她于公元520年命令人把他杀死，让她的另一个儿子取代他。

[8] 约3.6米。——编者注

[9] 约805米。——编者注

[10] 742年，回鹘与拔番密、葛逻禄联合起兵，推翻了后突厥汗国的阿史那骨咄叶护可汗，并在两年后建立了回鹘汗国。——编者注

[11] 拉施德丁明确指出成吉思汗杀了他的叔叔。《蒙古秘史》也明言成吉思汗判了他死刑，然后又补充说，在执行判决之前，成吉思汗心软了，饶恕了他的叔叔。无论他叔叔是死还是活，从那一刻起此人便从历史上消失了。这是《蒙古秘史》和波斯史料记载相冲突的另一个例证。

第二部分 成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用自己的智慧之页创作了自己。

——术外尼《世界征服者史》，巴格达，13世纪

第五章 光明的使者

铁木真花了二十五年统一草原部落，将它们置于他的领导之下。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他遇到的可汗中没有任何人值得效法，没有任何像样的理想值得遵循，当时的英雄中没有任何人能和古代匈奴和突厥可汗神话般的荣耀相比。在王罕和太阳汗的汗廷中，他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可仿效的地方，但是引起他注意的是文字书写的重要性。文字能保存法律，似乎既能连接过去，也能让未来的人看到。铁木真非常希望为他的新兴民族创造一个书写体系，并因此最终与世界上最不寻常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建立联系。这将在他未来帝国的政治和精神取向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代维吾尔族人生活在中国西部，他们是穆斯林，采用源自阿拉伯语的字母符号书写自己的语言，但是更早期的回鹘人 [1] 则生活在蒙古，信仰摩尼教，并采用源自古叙利亚语的字母书写自己的语言。他们曾从公元744年开始统治草原上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帝国——突厥帝国，直到他们在公元840年被击败并逃往中国。[2] 回鹘人不同于纯粹的游牧蒙古人，他们已经在草原边缘建立城市，并在河谷地带引进农业，但从未放弃游牧传统。1204年，当铁木真从乃蛮部接管他们以前的领土时，他们的城市已经几乎沦为废墟，但回鹘文明得以保存，一些回鹘人在自己的土地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仍选择留下来，另一方面，这种文明也借着他们的书面语言得以保留。在鄂尔浑河畔的牙帐城，依然可见回鹘故都的废墟，让人遥想当年的雄伟和神秘。第一个匈奴帝国就发源于此，后来突厥人曾在此建造他们的第一座草原城市。

尽管回鹘城市与中原城市相比相对较小，但已经足以容纳大都市生活的所有内容，有寺庙、宫殿、城堡、修道院、市场以及厚实的城墙和雄伟的城门。回鹘人挖出灌溉用的沟渠，种植花果，修建仓库，并努力把当地冰封高原的恶劣地形变成农业用地，其面积之广大，无论向哪个方向走都需用掉一个月的时间。与之前的突厥帝国竭力摈斥所有外国影响不同的是，回鹘人与唐朝建立了稳固的外交和军事联盟。唐朝皇帝承认其独特的军事技能，并将之归功于养育他们的蒙古恶劣气候：“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松柏。”[113]

回鹘人并不想只与一个外族政权结盟，于是他们大力开拓与粟特人的商业联系。粟特人是古波斯人的后裔，此时生活在撒马尔罕(即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周围，从事贸易活动。粟特人曾一度控制过一个中亚地区的大帝国，并派商队进入中国，很久很久之前连基督都还未诞生的时候就曾沿着丝绸之路到达君士坦丁堡。粟特人在公元前327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此后他们的文化吸收了希腊词汇、信仰和哲学。[114] 他们把古希腊文化、波斯传统和印度影响混合起来，并把他们经过交融后的精致文化传播到了蒙古大草原。在几个世纪里，他们大部分的政治权力都被剥夺了，但他们作为一个精于商业经营的族群坚持了下来，他们经营

经过精心设计的商业网络，通过一连串的绿洲和商道把中国和中亚地区连接起来，其商路南到印度，西至中东。中国有非常发达的文明，拥有自己的军队和皇室，能制造所有商品，能进行大规模的工程项目，但粟特人只是一种文明的残余，只有很少的政府机构，并没有自己的国家。

几个世纪以来，粟特人的骆驼商队来回跋涉穿越沙漠。一位11世纪的突厥观察家写道："然后商人来了，他们一直从事贸易，追逐利润，永不停歇。"尽管话语中含有批评的意味，但他很快话题一转，对他们的价值予以肯定，"他们提供各种丝制品以及世上所有的稀世珍宝……如果没有商人在世界上漫游，你何时才能穿上一件黑色貂皮衬里的衣服呢？如果来自中国的商队不再风尘仆仆络绎于途，这些花色万千的丝绸怎么可能来到这里呢？如果商人不去环游世界，谁能看到一串珍珠项链呢？"[115]

中国人对粟特人保持着比较严厉和怀疑的态度，尤其这些商人还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因而对他们不断寻找物美价廉的商品感到憎恨。一位中国评论家写道："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同样，他们接受的教育使他们一生都很贪婪："掌持钱如胶之粘物。" [116]

尽管存在这些反对声音，但批评者都承认粟特人很有学问，并且精通数学，他们创造了古老而精致的文化、文学和宗教。当时一位穆斯林观察家写道："虽然他们为了生活满世界漫游，但他们仍保持着对上帝的虔诚。" [117] 虔诚的粟特商人还担任传教士的角色，传播他们的信仰。

粟特人接触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宗教，接纳了各种不同的信仰，并与所有人维持商业关系，但他们最信仰的是所谓的明教，历史上他们被称作摩尼教徒(Manichaeans)，因为他们的先知的名字叫作摩尼。今天在英语和许多其他语言中，摩尼(Manichaean)是一个贬义词，指的是把世界划分为善恶两部分的眼光狭隘之人。这个名称一般用于侮辱某些只用对与错衡量问题的人，而且与machiavellian(狡猾的)一词联系紧密，因此有时会被弄混。而如今这个词一直用于泛指所有类型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偶尔也指称任何无良、欺诈、邪恶的政治、宗教或商业行为。然而，摩尼教虽然很奇特，但它本来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宗教。

摩尼于公元3世纪出生于巴格达附近的一个波斯家庭，属于一个实行浸礼的小犹太教派。在孩提时代他看到了第一个异象，写了几本经书，现存有一些很长但不完整的文本，还有许多片段。他对自己出生时就信奉的宗教很不满意，于是试图把他身边的主要宗教融合在一起。他认为，神化成肉身，首先是在波斯代身成为先知琐罗亚斯德，在印度转世为佛陀，在以色列成为耶稣，最后才成为摩尼。他的追随者崇拜所有这些神圣的化身，并认为圣灵出现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语言传教。他把来自印度、波斯和以色列的各种元素结合起来，并且认为希腊哲学家接受了神的启示。

摩尼在他的《沙卜拉干》(即《二宗经》)一书中提出他的哲学观点，这部书是他唯一一部用中世纪波斯语写成的著作。虽然他将这本书献给了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但他的教义并没有成功地使国王皈依摩尼教。他的信条虽然很流行，但从未成为波斯的官方宗教。他的其他作品用叙利亚语写成，这种语言与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关系密切，后者是耶稣曾使用的语言。

根据摩尼的教义，宇宙最初是由纯粹的光明、精神和智慧构成的。所有的美好事物都与黑暗和罪恶的物质世界截然分开，但邪恶设法引诱了光，并使二者混合起来。一切精神都是好的，都属于光明世界的一部分；一切物质，包括人的身体，都是邪恶的，都是黑暗世界的一部分。摩尼教导他的信徒要把他们身上神圣的精神与黑暗的物质世界分别开来。他的目标是要让人们放弃世俗的欲望，包括性欲和食欲，重新进入光明世界。他把世界描绘成一个绝对的罪恶之所，在那里，恶魔化身为邪灵，“他火烧，他摧毁……他恐吓。他振翅在空中飞翔，他用鳍在水里游泳，他像黑暗之物那样爬行……毒泉从他身上汩汩涌出，他喷出雾气，他的牙齿就像匕首”。 [118]

虽然在很久以前的波斯，比如在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大帝统治时期，就有着宗教宽容的历史，但到了摩尼的时代，琐罗亚斯德教占据着主导地位，其领袖认为摩尼是一个主要威胁。琐罗亚斯德教祭司敦促国王巴赫拉姆一世禁止摩尼和他带领的异端分子传教。国王采纳了这个建议，宣布摩尼和他的教导“无用且有害”，把他用铁链锁了近一个月，然后在公元274年春天把他处决了。 [119]

摩尼和他的信徒试图把所有宗教联合起来，但结果却恰恰相反，他们惹怒了较古老宗教的信徒，因为每个宗教的领袖都坚持自己的信仰实践是完全的、完美的，因此不需要引进外来观念来改进。9世纪的阿拉伯史家谴责摩尼教“甚至比基督教还要坏”。 [120] 起先人们只是不喜欢这个宗教，但很快就转为迫害。4世纪初，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完全取缔了摩尼教并迫害其信徒。他在公元302年3月31日的一项法令中这样写道：“我们命令，该教派之创始人及首领当受严惩。”并判决把摩尼教信徒“与他们可恶的著作”一起“烧在火中”。 [121] 这种压迫在公元5世纪时愈演愈烈，当时摩尼教徒奥古斯丁背叛自己的信仰，皈依了基督教。奥古斯丁撰写了大量神学著作，强烈谴责摩尼教，指责其信徒丧失道德。虽然奥古斯丁没有更进一步呼吁人们讨伐他们，但是新生的强大的基督教统治集团很快便把他的哲学异见和对他信徒的犯罪指控转变为残酷迫害的理由。

摩尼教徒被赶出了欧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然而每一轮的殉难都使得逃离的摩尼教徒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得更远。他们的信仰传遍了亚洲，到达印度乃至整个中国，他们有时被吸收进其他宗教，虽然被容忍，但也经常被蔑视。在中国，他们被形容为令人恶心的“信奉素食主义的魔鬼信徒”。 [122] 他们最后的避难所是大陆上最偏远的城市之一——蒙古草原上的牙帐城。在这里，他们终于得到了回鹘人的支持，在他们漫长的

历史长河中，第一次有了一个政府不仅容忍他们的存在，而且也接受他们作为宫廷和国家的官方宗教。

***

铁木真出生的时候，摩尼教已经在草原上流传了四个多世纪了。虽然游牧民族从不遵守摩尼教关于肉和性的限制，但是由于很多关于光、太阳和水的观念早就已经渗透进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几乎不可能确定这些思想究竟来自何处)，因此摩尼教的宇宙观以及神学与草原的灵性传统很自然地发生了交融。像以前的匈奴人和后来的蒙古人一样，回鹘游牧民族与光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黎明是一天最神圣的时刻。广袤的大草原一马平川，几乎不见树木，晴朗的天空万里无云，当太阳升起，普照大地，冬天使片片冰雪熠熠生辉，夏天使青青草原金光闪闪。太阳带来温暖，带来光明，每天都是一个奇迹，因此他们在赞美诗中充满了对朝阳的礼赞。即使在今天，蒙古人经常从他们温暖的蒙古包里走出来，在金色的朝阳照耀下张开双臂迎接最纯洁的祝福，并向四个方向泼洒牛奶表示感恩。

公元763年所立的一块刻有回鹘汗法令的石头 [3] 这样写道："[持]受明教。"石刻吩咐回鹘人放弃他们野蛮的习俗，以便"薰血异俗，化为[茹]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 [123] 回鹘汗自豪地宣称，他已经选择这个独特的异国宗教作为团结人民的一种手段。

一旦掌权，这些有点清教徒式的不宽容的摩尼教徒便摧毁了许多回鹘人崇拜的偶像和萨满器具。 [124] 他们已吸收了较古老的古典宗教和希腊哲学，因此已经没有余地留给草原上的万物有灵论了。由年老妇女控制的传统拜火习俗不得不与来自琐罗亚斯德拜火教的新观念和新做法进行竞争，这些新观念也是由粟特商人从波斯引进的。摩尼教徒使用突厥部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使用的相同的单词来解释他们的宗教：上帝是腾格里，而现在他们增加了古老的琐罗亚斯德神明阿胡拉·马兹达，这个词最后在蒙古语中读作库尔穆斯塔(Qar-Muzdy/Khormusta)。

***

虽然大多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神圣的语言，如梵语、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但是摩尼教教义认为，智慧会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不同的语言之中。摩尼在他的圣言中宣称："智慧的言行总是会呈现给人类，在印度是使者佛陀，在波斯是使者琐罗亚斯德，在西方则是使者耶稣。""于是，在这末世，有启示降下，借我摩尼，神之真理的使者，把这个预言带到巴比伦去。" [125] 摩尼认为，用不同的语言进行崇拜正像用许多不同的音调唱歌一样重要。他说："古人的宗教只在一处，用一种语言，但我的宗教将出现在所有地方，用所有语言敬拜，将流传到遥远的国度。" [126]

在这新被纳入的世界观中，水、风和光构成了生命的要素。摩尼教

徒借用古代巴比伦思想，尘世是“水的海洋”，而天堂则是“光的海洋”，是知识之神的居所。[127] 回鹘人一般称呼他们的宗教为“世界海洋”，因为它把以前的所有宗教之河汇聚成了一个大海，在希腊语中是“塔拉萨”(Thalassa)，在梵语中是“萨穆德拉”(Samudra)，在突厥语中是“腾吉斯”(Tengis)，在蒙古语中是“达赖”(Dalai)。回鹘人竭力把世界上的所有宗教统一起来，因此他们把他们的摩尼教信仰比作知识之海，犹如汇聚所有江河的世界海洋。[128] 他们认为，世界海洋代表纯洁、知识、权力、和平，以及海洋中所有的珍宝，如体现海洋自身超自然力量的珍珠和珊瑚等。

尽管他们的神学教义如此要求，但摩尼教修士和修女仍保持着奇特的生活方式。他们只吃自认为充满光明的食物。流动的河流与溪水中的水闪闪发光，喝这种水的人便接受了光，但井水来自地底深处，那里只有黑暗，所以他们认为，人类不应该喝井水。地面上种植的绿色植物、水果和蔬菜能吸收光，所以可以吃；但块根植物生长于地下，没有接受光，因此不能吃。他们吃水果、蔬菜和植物叶子，但不吃洋葱、大蒜、胡萝卜、萝卜和其他在地下生长的植物。他们拒绝吃肉，因为肉不是在阳光下生长的，因此不能提供光。他们喜欢葡萄，但是不喝葡萄酒，因为在酿酒过程中葡萄中的光被榨出去了。摩尼教徒首选绿色和黄色蔬菜，他们认为这些蔬菜的光含量最高。他们也吃种子。在他们的信仰中，每棵植物都有一个灵魂，他们认为种子含有数以百万计的灵魂。吃进这些灵魂能使人充满光明，有助于把这些灵魂凝聚起来，最终使得所有的灵魂都凝聚在一个充满光明的实体中。

回鹘人的摩尼教笼罩在神秘和仪式之中。他们的祭司讲述着遥远之地发生的神和人的神奇故事。耶稣用比喻，摩尼则用隐晦的典故。回鹘人传统上称耶稣为不儿汗耶稣，有句经文曾引用耶稣的话说：“为了救你脱离死亡和毁灭……我要赐给你眼睛未曾看到过的、耳朵未曾听到过的、手未曾摸过的。” [129] 只有最高级别的官员才自称充分理解了这个宗教及其神秘的仪式。因为他们重视保密，因此摩尼教徒被称为诺斯底派(Gnostics)，这个词源自希腊语的“gnosis”，意思是知识，在回鹘语和蒙古语中则演变成了“bilig”。[130]

虽然摩尼教把其他宗教的思想和实践结合了起来，但它严格禁止一些重要的礼仪，如基督教的洗礼、犹太教的割礼和佛教的火葬仪式。尽管摩尼教强调禁欲，但也不赞成一些基督徒自愿实行的阉割，也不赞成作为惩罚强加于人或为了当太监而实行的“净身”。

摩尼也禁止印度教规定的沐浴仪式。按照他的教导，进入任何水体都是一种罪恶，因为它污染了所有生命所依赖的生活用水。火可以净化自身和所有经火的人，但水是脆弱的，极易遭受污染。

在名为《科隆摩尼抄本》的文献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正准备跳进河里去洗澡，但遭到了水神的指责，问他：“你的动物伤害我还不够吗？你自己也要毫无道理地欺侮我，亵渎我的水吗？”那个男人回答

道："世上的奸淫、猥亵、污秽都被扔进你的身体里，你并不拒绝它们，为何你此时却却因我而伤心？"水神提醒男人，他应该是一个正直的人，不应该有这种丑恶的行为。还有一次，他被告诫，人和水是一体的，我们如何对待一滴水就是如何对待整个海洋。 [131]

只有宗教内的选民才必须遵守严格的贞洁和素食诫命，戒酒，不吃发酵的食品，禁食植物的根茎，也不吃地下生长的植物，因为那里没有光。但这些规则不适用于贵族或普通人。选民身穿白色长袍，戴着白色头巾，以显示他们的纯洁，白色因而成了摩尼教的象征性颜色。相比之下，佛教被称为黄教，基督教被称作黑教，因为他们的祭司所穿的长袍是黑色。穆斯林被称作裹头巾的人。摩尼教神父的白衣表明他们不会从事沾染污垢的工作。和积极参与日常生活的萨满不同，摩尼教祭司形成了一个脱离普通民众的阶层。后来，当铁木真组建自己的政府时，他任命白袍萨满担任他的精神顾问。 [132]

回鹘祭司对民众的管辖权不仅来自他们在思想上和在公共仪式上的影响力，也来自征税的权力。百姓除了向汗进贡用以供养国家和军队外，他们现在又不得不支付新税，叫作"灵魂服务"税，专用于教堂的运作和养活神职人员。为了保证人们遵守这项法规，回鹘汗恢复了古代草原的军事传统，每十人编为一个单位。 [133] 他进一步命令，这十人中要选出一位负责照顾其他人的精神健康，这个灵魂监督同时充当精神导师、思想监督者和宗教税吏，强迫人们向教会支付施舍和费用，并报告犯罪的和不当的行为。 [134]

铁木真最终没有采纳宗教税这个主意，但他采用了其基本的社会原则，把他的军队以十进位制组织起来，每个单位选出一人负责。十人单位又组成百人单位、千人单位、万人单位，这样，蒙古军队就成了一个精确的十进位制军事组织。同时，牲畜也是按群计算的。要一个个数绵羊、山羊、马、牛、牦牛和骆驼实在太麻烦，所以蒙古人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以马为单位。五只山羊或五只绵羊合计等于一匹马，五头奶牛或牦牛等于四匹马，四头骆驼等于五匹马。因此，所有的动物都可以组合简并到一个数字。

回鹘人自诩"强大而无敌"，因为"首领和百姓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摩尼相信保持一个优秀的精英集团的必要性，因此他故意不提佛陀、耶稣和其他宗教领袖教义中的平等思想。 [135] 他教导人们说，那为数很少的人是选民，具有比普罗大众更优秀的品质，而且他相信这个小精英群体应该统治其他人。随着回鹘变得越来越强大，其领导人越来越多地介入摩尼教，精英家庭被这种哲学所诱惑，认为无论自己想干什么都是有道理的。经文(有些地方故意模糊)含义的模棱两可给他们提供了放纵自己的借口，过着摩尼从未认可的生活方式。

回鹘统治者建造辉煌的宫殿，里面堆积着进口的奢侈品、漂亮的衣服、甜食、珊瑚、绿松石等。"妇女用粉、黛描眉，用刺绣装饰衣服"。 [136] 这些奢侈品是"中国制造"，而这些物品的进口使他们断然"与野蛮

风俗习惯决裂”。[137]

历史证明，颓废的社会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却会因一些突发事件导致其灭亡。这个命运于公元839年一个致命的冬天降临在回鹘身上，严重的雪灾造成大批牲畜饿死，这个现象被称为“白色饥荒”。一方的灾难往往是另一方的机会。在回鹘人遭受灾荒暂时虚弱无力时，从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来的数万名吉利吉斯人涌入蒙古大肆抢掠。吉利吉斯人杀死了回鹘汗和他的家人，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他们蹂躏了回鹘人的土地，抢劫寺庙，烧毁城市，偷窃牲畜，奴役百姓。

吉利吉斯人的大规模劫掠结束之后，并未创建一个新的帝国，也没有重建城市或建立另一个王朝。相反，他们开始一步步撤离这个被蹂躏的民族，带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并寻找新的地方进行掳掠。灰烬和尘埃依然笼罩在烧毁的寺庙和宫殿上，一些幸存者爬出废墟，抛弃了他们的城市，一步步走向草原，去寻找新的生活。一些人一路向南，穿越戈壁逃往中国西部的吐鲁番、哈密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绿洲，今天回鹘人的后裔仍在那里生活。其他人则融入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抛弃了他们的城市文明，过着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游牧生活。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回鹘人都逃离了家园，也并非每个吉利吉斯人都迁往他处。其中一些人留下来组成了新的草原部落。他们的后裔有时会回到旧城遗址，在废墟上放牧他们的山羊和马，有时他们会斜倚在老庙的山墙上，或登上昔日古老城堡的顶端，眺望草原，希望找到失踪的牲畜或友好的人家。随着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融入其他部落，他们丰富了新邻居传统的万物有灵信仰，为其增加了一层新的灵修实践。

***

铁木真从回鹘文明中理解了一个清晰的信息：一个帝国要获得成功，必须有一套书写体系。他明白，要把他的游牧武士及其追随者转变成一个民族，第一步就要引进一套像中华帝国和突厥帝国那样的书写体系，但在最初，他尚不清楚应该采用哪种书写体系。虽然蒙古语与突厥语在语法和词汇方面很相近，但原先用符文书写的做法已经过时。梵语也曾在一些石刻上使用过，但这种文字过于生疏，难以理解。采用汉字需要全面了解汉人的生活和思想，因而难以适应其他语言方式。铁木真对书写文字极不寻常的选择，势必将对他的新兴帝国的未来文化发展方向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一声令下，蒙古语突然成了一种书面语言。蒙古人把他们的书写文字称作畏兀儿字，因为教士们讲畏兀儿语，但他们实际上把自己和过去的文明财富联系起来了。畏兀儿文字源自粟特语字母，这种字母植根于古叙利亚语，也和阿拉米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有关系，是从右到左书写的。更复杂的是，畏兀儿人和蒙古人把字母表竖起来，从上到下按照汉字书写方法书写句子。他们的书写体系既源于亚洲，也源于欧洲，这样就把一种世界性的特色带进了草原生活。中国宋朝使臣赵珙形

容这种字母类似于中国的笛子乐谱。[138]



蒙语“成吉思汗”

这种混合文字系统成了蒙古人面向世界的新窗口和珍贵的历史关联。畏兀儿人不像天突厥那样试图拒绝外国影响，他们欢迎这种影响，但他们非常仔细地选择外国元素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铁木真承认，他打算为蒙古人创造的社会是类似于回鹘人那样的社会，但是他想让他的帝国幅员更辽阔、享祚更长久。他开始学习回鹘人成功的秘诀，同样重要的是，也从他们的失败中汲取教训。

1204年，在正式创立蒙古民族两年前，铁木真从乃蛮汗廷选了一位名叫塔塔统阿的文员，并指示他采用畏兀儿语字母书写蒙古语。[139] 塔塔统阿又招募了几位文员进入当时规模相当小的蒙古汗廷，开始把这套文字教给年轻人，包括铁木真的儿子和他收养的塔塔儿族的兄弟失吉忽秃忽。铁木真周围的这些人后来组成了蒙古帝国的宫廷，而这些看似很小的步骤在未来几十年中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每一次战役的胜利都会增加汗廷中的文书人数，因为熟悉其他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男性被纳入了政府管理团队中。他们从一个简单的文书班子逐渐变成了语言学校，汇集了来自不同的宗教背景和各具特色的知识传统的学者，他们所受过的哲

学和文学训练也各不相同。这不起眼的开端将培养出一批草原学者，他们在未来几十年中将成长为一支日益重要的全新的知识分子群体。

***

通过采用畏兀儿文字及其相关的政治机构，铁木真接受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摩尼教国家作为他的新兴国家的典范，从而使得他从前的文盲部落接触了世界文明。术外尼用不乏嘲弄的语气写道，蒙古人"把畏兀儿语言和文书当作知识和学问的顶峰"。[140] 畏兀儿人可能一直是世界舞台上无足轻重的角色，但蒙古人突然间便获得了大量信息，包括粟特人的商业惯例、中土哲学、突厥文学、希伯来圣经、希腊历史、印度数学、波斯童话故事以及各大宗教的主要戒律等。

蒙古人接受了形形色色的新的丰富的外来影响，这些影响在引入蒙古语言的一些单词中可以看到，比如：水晶、食糖、糖果、酒精、钢、皇冠、匕首、肥皂、石榴、鹦鹉、象棋、钻石、翡翠、书、铃铛、无花果和珠宝等。[141] 畏兀儿文字也带来了应对更大世界和创造一个政府所需的词语，比如"sang"，意思是仓库，但这个词义很快扩大，表示司库和财务部门。随着词汇增加，蒙古人也了解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铁木真把一些摩尼教的宗教法律直接纳入他的法律体系，比如对水的保护。后来的基督徒和穆斯林观察家对关于水的蒙古法律感到困惑和厌恶，尤其是禁止人们在河湖中洗澡或洗衣服的法律，但实际上这些法律都借自回鹘汗国的摩尼教规。

畏兀儿语和摩尼教教义引入了一种新的世界观，特别是人生就是对抗黑暗的持久抗争的概念。善与恶是分开的，不能融合，就像太阳在夜间不能发光一样。铁木真从此开始认为自己是上天意志的化身，因此一直坚持不懈地与那些拒不屈服于他意志的人进行斗争。与他为伍的就是服从上天，就是好人，与他为敌的就是忤逆上天，就是代表黑暗势力的坏人。[142] 他的使命就是征服叛逆者并迫使之降服，从而播洒和平。

畏兀儿人为蒙古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宗教礼仪语言去解释世界、法律和国家，其中很多都在《蒙古秘史》中有反映，部落神话的荒谬传说被提升为披上金光的官方意识形态。摩尼教为统治者提供了强有力的宗教支持，宣称君王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天，更具体地说，来自太阳和月亮。按照传统，汗是草原上最强悍的人，但现在，经过摩尼教信仰的打磨，他成了"美丽、可爱、高贵、光明、英勇、崇高、强大的汗"。[143] 有一首摩尼教赞美诗告诉选民要"穿上鲜艳的服装，披戴光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统治，上帝才会"把王冠戴在你头上"。[144] 这个光明之人的图像最终将成为对成吉思汗的礼赞。有一个故事与摩尼教有直接关联，据说成吉思汗的一位祖先阿兰豁阿因为一位骑着一道光的金人而怀孕，而且由于这个神奇的事件，她预言她的子孙将"为天下之主"。[145]

粟特人把关于王权的深刻思想观念带到了蒙古，这种思想部分来自

波斯，最显著地体现在亚历山大大帝身上。他们没有谴责亚历山大为侵略者或暴君，反而赞美他为英雄。《亚历山大传奇》和《伊索寓言》是两个最早用新字母翻译成蒙古语的文学作品。虽然在该地区漫长的历史中，亚历山大的统治为期很短暂，但他的王国却造成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因为他把不同的文明、语言和思想混合在了一起。拜亚历山大大帝所赐，粟特人、畏兀儿人和后来的蒙古人获得了丰富的艺术、美学和哲学底蕴，也获得了一个相当庞大的词汇系统。 [4]

摩尼的许多想法直接借自古希腊哲学。他的有关选民在灵性上优于他人的教义和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宣扬的国王应由精英哲学家担任的理念密切呼应。柏拉图描述卫士是“被带到这个世上成为统治者”的人。 [146] 通过他们所受的教育及其掌握自我的坚定努力，他们获得了统治他人的才能。卫士应戒除世上的虚华，忽略那些愿意活得像猪一样的人们所看重的东西。他们认为，正义是“一切事情中最大和最必要的东西”。 [147] 甚至远在铁木真之前，突厥和蒙古可汗就试图把自己塑造成热爱智慧的百姓的卫士，但铁木真是带着新的使命和承诺接受了这个身份。

铁木真的斗争并不仅仅是为了决定他自己的前途命运，他正在创建一个民族，并在这种斗争之中享受上天的祝福。摩尼声称自己具有贵族血统，而他也试图通过证明君权的正当性来说服统治者皈依他的宗教。摩尼和他的追随者写了几本给国王的建议书，说明如何作出决定，举行公共仪式，同时取得人民和上天的支持。摩尼认为，要创建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但仅有强大的军队是不够的。他写道，君王的义务是“在服务于他的王国时，为了内部的宗教和外部的整个王国献上他宝石般的高贵身躯接受磨炼”。 [148]

摩尼教徒把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君权的正当性引入了大草原。他们理论的两个原则，即内在的法律和外在的政府，对政府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解释。 [149] 正如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那样，每个国家也要有一个领袖。汗就是国家的灵魂，根据摩尼的说法，汗的统治至高无上，遍及神圣和世俗王国。他是“两种善的完美集合”。他是两种快乐的主人，“既是身体的主宰，也是灵魂的主宰”。 [150] 他“配得上这两种幸福的生活，配得上拥有身体和灵魂的支配权”。 [151] 汗的统治范围可以延伸到身体和灵魂，但信仰问题依旧是个人的内部问题，而外部事务则属于政府。铁木真也接受了这种思想，规定个人问题属于蒙古包内的事务，而公共行为则属于草原的事务。 [5]

对摩尼教徒来说，比军队更重要的是法律，通常被称为“纯法律”(阿力克法/arig　　nom)。信仰他们的宗教是“行在纯洁道上”。他们称他们的宗教和神是“法之忽提”(Nom　　Quti)，这个词语是希腊词语“法律”和突厥词语“陛下”的结合。回鹘人接受了希腊语和摩尼教的传统，也对法律高度重视，而铁木真也将如此。希腊法律“nomos”有着很久远的哲学和法律传统，而回鹘人对法律的定义很宽泛，几乎等于书面的经文。 [152] 法律是自然法，也是精神法。蒙古人已经有了表示法律的词，

但他们吸收了希腊词“nom”，用来指代神圣法律与精神道德的书。

对摩尼教徒来说，可汗的法是神圣的。摩尼教徒视神为“律法之王”，把汗看作“身披法律的威严”。 [153] 他们的一首赞美诗唱道：“上帝是法王，耶稣是佛陀!”而在另一首歌中，神则是“全智法王，摩尼是佛陀”。 [154] 神在精神和世俗王国都是完美的，“因为他已建立不儿汗法，救我们脱离忧伤和不幸”。 [155]

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第九章中，把法律比作建造国家必不可少的基石。有些法律在君王出生时就定下了，其他法律则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收集和补充。统治者颁布新的法律，与其说他创造了法律，不如说他发现了法律，并在适当的时间为了适当的目的而使用它们。

铁木真从畏兀儿人和突厥人那里学到了一个简单的观念：宗教和法律不能分开。正确的就是神圣的，而神圣的就是合法的。君王没有上天的支持就无法统治，为了获得这种支持，他的法律必须符合地母和天父的法律。

蒙古人已经承认了“tor”(礼法)作为宇宙不成文的道德守则，但“nom”引入了成文法，添加了一种新元素。所有人都被同一条绳子拴着，犹如穿过戈壁沙漠的骆驼商队那样。铁木真把这条绳索叫作“黄金索”。 [156] 它把蒙古人与金砧即北极星相连。只要他们连接在一起，他们就能很容易地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但如果他们弄断了那条绳子，他们便会漂泊流离，一个个孤独地死去。

***

当铁木真开始征服草原部落时，他的蒙古人在宗教和文化上与畏兀儿人和粟特人如此相似，以至于许多外国人干脆称他们为畏兀儿人、粟特人或摩尼教徒，而不是将他们看作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 [157] 14世纪伟大的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勒敦说，蒙古人信奉波斯僧侣的拜火教，他们是摩尼教徒。 [158] 畏兀儿人用突厥词语称呼他们的牧师为博古(bogu)，但有时候也用更古老的琐罗亚斯德名字称呼他们为麦琪(magi)。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都诞生于波斯，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清楚，但它们却相互极端仇视。 [159]

蒙古语称呼萨满的词语“boo”起源于回鹘语的“bogu”，这个词在其他部落，如克烈部，是指圣洁的人，但在蒙古语中很晚才这样用。 [160] 摩尼教祭司和草原萨满都用这同一个词语表示，因此巴·希伯来斯在他的书中记载，蒙古人从畏兀儿人那里借用了许多宗教思想，尤其是他们使用的“巫师”(萨满)一词上。他还指责摩尼教徒性行为不当(因为摩尼教徒被视为性变态)。他写道，当他们处在恍惚状态时，他们“除非被其他男人玷污，否则他们与魔鬼的密谈就不会结束，因为他们中很多人都是阴阳人”。 [161]

最终，摩尼教徒被基督徒、穆斯林以及中国学者从蒙古历史中剔除

了。几个世纪之后，当佛教僧侣使蒙古人皈依佛教时，他们对任何涉及这个讨厌的宗教的文字进行了审查。然而，尽管历史学者保持了对文字记载的垄断，普通人在他们的神话和传说中却仍然保留了这些被删除的历史片段。

于是，有一个奇怪而有趣的蒙古故事流传了下来，这个故事把铁木真和先知摩尼在一个超自然的人物身上联系起来，这个人物称作摩尼汗(Mani Khan)，在蒙古祈祷词中，他有着"黄金白银之体"。[162] 先知摩尼宣扬素食主义，禁止屠宰动物，因此摩尼汗成了野生动物的保护神，成为"所有野兽的主人"，"掌管着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

摩尼是素食主义者，而蒙古猎人嗜肉如命，这种鲜明对比在一个神秘故事中被表现了出来。这个故事讲述了铁木真是如何与摩尼汗达成协议的。根据一个可能是很久以后才编成的传说，当铁木真在博格达汗山上捕猎黑貂、白狐狸和雪豹时，摩尼汗在他周围降下大雾。因为他的马匹无法找到下山的路，铁木真只得就地扎营，杀鹿宰羊，生火做饭。这时，一个满脸皱纹、长胡子的干瘪老人出现在铁木真面前。他自我介绍是巴彦汗摩尼(Bayan Khan Mani)，即富王摩尼，并声称这里的动物，包括羚羊、野兔、鹿、狐狸、老虎、豹子等，统统属于他。他对铁木真说："我送给你几个，但请留下其他动物的性命。"

这位老人的请求感动了铁木真，他同意让野生动物从山上游荡到由他控制的草原上，但作为回报，他想要足够的肉喂饱他的百姓。摩尼汗同意向铁木真供应足够的肉和毛皮以保证他百姓的生活。铁木真请他不要把肉作为礼物送给他，而应该允许猎人通过狩猎而获得，这样他们可以保持精湛的技能，摩尼汗同意了。达成这项协议后，老摩尼汗赶走了许多邪恶的魂灵，包括"狐妖、疯兽、大脚雪人和独腿魔"。这样，山上的百姓和动物就都安全了。此后摩尼汗统治此地，只要蒙古牧民和猎人能做到有节制地狩猎，他就成为他们的精神守护神。

任何社会在采用一种宗教时，都会对它进行改造以符合他们自己的文化。所以，摩尼教徒的素食主义先知成了蒙古人的狩猎神。[163]

第六章 草原的耶稣

在王罕出逃并被他的敌人乃蛮人杀死之后，铁木真立一直与王罕为敌的弟弟札合敢不为克烈部汗。起初，铁木真允许克烈部在他们的新汗统治下享有一定的自由，对该部实行宽松的管制。他虽然杀了大部分曾反抗过他的贵族男人，但他承认他们的女人身上有着某种独特而有裨益的素质。乃蛮女人和克烈女人是他所遇到的最老练最见多识广的女人之一。虽然她们仍然是草原女人，骑马、射箭、喝马奶酒、全面参与政治生活，但她们的基督教信仰给了她们草原之外的知识，把她们与一些最重要的文明中心相联系。

铁木真安排了他的家人与札合敢不家族的一桩双向婚姻。他娶了新汗的女儿亦巴合别吉 [6] 为妻，又让他的小儿子拖雷娶了她的妹妹唆鲁忽帖尼别吉。[164] 他还把一个乃蛮公主脱列哥那从她的篾儿乞丈夫手中夺走，把她嫁给了他的儿子窝阔台。现在，铁木真和他的两个儿子，每个人都有了一个基督徒妻子，虽然并没有听说当时有蒙古人皈依基督教，但在接下来的一代人中，拥有一位基督徒妻子一度颇为流行。

铁木真也为他的几个女儿包办了与基督徒的婚姻。阿剌海别吉嫁给了漠南的汪古部部长，该部信奉基督教，其部长自愿加入蒙古，并一生始终保持忠诚。在丈夫死后，阿剌海别吉多次改嫁，每个丈夫似乎都是基督徒。中国特使报告说，她经常读经，但没有说明是用何种语言写成的何种经文。[165]

这个时候铁木真女儿的情况非常复杂，因为没有记录保留下来说明她们什么时候出生、她们的生母是谁。《蒙古秘史》本来记载了有关信息，但这一章节在元代的某个时候被删除了。六个女人可以确定为铁木真的女儿，但是她们是不是他亲生的？是他的正妻所生的，还是收养的？还是和他有另外一种关系，这些我们通通不清楚。在铁木真生前，这些女儿占据要职，但她们的影响力在成吉思汗死后被他儿媳的风头盖过了。[166]

从铁木真结婚直到1294年，在近一个世纪中，每个蒙古大汗都和基督徒女人有关系，要么是由基督徒母亲所生，要么拥有一个基督徒妻子。《蒙古秘史》表明，成吉思汗喜欢为他的孩子们选择基督徒配偶，因为他认为基督徒重家教，懂得如何教养孩子，会成为他孙子的好父母。他对他的基督徒儿媳和女婿的技能、知识以及与更大世界的联系很感兴趣，但他自己却拒绝基督教信仰，因为这种信仰并没有帮助其民族免于失败。

几部基督教编年史记载，铁木真的妻子是基督徒，但说法不同，有的说她是神秘的大卫王的女儿，也有的说她是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的女儿。据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说法，铁木真梦见了一位使者，答应帮他夺取

权力，获得成功。当他把这个奇怪的梦说给他的基督徒妻子听时，她承认那个使者是基督教的主教玛·登哈 [7] 。据说他召见玛·旦哈来解梦，主教告诉他，只要他“善待基督徒”，给他们“很多的荣誉”，他就可以获得成功。此后，根据法国修士——来自博韦的文森特记载，铁木真青睐基督徒，甚至请了一个基督徒僧侣为他预测未来，并为他占卜。 [167]

玛·旦哈是巴格达当地教会的重要领袖，但他生活在马可·波罗的时代，蒙古民族诞生时他还没有出生。在任何可靠的史料中都找不到铁木真和基督徒之间进行过宗教对话的真实记录。然而在铁木真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期，他和基督徒有着密切的交往，先是作为基督徒国王王罕的藩属，然后作为基督徒的丈夫和公公。

在蒙古人崛起之前，基督徒已经在草原上生活了两百多年了。当回鹘帝国在9世纪崩溃时，大多数回鹘人逃到了中国西部的沙漠绿洲，而摩尼教失去了官方宗教的地位，萎缩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教派。在他们的新家园里，回鹘人成了穆斯林。虽然佛教和伊斯兰教都曾派出传教士向剩余的草原部落传教，但他们既不想成为穆斯林，也不想成为佛教徒。相反，他们选择了一个不曾派传教士到蒙古宣教的宗教。摩尼教徒承认耶稣是他们主要的先知，即使在回鹘汗国陨落、摩尼教祭司逃离之后，人民继续尊他为神。但因为无法找到新的摩尼教祭司，他们希望得到同样崇拜耶稣的远方基督徒的帮助。

草原部落从摩尼教转而皈依基督教发生在11世纪初。1009年，东方亚述基督教会的牧首约翰五世(Cathdicos Yohannan V)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寄信人是都主教梅尔夫的阿迪硕(Abdisho of Merv)。梅尔夫是距巴格达一千多英里的一个小镇，此地在今天的土库曼斯坦东部，但当时是波斯的一部分。波斯教会 [8] 认为自己是最古老的基督教会，在语言和灵性上最接近耶稣的教导，但形势的发展对其追随者越来越不利。他们被切断了与其他基督教社区的联系，最初奋起反抗瑣罗亚斯德精英的压迫，然后反抗穆斯林的征服，而穆斯林怀疑他们秘密地与欧洲人进行结盟。

都主教信中的消息虽然很奇怪，但还是受到了欢迎。他报告说，在遥远的北方草原，有一个武士部落，该部二十万人都皈依了基督教。这就是后来在王罕领导下的克烈部。主教告诉牧首，克烈部的皈依发生在两年以前，即公元1007年。他用标准的基督教叙事方式说道，那个异教徒国王遇到了危难，但得到了基督教圣徒的救助。两个世纪之后，巴·希伯来斯在记述这件事时说，克烈部的汗在山里打猎时遇到暴风雪，迷失了。据说是圣谢尔盖(Saint Sergius)的幽灵说，如果汗改信基督教的话，他可以救汗。汗从丝绸之路沿线来往的商人那里已经了解了这个宗教。汗同意了，按照基督教商人的教导尽力理解这种教义。获救之后，汗寄了一封信给两千五百英里外的阿迪硕都主教，请求派传教士牧师为整个部落施行大规模洗礼。

基督教适合克烈部田园牧歌的生活方式。草原游牧民族非常理解圣

经中提到的牧羊人和羊群，他们重视法律对于一个分散居住的民族的重要意义，尤其是这个民族处在恶劣的环境中，一直在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克烈部旅行时带着可携式神殿(或者说教堂)和祭司，称为拉班(rabban)，意为导师(从希伯来语的拉比rabbi演化而来)，他们用叙利亚语朗读基督教圣经，能预言未来，观察星象，医治病人，确定丢失动物的地点，控制天气，如此等等。他们穿着长袍，焚香燃灯，举行复杂的仪式，让汗和他的统治荣耀非凡。

在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同时，一些贵族也取了基督教的名字，如雅虎(Yahu，耶稣)、失烈门(Shiremun，所罗门)和马可(Markos)。他们举行基督徒圣餐礼，喝发酵的马奶酒以代替葡萄酒，不过他们不吃圣饼，因为他们基本上不知道饼为何物。他们的圣餐仪式继承了草原的传统做法，把圣餐和畅饮发酵马奶酒结合起来了，因此这个基督教仪式经常在醉酒的状态下结束。

阿拉伯基督徒在12世纪写的《塔经》(Book of the Tower)中描写了草原部落基督教奇特的崇拜方式。根据其记载，克烈部的崇拜仪式在一个帐篷里进行，附近会有几匹专用的母马提供宗教仪式所用的马奶。在克烈部并入铁木真的阵营之前，克烈汗亲自为他的百姓主持大部分的宗教仪式，用他所知道的祈祷词进行祷告，把牛奶献在圣经前的坛上为祭。 [168] 由于这个原因，有一些报告把汗描写成了一名牧师。

草原部落欣赏基督教，因为它允许吃所有种类的肉，而且在其宗教仪式中喝酒。穆斯林和犹太人不吃猪肉，印度教徒禁忌牛肉，佛教徒什么肉都不吃。除了基督徒外，所有其他教徒都禁止或严格限制酒精的消耗量。然而，他们发现基督教礼拜的一个方面令人厌恶，那就是在基督徒的宗教仪式上，他们声称吃先知的肉，喝他们的血。1453年，君士坦丁落入突厥人之手，库萨的尼古拉斯描述了虚构的有各种宗教信仰代表参加的会议。鞑靼人抱怨说，基督徒“端来面包和酒，说它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献祭仪式后他们吃喝祭品，这太可恶了!他们吞噬了他们所崇拜的事物”。 [169]

天主教徒祈祷时双手合掌在胸前，东正教徒把双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但草原上的基督徒则以蒙古人的方式向天空伸出双臂。他们在吃饼之前先把一小块饼扔向空中，在喝酒之前先向地上洒一滴，和传统的蒙古祭天地仪式一样。 [170]

草原上的基督徒没有骑上战马向欧洲发动征讨，也没有对穆斯林发动圣战。没有人因他们是异教徒逼迫他们，也没有人迫使他们相信任何事情。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漫游，他们的宗教很少受到约束，既不局限于特别的建筑物里，也不会为了词语的确切含义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也许可以说，基督教在上千年的历史中，第一次在蒙古大草原上找到了几乎完全的自由。

草原上的基督徒对其他信仰持灵活态度。他们用萨满来控制天气，

这对放牧和战争都很重要，[171] 他们祈求自认为能够帮助他们的一切力量。基督教是一种官方宗教，而基督徒则可以在通信和翻译方面提供帮助，还会治病，但基督教并非宫廷宗教，而是一种依附于宫廷的宗教。当有需要时，王室甚至会转而求助传统精神治疗师和萨满。王罕和乃蛮部的太阳汗生儿子都遇到了困难，他们两人都转向萨满求助，以保证能生下继承人。[172]

巴格达建制派教会统治阶层一直不信任草原基督徒的诚意及其对教会的忠诚。一位叙利亚东正教教会的主教在写到王罕时说，神抛弃了克烈部的统治者，“但他之所以被抛弃，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心已经不再敬畏他的主耶稣基督。他的主曾尊荣他，而他却从一个名叫西辽的汉人部落娶了一位妻子”。王罕这样做，就是“背弃了他父辈的信仰，去敬拜别的神”。[173]

***

铁木真的基督徒妻子并不是独自来到他的营地的。亦巴合别吉除了带来家庭厨师和仆人外，还带来了两百个家臣。他们一起在蒙古汗廷的中心组成了一个流动性的基督徒社区。[174] 新来的基督徒公主及其众多臣民把蒙古人带进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复杂的宗教和商业网络，把蒙古人与这些地区漫长而痛苦的宗教历史联系在一起，其地域涵盖俄罗斯、拜占庭帝国、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前哨基地。

除了公主之外，铁木真还招募了许多基督徒文书帮助他，因为他们具有战略规划和管理技能。其中一些人被升为官员和指挥将领，而基督徒是最先在铁木真政府中任职的一批外国人。1202年，第一位最重要的基督教教士加入了他的阵营，至于他的身份，有的说是畏兀儿人，有的说是克烈部人，也有的说是汪古部人。他的名字叫镇海，意思是真正的海洋。在镇海的协助下，铁木真巩固了蒙古帝国的畏兀儿文明模式，而他后来成了蒙古汗廷的高级官员。

后来，术外尼批评镇海，说他偏向基督教。他写道，镇海“极力礼遇基督徒及其教士，当这事到处盛传时，传教士就从大马士革、鲁木、巴格达、阿速(奥塞梯)和俄罗斯赶来，奔赴他的宫廷，为他服务的也大部分是基督徒医师”。他有权决定“政事的轻重缓急”，“要他们对好坏和祸福负责”。因此，“在他统治期间，基督徒的事业蓬勃发展，没有穆斯林敢于跟他们顶嘴”。[175]

镇海集中力量发展与中土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带的贸易关系。因为畏兀儿人具有商业、农业和城市生活组织方面的丰富知识，铁木真非常依赖他的建议，并把这些领域的职责委托给他。镇海利用自己的职权建造了一座新城，通常被称为镇海城，既是军事重镇，也是工艺生产中心，周围还是小麦产区。在镇海大权在握期间，蒙古人复兴了蒙古北部色楞格河畔的一个摩尼教中心——一个富裕的城镇拜八里(Bai Baliq)，由回鹘统治者默延啜于757年建成，该城成了蒙古与西伯利亚部落通商

的北方贸易中心，城内生活着许多工匠，为蒙古贵族生产黄金饰品和其他物品。 [176]

***

一些外国观察家看见大批基督教牧师和蒙古人的可携式教堂，便认为基督教是蒙古汗廷的官方宗教。巴·希伯来斯用自豪的夸张语气写道，蒙古人首选基督教，而非其他宗教。“蒙古人在基督徒人群中见过很多谦虚(或圣洁)以及有其他优良品德的人，所以不久以前，当蒙古人的王国初建时，这些蒙古人就很喜爱他们了”。 [9]

尽管基督徒在蒙古汗廷有着巨大影响，但铁木真对基督教神学并不太感兴趣。对他来说，富足、强大、著名的克烈部的失败清楚地说明了基督教的软弱无力。要么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假宗教，要么其信徒渐渐远离了其真正的信仰，以至于上天也转而与他们为敌。王罕是一名基督徒，但他却背叛了铁木真。如果基督教不能说服其成员遵守公义道德，那么它对蒙古人来说就没有多大用处。

此外，铁木真坚持他的万物有灵信仰，对他来说，神灵无所不在，而基督徒相信神的话语在他们的书里，仿佛他们已经把神困起来了，并把它装在一个皮面装订的便携式木匣子里。只有基督教的牧师才能读圣经，才会听到上帝的声音。祭司们掌握着接近上帝之道，但他们贪婪地出售这种方法给那些拥有金钱和权力的人们。与此相反，蒙古人认为上天直接在山顶同他们交谈，在林中和他们交谈，并不是通过一本书和他们说话。他们定期与神灵沟通，而基督徒虽然经常引用他们背诵的经文，但却不能回答和经文相关的基本的实际问题，这使他们感到很沮丧。

你是否必须去天堂才能聆听上帝的话语，还是上帝来到你跟前把话语赐给你？如果你自己没有听到这些话，那么上帝把话语说给谁听了呢？那个人是你的祖先吗？上帝是说话呢，还是把话写下来呢，还是用符号来表示呢？人是在梦中，还是在恍惚中与上帝相见呢，还是面对面与上帝相见呢？你是独自一人，还是与其他人或神灵一起与上帝相见呢？上帝用什么语言来沟通呢？如果你不会说那种语言，那怎么办呢？

蒙古草原游牧基督徒不像西方基督徒那样爱好绘画或雕塑。他们认为那些画像和雕像没有多大用处。他们尤其拒绝基督教艺术，因为它描述的总是人类行为中能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酷刑和殉难(人被斩首，在锅中煮，钉在十字架上，被凶猛的野兽吞吃，被勒死，在架上折磨，车裂，被野兽撕碎，被箭射杀，被长矛刺死，饿死，被拿来喂狮子，活活密封在墓中，被鞭打，强奸，活剥皮，被摘内脏，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被铁钎穿起炙烤，倒钉死，淹死，被绳索勒死，从高处抛下摔死，等等)。西方基督徒不仅写故事描述苦难，唱歌歌颂苦难，用图画描绘苦难，而且急切地收集殉道圣徒的血、断骨、皲裂的皮肤、头发和身体其他部位，并向他们祈祷。

相比之下，游牧民族认为，提到邪恶或描绘苦难只会带来更多邪恶和苦难。他们特别憎恶对耶稣受难的描绘：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血从他的荆棘冠冕上流出，他的肋旁被矛刺穿。一个备受折磨的神的形象使他们的道德情感无法接受。对草原基督徒来说，耶稣可以被杀，但却能荣归天堂，这个观念说不通。与克烈部人和乃蛮部人不同的是，蒙古人认为神圣与世俗之间是截然分离的。对他们来说神是上天或天堂，而不是一个人。

基督教个人救赎的观念使蒙古人感到迷惑、害怕，因为它与草原文化中很强的社群理想相冲突。大多数蒙古人晚上甚至不敢一个人睡觉，所以想象在所谓的永恒天堂里却没有家人或亲友相伴是很可怕的事情。蒙古人认为，成为孤儿是人生最悲惨的命运，而与集体分离使他们感到恐惧。事实上，他们的很多魔法、仪式和风俗习惯都是祈求神灵保佑家庭成员，直到他们能平安回到家里。蒙古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宗教奖励信徒上天堂，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和祖先却不被允许进入天堂。

***

铁木真和基督徒之间的直接对话没有流传下来，但是第一位法国公使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在他的书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在公元1254年到达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的汗廷。威廉受一个热心的基督徒路易九世派遣出使蒙古，希望劝说鞑靼人信奉基督教，并且探讨结盟抵抗穆斯林的可能性。这位法国国王已经发起了前往圣地的十字军东征，并且渴望了解更多关于传说中的在波斯和中国之间的基督徒社区。

威廉和一小队精心挑选的同伴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他们大多数时间骑马，有时步行，或乘坐牛车，忍受了近四千英里的漫漫旅程，终于到达位于鄂尔浑河畔的蒙古首都。他在蒙古汗廷看到了很多基督徒，其中一些就来自巴黎，这让威廉感到很惊讶，给了他很大的希望，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挫败感。他曾希望，既然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其他蒙古人应该很容易地皈依基督教，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因为他们非常熟悉基督教信仰，因此才极力抵制它。

虽然威廉的游记非常精彩，但他却认为蒙古宗教是无知和不虔诚的迷信。威廉·鲁布鲁克的记述说明了一个事实，尽管很多蒙古男人的母亲是基督徒，他们也娶了基督徒为妻，但蒙古人和基督徒之间一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威廉错误地认为，蒙古人制作的纪念祖先的毡俑也是他们的神。他在他宝贵的游记中解释道："虽然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位神，但他们却用毛毡做成偶像纪念死者，给它们穿戴最贵重的衣饰，并把它们放在一个或两个车上，没有人敢碰这些车，只有他们的占卜者负责照顾它们。"威廉认为，既然他们崇拜这些人形的偶像，那么他们应该能够理解上帝也让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子。

他记录道："我向他们询问他们所信奉的神。"

他们回答道："我们只相信有一个神。"

鲁布鲁克问："你们认为他是神灵或者是具有肉体的东西？"

他们说："我们认为他是神灵。"

然后威廉试图向他们宣讲他的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要点，上帝创造了他的儿子耶稣，他是神，也是人。他问他们："你们认为他从来没有采取人的形体吗？"

他们回答说："从来没有!"

威廉挑战他们，指出他们崇拜偶像，崇拜具人形的神。"既然你们相信他是唯一而且是神灵，你们为什么又给他塑成肉体的形象呢？"他补充道，"而且为什么塑得那么多呢？再者，既然你们并不认为他会变成人，你们为什么又把他塑成人形，而不塑成别的动物形象呢？"

蒙古萨满坚称，他们制作并崇拜的并不是神。他们着重声明："我们并不塑造神的像!"塑造那些形象是为了纪念死者——"一个儿子、妻子，或者一个亲爱的人"，那些偶像只是用来纪念所爱的人。

威廉嘲笑这无聊和虚假的虔诚。他指责他们说："那么你们只是为巴结别人才立像的。"他写道："接着他们好像在嘲笑地问我，'神在哪里？'"于是威廉开始布道，用非常抽象的术语把基督教信仰和关于灵魂的道理讲给他们听，但很快就没人听了。他在他的正式报告中写道："当我要继续跟他们讲道理时，我的译员感到厌倦，不愿再译我的话，所以他叫我别再说了。"[177]

威廉在同萨满和万物有灵论者打交道时已经非常愤怒了，而当他和基督徒打交道时就变得更加沮丧了，因为他们对威廉的教导根本就不感兴趣，也不在乎罗马的教皇。草原基督徒的自由激怒了这位天主教教士，他认为要严格遵守教义，支持强大的教会层级结构。威廉对这些亚洲基督徒表示了极端敌视的态度。他写道，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主人已经不再敬拜基督，反而敬拜偶像，他的身边都是偶像的祭司，这样的祭司只会招来恶魔，他们全都是江湖术士"。[178] 威廉抱怨说，草原基督徒的祭司的声明"比事实多出十倍"，并且"无中生有地编造一个伟大的故事"，连佛教徒的生活也比他们"更清白"。

威廉在他的游记中抱怨，草原基督徒"一无所知"。他们的牧师随意举行仪式。他们"有叙利亚文的《圣经》，但他们不懂这种语言，所以他们吟唱时就像我们中间那些不懂语法的僧侣一样，他们绝对是堕落的"。威廉声称，这些祭司对酒精、女人和赚钱比宗教更有兴趣。"首先，他们是高利贷者和醉汉"；有人有好几个妻子；"他们犯了重婚罪，因为第一任妻子死后这些教士就再娶一个"；他们唯利是图，人们不得不为他们主持的基督教仪式付费，"因为不会免费主持圣礼"；他们"更在乎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不是增强人们的信仰"。[179]

***

铁木真与基督徒的联系终其一生都很重要，但他和他的基督徒妻子亦巴合别吉的婚姻却没能维持多久。这桩婚姻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建立的，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而终结的。她的父亲札合敢不在被任命为汗后不久，便违抗铁木真，他仍然认为他的克烈部人是蒙古人的主人。铁木真派了一支军队打败了他，并将他处死。执行这项重要任务的将军得到了亦巴合别吉做他的妻子。铁木真特地公开说明，之所以把她送人，并不是因为她长得丑或不喜欢她，他是出于政治原因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因为他不能娶一个叛徒的女儿。他允许他的儿子拖雷继续以她的妹妹唆鲁忽帖尼为妻。与此同时，他允许亦巴合别吉保留她的公主头衔，保留她所有的财产以及所有分配给她的人员，并命令道，她要得到充分的尊重。 [180]

铁木真这样做虽然有政治上的道理，但其动机可能并不纯粹是政治性的。真实的原因是他想娶另一个妻子忽兰，她是被击败的篾儿乞部首领的女儿。她的名字的意思是蒙古野驴，即戈壁滩上的野马。 [10] 蒙古野驴奔跑速度极快，而且远避人类。和其他种类的马不同，蒙古野驴永远不会被驯服，这也许表明了忽兰的个性，这或许正是吸引铁木真的东西。在他的一生中，除了正妻孛儿帖外，他最爱忽兰，并和她生了一个儿子。

根据《蒙古黄金史》的记录，铁木真不愿把他新娶了一个妻子的事告诉孛儿帖。他早些时候娶了两个塔塔儿女王和亦巴合别吉做妻子，更多的是政治决定，而非出于个人激情，但他却对忽兰表现出了强烈的感情。他没有把忽兰带回家，把她引见给妻子和家人，然后圆房，铁木真似乎无法克服对她的欲望，迫不及待地在外面作战时就想和她做爱。但是铁木真未透露姓名的同伴警告他说："野外合卺，于礼不合，回宫临幸如何？"

但铁木真"没听他们的话，还是共枕了"。 [181]

他和孛儿帖青梅竹马，现在也仍然爱着她。在和忽兰相遇之后，他对一位家臣说："无颜相对，回到家里，那屋子便窄了。原未询及家中之人，倘在外人面前发怒，似觉又羞又愧。"所以他没有自己去告诉孛儿帖他娶了一位新妻子，而是派了一位信使去报信。

"你来做什么？"孛儿帖问使者。使者告诉她，铁木真变心了，他的欲望战胜了他的意志，他无视同伴们的建议。他通过信使带的话简单而直接："贪恋于虎帐之色。"他指的是他的幽会地点，"已与忽兰共枕了。"

孛儿帖放下作为一个真正的女王的尊严，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她大声说："靠汗主的威力，全蒙古不愿意，又能怎样？"她重复道，"靠圣主的威力，众生灵不愿意，又能怎样？""额尔吉河上鸿雁集聚，任凭

主上射到拇指发胀；大国境内妇女尽多，听凭主上寻访探求。”她似乎理解并宽容了他出外作战时就违背风俗习惯开始与忽兰发生关系。她引述了一句谚语：“烈马喜被雕鞍。”然后，孛儿帖不禁一语双关地大声质疑，“难道多了还坏吗？少了就好吗？”[182]

铁木真在把亦巴合别吉送走并娶忽兰为妻后，没有再娶。现在，他有四个妻子，包括两个塔塔儿姐妹，而他再也没有因政治或情感的需要而娶妻子了。

***

札合敢不死后，铁木真加紧了对克烈部的控制。他决定，他的国家不会像被他打败的塔塔儿部、克烈部和乃蛮部那样成为一个联邦或部落联盟。他打算团结一切氏族和部落组成一个单一民族，而他自己则是唯一的汗。所有的部落和氏族将成为新的蒙古民族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地位会不断下降。现在他们主要的身份认同是蒙古，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在四十多岁的时候，铁木真把注意力从征服转向了管理。他摧毁了草原上所有的政府，现在正是要建立一个新政府的时候。塔塔儿人、克烈人和乃蛮人的精英系统已经完全被摧毁，他已经杀死了这些部落的贵族，把幸存者分配给了他自己的追随者。他成功地缔造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但他意识到，现在要继续掌权，他需要建立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系统，制定公开的法律，明确分工和责任，确定解决纠纷的手段。他把时间越来越多地花在了决定谁得到哪块牧场、调解家庭纷争、解决遗产问题、养活身边越来越多的官员和职员，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大大小小的实际问题。他陷入了日常事务而无法脱身，但他又不愿意像其他汗那样统治。他想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

铁木真曾试图通过与基督教的王室家族联姻加强自己的权力，但他的努力失败了。他曾希望通过将札合敢不变为傀儡进行统治，也没有成功。他虽然不是汗的儿子，但他决心成为自己国家的汗，而这个国家将不同于草原上或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而他也将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统治者。在四十四岁那年，他终于准备好踏上世界历史的舞台了。

第七章 缔造蒙古帝国

铁木真已经有了一套文字，也有了一支军队，他可以建国了。为了使这个新时代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简短而威严的头衔。他对传统的头衔古儿汗根本不感兴趣，因为戴着这个头衔的很多恶人下场悲惨，用一位基督教牧师的话说："其荣耀永远与污点相伴。" [183] 因此，他自己选择了成吉思汗这个新的蒙古头衔，这个头衔代表坚定、强大、刚毅和忠诚，同他自己名字铁木真所代表的品质类似。在蒙古语中，"成"(Chin)的意思是"决心"或者"坚强的意志"，因此，他成为了"强大的君主"或"强大的汗"。汉文史料中最早提及他的称号是在1221年宋朝特使赵珙提交给朝廷的报告中，说他的头衔的意思是"天赐"。[184]

对他的蒙古追随者来说，铁木真成了成吉思汗，但对他的突厥追随者来说，他是腾吉斯，意思是"海洋"。自从匈奴时代以来，这个名字就有着丰富的含义，阿提拉和他的儿子都拥有这个称号。几个世纪以来，草原统治者都把这样表示水的称号加给他们的领袖，但形式各有不同，如回鹘的Bilge Kol，意思是"智海"，或叫达赖汗，意思是"四海之内的统治者"。[185]

1206年夏天，奠定新帝国根基的时机已经成熟，成吉思汗决定回到不儿罕圣山脚下，斡难河的源头。差不多四十年前，他的母亲曾以此地为避难所。她曾在河边来回奔走，手里拿着一根黑木棍，挖掘根茎养活她的孩子们。[186] 现在，他选择此地作为他的新国家的根基，一则是对他的精神家园表达敬意，二则是对他母亲的深深崇敬。母亲曾目睹他毕生的斗争，还将活着看到他的胜利。尽管得到了这些荣誉，她还是很不满意，因为成吉思汗只给她的宫廷分配了五千个臣民。

没有外国人在场见证蒙古帝国的诞生，但后来的历史学家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有时加上自己的想象，描述了蒙古帝国创立的过程。在《弓箭手民族的历史》(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Archers)一书中，亚美尼亚史家格雷戈里(Gregory of Akner)写道，蒙古人向神祈求，救赎他们脱离可怜、悲惨的生活；神听见了他们的祷告，并派来了天使，就是铁木真在异象中看见的那只有着金色羽毛的老鹰；老鹰天使站在开阔地带，距铁木真大约一箭远的地方，宣布他的新称号，接着便为这个新民族颁布法律。[187]

在另一本亚美尼亚历史著作《东方史精华》中，海屯声称，蒙古人最初并不相信成吉思汗的称号是神授的，因为他童年时曾遭遇诸多不幸，同时也因为这个所谓的神的异象并不是出自虔诚的、受过教育或出身贵族的男人。为了回应人们的怀疑，神托梦给铁木真，但仍然没有人相信。"第二天晚上，这帮领袖看见了那个身穿白衣的士兵，也看见了成吉思汗曾告诉他们的那个异象。他们接到了永生神的命令，必须服从成

吉思汗，也要让所有人都服从他的命令。因此，七个鞑靼部族的七位领袖和贵族聚集在一起开会，同意服从成吉思汗为他们的主。” [188] 还有传说描述有玉玺从天降下，乡间弥漫着香雾，风吹来一块宝石，岩石上栖息的五色鸟大声宣告成吉思汗的名号，天上闪耀着神光。 [189]

波斯历史学家拉施德丁则说，一个萨满骑着白马飞到天堂，获得了这个名号。不过术外尼的说法可能更可信，他说，这个名号并不是萨满授予成吉思汗的，而是上天赐给他的："天神跟我谈过话，他说：'我已把整个大地赐给铁木真及其子孙，给他起名叫成吉思汗，吩咐他如此这般施行仁政。'" [190]

每个故事都说他担负着特殊的神圣使命，他是神所选定的君王。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写道："他们的国王是上帝的亲属。"显然是在用《圣经》中所记载的童贞女所生的耶稣来解释这件事。"上帝自己掌管天堂，而把大地赐给成吉思汗"，他"不是通过男人的精子所生，而是由看不见的光孕育，这光通过天窗进入室内，对他的母亲宣布：你将怀孕生一个儿子，他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 [191]

如果成吉思汗的父亲曾是皇帝、汗或者国王，那么他的合法性将会被理解和接受。但由于他缺乏政治传承，他的追随者便用超自然的现象来粉饰并解释他的人生故事。他的合法性不是通过骨血，而是来自天堂的金光。尽管外国记载对成吉思汗的崛起称帝赋予了形形色色超自然的元素，但是《蒙古秘史》本身在记载成吉思汗称号的选择以及与蒙古帝国建立相关的事件时并没有提到宗教内容，没有提到萨满、牧师或其他宗教官员曾参加加冕典礼，史料中没有提到祈祷，没有击鼓，没有向长生天献祭，没有提到上帝或者天堂，只是强调铁木真称汗是人民的意愿。人们聚集在一起，举起用白马鬃编制而成的民族大纛，把成吉思汗的称号加给了他。《蒙古秘史》不厌其烦地述说马对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但在记载有关的仪式时，其文字往往非常直白，只是说："既平毡壁之百姓，寅年聚会于斡难河源。建九游白纛，奉成吉思汗以罕号焉。" [192]

除了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称号外，成吉思汗决定给他的国家起一个新的名称。 [193] 汉人虽然知道草原牧民分为多个民族，但仍然把所有游牧部落统称为鞑靼人。成吉思汗的部落集团和大多数漠北的牧民被称为黑鞑靼，他们被汉人视为最不开化、最危险的人。与其相对的是住在漠南的白鞑靼，他们靠近中土，受到汉文化一定程度的熏陶。成吉思汗不愿采用旧有的名称，诸如匈奴、突厥、塔塔儿等，因此给他的人民起名为"蒙古人"。 [194] 关于这个名字有很多解释，但他本人从没有解释过这个词的含义。这个词的真正意思依然是一个秘密，正如他的生平和他的政府一样，这正是知识的力量，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权知道。

蒙古人喜欢"团结缔造成功"这个格言。然而，仅仅用一个名字称呼一大帮各具特色的复杂人群并不能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成吉思汗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要把居无定所也不隶属于任何城市的游牧民族统

一起来，融入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而这绝非易事。国家、民族或政府这些概念对农业社会来说司空见惯，但对游牧民族来说，却是奇怪的概念。汉人称他们为“移动的国家”或“马背上的国度”，在他们自己眼中，蒙古人就是兀鲁思(uls)，就是一个国家。

《蒙古秘史》的中心部分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了1206年的议事过程，详细记录了每个人是如何帮助铁木真登上汗位的，也具体解释了这个人将得到何种回报。被授予特殊荣誉的人里面，不仅包括在战争中表现勇敢、有过壮举的英雄，还包括那些虽不是英雄，但看到过异象、做过异梦，有助于他统治合法化的人。

蒙古人说，一个梦就是从某地寄来放在枕头上的一封信、一条留言，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件会在梦里预演。据说当铁木真八岁时，他未来的岳父特薛禅就曾声称：“我今夜得一梦，梦白隼握日月二者飞来落我手上矣。”[11] 从匈奴时代开始，草原部落就认为白隼象征权力。它曾经是阿提拉家族的徽章，铁木真也用白隼来代表他的家族。[195]

另一个启示来自巴阿邻人豁尔赤。他本来是札木合的一个追随者，后来抛弃了札木合，转而追随铁木真。虽然札木合和铁木真并没有共同的男性祖先，但他们被认为是出自同一个子宫、同一汪水的孩子，因为二人拥有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就是“傻子”孛端察儿曾捕获的兀良哈女人。豁尔赤描述了他如何在梦中看到一头强壮的牛拉着国家的大车，沿着一条宽阔的大道横跨地球。牛在向前走时向百姓大吼，说天父和地母已经选择铁木真做这个民族的统治者，并且命令百姓听从他。它喊道，所有的战士都应该来服从他，所有的草原部落都应该归附他，跟在他的大车后面。

豁尔赤把这个梦讲给铁木真听后，也向他讲解了某些道德原则。[196] 这个梦只是一个序曲，解释了他是如何登上汗位的，接下来他还要接受上台掌权后如何统治的秘密灵性知识。这些教义被称为大托拉，其中包含了人生最深刻的原则和真理，其内容仍秘而不宣。成吉思汗认识到了这些教义的重要性，因此在他的晚年，不再把豁尔赤看作老师或萨满，而是称作恁都呼都克，意即非常有福气的人。

命名仪式结束后不久，成吉思汗宣布了他的新政府的组织结构，概述了各个部门的性质以及任职人员。他挨个叫出那些人的名字，这些人或者曾在他二十五年统一蒙古诸部的斗争中功勋卓著，或者有过英雄壮举。他奖励他们官职，免交赋税，或者其他应得的奖励。术外尼写道：“直到各部都清一色听命于他为止。接着他制定新的法律，奠定法治基础。”[197]

庆祝结束后，年轻人开始进行摔跤比赛，大家一起赛马、唱歌、玩掷髁骨游戏、调情。老人们畅饮马奶酒，大食用热石头烹煮的旱獭肉，拜访多年不见的亲戚，和昔日的敌人一同欢笑。男人和女人参加射箭和摔跤比赛。观众很喜欢这样的表演，当一匹不被看好的马出人意料地赢

得了比赛，他们兴高采烈，当一个小女人在摔跤时把一个胖大男人掀翻在地，他们大声喝彩。这里没有金钱赌博，但参与者在赌他们的名誉，在激动人心的刹那之间他们可以赢得荣誉，也可能失去荣誉，蒙古人称这种比赛为那达慕。

蒙古民族的创立是成吉思汗和他的百姓之间所立的契约，不需要其他的祝福。他已经依照上天的法律使蒙古人回归正途。用《蒙古秘史》的话说，他"整饬蒙古之百姓讫"。[198]

***

1206年草原上的夏天是许多世代以来最和平的一个夏天。没有部落争斗，没有绑架妇女，没有报复性杀戮。人们聚集在斡难河和克鲁伦河之间，尽情享受着自由，不必远眺地平线，担心着突袭者的到来，或者在晚上担心一家人到了早上还能不能活着。草原游牧民族习惯在夏季聚会，人数通常有数百人，有时达数千人，但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为着所有部落的统一而聚集在一起，这是史无前例的举动。他们迅速建起了一个有数百顶大帐篷的城市，帐篷用木框和毛毡搭建而成。大多数村庄和城市布局往往是各种建筑物混杂在一起，街道蜿蜒曲折。蒙古营地的布局并不那样随意，往往是按照严格的军事纪律搭建的，街道笔直、开阔。蒙古包是根据具体的计划排列的，大汗的宫廷和家庭的蒙古包居于中央，外围是市场并设置了设备修缮处、马厩、肉类配送中心、医院和失物招领处。首次造访的陌生人马上就会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所需的一切和要见的人。

当铁木真于1189年首次成为部落汗时，他只有不足三万追随者，但到1206年他成为成吉思汗时，他的追随者的数量已增加到了一百万。他不再是一个部落的汗，他现在是一个新国家的皇帝。旧的部落汗既是立法者、军事领袖，也是萨满、法官和税吏，而他的国家已经超越了旧的部落结构。

成吉思汗深知，塔塔儿部、克烈部和乃蛮部之所以灭亡，并不只是因为自己在战场上的战术优势，而是因为他们内部的权力斗争和频繁的叛乱，以至于兄弟相斗、父子成仇，最终自取灭亡。成吉思汗知道，只要旧部落、氏族与贵族还在，他就永远不会安全。自从他击败了塔塔儿部后，他就决定，那些贵族家族的男人要么逃离，要么被杀，因为他们永远不能被信赖，也不会忠于他。他决心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组织，以防止将来出现这种背叛行为。

成吉思汗允许那些一贯忠诚于他的部落仍由他们传统的首领领导，但他的新帝国并非部落的集合，而这些部落可以由自己原来的汗统治，拥有他们之前的领土。他废除了所有曾抵抗或背叛过他的旧部落和氏族，把他征服的臣民重新分配到帝国各地，组成百户、千户和万户的新单位。他刻意把他的追随者融入混合部落，把他以前的敌人或不太可靠的人置于他亲信的监视之下。这些新单位继承自回鹘人，用于确保臣民

的忠诚和顺从，打破了亲属关系和阶级的界限。来自底层家庭的忠诚的男人现在统治着可汗和王后的后裔。为了防止草原生活特有的各种玩忽职守和拉帮结派的现象发生，他不准任何臣民离开自己所属的由十位战士和家庭组成的单位。

成吉思汗依赖自己的家庭成员执法并“决定司法事宜”。[199] 他指派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别勒古台审判并决定谁犯有盗窃罪、谁是无辜的，并调解争端。[200] 成吉思汗很重视书面记录，他要求把他的法律仔细记录下来，但别勒古台却是个文盲。过去的回鹘汗廷曾设有一个大职位叫断事官，成吉思汗也设置了这样的职位，由他收养的塔塔儿弟弟失吉忽秃忽担任。[201] 他煞费苦心地解释法律的重要性，并命令把法律写在纸上，保存在青册里。他警告说：“其勿更改失吉忽秃忽与我议拟之白纸所造青册文书。”这些法律要世世代代传下去。他说，新的法律将以现有习惯为基础，但当失吉忽秃忽把法律写下来时，他应该“裁定判决”[202]，修订法律使之适应当前需要和关切的情况。成吉思汗宣布失吉忽秃忽将成为他的“所视之目，所听之耳”。他分配职责，但没有人能改变他的法律或他的话。后来，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最高断事官，审判众人：“于举国百姓中，惩彼贼盗，勘其诈伪，死其当死者，惩其当惩者。”[203] 这些法律一度被称为大札撒，即成吉思汗大法，而法官被称为札鲁忽赤(Jarguchi)，这个称号在词源上与成吉思汗的第一位老师札儿赤兀歹的名字同源。

在成吉思汗的指导下，失吉忽秃忽创建了新的司法系统，确保法律在整个蒙古帝国得到贯彻执行。法律禁止官员施行酷刑和恐吓。失吉忽秃忽斥责道，被告“不应因恐惧和痛苦而认罪”，“不应害怕讲真话”。[204] 根据拉施德丁的记载，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失吉忽秃忽试图将这些法律推广到经常用酷刑折磨被告和证人的国家。随着书面法律逐渐取代古老的谚语，新建立的驿站系统把法律和其他圣旨传递到帝国各地。成吉思汗的中央汗廷现在可以作出决定，而这些决定以前是当地酋长作出的。他的庞大而高度集中的系统依靠的是速度和通信，而非传统和习惯。

***

铁木真现在已经是成吉思汗，是整个蒙古大草原的统治者，正如孩提时代他在不儿罕山上发的誓一样，他已经名扬天下。他已经准备好对付任何敌人，也不惧怕制造新的敌人，因为他自信能取胜。然而，他并没有准备好对付来自家族内部的挑战。新的蒙古民族犹如一项巨大的社会实验工程，而这项工程是成功的，因为大多数人早已厌倦了没完没了的仇杀，故而对这种新的稳定心存感激。然而，所有的幸福都是短暂的，创造这个新国家的欢乐也是如此，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为此感到高兴。有些人不可避免地心生怨恨，因为他们没有获得足够的权力。成吉思汗手下少数比较传统的臣民心中越来越不满，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畏兀儿人和其他外国幕僚进入汗廷，而他们却无缘接近大汗，因此心怀嫉恨。他们的长者本来掌握权力，享有威望，但如今却被一大帮迅速崛起

的写信盖章的文吏夺走了一切，他们感到了威胁。弟弟的官职有时比其兄长或本家叔叔还高，文员根据奇怪的皇历去预测星象的运行以及日食或月食的发生。还有人心怀怨恨，因为他们的部落在征服战争中被攻破，亲属被杀，还有许多人不甘心被暴发户蒙古人统治，因而心生嫉妒。蒙古人以前从未统治过一个帝国，他们一直是其他更开化的草原部落的附庸。对他们来说，从部落到帝国的变化难以忍受。

反对派很快集合在一个人身边，此人成了成吉思汗的主要竞争对手。他就是阔阔出。阔阔出在铁木真父亲的忠实伴当蒙力克的七个儿子中排行中间。 [205] 这两个家庭的关系很密切，但关系的性质却不太明朗。铁木真和蒙力克来自不同的氏族，但他们在铁木真动荡的生涯中一直住在一起。《蒙古秘史》称赞蒙力克使铁木真免遭“回旋大水”和“熊熊大火”的威胁，似乎暗示他曾帮助铁木真击败王罕和札木合。虽然蒙力克和铁木真都称也速该为父亲，也速该称他们为儿子，但是铁木真对蒙力克非常恭敬和尊重。 [206]

成吉思汗是通过军事实力登上大位的，而阔阔出则是借助精神力量吸引追随者的。有几则外国史料记载，阔阔出曾作为萨满或某种权威赐给成吉思汗称号，但《蒙古秘史》并没有这样记载。汉文史料特别提到他是一个巫师，而波斯史料则写道，他是一位先知。他的名字“阔阔出·泰德腾格里(Kokochu Ted Tengeri)”有着特别的神圣奉献的意思，但他是如何获得这个称号的，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学者对“泰德”(Ted)这个词的词源和意思看法不同。虽然萨满曾出现在被击败的太阳汗和王罕的汗廷中，但在成吉思汗的汗廷中并没有特别提到过。一些报道坚称，成吉思汗的世系中从没有出过“精神恍惚的萨满”。 [207] 蒙古萨满只通过他们的祖先传递信息，而诃额仑和她的家人被几位老妇人禁止参加祭祖仪式，因此铁木真与祖先的精神联系已经切断了。因此他敬拜大山，不再通过其他帮助直通上天。

虽然萨满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但他们也会引起猜疑，甚至厌恶。正如有句话说：“最坏的人才做萨满。” [208] 蒙古语中表示“萨满”的词boo，就具有令人讨厌的含义：肮脏、可恶、呕吐、阉割，毫无顾忌投机取巧的人；它也是虱子、跳蚤和臭虫的总称。 [209]

《蒙古秘史》把阔阔出的追随者统称为“九舌人”，似乎包括所有对成吉思汗怀恨在心的人。 [210] 这些人愈来愈相信阔阔出卓越的能力和精神权威，因此对成吉思汗造成了威胁，必须加以解决。波斯历史学家术兹札尼极端反蒙古，但通常观察入微。在此问题上他可能是对的，他说，阔阔出是个伪君子，他过度利用与成吉思汗亲密的亲戚关系，做得太过分了。他写道：“这个骗子自我膨胀，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他假装预言，成功之后便开始自我膨胀，野心勃勃。” [211]

阔阔出虽然表面上假装忠诚于成吉思汗，却利用他日益增长的精神权威来召集追随者。无论他的灵感如何，他大大低估了对手的本领、力量和追随者的数量，也低估了他对手的冷酷无情。阔阔出没有直接攻击

成吉思汗，而是多次挑起与他的家庭成员的冲突，特别是挑起与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的冲突，通过鼓励合撒儿的野心，使成吉思汗对他产生怀疑。成吉思汗从感情上很难接受合撒儿的威胁，因为合撒儿身材高大，力大无比，擅用弓箭。合撒儿过去也曾经背叛过成吉思汗，去投靠他的竞争对手王罕。[212]

在蒙古帝国建立后的第一年里，阔阔出的势力不断增长，到1208年的某个时候，他引发了一场危机，而成吉思汗似乎措手不及，不知道如何解决。阔阔出知道他的对手笃信托梦，于是他告诉成吉思汗，他在梦中得到启示，合撒儿已经成为蒙古大汗了。这话很快就散播开来，其震撼力可想而知。合撒儿逃离了营地，这进一步加深了成吉思汗的怀疑，他怀疑自己的弟弟已经构成了某种形式的背叛。一些史料记载，合撒儿和阔阔出及其兄弟合谋推翻成吉思汗。[213] 也有人说，合撒儿曾试图勾引成吉思汗心爱的妻子忽兰。有一部史书含蓄地指出，合撒儿出去打猎，但意在别处。而成吉思汗的一位家臣的报道更坦率："你弟弟合撒儿坐着喝醉了，他拉了忽兰夫人的胳膊。"

成吉思汗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合撒儿，他似乎对合撒儿有些害怕。札木合曾用超自然的词语描述过合撒儿，但他从来没有用同样的词语描述过铁木真。"他是翻转的龙蛇所生"，力气之大，能"射穿隔山之敌"，杀死"草原外的敌人"；他神奇的叉披箭一射可以杀死一二十人；他也有力气把人给吞了，"整咽带矢弓之人"。[214]

成吉思汗仍然信任阔阔出，但已对合撒儿产生了怀疑，他认为弟弟构成了威胁，在用梦做借口，采取行动反对他。成吉思汗逮捕了合撒儿，褫夺了分配给他指挥的百姓，并讨论该怎么处置他。若不是诃额仑及时干涉，合撒儿就一命呜呼了。当她听说合撒儿被拘捕的消息后，立即登上骆驼大车，赶了一夜，天亮时走进她儿子的蒙古包，要求成吉思汗释放合撒儿。有一刻，她甚至敞开胸膛暴露自己的乳房，提醒成吉思汗，他要保护他的兄弟们，因为他们是吸吮着同一个乳房长大的。成吉思汗不情愿地服从了母亲，并释放了弟弟，但只给了他一千四百个百姓，并对他严密监视。[215]

诃额仑被她儿子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争斗折磨得精疲力竭，虽然她才五十多岁，但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却"寿终正寝"，撒手人寰了。她的死给了阔阔出一个新机会去扩大他的权力，增加他个人的追随者。诃额仑最小的儿子帖木格作为守灶者继承了她的财产。事实上他一直在管理妈妈的财产，因为在他母亲去世之前，他一直和她住在一起。阔阔出说服许多原属诃额仑的百姓离开帖木格，来追随他。当帖木格当面质问他时，阔阔出和他的部下公开羞辱帖木格，让帖木格跪下来道歉，做他的附庸。

帖木格逃到他哥哥的汗廷，眼泪汪汪地求助。当他走进蒙古包时，孛儿帖还躺在床上。当她听到他的请求，她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怒不可遏。她在床上坐了起来，拿一条毯子盖住乳房，慷慨陈词，要求她的丈

夫保护他的弟弟免受那个邪恶的萨满阔阔出的伤害。她说，如果阔阔出在成吉思汗还活着的时候就敢伤害他的弟弟，一旦成吉思汗去世，他会对她的孩子做什么？孛儿帖一生遭受过无数苦难，但在《蒙古秘史》中，这是我们唯一一次看到她哭着恳求丈夫采取行动，而打击的对象是阔阔出。[216]

在孛儿帖的催促下，成吉思汗允许他的弟弟随意处置阔阔出，以报复阔阔出曾偷窃他的百姓并公开羞辱他的行为。帖木格等待着阔阔出出现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包里，向他发出挑战，好好打上一架。

当两人走到外面时，帖木格的同伴正等在那里。根据术外尼的说法，他们抓住阔阔出，“卡住他的喉咙，用力地把他摔在地上，他再也没有爬起来”。[217] 据《蒙古秘史》记载，他们打断了阔阔出的脊骨，把他扔在营地边上等死。后来成吉思汗公开宣布他的最终判决：“以通天巫致手足于我弟每之故，以无稽谗言于我弟每之间，故不得天佑，将其性命身躯而去矣。”[218]

他对阔阔出的父亲和兄弟说的话更直截了当，他责备他们：“不劝汝子之无状，思与齐之也，乃至通天巫首级矣。若知汝等如此性行，则依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等为例矣。”因为他觉得他亏欠了蒙力克，因此他放过了蒙力克和蒙力克的其余六个儿子，但剥夺了他们的权力。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允许竞争对手拥有政治权力，也不允许宗教领袖施加太大的影响。阔阔出死后，再也没有蒙古人敢公开质疑成吉思汗的权威。

成吉思汗竭力把不同宗教的信徒混合在一起，正如他把不同氏族、部落合并成新的军事和政治单位一样。这样，每种宗教在他的汗廷中都会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但没有任何一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集团。阔阔出公然挑战他的权威，证明了他对宗教人士的怀疑是有道理的，这些人总是以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接近天堂，借机宣扬自己的地位。成吉思汗仍然会为了特定目的而利用萨满，如预测未来或控制天气，但他再也不允许任何人在他与上天之间设置障碍。

阔阔出开了一个血腥的先例。这是蒙古大汗第一次诛杀一个声称自己的地位高于国家或汗的宗教领袖，但绝不是最后一次。后来这一政策又被援引，用来证明1258年在巴格达处决伊斯兰哈里发和他儿子的正当性，也用来证明处决被其信徒视为神人的伊斯玛仪阿萨辛教派伊玛目的正当性。后来，蒙古统治者反复要求召见教皇，要审查他的行为，但没有成功。否则，如果教皇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很有可能也会被杀。正如蒙古人不会容忍政治领袖的竞争对手一样，他们同样杀死违抗成吉思汗的宗教领袖。成吉思汗是上天的代表，而违抗他就是违抗上帝。佛教、苏菲派穆斯林和东正教基督教领袖了解蒙古政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作为来适应这种新兴力量。

成吉思汗没有选择宫廷萨满，而是依照传统任命智老作为精神顾问，官号别乞。1206年，当他创建蒙古民族时，他宣布：“蒙古之制，

有为别乞官之道。” [219] 他把这个称号赋予巴阿邻长者兀孙额不干，此人对他一贯忠诚，永远不会“隐藏或隐瞒”任何事情，因此兀孙额不干成为了特殊的荣誉顾问。成吉思汗允许他穿得像老摩尼教神父一样，“衣以白衣，乘以白马”。 [220] 在蒙古包中，留给他一个座位，有专人侍候他。这种顾问虽然享有尊荣，可以建言献策，但几乎没有独立性，根本没有余裕来干涉国家事务。他们永远不可能像阔阔出那样能行使权力或构成威胁。成吉思汗新国家的统治精英不会是宗教或部落贵族，这种特权只有他的武士团队才可享有。

***

每一个故事，不管真实与否，都能告诉我们一点东西。在14世纪初，埃及学者谢哈布·奥丁·奥·奴外里(shihab ol-Din al-Nuwayri)记录了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和创立法律的过程，他叙述的故事非常有趣。按他的说法，成吉思汗在早年曾向一位犹太拉比寻求指导，他问：“为什么耶稣、摩西和穆罕默德有那么大的权力和名声？”

拉比回答道：“因为他们爱神，委身于他，所以神回报他们。”

成吉思汗又问：“要是我也爱神，委身于他，他会回报我吗？”

“是的。”拉比回答道。

在对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教义及法律进行长时间讨论之后，成吉思汗退居山林去冥想。过了不久，他唱着歌跳着舞出现了，他曾细心观察过身边的各种宗教，但最终选择了不皈依任何宗教，也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相反，“正如他所宣称的那样，他只爱上天”，并声称：“只要是上天的旨意，他都会坚持这样做，这是他的开始。” [221]

成吉思汗是否真的见过一位拉比，似乎令人怀疑，但这个故事融合了各种元素，包括他在不儿罕山所接受的长期灵性修炼以及他与各种宗教学者会晤的心得。因为他崇拜大托拉，即蒙古法律，许多观察家经常把它等同于犹太法妥拉——犹太人认为这就是摩西的律法，也有人认为是讨拉特，即穆斯林公认的众先知的律法，其中也包括耶稣的律法。[222] 蒙古人把摩西律法、先知之法和中国的“道”混合在一起，以求找到真理之法和生活的适当方式。

成吉思汗教导他的百姓崇拜他们的国家，正像其他人崇拜他们的神、灵、先知和圣徒一样。蒙古人向他们的国家之灵脱邻苏勒德(Toriin Sulde)和国旗献祭并许愿，正如其他国家的人民向他们的神灵所做的一样。 [223] 他们视国家及其大法为神。只有民族才是所有权威和宗教信仰中最高的存在。这种思想在16世纪成吉思汗的后代俺答汗所制定的法律中有明确表示，他的法律把国家置于宗教之上。他下令“宗教法律就像打结的银丝带”，但是“皇帝的法律就像金轭”。 [224]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在试图找到成吉思汗史无前例的征服和帝国

迅速扩张的秘诀。是因为蒙古人的复合式草原弯弓吗？是因为耐力超群的蒙古战马吗？是因为蒙古武士的饮食吗？是因为牧人的艰苦生活吗？还是只是因为天气或气候的变化呢？还是像蒙古史所写的那样，只是命运或天意？毫无疑问，成吉思汗自己才是他取得胜利的原因。他的成功来自他寻求真理和为维护至高命令的终极原则和法律所作出的努力。在《蒙古秘史》中，他说：“我朝立于众国位之上，因我常思真理之圣道，大法。” [225]

第八章 火焰的卫士

历史一再证明，无论一个人多么强大、多么努力，都无法完全控制一切。统治者经常依靠家人来扩大自身的影响，而对所有外人持怀疑态度，但是成吉思汗被他的亲属一再背叛，于是他转向自己亲密的小圈子，这个圈子被称为那可儿(Nokor)。他的那可儿都是在建国之前就结识的，他们的忠诚经受过考验，坚定不移。他们通常来自底层氏族，年轻时就加入了他的阵营，有些是经过家人的允许，但也有人是离家出走来投奔他的，证明他们对成吉思汗比对自己的家人还要忠诚。像许多社会中自强不息的男人一样，他们崇尚成就，藐视出身和高贵的身份。他们把自己的成功归于勇敢、自律以及对自己同胞和成吉思汗的完全忠诚。

那可儿成了比家人更亲密的伴侣。成吉思汗告诉他们："汝为我力也。"他知道，是那可儿在过去几十年的斗争中帮助他获得权力并创建了一个新国家。他说："霖雨霏霏，日夜常注时，汝为使我夜眠，张毡衫而立，不使淋我，彻夜仅得一移其足焉。" [226]

在成吉思汗的一生中，他任用了许多具有特殊素质的新人，包括以前的敌人，进入他的核心圈子。有些人是通过一些极不寻常的方式被选中的。在一次战斗中，一个敌方战士一箭射穿了成吉思汗战马的脖子。成吉思汗得以幸存并赢得了战斗，然后他向被俘虏的士兵问话："谁射了一箭，断我白嘴黄马之颈？"一名男子走上前供认，是他射的那一箭，他以为自己肯定会被处决，"归于腐烂"。相反，成吉思汗却认为他是勇敢的英雄，表扬他，奖励他，并解释道：大部分战败的士兵都会隐瞒他们先前的行动，出于恐惧不敢说话，但这个人很勇敢，敢说实话，"他是一个可做伴当之人"。

随后，成吉思汗称他为哲别，这是他用来杀死那匹马的特殊箭头的名称，并请他"留在我身边"。 [227] 哲别以他的新名字为骄傲，并将成为一名伟大的蒙古将领。

成吉思汗一度组建了一个称为九伴当的小班子，其成员包括他信任的朋友者勒篾，兀良合部的速不台、哲别、忽必来——这四人被称为"四狗"。他们发誓效忠于成吉思汗，从来没有动摇过忠心。速不台保证要像老鼠或乌鸦一样勤奋，尽心竭力满足主人的需要。他发誓："试为盖毡而共盖之，试为风毡而掩护家乎!" [228] 成吉思汗把他们的忠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很少谈论自己的贡献，相反却大肆表扬别人为自己的成就所作出的或大或小的贡献。他对速不台和者勒篾说："令到之处碎其石，令犯之地破其岩。碎彼明石矣，断彼深水焉。" [229]

速不台成了他的最伟大的将军，但成吉思汗却与札儿赤兀歹的儿子者勒篾保持着最亲密的精神联系。后来在回顾他的青年时代时，成吉思

汗说，者勒篾分担了他的神圣使命，他表示，“当天地加添我的力量，并把我置于其保护之下时”，者勒篾及时出现了。 [230] 在一次公开集会讲话中，他引述古老格言，直接对者勒篾说：“你使我心安，你给我带来平安。”两个人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每当成吉思汗或他爱的人遇到危险的时候，者勒篾似乎总是出人意料地及时赶到倾力相助。

者勒篾多次救过成吉思汗的命，也救过他儿子拖雷的命。有一次，成吉思汗的脖子受了箭伤，血流不止，者勒篾在战场上一直守护着他，一晚上不断从伤口处吸出瘀血。还有一次，为了找些食物给他的主人吃，者勒篾光着身子进入敌营，却没有被发现，蒙古人认为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具有超自然的能力。

根据《成吉思汗黄金史略》，还有一次，者勒篾陪伴成吉思汗和他的几个伴当一起到漠北的汪吉河狩猎。当成吉思汗疲惫地骑马穿越河谷时，马背上“不断的颠簸”让他进入了梦乡。他看见他童年时代最大的敌人泰亦赤兀惕人来袭。当他醒来时，看到远方一支军队正在逼近。者勒篾爬到峡谷顶端，“从高高的山顶挥手”，引来云雾笼罩了河谷。 [231]

者勒篾一直在成吉思汗的门外站岗放哨，担任他最忠诚的卫士。数以百计的卫士守卫在成吉思汗周围，入侵者几乎不可能到达门口，而门口有着特殊的精神内涵：谁踩到了木门槛就会被视为践踏了整个宗族的心，不仅羞辱了祖先，也给将来出生的几代人带来耻辱。保护入口意味着一种责任。者勒篾在大门的右侧站岗，这是一个带着荣誉的特殊位置，象征着对皇室血统的保护。

诃额仑曾指责成吉思汗“影外无友，尾外无缨”。也许因为母亲的这个嘲讽，成吉思汗指定他最早的追随者之一博尔忽为他的影子，者勒篾为他的鞭子。 [232] 者勒篾在成吉思汗一生中所起的独特作用类似于札儿赤兀歹老人在铁木真青年时代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

成吉思汗赐给他独特的荣誉，称他为“完者忽都”和“有庆有福” [233] ，这个短语主要指精神力量强大的林中百姓。这两个词后来成为波斯、俄罗斯和元朝统治者喜欢用的名字。成吉思汗后来授予者勒篾的儿子“持箭袋人”的独特称号。 [234]

除了四狗外，另外四个伴当被称为“四马”，包括在孩提时代就离开家人首先加入铁木真阵营的博尔忽、后来领导华北作战的木华黎，以及曾在一次战斗中救了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一命的博尔术。博尔术是“四马”中第一个死去的，他在镇压秃马惕部女王博特灰·塔尔浑的叛乱中被杀害，被害地点位于贝加尔湖与库苏古尔湖的中间地带。还有一位是赤老温，他忠实地服务于成吉思汗，但不像其他人那样获得一致好评。因此，一共有九个伴当(成吉思汗本人是第九位)居于帝国的顶端，指挥着帝国的军队、政府和国家。

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比如木华黎，出身于奴隶阶层，其社会地

位的提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单靠他们自己几乎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木华黎后来成为整个华北的军事统治者，但他从来不会忘记或隐瞒自己卑微的出身。他甚至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孛儿，意思便是“奴隶”。

***

成吉思汗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周围是八个伴当：四狗和四马。这些将军和指挥官并不常和他一起扎营。他们总是外出作战，率军守卫边境，并监视他最遥远的领土。通常情况下，成吉思汗与四个妻子中的一位一起旅行，由后者负责管理斡耳朵 [12] [235] 。其他妻子会在远方的领地安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宫廷，在成吉思汗外出期间负责管理百姓，确保自己辖区政府的正常运作。

主营地的斡耳朵由左右两翼环绕，它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区域，称为“格尔”(gol)，意为中心。这个小圈子的警卫和伴当总是位于中心位置，无论是在营地、在迁移过程中，还是在战斗中，都是如此。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他们都环绕着成吉思汗。很少有人能进入这个圈子，即使是他级别最高的大臣，未经许可也不能进入。精英勇士怯薛军团一直认真地守卫着这里。怯薛的字面意思是被选召者，或神圣的守护者、民族的保卫者。 [236] 他们不仅仅是卫士，也形成了政府内最有权势的团体。他们的工作不是暂时的，他们都是成吉思汗一生的伴当。

马可·波罗把这个精锐卫队称作怯薛丹，和罗马帝国的贵族骑士名称很相似。由于拉丁语和蒙古语名字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他将蒙古怯薛称为“主人的忠诚骑士”。 [237] 宋朝皇帝特使惊叹于他们对成吉思汗的铁血丹心，写道，怯薛总是把一切美好的事物归于他，因此人们常会听到“感谢长生天和大汗的祝福”，并说：“如果汗要我赴汤蹈火，我也会为他而去。” [238]

成吉思汗要求他的卫兵不仅体魄健壮，而且具有高尚的精神品质。他坚持要求，他们必须长得帅气、聪明伶俐、战术精湛、意志顽强。他亲自挑选自己的怯薛，有时会出人意料地奖励他们。1202年怯薛的人数为一百五十人，把王罕的卫队包括进来后，人数扩展至约一千人。1206年后，随着蒙古民族的正式建立，成吉思汗把卫队总数增加到了一万人。这个时候，绝大部分怯薛充当保镖、仆人和管理员，但从他早年生涯一路保护他的核心怯薛仍然是精英中的精英。

怯薛内部等级森严，然而每个人分工平等，各自承担自己的职责。怯薛官必须是所有人中最勇敢、工作最勤勉的。保护成吉思汗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因此即使是指挥官也必须和其他怯薛一样不分白天黑夜站岗放哨。

为了维护法律，保持精英荟萃的汗廷的神秘性，怯薛不能和外界联系，甚至不能与家庭成员联系，在值班时则完全禁止任何联系。大多数怯薛成员是文盲，因此在他们内部不用文字传递消息。根据《蒙古秘

史》记录，成吉思汗说，“传之口齿”，“我们当信之”。[239] 尽管怯薛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但成吉思汗也鼓励他们在团体内部找到满足并享受彼此相处的生活。他告诉他们：“欢笑亲昵时，应该像牛犊般驽钝。”[240]

怯薛构成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尽管成吉思汗采用书面语言记录法律和司法事项，但他不许他的军队把事情写下来。信息的传递和保存必须采取口耳相传的方式，这样信息就不至于落入敌手。中国观察家惊奇地指出，在整个蒙古十万大军中，竟没有一张写有文字的纸片。[241] 文字书写只限于法律事务和行政管理，但书面命令只有在当值怯薛签字盖章之后才能正式生效。

虽然怯薛是国家的行政中枢，但是它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运作。成吉思汗永远不会忘记，塔塔儿人用有毒的食物毒死了他的父亲，因此他命令他的勤务兵为他准备饮食，严格检验他吃的饭菜。他们严密监视来来往往服侍的男孩和女孩，监督马奶酒的发酵过程和酒的分发过程。而随着帝国扩大，酒越来越成问题。成吉思汗意识到，无节制地酗酒不只是对个人的一种威胁，而且是对整个国家的一种威胁。突厥统治者的治国手册《福乐智慧》一书的作者警告说，“酒是敌人”，“世界的王子享受着甜葡萄酒，而他们的土地和人民却遭受着病痛的折磨”。[242]

传统上，蒙古人在秋天马奶和骆驼奶最充足的时候酿制马奶酒。奶的产量决定着酒的产量。冬天，奶源枯竭，牧民们再无奶酿酒，必须等到第二年秋天才能再次开怀畅饮。然而，随着商业活动越来越活跃，随着新国家不断被征服，蒙古人发现，酒精不仅可以用奶酿制，也可以用葡萄、米、蜜以及其他原料来酿制，酿酒的原料似乎永远不会枯竭。成吉思汗并没有完全禁止形形色色的欢宴醉酒，而是试图教导他的军队、百姓和家人了解酒精的危害，希望他们能够节制自己。但在这方面他并没有取得多少成功，他的四个儿子及其后代都曾经一度患过重度酒精中毒症。

怯薛的权力不仅仅局限于控制营地、酒和饮食。他们享有几乎可以随心所欲的权力，只要他们需要，所有人都有义务为他们提供马匹、食物或他们要求的一切，根本无须解释。没人会跟他们争吵或质疑他们，在军队中，他们的级别高于其他士兵，包括部队指挥官。他们可以追击任何胆敢举起长矛攻击他们的人，并杀死他们，“剥汝之血衣，取汝之财物”。[243] 尽管他们享有特殊的权力，但是怯薛战士的生死取决于异常苛刻且不容变通的法律。守护者干了坏事，不只违反了法律，也背叛了道德准则。这种行为会威胁到整个怯薛群体的身份和精神力量。

一般情况下，成吉思汗在惩罚他的臣民时不太区分犯罪的恶性程度，在他看来，偷一匹马或说谎与谋杀或背叛家庭没有什么不同。他没有区分违法行为的等级，所有罪行都是在犯一样的错。犯下一宗这样的罪就违反了生活的道德准则。一个会说谎或犯奸淫之罪的人肯定会偷盗或杀人，这样的人不应该活在世上，因此不管违法行为如何，通常都是

死刑。他的规则对他身边的人更严厉。一个值班时打盹的警卫、偷走一匹马的小偷和背叛汗的臣民接受的是同样的惩罚，因为他们都证明了自己的不可靠与可耻，是不值得信任的社会成员。尽管几乎每种犯罪的惩罚都可能是死刑，但在实践中，成吉思汗承认，每个人在一生中某个时候都犯过罪。他通常会对初犯施以怜悯，而对累犯处以极刑。

成吉思汗经常对承担具体职责的部下作出指示，告诉他们，作为他的精英部队成员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他的教导揭示了他的人生观，以及为什么他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掌握如此大权力的原因。他强调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果断行动。在任何关键问题上，行动都重于思想。采取行动之前先要仔细思考，但是一旦决定，思考就结束了，思想就应放到一边。在他看来，决心和意志是头等大事。如果有一条山路，别人说太高，无法跨越，“你只需要想跨越它，你就已经跨越了”。他警告说，如果有一条河流难以渡过，“不要考虑怎么渡过，你只有想要渡过，你才能渡过!” [244] 成功总是在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另一边等着你。如果坏事发生了，你总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 [245]

这样的话语，如果从一个普通人口中说出来，听起来只不过是唯心主义的空谈或花言巧语，但成吉思汗反复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性，因为他总是能实现看似不可能的目标。对于怯薛和他的其他战士来说，他们必须首先在战斗中表现勇猛。他要求他们要快如鹰，精如隼，饥饿如虎，凶猛如狼，在夜间如隐形的乌鸦一样。任何行为或行动，重要的不只是意图，而是必须成功地完成。无论多么好的计划、多么强烈的渴望、多么大的努力，最后，成功才是最重要的。他在称赞他的一个追随者时说道，许多人“发誓”，但你“完成了任务”。成吉思汗相信，这种不避艰险的坚定努力可以改变命运本身。他对他忠实的追随者说，因为你的行为，“门开了，长生天赐我以缰绳”。 [246] 天堂不需要祈祷、献祭和诵经，它需要的是行动。

***

在组织政府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依靠草原传统、常识和他自己融合新旧精华的创新天赋。经世致用的突厥著作他一本也没有读过，当然更不会读希腊的哲学著作，然而这两方面的思想都通过摩尼教徒和畏兀儿人渗透进了草原。

怯薛身上综合了各种元素，包括摩尼教的选民元素，即麦琪或博古，以及柏拉图《理想国》的卫士。柏拉图描述卫士是“武士运动员”，他们将“照顾自己和整个国家”。统治者应该带领他们的士兵，单独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这样的生活“当然不是私人或个人性质的”。 [247] 守护者的职责是“保护我们抵抗外敌并维持国内公民的和平生活”。 [248] 柏拉图把他们称为“贵族青年，非常像训练有素的警犬……眼光敏锐，强壮有力，一旦发现敌人，立即将其制服”。 [249] 柏拉图把卫士和牧羊犬相比，写道，他们必须是“嗅觉灵敏的狗，也必须习惯所有的食物和气候变化” [250] ，和荷马一样，柏拉图声称真正的勇士不应该吃素，应尽量多

吃肉。 [251]

柏拉图的话在《蒙古秘史》中也不难找到踪迹，而且更形象生动。札木合形容成吉思汗周围的男人“其额生铜也，其喙凿子也，其舌锥子也，其心则铁也”，这些人勇往直前，“食露乘风而行也。于争战之日，乃以人肉为食也”。 [252] 札木合特别举兀良合的男人为例，包括哲别、速不台、别苏德家族的弓箭手者勒篾，称他们为战时最凶猛的狗。

他们的训练包括经常的体育锻炼。柏拉图也强调体育锻炼对身体的重要性，以及“音乐陶冶灵魂”的重要性。 [253] 他解释说：“音乐训练比任何其他手段都更有效，因为节奏与和谐将深入心灵深处。” [254] 成吉思汗禁止士兵把消息写下来，要求他们根据实际需要学习音乐的节奏与旋律。他们必须记住详细谱写成歌曲的国家法律和军事纪律，也要记住制作这种歌曲的音乐公式。他的部下必须能够逐字复述很长的文字，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能够使用预制的格式，把新的消息放到歌曲中。同样，柏拉图说，理想的卫士必须学习音乐“组合的基本形式，只要看到就能认出它们及其图像”。 [255]

***

虽然成吉思汗的怯薛主要由士兵组成，但他们在他的宫廷中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作用，和他们的领袖共享其神圣天命。他们也分享他的权力，并因自己取得的成就得到奖励。在蒙古草原上，从未有过出身如此卑微的人能够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并爬升到部落贵族阶层中，在外国更是闻所未闻。

怯薛成员因接近成吉思汗，也和神保持着直接且个人的联系。他们不需要圣书、牧师或巫术而能介入世俗事务。他们遵循正确的行为准则，只是因为这种准则是绝对正确的。蒙古人认为，每个人都有天生的自我保护倾向，喜欢舒适的生活，但每个人也都有天生的荣誉感，倾向于正确的行为。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允许哪些本能掌握自己的生命。成吉思汗挑选那些选择荣誉道路的人组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对于一个能够遵守这种道德纪律的人，精神气质是至关重要的。

由怯薛控制的禁区是帝国的圣殿。外国人永远不可能在那里下榻。在觐见成吉思汗之前，他们和他们的礼物必须经火净化。1246年，修士勃朗嘉宾到达蒙古营地时，他写道：“当我们被引进他的宫廷时，他传令告诉我们说，来使必须从两堆火中间穿过去。”这一要求扩展到他们随身携带的宗教用品，包括圣经、教皇的信和十字架。他解释道：“一开始我们拒绝了，但是他们对我们说，这样做没有危险。”“火可以驱走一切邪恶的东西。” [256] 勃朗嘉宾服从了命令。“他们点燃了两堆火，相距不远，他们把两支矛固定在每堆火旁，矛的顶部系上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些麻布，所有人、牲畜和房子都必须从绳子下经火，穿过火堆。与此同时，每堆火旁站着一个女人，把水洒在经过的人身上，并背诵某些诗句”。 [257]

这个地方非常神圣，即使在大营迁走后，扎营的地方依然是禁区。在之后的几个月甚至数年里，没有人敢穿过这里，也不敢进入这个地方，直到成吉思汗营地的所有痕迹和灰烬完全消失为止。

成吉思汗把他自己和他的内廷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种神秘性扩大到了所有的宗教活动。他不像其他国王和皇帝那样公开宣示自己的宗教信仰、宣扬他们个人的虔诚，他很少允许公众看到他的灵修实践。他认为知识是宝贵的，只在必要时才能与人分享，即使与人分享时也要非常小心谨慎。在所有形式的知识中，关于天堂和超自然界的知识是最宝贵的，因此也是最神秘的。与人共享这种知识只会稀释它，向外国人和陌生人透露这种知识会构成极大的危险。

由于蒙古人的灵修实践隐蔽性很强，一些著名的观察家宣称蒙古人缺乏有组织的精神生活。13世纪一位亚美尼亚史家对此感到困惑，他写道："他们没有宗教，也没有崇拜，但他们在做事时总是称呼神的名。我们不明白，他们也不明白，这是为了感谢那位自有永有的神，还是感谢他们称之为神的东西。"[258] 勃朗嘉宾修士声称，蒙古人"对于永生和无边的苦海则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却相信人死后将生活在另一世界里，并且还在那里饲养自己的畜群，吃吃喝喝，可以从事在本世间人们所做的一切"。[259] 巴·希伯来斯则写道："原先蒙古人没有自己的文学，也没有自己的宗教，但他们知道独一的神，宇宙的创造者，其中一些人承认天堂就是神，他们就这样称呼它。"[260] 阿拉伯作家奥·奴外里也记录了同样的感受，他说蒙古人"不服从任何宗教，也不属于任何宗教社区，但他们只是爱神"。[261]

这个时候，法律与宗教一般是交织在一起的，大多数社会相信他们的法律有着神圣的起源。但多明我会修士里克尔多达·蒙特·克罗斯在他的《朝圣之旅》(Liber Peregrinauonis)一书中写道，蒙古人"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他曾奉命作为一名传教士去宣教，试图使蒙古人成为基督徒，皈依天主教并效忠教皇，但他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他写出《朝圣之旅》这部书作为未来传教士的指南，希望他们取得成功。他说："他们不像许多其他国家那样虚伪地吹嘘说自己的所有法律都来自上帝，他们只是说他们的法律本质上是出自某种本能或自然活动，他们说有一种最高权力高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那就是上帝。"[262]

蒙古人缺乏宗教的说法激怒了成吉思汗的后裔尹湛纳希。很久以后，他在19世纪写的《青史演义》中驳斥了所谓的蒙古神学很原始或根本不存在的观点："那些认为蒙古语中没有表达深刻概念词汇的人，就像那些自己在岸边游泳却认为海水很浅的人一样。"[13]

宗教不仅是成吉思汗政治权力的主要源泉，还能使他保持军队的忠诚，鼓舞部下的士气，但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他不允许别人窃取或限制他的权力。他在儿童时代没有参加过部落宗教仪式，他用个人独特的方式追求宗教，同时纳入来自许多方面的元素。术外尼对此独具慧眼，他写道，成吉思汗发明了自己，他"没有煞费苦心研究过去的历史记录，

也没有强迫自己一定要符合传统”。他一生的成就来自于“他自己的悟性加上他自己的智慧”。 [263] 他不仅在战场上征服敌人，也依靠自己对上天力量的信念执行法律，施行公义。“他按照自己的思想，为每一种情况立下规矩，为每个罪行定下刑罚”。 [264]

即使他的敌人和那些痛恨他的人也认为，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正规培训的人能取得如此难以置信的成功，只能是神迹。术外尼写道，他率领一支为数不多的军队，不带给养，“征服和削平了从东至西的海内雄长”。 [265] 虽然术外尼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他写道，真主选择了一个非穆斯林的成吉思汗来完成在地上独特的使命，“全能真主使成吉思汗才智出众，使他思想之敏捷、权力之无限为世上诸王之冠”。[266]

成吉思汗封闭了不儿罕山周围地区以及斡难河和克鲁伦河源头的整个区域。只有皇室成员和他的密友可以到那座山去，而普通百姓和外国人被禁止靠近。只要成吉思汗接近圣山，他就能与大地和天空保持精神上的联系，但由于他一直出外征战，时间也越来越长，他只好寻找不同的方式与神进行沟通。由于他一生都是一位游牧民族的战士，他的宗教也应该是便携式的，易于适应新的环境。他的宗教不能以建筑物为中心，不能依赖雕像、钟或其他大件的祭祀器具，因为这些物件运输起来实在麻烦。他的宗教必须轻便、耐用，而且实用。

传统的蒙古宗教活动主要集中在蒙古包中央的火堆上，家庭成员，通常是母亲，每日用脂油献祭，相信家里过去和未来的神灵居住在火中。在以前，可汗的皇家营地崇拜火，以火为汗室的象征，但成吉思汗并没有遵循这一传统。他的火是他周围的军人敬拜的地方。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家族，他们军营里对火的崇拜从事关一个家庭的荣耀扩大到事关所有家庭的荣耀，最终成了国家崇拜的一种方式，从而强化了团结和统一。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下，蒙古包中央的灶火成了他的国家崇拜的中心。它象征着军纪国法及其道德权威。

在家里，妇女负责大部分的仪式，如用规定的方式点火，在营地迁移时用恭敬的方式把火灭掉。他们尊敬日常物件，如每天用来向太阳和四方泼洒牛奶的奶桶。男人的仪式以他们日常放牧、狩猎和战斗的用品为中心，如马、武器和军事装备等。每个男子都有自己特定的弓箭和马鞍，但鼓和成吉思汗军旗则属于所有战士集体所有，最后用来象征整个群体。怯薛负责严密守卫鼓和大旗等圣物。这些物品由他的精锐士兵负责管理，牧师或萨满无权过问。

札儿赤兀歹老人第一次来到铁木真营地时，背上绑着鼓，这面用于宗教仪式的鼓是他灵修生活的中心。击鼓能向上天传递消息，并带回消息。它在地上代表上天说话，在天堂里代表人说话。鼓所具有的这种精神力量使其在战斗中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鼓的影响可以从中土的观察者描写蒙古军队入侵的一段话中感觉到：“鼓声震天，烟尘四起。”[267] 尹湛纳希写道：“在第一番鼓声中，军人的士气得到激励，他们奋

勇进攻。”蒙古人总是在沉默中开战，这样，当战斗中突然鼓声大作，敌人会受到震慑。“当敌人精疲力竭时，我们击鼓，这就是我们取胜的原因”。[268]

在不儿罕山的家园里，成吉思汗通过树木与大地对话，尤其是孤零零的树、脱颖而出的树、奇形怪状的树，或长在奇特之处的树。他对着树祈祷，把布条挂在树上，向它献上礼物和祭物，有时绕着树唱歌跳舞。军队走到哪里，鼓就可以带到哪里，但树不能移动。于是，蒙古人扛起一面精神旗帜，在长杆或长矛的顶端绑上马鬃。他们尊崇这面精神旗帜，崇拜它，向它献祭。在举行秘密仪式时，他们把成吉思汗的大纛立在中央。它立在哪里，哪里就是蒙古帝国的中心，因此也就成为世界的中心。

没有记录显示，当成吉思汗想要同长生天交谈或举行私密的仪式时曾要人陪着他。他倾听自己的心，得到灵感，然后告诉人们他听到了什么。他的祈祷没有记录流传下来，但可以从后来该地区萨满的祭祀祈祷中听到一些回声：

我们在阳光下嬉戏，
我们乘着月光飞升，
我们升入天堂，
我们降到山谷。[269]

***

成吉思汗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才组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蒙古军队，培养出一支像怯薛那样忠诚的精锐之师。一路走来，他也犯了很多错误。在他四十多岁时，他已经击败草原上所有的敌人，并从成功和失败中学到了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他准备出发向世界宣战了。那时他已经把所有的游牧部落牢牢地统一起来，成为他坚实的后盾，他已经扑灭了百姓中任何可能的异议。他有了一个统一的蒙古民族，有了一批经验丰富、绝对忠诚的战士，是时候把他精锐的战车驶向更遥远的地平线上了。

在出发进入战斗之前，蒙古人泼洒牛奶祭旗。成吉思汗的军人说了什么话人们不得而知，但在这样的一个仪式上札木合说的话被记录了下来：“祭我遥望之纛矣，擂我牛皮所幔，浊声(嗡嗡)之鼓矣!乘我黑脊快马矣!贯我皮穿之甲矣!持我环刀之柄矣!搭我具扣之箭矣!欲与兀都亦赤惕篾儿乞惕决一死战矣!”[270]

[1] 回鹘又作回纥，是今日维吾尔族人的祖先。——编者注

[2] 指回鹘汗国取代后突厥汗国的统治，并在840年被黠戛斯所破，部众西迁。——编者注

[3] 即九姓回鹘可汗碑。——编者注

[4] 蒙古人把许多亚历山大的故事融入了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1246年，在第一位欧洲特使修道士勃朗嘉宾访问蒙古的时候，就听到了《亚历山大传奇》中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已经加上了蒙古特色，并与蒙古大汗联系起来了。据他记载，在蒙古人与印度作战时，印度军队的领导人拥有由黄铜制造的傀儡武士，内部由火焰推动。当它们接近草原战士时，黄铜武士喷出了火，烧毁了侵略者的马匹，击败了他们。《亚历山大传奇》记载的亚历山大企图侵略印度的故事与此完全相同。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基本上是虚构的，但是在关于亚历山大的民间故事和神话的背后，是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以及对政治和宗教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看法。故事的核心反映了希腊哲学的某些方面，主要出自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但经过了摩尼教义的过滤。

[5] 其中一本摩尼的经书，称作《二宗经》，在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仍不为人所知。它可能还没有被翻译成欧洲语言，但已经从叙利亚语译成了汉语和突厥语，成为摩尼教在东方最有影响的经书。在亚洲，《二宗经》的教义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道教徒把它作为自己的神圣经文之一，从1016年直到被宋朝朝廷作为外来伪经禁止为止。

[6] 别吉，相当于汉语里的“公主”之意。——编者注

[7] 即登哈一世，1266—1281年期间任东方亚述教会牧首。——编者注

[8] 即东方亚述教会。——编者注

[9] 欧洲观察家本来以为蒙古人就是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的基督教军队，将把世界从穆斯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个幻想破灭以后，他们又认为蒙古人是犹太人。在13世纪，一般来说信息还算灵通的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以及其他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蒙古人是以色列失踪的一个支派。犹太人在蒙古人的统治下过得很好。巴·希伯来斯认为，这是因为“对蒙古人来说，不分信徒和异教徒，也不分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属于同一类”。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属于游牧民族，其文明和依赖农业的中华文明不同。成吉思汗发现具有游牧传统的人更容易理解。有些编年史家把他的律法称为妥拉(Torah)，和犹太律法是同一个词，承认他既是一个征服者，也是重要的立法者，而只有先知和圣徒才有立法的权柄。对穆斯林来说，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在他之后再无先知，但阿拉伯编年史家伊本·阿塔在1260年写道，蒙古人也认为成吉思汗是先知。有些穆斯林的作家把他的教导称作“成吉思汗妥拉”，这个法律体系影响了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哲学和法律长达几个世纪。当时欧洲的犹太人相信蒙古人用闪语字母写字(他们的文字实际上源于古叙利亚语)。西西里岛的一个犹太人在一封信中说，蒙古人携带的文件“是用希伯来语字符写的……从上到下盖了十二个金印”。结果是，“西班牙国王、德国国王、匈牙利国王和法国国王无不恐惧颤抖”。犹太历法的5000年(即基督教日历中的1240年)正在到来，很多人认为蒙古人是奉命去打败邪恶势力，为期待已久的弥赛亚的到来做准备的。成吉思汗在征服花剌子模汗国时善待犹太人，很多犹太人在蒙古军队和政府中服务，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念。当1260年蒙古人接近耶路撒冷，准备发动艾因贾鲁战役时，人们越发相信蒙古人就是犹太人了。犹太诗人和学者米书兰·达·皮也剌相信，他们是来重建所罗门圣殿的。

[10] 蒙古人认为这是一种野马，但西方人则把它归类为野驴。

[11] 关于特薛禅做梦的故事很可能也是后人插入《蒙古秘史》的，目的是安抚或奉承弘吉剌部成员，因为该部落变得非常强大，许多蒙古皇后都是特薛禅的后代。因此这个说法似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12] 斡耳朵，意为宫帐或宫殿，是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的皇宫住所和后宫管理、继承单位。——编者注

[13] 尹湛纳希是俺答汗和他儿子曾格都凌汗的第八代后裔。

第三部分 成为世界征服者

上帝已切断它对地上君王的爱，它的脸光已照在成吉思汗身上。它已赐给他所有土地的王权。

——旭烈兀，1258年，巴格达

第九章 飞鸟的双翼

13世纪初，中国是由十几个王国组成的，有些大的王国足以自称帝国，剩下的一些则疆域狭小，除了时常发生小规模对抗和局部冲突之外，不足挂虑。中国的北部深陷政治风暴中，而中国的南方则经历着漫长的衰败过程。东北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统治着北方，远在南方的宋朝曾经统治过一个统一的中国，而此时已成为一个残破的濒临崩溃的王朝。在今天的西藏和云南境内分布着几个孤立的佛教王国，相互之间合纵连横，变幻莫测，没有任何一个王国能够长久地统治其他王国。

在黄河上游和今属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周围，西夏人建立的佛教王国控制了作为中国丝绸之路入口通道的甘肃走廊。丝绸之路的西段被契丹人所控制，他们的祖先曾建立辽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但被女真人驱逐，此时在天山山脉和相邻的绿洲地区还存在着一个小王国。在漠南边缘坐落着几个部落王国，其居民大多是突厥基督徒，其职责是沿着分隔蒙古与大生产中心以及贸易线路的边境地区巡逻。

尽管中国的王国可能处于分裂状态，但它们很富足，那里的人民有很高的生活水准，和草原上艰苦的生活方式相比，甚至可以算得上奢华。每种知名商品都要经过贸易路线运输，这条贸易路线把中土的大小王国与中亚的伊斯兰中心连接起来。除了金属外，最重要的商品是丝绸。今天丝绸主要被视为一种奢侈品，但蒙古人认为它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商品。中土织工生产的丝绸太细密了，连虱子等害虫都无法穿透，即使是质量较差的丝绸，其丝线仍非常光滑，虱子根本无法在上面产卵。在蒙古寒冷干燥的环境中，沐浴是很困难的，因此使得中国丝绸更加宝贵。丝绸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用途——保命。当被箭射中时，坚韧光滑的纤维会缠绕在箭头上，甚至进入体内。丝绸能大大减轻伤口的严重程度，最重要的是，可以使箭头轻轻地取出来，不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降低感染的可能性。对战士来说，丝绸是一种神奇的纤维。

尽管中土商品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与中土进行贸易必须穿越茫茫戈壁，不仅路途遥远，而且环境恶劣。蒙古牧民不种粮食，不织布，不开采金属，不制造铁锅，然而要继续保持游牧民的生活方式，他们需要所有这些东西。为了既做牧民又做战士，他们需要中土的贸易商品。当中原王朝强大时，它会精心控制这些商品输出到草原上的数量，并要求以动物、毛皮、皮革、羊毛来交换。但是，蒙古人所提供的这些东西实际上也可以由高丽人、女真人、藏人、畏兀儿人以及周边的其他小民族来提供，而且更容易获得。这些民族在商业上远胜蒙古人，但蒙古人精于战斗。现在蒙古已经统一，不再彼此争斗，于是他们向南望去，开始垂涎中土诱人的财富。

当成吉思汗忙于在大草原上巩固自己的权力时，中土的王国们仍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当他统一蒙古民族后，便向漠南的一系列城市发动袭

击。此地属于西夏王国，居民是唐古特人，其文化与藏人同源。这些袭击看上去似乎只是游牧民族的典型攻击行为，每当定居的王国变得衰弱，或疏于防卫时，他们就会发动这样的袭击。然而，对成吉思汗来说，最初的袭击只是一些测试，看看邻国的抵抗决心有多强，并从中找到薄弱环节逐一击破。

但这种测试并没有鼓励这些王国团结一致，组成联合阵线抵抗草原游牧民族，只是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紧张局势。在这场混乱中失败的王国不时会出现小规模的难民潮，成吉思汗对他们表示欢迎。起初，他们几家几户结伴逃亡，然后是整个部落开始叛变。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汪古部，这是一个与金朝结盟的半定居突厥部落，负责在北方边境巡逻，防范游牧民族。成吉思汗接纳了他们，并把自己的女儿阿剌海嫁给了他们的汗，从而把这个部落民族纳入他的帝国。

1208年夏，蒙古民族诞生两年后，金朝四名汉人官员带着家眷逃到成吉思汗的宫廷，寻求保护，并愿意效忠成吉思汗，鼓励他推翻金朝皇帝。[271] 他们加入蒙古阵营的举动使得人们相信，天命改变了，同时他们也使成吉思汗相信，他的职责不仅仅是团结草原上相互敌对的部落，而且还要解放并统一中国。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并受人尊敬的人投奔蒙古起到了示范作用，激发了金朝军队中心怀不满的士兵的变节行为。很多人逃到了这个新国家，因为在那里军队比在中原更受尊重，待遇更好。他们使成吉思汗相信，金朝是一个垂死的王朝，那里的土地和百姓都等着他来拯救。

成吉思汗没有立即回应有关进攻中原的建议。起初他仍在继续巩固他在蒙古本土的权力。中原历史学家描述了在蒙古入侵几十年前中原的混乱状况。内战蹂躏着土地，绝望的百姓“临危投河井，情急自刎缢”。在这样的年代，“兵民皆遭戮，善恶同死去。尸首塞城池，鲜血满街衢”。[272]

成吉思汗在自己的成年生涯中一直在战斗，但直到现在为止，他的敌人都还是其他的游牧民。他知道如何对付游牧部落，因为他们也像他一样生活和战斗。尽管曾经与他交战的部落规模大小不一，但比起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来说要小得多。金朝拥有5000万臣民，而成吉思汗只有区区百万之众。如果把华夏所有王国的臣民加在一起，总数则达到了约1.2亿人。在中原，成吉思汗不得不首次面对那些居住在城市的人，他们隐藏在坚固的城墙背后，使用更为强大的武器，包括火药和爆炸装置。他不能用草原上对付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来对付他们。

难民和士兵穿越沙漠自蒙古高原而下向他投诚，这使成吉思汗备受鼓舞。他已经测试了中国南方的防御能力，现在决定把越境袭击升级为全面战役，他将率军作战。为了对付这些新敌人，他采用了在不儿罕山当猎人时所学到的最基本的功课。他的军事战略是像狼那样接近敌人。狼群从来不会攻击畜群中最强壮的成员，他们不追逐种马或母马，因为它们会决一死战来保护它们的马驹。相反，他们挑选羸弱的、行动迟缓

的马作为攻击对象，而让其他牲畜逃离。因此，成吉思汗一开始并没有对金朝或更远的宋朝发动攻击，他选择了西夏，一个位于中国西部的较弱小的独立王国作为他的第一个猎物。1209年初，天气尚寒之时，他率军穿过戈壁沙漠，发起攻击。用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的话说："蒙古人及其战马猎杀汉人、波斯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正如他们猎杀羚羊或老虎那样。" [273]

他的新战术取自伟大的蒙古狩猎术，通常被称为"明安阿瓦"(minga ava)，即"千人狩猎术"。这是一种集体狩猎方式，需要数百甚至数千个猎人合作，在周围的广袤地区散开成一个大圆圈。他们抽打棍棒，制造噪音，慢慢地合拢，驱赶着所有野生动物向前奔跑。 [274] 这些受惊的动物身上的圈套越来越紧，它们惊慌失措，四处奔逃，但逃生无望。当把它们关进死胡同后，猎人们便可以从容地一个接一个地猎杀它们。

当蒙古人进入西夏境内后，他们采用了同样的战术，他们恫吓乡村百姓，迫使他们逃往城市。一些外国观察家很不理解蒙古人的战术，认为他们相互之间显然缺乏协调，好像只是在乡间来回穿梭，袭击一个地方，战斗还没有结束就离开，接着跑去攻击另一个村庄。有时他们甚至在胜利在望时就匆匆撤退了。实际上蒙古战士故意把人口搅动起来，把他们从自己的家园赶出去。蒙古战士的目标不是杀人，而是利用他们，把他们作为一种武器，为未来进攻城市做准备。一旦四处逃散的人群聚集在城墙后面，他们便会开始迅速消耗食物供应，引发恐慌和混乱。大量人口生活在拥挤的环境中，容易造成疾病暴发和传染病的迅速蔓延。西夏人无法逃脱蒙古人的围困，开始像野兽一样恶狠狠地彼此相待。

成吉思汗到达西夏王国的首都银川时，看见其巨大的城墙显然是坚不可摧的。他知道，让他的士兵攻击这样重兵把守的城墙，毫无意义。起初，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但他很快发现，他可以通过筑坝控制水流，使流进城内的河流改道，或放水冲击他们并破坏墙壁，进一步削弱守城将士的士气和能力。他命令士兵构建一系列的运河和水坝使河流改道，但水坝不够坚固，难以抵挡汹涌的河水，结果大水反而冲垮了他们自己围成的营地。

成吉思汗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能够把显而易见的失败转变为不可思议的胜利。这时，他的战役已经进行了近一年。1210年初，他下令解除围城，并从银川撤出。西夏士兵以为胜券在握，欣喜若狂，冲出城去追击逃离的蒙古兵，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巧计，目的是引诱他们打开城门，冲出城外。蒙古人靠伏击打败了虽羸弱不堪却不可一世的西夏军队。他们的国王投降，宣誓效忠成吉思汗，缴纳了大量贡品，并答应每年交付更多贡品以保住他的王位。

***

这是成吉思汗首次在城市取得胜利，鼓舞了边境部落加入蒙古阵营的决心。正如汪古部自愿与他们联合一样，在中国西部绿洲城市的畏兀

儿人很快也挣脱了西辽统治，热情地加入了正在崛起的蒙古帝国。西部草原的哈剌鲁突厥人紧随其后，不久也前来效忠。成吉思汗把他的女儿们嫁给了这些部落的领袖。西伯利亚南部的卫拉特人也来投奔，成吉思汗也把女儿嫁给了这个部落的首领。这样，他让自己的女儿控制了这四个王国，并要求其国王率军加入蒙古帝国的军队。

由于从西夏掳掠到了丰富的财宝，也由于他的随从大军不断壮大，成吉思汗现在准备把目光转向金朝及其首都中都，即今天的北京。至于进攻金朝的理由，他根据听众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说法。对他自己的人民，他呼吁复仇，谴责金朝曾残酷地把他们的祖先俺巴孩汗钉死在木驴上；对于契丹人，由于他们曾被女真人驱逐，至今仍在遭受后者统治的痛苦，他提醒他们与蒙古人亲密的亲属关系，告诉他们，女真人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他让契丹人心怀一线希望，恢复他们一度辉煌的契丹王朝；对于在金朝野蛮统治下受尽苦难的汉人，他给他们一丝生机，可以摆脱异族统治，或至少用较为宽松的蒙古统治代替令人窒息的金朝统治及其无休止的剥削。

蒙古人认为金朝皇帝是一个篡位者，因为契丹人以前曾统治该地区，所以，他们总是把金朝称作契丹。这个名称也被马可·波罗所用，只是写法不同而已。尽管成吉思汗击败了西夏并同汪古部、卫拉特部、畏兀儿部以及哈剌鲁部结盟，但是金朝官员最初并不害怕他们以前的这个低级附庸，对他很傲慢，甚至要求他再次投降。眼看着成吉思汗在对戈壁边缘的这些小王国的作战中取得了一连串胜利，金朝皇帝并不为所动。他对成吉思汗发出了挑战，说："吾国犹如洋海，尔国一抔沙土耳。" [275]

成吉思汗利用金朝对他的侮辱号召他的百姓。他深谙巫术仪式和灵性表演艺术。当他面对进攻金朝的艰巨使命时，他需要他的百姓坚定且完全地投入。术外尼详细报告了他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的。成吉思汗把他的民族聚集在草原上的一座圣山周围。他把人群按照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组。"整整三个白天和夜晚，他们所有人都光着头，三天没人吃东西，也不允许挤奶给小孩子喝。在此期间，成吉思汗独自一人祈祷，其他人则聚在一起祈祷，大声呼唤上天的名字，'腾格里!腾格里!'他们没有为胜利祈祷，他们通过祈祷来让上天获得荣耀"。

成吉思汗祈祷上天的引导，祈祷能遵循上天的意愿，而不将他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上天。最后，"三天后，在第四天的黎明时，他出现了"。并告诉众人一个消息，上天已经答应他，他将取得胜利。"接下来整整三天的时间，在这同一地点举行了盛宴。三天结束后，他率领部队出发征战"。 [276]

很快，一首歌在中国境内流传开来：

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去处。 [277]

在1211年，年近五十岁的时候，成吉思汗再次横越戈壁。这一次他要去教训金朝皇帝。蒙古铁蹄踏遍了中国北方，一个接一个地攻打城市，把人们从他们的村庄中赶出，袭掠小镇。最后，1214年，成吉思汗接受金朝皇帝投降后，便急匆匆带着他的军队缴获的大批财富返回蒙古。

成吉思汗像对待西夏国王一样告诉金朝皇帝，如果他发誓服从成吉思汗，他便可以留在他的首都继续执政，但他很快便对自己的宽仁感到后悔了。蒙古军队撤出后，金朝皇帝就造反了，他向南逃往开封，建立新都，他愚蠢地认为那地方太远了，不会受到蒙古人的进攻。但成吉思汗在次年，即1215年，便折返围攻中都。

在回到中都后，成吉思汗在该城西南约十英里(约16.1千米)远的地方安营扎寨，附近有一座非常漂亮的石桥。这座桥刚建成不久，全长874英尺(约266米)，横跨在水流舒缓的永定河上。在薄雾里的晨曦中，白色的大理石桥好像静静地悬浮在空中，一排精雕细琢的石狮子镇守在桥栏上。这座桥看起来就像把云彩连接起来的拱形云梯。中国人称之为卢沟桥，但后来外国人称之为马可·波罗桥。今天，这座桥仍然在那里，只是由于洪水冲刷和战争破坏，需要不断修复，但它和成吉思汗时代的模样大致相同。

成吉思汗对汉人造的城墙和护城河不太感兴趣，因为这些东西只会阻挡他的前进步伐，但在这座桥身上，他看到的不仅是美丽，还有极强的实用性。蒙古的河水浅，流速慢，他从来不需要桥梁。除了在一年中最多雨的日子外，人和牲畜很容易涉过河流。但沿海平原的河流大多了，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即使最强壮的马也难以横渡。桥梁建筑深深吸引了他，之前他只懂得如何在草原上驰骋，但现在他也许第一次意识到，大规模的建筑结构既可以加快人们的行动，也可以构成障碍。从这时起，他成了一个专心致志的桥梁建设者，并且组织了一支汉人工匠队伍随军行动，为未来的战役作准备。

当他驻扎在这座桥附近的时候，一大批在金朝皇帝南逃开封后留下来保卫首都的金朝士兵叛逃，加入了蒙古阵营。即使没有他们的帮助，成吉思汗也可以轻松赢得战役，但他们的投诚加速了胜利的到来。金朝首都已被其皇室抛弃，拱手让给了入侵者，城内士气低落，因此成吉思汗很容易地就占领了这座城市。

按照蒙古人的征服模式，那些战斗中幸存和被迫迁移的人们很快发现，在成吉思汗统治下竟能享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马可·波罗虽然并不是军事方面的专家，但他很快便发现了蒙古人的困境：他们的人数太少了，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有效占领所征服的土地。为了巩固胜利果实，蒙古人要么设法赢得当地民众的支持，要么将他们驱逐出境。“当他征服了一个地方后，他既没有伤害那里的人民，也没有毁坏他们的财产，他只是把自己的部下安插在当地，配上一定比例的当地人，然后他带领剩下的人前去征服其他地方。”[278] 马可·波罗在提到成吉思汗征服

整个亚洲时写道，“当他征服的百姓开始意识到，他在多么精心地保护他们免受其他人的伤害，他们在他统治下决不会受苦，看到他是一位多么高贵的君王，他们便死心塌地成为他忠实的追随者。”

成吉思汗于1209年击败中国西部的西夏王国，1215年征服中国北方的金朝，每次征服之后，他都坚持把所有财产进行统计。每当他占领一座城市，都要求把掠物和贡品仔细记录并分发，然后普查所有物资和动产，包括牲畜、建筑、矿山、工厂和森林。失吉忽秃忽作为蒙古帝国的最高断事官，负责看管在金朝首都掠夺的财物并登记造册。

成吉思汗竭力确保自己的所有追随者都能收到一定数量的战利品。皇室家族每个成员以及士兵和官员，甚至是蒙古本土的孤儿、寡妇和老人，人人有份。在和平时期，他竭力做到像在战时一样考虑仔细、周全。成吉思汗知道要保持他的声望，就必须做到凡事一丝不苟，与人分享胜利果实。

伏尔泰曾写了一出富有想象力的戏剧，描写成吉思汗在中土的征服战争和他的生平，精辟地解释了被征服者是如何看待这场征服战争的：“愤怒的上天派出这个北方暴君来毁灭我们……这些掳掠成性的野小子居住在帐篷里、战车上、战场上，他们永远无法忍受高墙环绕的封闭的城市。他们憎恶我们的艺术，憎恶我们的风俗习惯和我们的法律，因此想把一切都改变，他们要把这个辉煌帝国的所在地变成一片广袤的沙漠，和他们自己的祖国一样。”[279]

但是成吉思汗并不打算毁灭华夏文明。他越过戈壁，艰苦作战，并不只是为了掠夺汉人并摧毁他们的国家。每个游牧人都明白一个优良牧群的价值，明白人们不能从一头死牛身上挤出牛奶。即使猎人们也承认，滥杀动物将铸成大错，森林里将没有动物繁殖供来年狩猎。中土是一个宝贵的资源，而成吉思汗决心要利用它，也会保护它。

***

成吉思汗征服了他所见到的每个城市。被击败的城市看起来都很相像：摇摇欲坠的塔、残破的大门、摇来晃去的木头、被焚毁的宫殿、垂死的士兵、破败的市场、失踪的孩子和被洗劫一空的店铺。野狗在街上到处乱窜吞噬腐尸，以腐尸为食的鸟类盘旋在寺庙上空。众神居住的神庙曾经接受善男信女慷慨的捐赠，那里曾解释过关于过去和未来的预言，那里曾制定过生活的戒律，现在也破裂了、倒塌了，像未能守住这座城市的城墙的命运一样。寺庙里曾装饰着描绘另一世界的绘画和经文，悬挂着漂亮的挂毯，点燃着酥油灯，装饰着大理石和黄金，桧香缭绕，沁人心脾。大殿里萦绕着僧人的诵经声和信徒的祈祷声，而如今却赤裸裸孤零零，空空荡荡，一任狂风撕扯着废墟中残存的几张碎片，让人遥想这里曾经有过的生机勃勃的生活。神圣的经文如今只剩下烧焦的残页，在尘土里迎风飘动，小鼠撕碎它们，用以筑巢，饥饿的山羊啃咬它们，聊以充饥。那些曾经深谙公义和永恒生命秘密的僧侣们僵卧于尸

堆中，无法分辨其年龄、教育水平或职业。这些僧侣们曾经能够与人交谈，也能代神说话，能够以上天的名义发号施令，如今却死的死、逃的逃。那些占星师声称可以通过观察鸟类的飞翔或观察一只羊肩骨的裂缝预测未来，现在却成了战俘，拖拉着战斗器械从一个陷落的城市再到下一个城市。

蒙古人习惯于广袤的草原，在市区纵横交错的道路、墙壁、场地、沟渠以及运河间很容易迷失方向。蒙古语中缺乏词语来识别不同类型的结构，他们按其材质分类为木、石、泥或草，但对其功用却不甚了然。同样，他们无法分辨大多数作物，对蒙古人来说，它们只是“草”或“绿地”。他们对即将出发去征服的人民的服饰、阶级划分与社会组织缺乏了解，也不会说他们的语言，几乎不能把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

虽然蒙古人轻易地击败了中土军队，但他们却害怕未知的神灵在这块异邦土地上复仇。蒙古士兵经常生病，而且似乎遭受着精神痛苦和心灵荒漠。《蒙古秘史》宣称：“契丹百姓水土之神主，以其百姓人烟受掳也，城池村镇被坏也，故急为祟也。”[280] 蒙古人进入了精神上敌对的土地，充满了未知的危险。他们听不懂这些外国鬼神的歌谣和吟诵，也不能确定它们喜欢哪种类型的祭祀，什么行为会遭到它们的惩罚。这里不是他们祖先的土地，这里充满了被杀之人的鬼魂。在汉人的土地上，只有尘土飞扬的道路、高墙、翻耕过的土地、拱形的桥梁、高大的建筑、牲畜棚、方方正正的果园、臭气熏天的茅房、闪闪发光的寺庙、腐烂的垃圾堆和嘈杂的市场。在这里，他们不知道向谁祈祷、在哪里祈祷，也不知道如何祈祷。

成吉思汗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征服了一百万人的游牧民族，但在中土短短几年时间，他的臣民突然增加了二十倍。他缺乏经验管理植根于农业和详尽传统的定居文明。作为一个草原武士，成吉思汗知道如何征服，但他还不知道如何统治已经成熟的都市文明。他没有花太长时间就把在不儿罕山狩猎或在草原上放牧时学到的战术应用于针对定居民族的战争，但他的部落政治经验无助于统治城市、管理无边无际的农田、组织商业网络、监督工匠的工厂或治理农民的小村庄等。总之，游牧民族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陈旧技能无法转用来治理这个异族环境里的农民和城市居民。

很显然，他不可能通过诉诸武力取得成功。他的军队可能不足一百万人，肯定不超过一百一十万人。现在他已经征服了数千万人，他没有足够的军队占领所征服的所有土地。成吉思汗可以打败任何一支军队、攻陷任何一个城市，但他需要他的军队继续前进到下一个堡垒，投入下一场战斗。他不能把他的士兵留下来做占领军，他当然也不能信任来自他臣民忠诚的承诺。一旦他的军队过去，消失在地平线上，被征服的臣民经常会反抗。这样的反抗都受到了他严厉的惩罚，但他需要他们的忠诚，至少需要他们的合作，以维持他庞大的帝国。

成吉思汗临时制定了几种策略，来统治容纳不同语言和宗教的庞大而复杂的帝国。在他征服战争的早期，他很喜欢接受被征服地人民的投降，让他们过去的统治者继续管理他们的土地，但这个策略失败了。一旦蒙古人撤出，这些统治者就会发动叛乱，而且表现得好像他们击败了蒙古人一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制定了政策，定期处决所有叛乱分子，这样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有机会进行反抗，但这样做并不够。

接下来，他任命他的军事将领主管当地行政事务，但这分散了他们从事征服战争的精力。此外，伟大的将军不一定会成为优秀的管理者。他简要地查看了一下当地的官僚机构，想知道他是否能使用受过良好教育的汉人官员或学问不多但很聪明、曾经负责管理宫廷的太监。但他得出结论，如果这些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使自己的国家免遭侵略，那么他们对他还能有什么用处呢？他们已经表现出了十足的无能，因为他们给他们的君主提供的建言糟糕透顶。因此他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们会为他服务得更好。

这种怀疑在13世纪元朝统治时期创作的戏剧《汉宫秋》中得到了表现。[281] 在开场白中，一个坏人——中国皇帝的宰相解释道，一个政府大臣必须“为人雕心雁爪，做事欺大压小。全凭谄佞奸贪，一生受用不了”。然后这位宰相描述了他是如何在皇室得到升迁并掌握大权的，“因我百般巧诈，一味谄谀，哄得皇帝老头儿十分欢喜，言听计从”。

最初，成吉思汗蔑视他新臣民的学问。假如他们的圣人能预知未来，假如上天指定他们为他代言，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看见蒙古的骑兵横越沙漠，跨过高山？如果他们知道如何解经，知道如何发现天象的秘密，能够从飞翔的鸟儿和飘飞的树叶看见预兆，为什么他们不在蒙古人到来之前逃离他们的城市？如果上天教导他们要吃什么、穿什么、如何祷告，为什么他不教他们学会说蒙古语，以便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命运做好准备？如果他们的宗教如此强大，为什么蒙古人能够拉下他们的偶像、撬出他们的珠宝，把他们的黄金熔化成金块？

十多年前，当他第一次征服乃蛮部时，成吉思汗就已开始从被击败的敌人中选取办事员。现在他需要更多的办事员。他需要大批管理员来管理在他控制之下的数百个城市和数千个村庄。为了满足他迅速扩张的帝国的行政管理需求，他转向了宗教领袖，这些人通常拥有较高的学历，精通写作，并善于解释并执行成文法律。他们坚持原则和理想，绝不会像传统贵族那样贪污受贿，他们知道如何去领导大众，如何与群众沟通。成吉思汗希望中土的宗教界人士能向他提供帮助和指导。他宣布，他寻求宗教人员以“协助汗廷促进教化，弘扬善道，以使前代良俗善政发扬光大”。

他公开呼吁学者和宗教领袖“策于朝廷”，旨在“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如果能做到这些事情，那么人们“将若草之靡

风，水之走下矣”。这样，四海之内将实现“太平”。 [282]

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城市里的学者对农村或偏远省份的生活缺乏深刻的理解。为了更充分地了解整个国家，他派遣人走遍新征服的领土，召集学者和祭司“来到我们蒙古土地，以便使本大汗可以在通国建立伟业”。 [1] 根据佛教纪事史籍《珠史》记录，成吉思汗邀请学识渊博的学者来教导他有关“中国的良风善俗”以及他们的法律和宗教。 [283] 《金轮千辐》和《主成吉思汗世系》是18世纪的两部蒙古史籍，都用几乎相同的措辞记载“当他用自己的力量把有着不同风俗习惯的百姓聚拢在一起”后，成吉思汗把有学问的人召到他的军营，了解新臣民的习俗。他问他们，怎么做才能使人们拥护法律，好政府的原则是什么，怎样“保护并抚育生灵”。 [284] 只有在审查这些法律和风俗习惯后，他才任命官员以他的名义治理。 [285] 在中国北方，成吉思汗征服后，“即选择最聪慧之外臣制定和改善帝国之法”。

他急需人手来帮助他统计并记录所缴获的一切，于是他转向了一类特殊的人群，即前金朝的宫廷幕僚。这些人在金朝中都陷落后被俘，为蒙古人服务。在首批招募的人中有一个人叫耶律楚材。1218年，耶律楚材年仅二十八岁，就被任命为游牧汗廷秘书，担任在夜间观察星象的占星师一职。成吉思汗第一次见到这位高高瘦瘦的年轻人时，很吃惊，因为他的身材和蒙古人相比要高大许多，而且虽然他很年轻，却蓄着一副漂亮的大胡子。成吉思汗总是很难记住官员的外国名字，因此总是给他们起个外号以便记忆，他称这位年轻学者为兀都撒可儿，即“长胡子”的意思。

***

耶律楚材是辽朝皇室的后裔，属于契丹族。契丹族是一个在语言和文化上都和蒙古人密切相关的草原部落。当辽朝被女真部落推翻时，它的许多皇室成员继续服务新的统治者，只有耶律楚材选择服务成吉思汗。虽然他的家族起源于蒙古高原，但已经在中土生活了三个世纪，因此，耶律楚材对游牧生活和定居生活都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两种背景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蒙古帝国早期联系中土思想和文化的一个有效渠道。他后来的著作成为研究成吉思汗乃至蒙古帝国法律和机构建设的宝贵资料。

《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越高岭渡大水，所以出征长行者，唯思平定诸国矣”。但他清楚地知道，“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征服中国北方后不久，他的妻子也遂哈敦就提醒他，正如孛儿帖曾经做的那样，他会慢慢变老，“似大树之躯骤倾”。她告诉他，即使是大柱的基石最终也会崩颓。草不常绿，他现年五十七岁，在这个年纪大多数蒙古人都已退出活跃的生活了。成吉思汗知道，若想使他迅速扩张的帝国享祚长久，他就需要制定一个新的管理制度。

在1219年5月15日，他写信给著名的圣人、老道长丘处机，要求见

面。虽然这封信可能是耶律楚材执笔为他写的，以使其更符合中国的文体风格，但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他召来这位宗教领袖的目的。他的话坦率地描绘了一幅图画：他作为一个人已经达到了世俗权力的巅峰，但身体却进入了一个长期且不可逆的衰老过程，他希望他的帝国能国运长久。

他没有一味吹嘘他的征服，而是实事求是地解释为什么他成功了而他的敌人却失败了。他写道，他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他的敌人太弱了。他声称，“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金朝政府“无恒。是以受之天佑，获承至尊”。因此，“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他表明他对自己征服的独特性有着深刻认识：“念我单于国千载百世以来，未之有也。”

至于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美德是谦虚，“非朕之行有德”，但是他“返朴还淳，去奢从俭”。他接着说，“每一衣一食，与牛竖马圉共弊同飧”。

在自我介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后，他描述了他基于美德的家长式善政：“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弟兄。”他指出，他的民族在哲学和精神上的统一是他执政的重要因素，并谈到，宗教意识形态撕裂了其他社会，使他们易被征服。蒙古基督教牧师拉班·扫马写道，教条“使灵魂苦毒”。[286] 相比之下，成吉思汗声称，在他的蒙古民族，“谋素和，恩素畜”。

他觉得上天和历史赋予他的担子过重，让他难以承受，并承认他需要人帮助来完成自己的使命。“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犹惧有阙”。正如“且夫刳舟剡楫，将欲济江河也”，他需要“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但是，“朕践祚以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然后他请求帮助，说：“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 [287]

成吉思汗签署了他的信函，没有用专制君主喜欢用的长长的华丽头衔。他的胜利胜过千言万语，不需要任何虚浮华丽的修饰。

***

丘处机接到信的时候，成吉思汗已经转移阵地，发起另一场战役。这位圣人和他的弟子历时两年多，终于于1222年春天在阿富汗赶上了蒙古军队。虽然在所有与成吉思汗会面的宗教学者中，他是最著名的一个，但绝不是唯一的一个。成吉思汗在作战途中，所到之处，蒙古官员都会热切地寻觅当地圣贤。在他努力掌控新帝国的早期阶段，他急切地寻求中国圣人的帮助，这方面最详细的记载出现于1219年在兰州游方的两个和尚的报告中，当时蒙古人刚刚占领这个城市不久。其中的佛教法师年约六十岁，他催促他十几岁的弟子海云赶紧逃命。他告诉那个男孩：“吾今老矣，死亦为宜，汝方妙龄，求生路可也。”

弟子坚决地拒绝了。他告诉他的师傅：“因果无差，死生有命。”这也是他一直接受的教导，“今在艰危之际，岂忍弃师而独求生乎!”他说，

如果自己逃走，“若遇识者，问吾师安在，其将何辞以对!”[288]

蒙古军队中的汉人军官来到这两位僧人身边，在饱受战争摧残的土地上，他们正平静地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当被问到他们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害怕蒙古人时，年轻的和尚巧妙地回答道，他们知道蒙古士兵是来保护他们的。汉人军官很惊讶，问他属于哪个佛教宗派，是致力于冥想的禅宗佛教，还是注重宗教礼仪的密宗佛教。

开始时海云说，两个佛教派别都很重要，“犹如一鸟两翼”。但很快军官就清楚了，这两位僧人信奉的是注重冥想的禅宗佛教，但他们也有很实际的知识。虽然一些僧侣谴责暴力，对武术毫无兴趣，但海云说，“武士和学者”就像一只鸟的两只翅膀，“对国家来说二者缺一不可”。[289]

木华黎被他们的故事所打动，给成吉思汗发了信，推荐两名僧人，说他们是真正的“通天者”。[290] 但成吉思汗离他们太远了，无法会见他们，所以他要求他们聚在一起祈求上天旨意成全，并保佑蒙古人。成吉思汗说，他希望将来能见到他们。他指示：“汝当供其衣物、食粮，好生供养。若再有类似僧侣，一并妥善安置，请他们多向长生天言语。”他进一步命令，“无论何人，不得对其不敬，当待之以达尔罕之礼。”[291] 达尔罕是一种自由人，免征税、征兵和劳役，不用参加地方官员以国家的名义所要求的维修道路和其他形式的体力劳动。

木华黎把这两个人带到他设在中国东北的总部，以便按照吩咐照顾他们。他赐给他们头衔，称他们大长老和小长老，但两人拒绝世俗的荣誉，并继续简单地和百姓一起生活，以乞讨为生。[292] 老禅宗大师不久便于1220年夏天去世了，他的弟子海云注定永远见不到成吉思汗，但那位小和尚后来在成吉思汗孙子统治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2]

从最早的征服战争开始，成吉思汗就对发现人才很感兴趣，但在早年，他着重招募忠诚的战士和有特殊技能的人，比如会制造武器的人、从事金属加工的人，或充当向导、间谍和侦察的人。后来他的兴趣扩大到包括医生、织工、木匠、珠宝制造商、翻译人员、工程师、陶艺家以及各种工匠。在中国北方的战役结束之后，他开始召集各种各样的祭司、巫师，以及僧侣、占星家、魔术师、先知、炼金术士、占卜者、圣贤、算命先生和江湖术士，这些人往往从遥远的边陲出发，旅行好几个月，穿越最宽的河，去寻找他的游牧营地。13世纪末的历史学家拉施德丁写道：“既然从世界一端到另一端都在蒙古人或其分支的统治之下，具有各种各样宗教背景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学者和历史学家纷纷从中原、印度、克什米尔、西藏地区、畏兀儿地区来到我们眼前，大批其他民族的人，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法兰克人也纷纷出现在我们眼前。”他进一步说明，“每个人都带来了记载着本国历史、年表及宗教思想的书籍。”[293]

成吉思汗的汗廷吸引了各类宗教人士，带着神奇石头的蒙古萨满、

炼丹的道士、念经的佛教僧侣和占星师、祈祷的毛拉、唱诗的基督徒、精于宫廷礼仪的儒家大师、藏族占卜者以及各种各样的自由职业者，包括灵媒、著名的魔法师或仅靠魔术博人一笑的江湖术士。成吉思汗的营地既是一所游牧民族大学，也是一所精神动物园，汇聚了大批操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信仰不同宗教的学者。营地里人来人往，穿着不同色彩的长袍，有明黄色、纯白色、亮橙色、深红色和纯黑色。清晨，到处可闻叮当作响的念珠声、锣鼓声、口哨声、木鱼声，夜晚，身穿羽衣的萨满围着火堆跳舞，直到进入恍惚状态，巫师读着烧裂的羊肩骨裂缝，占星师注视着夜空，士兵们在掷踝骨。

一开始，这个招募外国学者和宗教人士的举措并没有得到普遍好评，因为蒙古人总是不相信所有外国的东西。巴·希伯来斯解释说，当成吉思汗入侵中土时，他听说那里的人民崇拜偶像，他们的“祭司是智慧之主”。因此，他“派出使臣前往，向他们索取祭司，并答应会尊崇他们。祭司来到后，成吉思汗命令他们和萨满辩论有关信仰的问题，并和他们一起探讨。祭司说话并引用他们的书中要点，这本书在他们的语言中称为‘Nom’；而萨满做不到这一点，失败了，他们无法回答问题，因为他们知识贫乏。从这时开始，祭司的地位在蒙古人中升高了，他们被吩咐制作偶像，并进行复制，就像他们在本国所做的那样，并按照他们的风俗习惯提供丰富的牺牲和祭品。虽然蒙古人大大尊荣祭司，但他们并没有抛弃萨满。二者仍然活跃在他们之中，各自履行自己特殊的职责，并没有轻视或藐视对方”。[294]

要完成组织一个新社会的任务，宗教人士似乎是一个适当的选择，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已经在监督缴税和制定法律方面有了丰富经验。在成吉思汗看来，所有教士都在某种形式上崇拜上天。相互间的敌视经常把一种信仰与另一种信仰分开，把一个敬拜者与另一个敬拜者隔离，但成吉思汗并没有亲眼见过这样的敌意。当他把不同宗教的人聚集在一起协助他执政时，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信仰不同的人经常对他人的不同做法表现出不信任、猜疑，甚至仇恨。

虽然他还没有意识到，但是，成吉思汗正在被拖入他的第一场宗教战争。

第十章 上帝的全能

成吉思汗征服金朝之后不久，就收到了生活在西辽帝国的一群穆斯林急切而奇怪的请求。此地在天山北麓，位于今天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地带。他们看到同为穆斯林兄弟的畏兀儿部和哈剌鲁部都摆脱了西辽统治，加入了成吉思汗阵营，因此恳求成吉思汗来把他们从现在的主人手中解放出来，并统治他们。他们之所以呼吁这位蒙古领袖来帮助他们，是因为他们现在的统治者正是他的宿敌屈出律——乃蛮部太阳汗的儿子。

大约十年前，当成吉思汗征服基督教克烈部和乃蛮部时，他把两个汗都杀了，但他们的儿子都逃走了。王罕的儿子最初在信奉佛教的西夏获准避难，而后在流亡途中被他的追随者抛弃，死在了漠南。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几乎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但他终于在1208年左右成功地到达中国西端的西辽首都。西辽领袖热情地接待了他，因为他们自己毕竟在部落动乱时也曾当过难民。

他们的祖先契丹人曾建立辽朝，从公元907年至1125年统治中国北方和蒙古部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现在统治着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王国，称为“喀喇(黑色)契丹”，即西辽。他们建立了他们的新帝国，地点在前粟特贸易中心的八剌沙衮周围，靠近天山上美丽的深水湖伊塞克湖，离现代的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不远。西辽的统治者保持着他们古老的帝国风格，坚守佛教信仰，因此与他们的臣民越来越疏远，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改信伊斯兰教，开始挣脱加在他们身上的锁链。正如许多政权终结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那些执政掌权者陷入一种困局难以自拔，他们不理解臣民普遍的恐惧，也不明白周遭的世界早已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西辽皇帝古儿汗幻想借助屈出律的支持，打败突然崛起的对手成吉思汗，把草原部落重新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在屈出律身上看到了野蛮人的活力，以为屈出律可以帮助他那僵化的王朝恢复权力与荣耀。屈出律竭力迎合皇帝的妄想，并高兴地放弃了他的基督教信仰，皈依西辽宫廷的官方宗教佛教。一个穆斯林史家说，“屈出律从信奉耶稣教转为偶像崇拜”，而且试图强迫百姓皈依他的新宗教。“他把正确道路的明灯变成了放弃信仰的黑暗，从侍奉仁慈上帝变成了侍奉撒旦的奴仆”。 [295] 心存感激的皇帝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立他为汗，让他着手招募被成吉思汗击败的草原上的散兵游勇，组建一支私家军。

古儿汗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无能的统治者，发动了一系列谋划不周的战争，颁布了一系列前后不一的法令，但这个决定将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且是最糟糕的错误。屈出律一获得控制军队的权力，便立刻转而与他的岳父为敌，“就像云中的闪电一样向他突袭”。 [296] 1211年，成吉思汗入侵金朝领土那一年，屈出律废黜了古儿汗，监禁了他，并夺取了首

都、国库和政府的控制权。两年后，在1213年，古儿汗死了，屈出律成为唯一的统治者。作为一个怀有使命的反叛者，他充满了活力，积极进取，发动了战役，试图收复这个皇帝在中国西部那些盛产葡萄、甜瓜和葡萄酒的肥沃绿洲城市的领土。[297]

虽然屈出律现在成了一个佛教徒，但他最初任命的官员都是穆斯林，用以统治他的穆斯林臣民，但当地人不满他们和屈出律合作，很快便推翻了他们，并暗杀了新任命的官员。屈出律最初的反应还比较适度，他召集基督教、佛教和穆斯林学者举行公开辩论，以缓解宗教上的紧张局势，但这些辩论非常情绪化，只能凸显他的臣民之间的差异，激化不同宗教间的愤怒情绪。这时，屈出律决定，因为穆斯林拒绝了他派来统治他们的官员，他别无选择，只能完全压制他们。他关闭清真寺，并禁止教导伊斯兰教教义。最后，他在绝望中孤注一掷，希望把他桀骜不驯的百姓的信仰统一起来，要求穆斯林皈依者转回其原来的宗教基督教或佛教，并放弃穆斯林服装，采用西辽帝国的传统服饰。为了强制执行严格的反伊斯兰教新政策，屈出律在每个穆斯林家中派驻了一个士兵，监视他们的行为，强制他们遵守法规。术外尼写道："处处看得见奸淫烧杀，而且异端的偶像教徒大肆胡作非为，谁都阻止不住他们。"

虽然花剌子模汗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国王穆罕默德二世是中亚地区最靠近他们的强大的穆斯林统治者，但在西辽受迫害的穆斯林并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帮助，而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是屈出律的盟友。因此，陷入绝境的穆斯林派出使者向屈出律的大敌成吉思汗求助。15世纪中亚地区突厥史家米尔扎·穆罕默德·海达尔(Mirza Muhammad Haidar)写道："之前有关世界之王成吉思汗征服的传闻已经传到了国外。"穆斯林转向蒙古人求救。在"世界之王成吉思汗的保护下"，他们"不再遭受古儿汗屈出律邪恶行为的伤害"。[298]

成吉思汗庄重地接待了穆斯林使者。他相信他们是真诚的，提出的理由是充分的，于是接受了他们的请求，派遣他最得力的一个指挥官哲别，于1216年率军前去解放他们。用术外尼的话说，他们的"祈祷之矢射中采纳之的"。成吉思汗开始"消灭屈出律这个败类，清除他那叛乱的恶果"。[299] 对这位蒙古领袖来说，这场战役只不过是扩大他帝国的一种手段，而那里的百姓正渴望加入他的帝国。这同时也是一个向他的草原战争中残存的敌人屈出律施行报复的机会。

结果是，这个任务比哲别预期的要容易得多。屈出律采取了一个策略，把他的士兵从山上的中央要塞撤出，分散驻扎在沙漠绿洲的各个家庭中。这种布阵的后果是他没有预料到的。随着蒙古军队逼近城镇和村庄，穆斯林自发地起来攻击住在自己家中的士兵。因此，"住在城中穆斯林家的所有他的士卒，如水银泻地般刹那间给消灭殆尽"。屈出律的军队土崩瓦解，他带着一小队仍然忠于他的士兵穿越山谷南逃到印度。蒙古人把他"追得像一条疯狗似的"，跨越今天的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终于在1218年擒获并杀了他。

被解放的西辽穆斯林及其联盟部落蜂拥来到成吉思汗麾下。术外尼称蒙古军队的到来是“真正的一种慈爱，神恩的一种仁爱”。西辽人感到很惊讶，因为纪律严明的蒙古勇士并没有收缴战利品，也没有要求他们进贡。哲别“除了关于敌人的消息外，什么都不问他们要”。[300] 成吉思汗着眼于未来，特别希望得到有关花剌子模国王的消息，这个国王统治着波斯和中亚天山山脉和里海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在解放穆斯林并杀死他们篡位的汗之后，哲别胜利班师回到蒙古中部。他带给成吉思汗一百匹白马作为礼物，以代替十几年前他射死的成吉思汗的胯下之驹。

征服西辽后，成吉思汗第一次遇到各种宗教派系之间的斗争，因其人口中混杂着穆斯林、佛教徒和基督徒。他的回答简单而公正。他再一次允许“祈祷请求”，但不限于恳求他来把他们从西辽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穆斯林，而是针对所有宗教的信徒。成吉思汗打发使者走遍新解放土地上的每个城市和村庄，宣布他的律法，以便每一个人都能听到并了解。他下令：“人人均可信仰自己的宗教，遵守自己的教规。”[301] 从此，这条命令成了他征服战争中的根本原则，在他有生之年都如此对待他的臣民。

虽然在历史上宗教宽容非常罕见，但在13世纪却并不新奇。几位卓越的领袖，如居鲁士大帝和亚历山大大帝，都实行过不公开的宗教宽容政策，此外，在此之前至少有一位皇帝曾发布过明确的宗教宽容法令，他就是罗马皇帝朱利安。他生来就是基督徒，但在公元361年成为皇帝后放弃了信仰。次年，他发出了宽容敕令，允许所有类型的基督徒享有信仰自由，恢复了以希腊神和罗马神为国教的传统，并且像以前的皇帝一样自任帝国大祭司。他提出要重建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犹太教圣殿。尽管他对某些宗教很宽容，但他竭力反对基督教，而基督徒则坚决反对他。虽然该法令因其独特的意图一度很有名，但并没有带来宗教自由。第二年，这位三十二岁的伟大皇帝在伊拉克带军征战时被自己手下的一名士兵刺杀。据曾当过朱利安老师的利班纽斯说，这名刺客是一位对皇帝心存不满的基督徒，他认为皇帝是异教徒。[302] 在他死的时候，罗马帝国已经重新归向基督教，并正在进行更加严厉的宗教迫害。朱利安的法令已推行于寺庙、教堂和牧师。法令赋予这些异教教派一定的宽容，允许它们在一定限度内活动。

成吉思汗的法律是独特的，因为它不只是允许宗教神职人员从事他们的职业，它还允许每个人拥有选择对自己最具吸引力的宗教或信仰的权利。在蒙古人统治下，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个人权利。很久以后，在18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区分宗教自由究竟是个人权利还是集体权利具有重要的哲学和政治意义。

术外尼是第一位指出成吉思汗新法律重要性的史学家。他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这是成吉思汗的第一份国际性法令。成吉思汗曾于1206年为蒙古人创制了法典，当他在中土作战时，也曾发布过各种军事和行政法令，但这项法律是一项普通法，作为一个严格的法律和道德原则，将推广到新建立的整个蒙古帝国。这是第一套被称为“大法”的国际

法律，超越帝国内部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后来的学者，包括对托马斯·杰斐逊产生重要影响的写出成吉思汗传记的佩蒂·德拉·克罗瓦，也称这是成吉思汗的第一部法律。

***

当时，成吉思汗也无法知道他的新法律将会变得多么重要。他与西辽穆斯林的遭遇使他对大宗教之间的界限有了新的认识，明白了它们相互之间有多么不同，存在多么大的敌意。他认为所有形式的崇拜都朝向同一个目标，都在向同一个神圣的存在说话。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所谓对与错，只是所用的方法各有不同而已，但都在教导他们自己的道德规范。与其说他认为相互竞争的信仰之间是平等的，不如说他把它们看得完全相同。有一种普世的宗教，但却有着不同形式的表达，就像有一个统一的帝国，就是他的蒙古帝国，但在帝国内部，人们可以说不同的语言，遵循不同的风俗，采用不同形式的政府，沿袭他们自己的传统和他们祖先的教诲。

在降伏屈出律并把西辽帝国纳入蒙古帝国之后，成吉思汗出人意料地成了宗教自由的拥护者和被压迫者的保护者。在草原游牧民族中，亲属和部族形成了社会中的自然鸿沟，但在定居社会中，宗教的裂纹线在全国纵横交错，犹如一颗钻石上的瑕疵一样，等待一击而碎。成吉思汗认识到了挑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好处，但他也意识到，要在他不断扩张的帝国中实现和平，唯一的办法是消除这些可能突然爆发的分歧。

14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大马士革官员奥·乌玛里对成吉思汗如何接纳外国宗教信仰感到惊奇，因此他错误地认为，他的儿子们各自选择信奉不同的宗教。他声称，成吉思汗的一个儿子皈依了犹太教，另一个皈依了基督教，其余的有人坚持信仰他们的本土宗教，有人崇拜各种偶像，但没有一个是宗教狂或试图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别人。 [303] 他写道，按照成吉思汗的法律，因宗教信仰而杀人将被判处死刑。 [304]

术外尼也天真地从正面意义上解释了成吉思汗对于宗教自由的承诺。他写道：“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他没有逼迫他们，“他尊重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神殿的途径”。 [305] 虽然这可能是真实的，但他的宗教政策也有明确的政治动机。

成吉思汗具有工于算计的天赋，总是能够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并把敌人的强项转化成为弱项。他发现宗教自由可以用作对付他周围文明的政治和军事利器。他清楚地明白宗教信仰对人的影响力，因此他要利用人的信仰来加强他的战略优势，正如他曾引导河流冲倒城墙一样。

耶律楚材慎思明辨，他发现：“甚哉，生民之难治也!速于为恶，缓于从善。” [306] 单靠军队和政府不能保证良好的行为。成吉思汗认识到，他需要通过宗教来控制形形色色的臣民。他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

应付不断扩张的帝国境内宗派之争的紧迫问题提供了一个实用的解决方案。蒙古世界观还在缓慢的发展过程之中，这种世界观认为，上天选择了成吉思汗恢复正常的世界秩序，纠正错误行为，恢复自然正义，并把迷失的国家领回“康庄大道”，把它们统一起来，置于蒙古人控制的单一帝国之下。为了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成吉思汗不得不诉诸武力，但他的态度十分真诚，在入侵一个国家之前，他会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自愿地服从他的命令，那么他们的城市就不会受到攻击，他们的市场将继续营业，而他们的统治者和宗教领袖将继续执政掌权。蒙古人答应保护他们免受内外敌人的攻击，管理他们的贸易路线，并实行统一、公平的税收政策。成吉思汗没有赋予他们政治自由，但保证他们的安全和稳定，并允许他们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

他的政策吸引了备受迫害的穆斯林，给了他们一个神学上的借口来支持一个异教徒领袖。术外尼写道，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支持伊斯兰教，“哪怕他自己不信奉这种宗教，他也会日益兴旺发迹”。[307] 佛教徒和基督徒也享有同样的自由，他们不再相互攻击，也不再谴责异教徒征服者蹂躏他们的土地，而是找到了一个理由，把他的统治看作某种形式的解放。

根据一个穆斯林史料的记载，成吉思汗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早年，曾做过一个梦，在梦中他正在把头巾缠绕在头上，但头巾越来越大，越来越长，似乎没有尽头。因为只有穆斯林戴这种头巾，他便派人去向一个博学的穆斯林商人请教，请其解梦。那位商人解释道，头巾显然象征大汗对穆斯林的权力，他梦中头巾的越变越大意味着他将征服所有伊斯兰教国家，有一天他会统治穆斯林世界。[308]

事实证明，穆斯林曾是成吉思汗最亲密的盟友，但也是他最憎恶的敌人，一些穆斯林最早效忠于他的统治，但最终，他们成了蒙古人征服的最大受害者。八个世纪之后，伊斯兰教仍在挣扎着恢复。和其他宗教相比，成吉思汗似乎凭直觉更了解伊斯兰教，他尊重穆斯林的文化和知识成果，因为他们文化的核心也是游牧文化。蒙古人和穆斯林都是游牧民，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军事传统，都讨厌吃猪肉和狗肉。正如术外尼所写的：“在那些日子里，蒙古人尊敬地看待穆斯林，为照顾他们的尊严和安适，替他们设立了干净的白毡帐。”[309]

在希腊、罗马、埃及、印度和中国，早期帝国都盛行神秘而奇特的宗教，但伊斯兰教与它们都不同，其信息非常明确，集中在一部篇幅并不太长的经典《古兰经》中的律法里。阿拉伯语文字弯曲有致，很美丽，和蒙古文字很相像，因为它们起源相同。在一些为成吉思汗辩护的穆斯林看来，成吉思汗与伊斯兰教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古兰经》第九十六章记载，真主用血块创造了第一个男人，而成吉思汗出生时手里就抓着这样一个血块。成吉思汗代表人类新时代的开始。

蒙古人已经征服了中国北部和西部的王国，现在控制着世界上最富有的贸易线路，从中国北方城市出发，进入中国西部的甘肃走廊和畏兀

儿绿洲，到达天山山脉的城市，把中华和伊斯兰这两个伟大的商业文明连接起来。一切都在迅速变化。囚犯变成了王子，王子变成了囚犯。成吉思汗的女儿现在管理着汪古部、畏兀儿部和哈剌鲁部这三个主要的贸易王国，而她们的丈夫则在军中服役。成吉思汗颁布了新的法律，促进贸易，降低税率，废除地方关税，保护客商，他在贸易线路上驻扎卫兵，而且，“凡进入他的国土内的商人，应一律发给执照”。[310]

洗劫中土城市已经使蒙古人获得数不清的掠物。他们有这么多珍贵丝绸、油漆家具、玳瑁梳子、玉花瓶、金、银、绿松石、珊瑚、盘、盆、药品、兵器和酒，但却没有足够的骆驼把它们运走。在蒙古的寒冷气候里，游牧民族能穿的丝绸有限，能搬动的珍宝有限，他们的蒙古包可摆放的家具也有限。过多的货物积压在仓库里，大大限制了蒙古人继续其游牧生活方式的能力。

富有冒险精神的穆斯林商人听说蒙古人出人意料的成功和他们的巨额财富后，便从忽毡(即现代塔吉克斯坦锡尔河畔的商贸城)收集不事纺织的草原游牧人急需的棉花、羊毛和其他面料，并组织了一个商队。成吉思汗向商队领队问道：“这家伙是否认为我们这儿从前根本没来过织品？”[311] 于是他吩咐手下把蒙古仓库中堆积如山的丝绸面料和其他商品展示给商队的领队看。这些人从没有见过如此巨大的财富，一下子惊呆了，于是，他们不再试图向蒙古人兜售自己的商品，而是把它们作为礼物献给他们，希望成吉思汗也把他的财富分给他们一份。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穆斯林商人带来了一些优质棉花，成吉思汗很喜欢，还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织锦。中国织工用丝线织成精美的山、鸟、树和精巧的场景图，但穆斯林的织工用真金丝线织成精美的几何图案，配以飞舞的花卉图案，或者鸟、狮子或其他动物的图案。

成吉思汗很喜欢这些商品，并决定用他的新财富来购买他无法从中土获得的商品：忽毡商人带来的华贵的织锦、大马士革优质钢、来自印度的香味扑鼻的檀香木。他不需要派一支部队到中亚获取这些货物，他似乎只需要派一个贸易商队就可达到目的。他新征服的穆斯林臣民善于交易，有着组织商队穿过沙漠的悠久历史。而派遣商队所需要的费用和精力同装备一支军队的成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只要与诚信的合作伙伴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蒙古人就可以用金、银或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任何外国货物。

***

1218年，成吉思汗派出一个外交使团到花剌子模汗国，与该国国王洽谈贸易开放。花剌子模是汗国皇室家族所在地，位于流入咸海的阿姆河辽阔肥沃的三角洲。花剌子模国王曾仿照早期的波斯王国来建造他们的国家，从而使他们成为古粟特人的继承者。在其领土上既有着许多大的贸易城市，也有荒凉的沙漠和山地，从咸海一直延伸到阿富汗，北入现代的哈萨克斯坦，囊括现代伊朗、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哈萨

克斯坦南部、阿塞拜疆东半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的西半部。花剌子模帝国西部与巴格达哈里发的阿拉伯帝国接壤，东北部与前西辽帝国接壤。不知为何，该汗国国王与周围所有邻邦，无论大小，都保持着敌对关系。

即使是对蒙古人的一切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术兹札尼也承认，成吉思汗起初去花剌子模是为了寻求和平。他引述成吉思汗寄给花剌子模国王的信说："朕为东方的统治者，你就成为西方的统治者吧。我们双方应缔结坚定的和平友好条约，要让商人和商队自由来往通行，带着贵重和普通货物从我方前往你方，正如从你方来到我方一样。" [312]

花剌子模国王作出了积极回应，并援引蒙古人成功地把西辽帝国的穆斯林从佛教迫害下解救出来的功绩，认为成吉思汗已经与伊斯兰教建立了永久同盟。他邀请成吉思汗派遣商队带着商品前来贸易。为了组建一支大型商队，成吉思汗下令他的每个女儿和儿子选择一位穆斯林家臣参与这次商贸之旅，并为他们配备"金砖或银砖"。 [313] 除了黄金，蒙古人还发来了貂皮、麝香、玉、驼绒纺织品。 [314] 这既是一个贸易商队，也是派往中亚地区最大王国的外交使团。

成吉思汗通知花剌子模国王："我们也派出一队商旅，随他们前往你邦。"希望他们可以获得"奇珍异宝"，与此同时，"从今后，因我等之间关系和情谊的发展，那仇怨的脓疮可以挤除，骚乱反侧的毒汁可以洗净"。 [315] 《蒙古秘史》记载，商队由一百个商人组成，由乌忽纳带队，此人可能来自印度，因为至少有一个印度人是商队的主要领队。 [316] 据术外尼记载，商队由四百五十多人组成，加上他们自己的牲畜和货物，用五百多头骆驼载货。 [317] 无论商队人数多少，该商队都是来自蒙古的最大且最有价值的商队。

成吉思汗希望他统治下的帝国能以贸易兴国，不仅给蒙古民族带来繁荣，也给在他统治下的各国，无论是汉人的国家、穆斯林的国家，还是基督徒的国家，都带去兴旺发达。然而，正如术外尼用诗意的语言所指出的那样，有时很难断定静静地栖息在某人屋顶上的那只鸟究竟是带来吉祥的凤凰还是带来不幸的猫头鹰。成吉思汗可能暂时在世界屋脊上栖息，但他正要对那些低估他力量和决心的人释放出巨大的恐怖能量。在"兴旺之水"从"他们欲望的江河"流出之前，花剌子模的穆斯林将忍受"祸害的军队"带来的苦难。 [318] 一旦屠杀开始，便是残酷无情的，但这场苦难本可以避免。

1218年至1219年之交的冬天，花剌子模汗国的一位官员，也是国王的舅父，率军搜查了刚刚抵达该汗国边境城市欧特拉的蒙古商队，此地在现代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附近。他囚禁了带领商队的商人，然后，经过国王(他也觊觎这笔财富)的同意，他杀死了商队成员，只留下一个活口，此人设法逃脱向成吉思汗报告。这次袭击绝不仅仅是一个典型的针对商人商队的洗劫，而是更加严重的事件。它激怒了成吉思汗，更重要的是，动摇了他对穆斯林的信任，他本来以为他与穆

斯林之间已经建立了这种信任关系。这种敌对行为危及了他曾设想的连接东西方贸易的网络。

他把这次对商队的袭击看作花剌子模汗国国王无缘由的、蓄意的背信弃义行为。用术外尼的话说："那愤怒的旋风把尘土投进仁爱的眼内，万丈怒火使眼泪夺眶而出，唯有洒下鲜血才能扑灭它。" [319] 但一开始成吉思汗表现出了惊人的克制：他派遣特使要求该国国王惩罚欧特拉总督。但这位国王对来自偏远蛮荒之地的野蛮人的要求嗤之以鼻，认为他们也许能恐吓邻近的宋朝，但决不会威胁到他固若金汤的穆斯林城市，因为他的军队规模强大到是成吉思汗的军队的数倍。这个国王不仅没有对成吉思汗的要求作出反应，反而杀害了特使。这个国王一生统治无能，优柔寡断，而这次的决定是他毕生最糟糕的决定。

花剌子模国王绝非仅仅背叛了成吉思汗。在蒙古人看来，他违背了天意，偏离了正确的行为之道。用成吉思汗的话说，这个国王已经斩断了联系人性道德与天道的神圣纽带。他问道："何可听撒儿塔兀勒百姓，断我金縻绳耶？"然后他再次动员他的国家准备战争。 [320] 他把入侵中亚穆斯林国家看作是一个正当行为，是为了把它们拉回正道而作出的努力。他带着长生天明确的使命而来，目的是"使之归正"。 [321]

***

在商队遇袭不到一年后，蒙古军队于1219年至1220年之交的冬天出征。成吉思汗打击花剌子模国王和穆斯林城市的战役是一个家族事务，无论从好的意义上还是从坏的意义上说，都是如此。他的儿子和女婿陪同他出征作战，孛儿帖则留在后方，负责管理蒙古帝国，而他的女儿们则统治着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城市。战役开始的时候，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们为解决他的继任者问题召开了会议。他现在五十七岁了，以他这个年龄，有可能不会活着返回了。经过激烈的家庭讨论，他的儿子们同意支持他第三个儿子窝阔台为下一任大汗。其他三个儿子都将成为统治帝国部分领土的汗。成吉思汗本来心仪他的长子术赤，术赤也是所有儿子中最聪明的，但是由于其他兄弟对他的父亲究竟是谁存有疑问，因此一直不支持他。

成吉思汗精心挑选随行的家属和军人，启程踏上前往中亚的漫漫征程。他选择了他的第四位妻子忽兰哈敦陪伴他并管理他的移动军事总部，其他三个妻子则留在蒙古帝国宫廷。他的五个儿子陪同他征战，其中四个由孛儿帖所生，另一个小儿子阔列坚由忽兰所生。 [322]

就在成吉思汗率军离开蒙古中心地带，穿越阿尔泰山进入中亚时，成吉思汗和他的军队停下来祭奠帝国大纛。这是在漫长的战役之初由怯薛主持举行的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对每个参与者来说都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虽然仪式是在七月举行的，但仪式结束之后立即下了三英尺深的雪。

成吉思汗的谋士耶律楚材写道，“帝疑之”。像任何熟练的观象师一样，耶律楚材把这场雪解释为一个吉兆，玄冥之气主雪，“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 [323] 一个优秀占星家的工作并不完全是能够预测未来，而是能够对任何情况给予正面解释，即使士兵或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是一个坏兆头，也要往好处解释。成吉思汗自己可能不需要这种解释，但他要让他的士兵听到。在他的余生中，耶律楚材证明了自己善于把可能的负面迹象解释为正面的预示，变成成吉思汗成功和胜利的保证。他擅长宣传鼓动，承担着为他的主人引导公众舆论的重要任务。

然而大雪越下越多，这时真正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问题了。耶律楚材写道：“时方盛夏，雪凝冰积。” [324] 他描写道，山路狭窄，无非“樵夫小径” [325] ，但大汗命令“斫冰为道”。 [326]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了。耶律楚材写道：“当意志坚强的人决心已定，便坚如大山，不为时事所移。” [327]

虽然这次远征将成为史上最血腥的军事战役之一，但对于年轻的耶律楚材来说，开始时他只是觉得好玩。离家随蒙古军队出征使他获得了释放，机会难得。他穿越蒙古、中国西部和中亚地区，看到了新的美景，启发了他新的想象。他一生花了大部分时间从诗、书、画和书法中研究并学习世界，但现在突然有了机会去亲眼看一看山上的云雾是什么样的，太阳如何在波平如境的湖面闪烁，群鸟落在山巅，为何看上去犹如冰雪覆盖一般。

作为一个年轻学子，他有着不知疲倦的热情与好奇心，他草草记下许多短诗，他称之为“光风满贮诗囊去”。 [328] 耶律楚材也描述了成吉思汗在蒙古移动的帝国首都，在那里，“山溪交错，满目苍翠”。在营地里，“车帐如云，将士如雨。牛马被野，兵甲辉天；远望烟火，连营万里。往昔辉煌，谁与争锋？” [329]

生活是一个感官的发现之旅。当他越过群山，进入花剌子模的土地，耶律楚材很高兴地在穆斯林的花园和果园里看到梨、杏和苹果，而当他看到石榴时激动地写道：“其大如枡，甘而差酸。”他看到硕大的西瓜，“长耳仅负二枚，其味甘凉可爱”。在其他地方，甜瓜长得大如“马首”。 [330] 有时连最简单的事情也会使他困惑不解，比如穆斯林的硬币不像中国古钱币那样中心有个孔，以便可以串在一起，容易计数和运输。他喜欢葡萄和葡萄酒，凭着年轻人的机灵和天真的闯劲，他自己很快就学会了酿酒。“葡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自酿葡萄不纳官”。 [331] 在他一生中，他一直在享用葡萄酒，有时会喝过头，也在诗中不断提到葡萄酒。

阅读耶律楚材的游记，看到其中写了那么多杏、石榴和免税酒等，有时让人很难相信，耶律楚材是随蒙古人西征的，而战争即将打响。他正在参加一场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战争，尽管起初他似乎完全不知道这次冒险的意义，但他逐渐理解了其重要性，意识到他必须记录他所看到的一切。蒙古征服花剌子模的战役使他接触到了新的土地和思想，激发

他更多地思考他个人的背景，厘清他的信仰。他发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尽管他非常忠于成吉思汗和蒙古人，但走得离家越远，他早年接受的教育就不断地从心底浮现出来，他也越来越像一个汉人。

蒙古大军正在逼近，消息不断传来，警报四起，但花剌子模国王一筹莫展，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似乎非常害怕蒙古人，同时也相信真主会保护他免受异国莽汉的羞辱。他派兵增援欧特拉，因为他知道这个城市将首先受到攻击。蒙古军队到达后，包围了欧特拉，并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围攻。这个国王错误地认为，蒙古人最终要么放弃围攻，要么洗劫这座城市作为对蒙古商队遭劫的报复后，便会满足而去。因此当蒙古人派出小股军队，同时从不同方向进攻几个城市时，他仍愚蠢地毫无准备。这其实类似于在大狩猎开始前惊吓动物的蒙古战略，蒙古军队表面上看似分散杂乱无章的攻击让这个国王感到困惑，也使他无法组织协调一致的反应。他不知道从何处去阻击蒙古人，更无法预计接下来将发生什么。

蒙古人在攻下边境城市欧特拉之前就袭击了花剌子模帝国的心脏。如果他们也选择自亚历山大时代以来大部分军队所走的贸易路线，他们将穿过一系列城市，其中包括伟大的贸易和艺术中心撒马尔罕，然后到达布哈拉或者位于现代乌兹别克斯坦城市乌尔根奇附近的都城希瓦，这个地方也叫花剌子模。但成吉思汗和他的小儿子拖雷并没有选择走这条路，他们率领五万大军，分为五个单位，在当地牧民向导的帮助下，于1220年初天气依然比较寒冷的时候越过克孜勒库姆沙漠。当年二月，蒙古人扑向布哈拉，就像一群饿狼扑向毫无防备的绵羊一样。两个星期后，这个城市被攻陷。

在一个月内，他们已经到达了防守更加严密的撒马尔罕城下，尽管有庞大的军队驻扎在那里，蒙古人仍然迅速拿下了这个城市。蒙古人在欧特拉疯狂发泄他们的愤怒。这个被称为复仇之都的居民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因此拼死抵抗。抵抗者射尽了他们的箭，然后就阵亡了，女孩子们走上前来，开始拆除宫殿的砖块砸向进攻者。但蒙古人决心取胜。正如术外尼所说，蒙古人屠杀那些头戴面纱的女人，和屠杀那些头戴缠头巾的男人一样残忍。[332]“内堡和城池被夷为平川”。而那位曾扣押蒙古商队，引发这场战争的傲慢的总督，不得不“饮下死亡之杯，穿上永生之服”。术外尼引用波斯经典《沙赫纳美》(诸王纪事)的话说：“这就是天道，它一手捧着王冠，一手拿着绞索。”[333]

蒙古人在花剌子模取得的胜利是血腥恐怖的，尤其是被击败的士兵，蒙古人通常把他们集体屠杀，或保留一些活下来，但等待他们的是更悲惨的命运，他们被用作未来战斗的人肉盾牌，或活活地扔到护城河里当填料。成吉思汗的侵略军规模很小，因此他要确保在战场和他的蒙古家园之间没有潜在的敌军存在，以便在必要时能顺利撤退。活着的士兵便构成了持续不断的威胁，于是他便把他们消灭。他对待平民的方式各有不同，有时很严酷，有时则比较仁慈。在后来漫长的战役中，他对败兵的政策保持不变，但随着他越来越深入中亚，离故土越来越远，他

对待平民也越来越严酷。

在布哈拉、撒马尔罕和欧特拉迅速陷落后，成吉思汗给每个城市一个投降的机会。他派穆斯林使节去那里，敦促他们“从毁灭的漩涡和血槽中逃离”。如果他们反抗，他保证将歼灭他们于血海之中，“但如果你们智慧的耳朵听从忠告，顺服他的命令，你的生命和财产将安如磐石”。[334] 成吉思汗总是说话算话。那些投降的人未受到任何伤害，他善待他们。反过来，他用这种公平待遇作为一种手段，鼓励其他城市投降。

有些城市投降了，而其他城市甚至在蒙古人威胁到来之前就揭竿而起反抗他们国王的压迫了，因而当一些难民逃避侵略者时，剩下的人也跑去加入侵略者的行列。其中一些人跑去迎接蒙古人，因为他们也是游牧人，宁愿接受成吉思汗的统治，也不愿受国王的压迫剥削。还有一些通常来自突厥部落的异教徒，他们憎恨人口占多数的穆斯林，因为他们受到穆斯林的压力，要求他们放弃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皈依伊斯兰教。随着每次新战斗的开始，那些抵抗者面临的命运也越来越严酷。

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蒙古人了。当他们来到大河时，他们用船建造桥梁，用石头和泥土建造水坝。当敌人跳上河边的驳船企图逃跑时，蒙古骑兵追杀他们，向他们发射易燃的石脑油，并在河面上来回拉起粗大的铁链。[335] 蒙古人用石头、泥土和俘虏的躯体填充城市的护城河。当他们来到很高的城墙下时，他们搭建云梯，并让他们的汉人工程师制造破城槌、弩炮以及其他巧妙的围攻机械，而俘虏则在挖地道。

国王穆罕默德二世被吓坏了。术外尼在谈到他时说：“魔鬼这个蛊惑者，已使他的父亲穆罕默德一世心中恐怖和害怕到极点，以致为了不让那支威力无比的军队抓到，为了在他们的袭击前紧踩马镫逃生，他但求入地有缝、上天有梯。”[336] 他开始与他的大儿子扎兰丁激烈争吵，扎兰丁想让他抵抗，因为蒙古人尚未到达他的首都。他对他父亲说：“在一个我们没有遭遇，甚至还没有离开他本土的敌人面前，转身逃跑，把军旅分散到各地，这是一个懦夫的表现，不是一个强大侯王的做法。”[337] 扎兰丁认为，他父亲未能组织起一个抵抗蒙古人的联合行动。各城各省不得不各自为战，凭一己之力抵抗侵略军，相互之间没有协作，也没有人指挥。他请求父亲让他指挥军队，否则“我们将像胶糖那样受到谴责之口的咀嚼，在全人类面前溺毙在悔恨的洪水中”。

国王试图用哲学来证明他的立场。“圆中均有缺，满月均有亏蚀，缺中又均有圆”。他轻描淡写地说，有的时候不战斗倒是明智之举，“因为在绞索中激动只有加速死亡，把揣测和幻想结合起来只能产生疯狂。这是人所共知也是一个成立的事实”。[338] 扎兰丁愤怒地离开了，决心“在雄伟的战场上驰骋”，即使他不得不违抗上天的意志，他也要战斗。

蒙古人一路追杀这位懦弱无能的国王，而他正从他的首都希瓦逃向里海，把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们撇在身后，自谋生路，结果被蒙古兵俘虏，境遇凄惨。他空无一人的首都靠近现代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

斯坦边境，曾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富裕城市。术外尼写道："它的领域是容纳现代奇珍的宝地，他的宅邸散发各种崇高思想的光辉，它的州邑、郡县，因贵人光临而成为一个个玫瑰园。" [339]

国王的母亲组织疏散后宫和皇家金库。她杀害了城内聚集的所有人质，因担心蒙古人可能解放他们，而他们会加入敌营。城里的居民现在被抛弃了，因为"没有一个领袖派给他们，他们可以赖以应付不幸事故，负责国政和公务，并因他的摄政，他们可以抵抗老天施加的暴力"。[340]

成吉思汗派速不台和哲别两员大将率领两万精兵向西追击逃亡的王和金库，但他没有围攻都城。相反，他把它交给他的三个儿子负责，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占领首都的荣誉，同时学习一起合作。结果他们却像守城的希瓦人一样互不合作。术赤料想他最终会继承这座城市，因此想把破坏减到最低限度。而察合台和窝阔台只想要摧毁它，并掠夺它。他们"率领一支冲锋陷阵如洪水、连绵不绝如阵风的军队到来。他们绕城巡视，遣使诏谕居民投降"。他们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他们忙于为攻城准备木头、投石机、投掷器等武器。花剌子模境内没有石头，他们便利用桑木制造投掷器。一如既往，他们每天都利用许愿和恐吓、威迫和利诱来逼迫居民，偶尔彼此也射几箭"。 [341]

蒙古人的攻击相互脱节，缺乏组织。蒙古部队在护城河里灌满了石脑油，放火焚烧，几乎攻陷了这座城市，然后，为了挽救城内建筑物，使其免遭损害，他们使河流改道，结果前功尽弃。成吉思汗不得不下令，撤销术赤指挥官的职务，让窝阔台接替他的职位。几经挫折反复，最终还是攻下了这座城市。然后，出于贪婪，这几位兄弟抢夺贵重财宝，私自瓜分，却不送给他们的父亲——帝国的大汗一份。

成吉思汗入侵花剌子模帝国时，他发现，中亚城市的穆斯林与中国西部草原和沙漠绿洲突厥部落的穆斯林大不相同，他们并不像突厥穆斯林那样觉得他有什么魅力，也没有对陪伴他的穆斯林表示任何精神上的亲近感。对他们来说，他只不过是一长串不知从何处而来的野蛮劫匪中最新的一个，尽力抢走一切，然后便消失无踪。可是当他们发现，这个统治者与众不同，根本不打算离开时，他们后悔莫及。

花剌子模人并不像在西辽统治下的穆斯林那样欢迎蒙古人，也不把他们当作解放自己的英雄。同样，蒙古人也对他们的新敌人充满了蔑视。根据一个穆斯林的描述，蒙古人是这样看他们的："住在房子里的城镇居民是退化和柔弱的族类，他们是种地的农夫，像牲口一样辛苦劳作的奴隶，以便他们的主子可以在奢华生活中打发时光。" [342] 蒙古人对撒马尔罕、布哈拉和欧特拉人的观感则是：这些人就像山羊群或绵羊群，很快就被吓呆，容易诱导，可以随意驱使。

即使那些投降并服务蒙古人的穆斯林也竭力想弄明白他们的帝国和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这些虔诚的信徒来说，伊斯兰文明的明珠遭

到如此空前的破坏是令人费解的。只有上帝的盟友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力，但上帝为什么允许这种毁灭呢？他们习惯于穆斯林之间的战斗、袭击、入侵、互相残杀，他们也曾与基督徒和非信徒作战，但异教徒从未如此大规模地征服过他们。因为这种征服太不可思议了，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神的旨意。成吉思汗一定与神有着某种看不见的联系。正如14世纪一位库尔德历史学家所说的："虽然他不是一个穆斯林，但他与神之间有真正的友谊。" [343]

蒙古军队横扫花剌子模和古代波斯文明的土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其中一个重要城市是位于德黑兰东南部的雷城(Ray)。该城因不同版本的伊斯兰法而造成的宗教冲突很严重，内部四分五裂，几乎无法组织起对蒙古人的有效抵抗。根据16世纪的波斯历史学家穆罕默德·赫万达米尔的记载，相互对立的两个伊斯兰教派的信徒会见哲别，都恳求他杀死另一派的信徒。结果他把两派信徒全都杀死了，并且问道："这些诡计多端的让自己同胞流血的男人还能是什么好东西？" [344] 我们不能认为赫万达米尔的记载都是事实，因为这是在征服发生很久以后记下来的，但它说明了在穆斯林派别之间的宗教敌意有多么深。

伊斯兰内部的对抗如此之烈、仇恨如此之深，以至于与花剌子模国王为敌的许多穆斯林选择和蒙古人站在一起，并且很高兴看到蒙古骑兵摧毁国王军队的惨状。在巴格达的哈里发和常被称为阿萨森教派的伊斯玛仪派支派尼扎里派头目都被其他穆斯林指控曾在战争中暗助蒙古人。不管他们是否这样做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们从没有帮助过花剌子模国王。

成吉思汗肯定与伊斯玛仪派有过秘密交易。伊斯玛仪教派的第二十五任伊玛目哈桑三世在主动投降蒙古以后，曾派出使者拜见成吉思汗。[345] 花剌子模国王统治着波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但里海附近的山地除外。这一大片山地由哈桑三世控制，其军事基地在阿拉穆特。他的穆斯林教派被大多数穆斯林谴责为异教徒，但他们则认为自己的领袖是一个神人。伊斯玛仪一向以狂野不羁的行为闻名，他们抽大麻，也滥用其他药物，沉迷女色，并频繁地突然改变他们的神学和宗教实践。这个王国地域狭小，周围强邻环绕，东北方向是花剌子模，西部是巴格达哈里发，西北方是塞尔柱突厥人。他们利用他们家园的崎岖地形保护自己免遭吞并。虽然他们没有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但他们在山上建造了一系列似乎坚不可摧的堡垒。

为了与巴格达哈里发结盟对付花剌子模国王，哈桑三世已经放弃他的什叶派信仰，并宣布效忠逊尼派。他的追随者们接受了这种突然的变动，解释说是因为神自己不断变化的特性，但他们也知道，这可能只是一个政治策略，并没有什么神学意义。在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传统中，这种诡计总是让他们引以为傲。他们盲目追随他们的领袖，从不质疑和怀疑，也不后悔。

尼扎里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力很大，全都是因为他们巧妙而有

效地使用暗杀和恐怖手段。他们无法战胜战场上的军队，于是便对敌人的领袖采用特殊的外科手术般的打击。为达到此目的，尼扎里派组建了一支受过专门训练的敢死队，这些人愿意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牺牲自己。1307年，一位亚美尼亚史家在《东方史精华》一书中写道："这些人没有信仰，无法无天。这些人没有任何信念或信仰，他们只信他们的主伊玛目，即所谓的山中老人教给他们的那样；而他们都那么服从于他们的主，只要他吩咐，他们情愿赴死。" [3]

这些敢死队成员都要接受训练，掌握他们邻邦的语言，理解其文化和服饰，还要学会伪装与隐身术。然后，他们被派去渗透进敌人的核心圈子，按照需要逐步有条不紊地进行，直到他们能很好地执行其任务为止。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作为间谍采取行动，但是当需要时，他们随时准备发动袭击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或者个人单独行动，或者以小组形式行动，这样如果一个人失败了，另一个便能迅速取代他的位置。

他们的目标大多是其他穆斯林，特别是塞尔柱突厥人，但他们也刺杀过著名的十字军将领，比如的黎波里的雷蒙德二世和蒙费拉的康拉德等。他们也试图刺杀法国的腓力二世和路易九世以及英格兰的爱德华二世，但并没有成功。 [346] 有些被指为尼扎里派的谋杀行动很可能是更接近于受害者的对手干的，只不过嫁祸于尼扎里派。一些所谓的刺杀未遂案件可能是返回欧洲的十字军添油加醋编造的战争故事，这些人热衷于讲述自己的辉煌战绩和濒死体验。

即使是未遂的暗杀也能散布恐怖。在12世纪，敢死队施巧计渗透进了伟大的库尔德将军萨拉丁的核心圈子。这位将军曾是埃及、也门和叙利亚的阿尤布苏丹。他们设法来到他的私人住处，试图刺杀他，但两次行动都失败了。有一个流传的故事说，那个刺客故意放过了苏丹，当他爬进苏丹的帐篷后，并没有杀苏丹，而是用他的刀把一封警告信钉到苏丹的枕头上。即使是尼扎里派的盟友也对他们的友谊怀有戒心。术外尼写道："一些与他们订有协议条款的国王，无论是前任国王还是当代的统治者，都吓得战战兢兢。" [347]

通常的刺杀都是自杀式袭击，因为刺杀目标的警卫往往要么杀死刺客，要么立即捕获他们，然后把他们折磨至死，但一些刺客设法逃脱并回到了阿拉穆特周围，在那里他们会被安排在世上过上天堂般的幸福生活，这通常意味着充足的毒品和性的供应。正是因为他们用这种方式使用大麻，因此他们得到一个称呼——阿萨辛派(hashshashin)，即吸大麻者。他们究竟吸了多少大麻是值得研究的，但这可能只是他们的敌人对他们的一种侮辱，以便说明他们的思想有多么混乱。无论是否属实，这个词在西方有了新的意义，成了一个现代词"刺客"(Assassin)。

伊玛目哈桑三世的使节与成吉思汗的会面当然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次会面，它也是一次非常秘密的会面。虽然术外尼在他所写的成吉思汗传记中介绍了尼扎里派的悠久历史，包括哈桑三世的传记，但他对伊玛目哈桑与成吉思汗交往的描写却很简略，颇让人感到费解和沮丧。据

他说，伊玛目在会谈开始之前曾给成吉思汗寄过信，但却又说，关于这些信件，“真相并不明确”。 [348] 他暗示成吉思汗亲自会见了哈桑三世，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他只承认可能是当时众所周知的情况：“显而易见的是，当征服世界的皇帝成吉思汗的军队进入伊斯兰教国家时，派遣大使述职并表示效忠的君主是贾拉勒·丁(即哈桑三世)，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奠定了公义的基础。”术外尼用很长的篇幅说明蒙古与这些异端结盟的正确性，强调至少在当时，哈桑三世是与逊尼派妇女结婚并信奉逊尼派信仰的。

无论当时的会面中发生了什么，蒙古人和尼扎里派达成了一项协议，刺客教派和哈里发的部队会站在后面观望，让成吉思汗摧毁他们的敌人。 [349] 尼扎里派不会干扰蒙古人，但他们也没有派出战士与成吉思汗的军队协同作战。他们可以自由地攻击花剌子模，只要他们的攻击不影响蒙古军队的作战就可以。也许最重要的是，在成吉思汗在中亚地区作战期间，尼扎里派占领的所有土地起到了安全区的作用，供逃离蒙古人或花剌子模人的难民避难。尼扎里派的领地成了许多平民的救生走廊，但士兵除外。

成吉思汗和伊玛目之间的协议似乎是出于政治和战略的考虑。在他们结盟时，成吉思汗的重点是征服，而伊玛目已经快接近生命的终点。成吉思汗并不需要尼扎里派军队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能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尼扎里派经营着一个出色的间谍网络，在中亚和地中海地区收集情报。根据史家阿里·伊本·阿尔·阿西儿的说法，尼扎里派的官员会见蒙古大将出马瀚，向他提供情报，鼓励他追击扎兰丁。 [350] 这个联盟在成吉思汗的一生中都很稳固，在他死后十多年里，尼扎里派继续向蒙古人提供情报。 [351] 尼扎里派没有给蒙古人提供士兵或进贡，但在蒙古军队一个接一个征服城市的同时，刺客们有时自发地向花剌子模发动袭击，并让他们的边界保持开放，接纳那些抛弃花剌子模国王的形形色色的难民。

伊斯兰世界的严重分裂给成吉思汗提供了利用宗教对立和宗派斗争进行征服的简单途径。虽然许多穆斯林接受成吉思汗的说法，他是上帝对他们施加的惩罚，但一些神秘的苏菲派声称，实际上是他们向上帝发出了一个神圣的呼求，招来蒙古人摧毁他们在伊斯兰教内部的敌人，并惩罚堕落的王室。根据一种说法，苏菲派的领袖曾亲自引导蒙古勇士进入市区，鼓励他们杀死所有的穆斯林，大喊：“啊，异教徒部落，杀死这些作恶的人。” [352] 相互对立的苏菲教派一再重复引用同一个故事和说法，他们争着邀功说，是自己把蒙古人带到了伊斯兰世界。虽然存在多种说法，但这些记载都是在事实发生很久以后写成的，似乎更多的是虚构的故事，而不是事实。

拉施德丁的说法更加可信，他说，1221年，在对花剌子模首都希瓦发动攻击之前，成吉思汗设法拯救住在希瓦的伟大的苏菲派领袖纳吉姆·奥丁·可不拉和他的门徒。蒙古人把信息绑在箭头上射进城内，鼓励苏菲派逃离。七十位苏菲派弟子逃了出来，但他们的主人太老了，无法逃

离。有人说，这场攻击正是他曾经向上帝祈求的。这位年迈的苏菲派大师拒绝了成吉思汗的邀请，不愿放弃这座城市，他回答道，七十多年来，他经历过“苦难的岁月，也经历过甜蜜的时光”，现在从家中逃走会显得缺乏“男人的操守和雅量”。据说他这样回答：“我将从你那里得到圣战和殉难的祝福，而你将从我们这里获得伊斯兰的祝福。”他相信蒙古人在净化伊斯兰教后最终将皈依伊斯兰教。 [353]

拉施德丁告诉我们，这个城市投降后，成吉思汗和他的士兵曾寻找这位老苏菲派领袖，他们“找了很久，最后在被杀的人中间发现了他的尸体”。 [354] 他的竞争对手、反蒙古的苏菲派领袖声称对他的死负责，他说他命令成吉思汗杀死他和其他离经叛道的苏菲派领导人，因为他们犯了罪，把真正的信仰传授给不肖弟子，甚至还有狗。 [355]

***

成吉思汗认识到一般的穆斯林都很虔诚，因此他迅速制定了一个有效方法，利用他们对上帝的坚定信心作为打击他们的有力武器。1220年3月，在访问新征服的布哈拉的清真寺后，他召集该城的领袖开会。据术外尼记载，成吉思汗告诉他们：“人们啊，须知你们犯了大罪，而且是你们中间的一些大人物犯下这些罪行。如果你们问我，我说这话有何证明，那我说，这因我是上帝之鞭的缘故。你们如不曾犯下大罪，上帝就不会把我作为惩罚施降给你们。” [356] 他声称，这些被打败的领袖应该负责，因为他们误导了他们的社会，同样，他认为宗教领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和他们的追随者的行为负责。

他召集穆斯林领袖并不是想成为他们的学生或弟子。他是叫他们来接受审判。他自认为是上天在地上的代表，有责任研究被征服者的宗教，以确定他们所犯的错误，并纠正他们的错误。他仔细地审视着那些穆斯林领袖，就像一位商人在检查苹果上的蠕虫或宝石上的瑕疵一样。他的职责是区分善行和恶行，并惩恶扬善，使每个人回归正道。这些人中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蒙古入侵的含义。当一位伊玛目被其追随者问到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时，他回答说：“别出声!这是真主吹动的万能之风，而我们无权发言。” [357]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他会见了自封的神人和智慧之师，他倾听他们、询问他们的做法、审查他们的成就，并测试他们的道德水准。他的探求并不是一位学者悠闲的研究，也不是在偏僻山洞里冥想的隐士的探求，他的探求是一个行动中的男人的探求。战斗正在身边残酷地进行，生与死的决定、战斗引起的肉体和情感的混乱都使他的精神使命更具有紧迫感。在令人窒息的战火硝烟中，他的思想必须坚强而清晰，与众不同，超越濒死之人的哀号之声。

他要用一条金色的缰绳驯服并驾驭迷途的宗教，并引导它们进入他所领导的一个车队。

一头骆驼不能成为一个商队，因此他认为，单独一个宗教也不能引导人类上天堂。他宣称，他的责任就是使“整个伟大的人类都走在法治的道路上，为了获得荣耀和名誉”。[358]

他并不是不信宗教本身，而是不信任控制宗教的人，因为那些人利用他们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上天的旨意。他让做错事的人对此负责，杀掉了一些人，也囚禁了许多人。而对另一些人，如果他们对社会和上天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承诺给予他们自由和经济支持。在他征服的土地上，他鼓励宗教自由，但是无论在何处遇到宗教极端主义，他都会严厉镇压。

在撒马尔罕会见穆斯林学者时，成吉思汗请虔诚的穆斯林不管在何处祈祷时，都记得为他祈祷。他认可穆斯林的大部分做法，赞扬他们致力于祈祷和施舍的行为，但也严厉批评他们，因为“他们随心所欲地吃喝快乐，整夜沉湎于放荡生活”，甚至在神圣的斋月也不知收敛。[359]《古兰经》中可能包含某种正确的信息，但它似乎并不比其他宗教的经书更有效地鼓励好行为。书本并不比它所鼓励的行为更重要。如果穆斯林不遵循自己圣书的命令，蒙古人凭什么要对它感兴趣呢？

他告诉穆斯林，没有必要去清真寺礼拜，或到麦加朝圣，因为上帝是无处不在的。他批评这些做法，但没有禁止他们。他极力劝阻穆斯林断肢惩罚、割礼、让妇女戴面纱或将妇女隔离，就像他讨厌汉人缠足一样；他谴责一些穆斯林的做法是可悲、不洁的，在他看来，他们违反了更高的道德律令。例如，他强烈反对屠宰动物时切开其喉咙，使其失血过多而死亡。在蒙古人眼中，这种做法残忍不洁，而且浪费，因为它污染了空气和土地。同样，在溪流或池塘沐浴就被认为污染了人和动物饮用的宝贵的水。

***

随着战事减缓，一些城市选择投降，蒙古人开始欣赏伊斯兰教的魅力，觉得这种宗教比游牧民族简单的宗教更精致。他们遇到了一个伟大的穆斯林文明，并惊叹于它的美丽。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清真寺像绿松石山拔地而起，地板上装饰着地毯，犹如白色大理石上的诗篇。

在进入布哈拉前，蒙古人不曾见过这样一个社会，宗教当局既行使政治权力，也担任法官，履行国家政府的职能。在佛教王国，统治者作为一个虚拟的神进行统治，但在穆斯林国家，很难确定谁制定法律，究竟是统治者统治宗教，还是相反。这两种政体混合在一起似乎是有问题的。毛拉、伊玛目和阿亚图拉负责执法，实际上掌管了国家权力，并使设立世俗统治者成为一件不必要的事情，而蒙古帝国的原则却相反。

穆斯林立即努力使蒙古人改变信仰，但成吉思汗予以抵制，部分原因是他对伊斯兰教与城市生活的密切联系持怀疑态度。在蒙古人看来，伊斯兰教是一种比较适合工匠、商人和农民的宗教。有一位汗曾这样告

诉试图劝说他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我的勇士中没有理发师、铁匠和裁缝。""如果他们成为穆斯林并遵循伊斯兰教法，他们以什么为生呢？" [360] 蒙古人是游牧民和战士，他们的信仰支撑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些道德讨论记载在神秘的苏菲派穆斯林著作中，但是这些讨论很快就变味了，变成了竭力劝说蒙古人攻击对立的苏菲教派的自利行为。这些故事往往未注明日期，很少透露会议在何处举行，有时甚至连故事的作者也不交代，但从总体来看，它们使我们对讨论的基调和主题有了某种深入的认识。当苏菲派领袖哈贾·阿里被带来见成吉思汗时，这位蒙古领袖获悉，这位圣人的父亲也是一位圣人，"经常把食物分发给人们"。

成吉思汗问："他把食物分给自己的百姓呢，还是分给陌生人呢？"

他的一个门徒回答："每个人都把食物分给自己的百姓，但这个人的父亲把食物分给陌生人。"

成吉思汗说道："那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把食物分给神的子民。"然后他把那个人释放，并赐给那个人一件新斗篷。 [361]

对苏菲教派来说，羊毛斗篷是一种信仰的标志，在一些苏菲教徒看来，这一姿态表明成吉思汗认可他们的宗教习俗。但蒙古人似乎很难把穆斯林和犹太人分开，更难把一派穆斯林跟另一派穆斯林分开。也难怪没有蒙古记录提到成吉思汗与苏菲教派的会见，甚至没提到他是否知道他们，而穆斯林作家却记录了一长串他与苏菲派领袖及其弟子的这种会见。

虽然很少有证据支持苏菲教派记录的所谓的会面，但苏菲派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的确比较兴旺。最初的蒙古入侵曾把成千上万的苏菲派教徒送去流放，如伟大的诗人贾拉勒丁·鲁米的家人，而他们也因此把自己独特的崇拜方式向西传播，带到了土耳其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这些难民当然没有理由赞美蒙古人，但蒙古的宗教宽容政策给了苏菲教徒传教的自由并使之得以蓬勃发展。

苏菲派经常宣称成吉思汗是他们自己人。一个苏菲派记载描述成吉思汗在他上台掌权之前是一个苦行者，说他"离开他的家族和部落，住在山上"。根据埃及百科全书编撰者奥·奴外里的说法，这个故事似乎反映了成吉思汗早年在不儿罕山的经历。而在苏菲派的版本中，他的声名远播，人们"踏上朝圣之旅来见他，而他也愿意跟他们说话"。他"不属于任何宗教组织"，但当人们来到他跟前时，"他暗示他们用双手鼓掌。当他跳舞时，他们高呼：'啊真主，啊真主，他真好!'他们这样为他打拍子，而他跳舞"。 [362] 苏菲派经常利用非常规手段与神契合，歌唱、吟诵、旋转或跳舞，常伴有击鼓、拍手、脚踏地板打节拍。这种催眠仪式常常使参与者进入实际上的恍惚状态，就像草原上的萨满一样。

有一种类型的苏菲派，称为唯信仰论者，反对遵从道德律令。他们违背社会规范，穿着奇装异服，有时甚至几乎全裸。百折不挠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报道，他们“手上、脖子上、耳朵上戴着铁环，甚至生殖器上也戴着铁环，以便无法发生性关系”。 [363] 他们怪异的行为有点类似于可以裸坐雪地而不会冻伤，或坐在熊熊大火中而不被烧死的突厥萨满和蒙古萨满。

然而，成吉思汗显然并没有太注意到苏菲派。他不需要更多的萨满，他寻求有实用技能的人。他发现受过比较传统训练的穆斯林神职人员拥有这些技能，他们可以读写用特殊文字书写的外语、统计数字、编纂记录、同声翻译等，而且一般来说已经掌握了官僚的技能。他选拔他们中最优秀者来为扩张中的蒙古帝国提供文书服务。穆斯林学者既会哲学和神学，也懂得实际事务，例如如何设计建筑物、建造灌溉系统、挖井、移植树木、饲养动物、做染料、铸造金属，以及处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其他问题等。

蒙古人执意要对帝国境内一切人和事进行普查，因此他们需要会计师，而穆斯林处理数字的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们遇到的所有人中，穆斯林的数学水平是最高的。成吉思汗要把他的帝国按照十进位制进行组织，因此他需要具备扎实的数学技能的职员为他计算，把十合并成百，把百合并成千，再把千合并成万。他需要的是手指能熟练打算盘的人，而不是捻念珠的人。他找到了在诗歌、书法和礼仪教育方面训练有素并熟悉宫廷政治技巧的汉人官僚阶级，但他们不能像穆斯林职员那样做算术。佛教学者侧重于仪式和冥想，并在关于词义的无休止的讨论中迷失了。相比之下，穆斯林学者具备更多实用技能。在征服花剌子模之后，蒙古人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穆斯林行政官员阶层，把他们派遣到中国来帮助管理那里新征服的领土。

尽管穆斯林作为文员很有用，但成吉思汗为了限制任何单一宗教的潜在影响，雇用了不同教派和民族的竞争对手，并使他们的职责交叉重叠。所雇用的人群包括犹太人和基督徒，以及大量来自总是争吵不休的团体的穆斯林。他强迫逊尼派、什叶派、琐罗亚斯德派和苏菲教派在一起工作。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掌握太大权力。他们的个人仇恨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他们往往压抑对蒙古人所持的负面态度。

***

1220年底，蒙古人一路追击花剌子模国王，把他赶到里海的一个荒凉的小岛上，他死在那里。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扎兰丁·芒古波尔蒂现在成了正在崩溃的花剌子模帝国名义上的也是最后的统治者，他渴望战斗并捍卫王朝的荣誉。尽管他拥有王和苏丹的高贵头衔，但他统治的地盘只是他正在萎缩的军队所能控制的土地。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城市，逃到阿富汗山区，希望能在印度为他的军队和家人找到避难所。

在摧毁花剌子模之后，成吉思汗派军队穿过伊朗，进入高加索山脉，占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并攻击俄罗斯南部。然后他自己前往阿富汗追击扎兰丁。他希望在到达印度之前就能把扎兰丁杀死，并在那里找到新的盟友。

在此后的三年里，成吉思汗的军队四处出击，从喜马拉雅山到乌拉尔山脉，从太平洋到黑海，从遥远的中国黄河流域到乌克兰第聂伯河畔，直到印度境内的印度河，蒙古人征服战争中最血腥的一页就此翻开。堡垒和城市崩溃了，军队灰飞烟灭，教堂、寺庙成为废墟。世界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同样具有毁灭性的暴力情节，但却从来没有在如此广大的地理范围内同时发生过。

不同宗教背景的人用不同的语言撰写的历史记述了同样令人震惊的血腥和毁灭。蒙古人于1223年春季在加尔加战役中击败俄罗斯后，我们可以在《诺夫哥罗德纪事》中听到作者的痛苦哭喊："因此，因为我们的罪，神把争端放到我们当中，不计其数的人死去了，整个城镇和村庄，到处有哀悼、痛哭、悲伤……鞑靼人从第聂伯河转身而去，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又躲在哪里，上帝知道一切，因为我们的罪，他把他们派来惩罚我们。" [364]

第十一章 命运的拇指

成吉思汗从不怀疑自己肩负的使命，坚信他有权决定地球上所有民族的生死。他的征服是严厉而残酷的，但残酷和野蛮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虽然他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思考了超出他的时代和环境的很多事情，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对杀死那么多人感到后悔过，或质疑过他的征服是否具有崇高的道德性。在他看来，在战争中死去的人都完成了上天赋予他们的使命，意味着他们应该死。杀死他们，他只是按照上天的意愿，履行他自己的使命而已。

自从在1209年开始的针对西夏的第一场征服战争，成吉思汗不曾输过一场战斗。他轻而易举迅速征服了花剌子模的城市，此战之轻松快速远超他的预期。在他身后是一系列成功的完整记录，他在1220年夏季养肥了马，前往阿富汗，几乎是以悠闲的方式追击花剌子模的新苏丹扎兰丁。他不喜欢中亚低洼地区的酷热，阿富汗高地让这位上了年纪的武士得到了难得的休息，而他的儿子、女婿、孙子和一个女儿正带领部队在炎热地区作战。

当成吉思汗接近六十岁时，他发现，管理他不断扩大的家庭占去了他更多的时间，选择他的继承人并培养其成为帝国未来领袖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正如《蒙古秘史》所记载的："身有首，衣有领则撒因也。"[4] [365] 英勇尚武是好的，但必须经过理智的调和。不幸的是，他没有看到他已届中年的儿子们变得更聪明或更有能力。他们太贪图享受了，当父亲离开，把他们留下善后时，他们便会为了唾手可得的财富彼此争来争去。成吉思汗开始担心，他的后代可能是太懒了，"裹以藏草，不得为牛食"。[366] 一个问题困扰着他，这是任何一个父母都不想问也不愿回答的可怕问题。他问道："如此不肖者则奈何？"[367] 但是没有人敢回答。

在中国作战时，他派他的儿子们独立率军出征，但由他做总指挥，随时准备在需要时派遣增援部队，或在关键时刻召回他们。在穆斯林的土地上，他的部队已经遍布辽阔的领土。他的军队的战线从印度河流域(今巴基斯坦)延伸到俄罗斯南部的伏尔加。在这些遥远的国度，他的儿子们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自己下令，当他们见不到自己的父亲时，他们不得不彼此协调，他们也不得不做出独立的决定。虽然年长的儿子们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但当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很快将会继承什么时，他们童年时期的争斗和问题经常浮出水面，而且似乎更加恶化了。

他的成年子孙大都分散到中亚各地，有的与他在一起，有的两人成对，也有的独自行动，这给了成吉思汗在战场上测试他们的机会。就像一只老狼教小狼学会捕猎一般，他教他们战略战术和激励将士士气的方法。他向他的儿子们解释何为善政的训词，描述美好生活的本质。但他不是简单地发布命令或诏书，他鼓励他们提问题，可以不同意他的看

法，以便发现更好的方法。

亚美尼亚历史学家乞剌可思总结了他几个儿子之间的差异。他引述成吉思汗对他的儿子察合台的描述：“他是一个好战的武士，但他天性里有过分的骄傲。”他描述将成为继承人的窝阔台：“他从童年开始就很谦和，充满了美德，乐善好施，从他出生的时候开始，我的荣耀和伟大与日俱增。”另一个没提名的儿子，要么是术赤，要么是拖雷，成吉思汗形容他“战无不胜，但很吝啬”。[368]

术赤的血缘一直是个问题。他的兄弟们不想让他继承汗位，因为他们的母亲嫁给篾儿乞部的赤勒格后已经怀孕了。然而，在家庭内部孤立术赤只会加剧年轻儿子之间对未来遗产的争夺。他们曾对如何征服希瓦以及征服之后谁将拥有它争吵不休。他们的父亲对此感到愤怒和厌恶，于是把他们召到阿富汗。他起初拒绝跟他们说话，但最终心软了，作出努力，用更恰当的方式指导他们。但根据《蒙古黄金史》的记载，在一次会话中，他的长子反对他父亲的教训。术赤对无聊的政府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不感兴趣。他渴望征服，而不仅仅是统治。他粗鲁地告诉父亲：“我本来希望你能告诉我前往那些还没人到过的地方，把那些尚未征服的百姓据为己有。”他宣称，他要向他的父亲和蒙古民族尽的首要义务是扩张帝国的疆域，而不仅仅是统治已经被打败的民族和他们已遭洗劫的城市。他抱怨道：“但看来你在指导我统治完全顺服的百姓。”他表示，统治一个已征服的国家无异于“吃已经做好的食物”，他对此不予考虑。

成吉思汗告诉儿子，如果他是这样的态度，“你不会强大”。他详细地解释了烹制被术赤如此轻蔑地拒绝的“做好的食物”有多么困难。首席厨师必须准备好不同的食材，确保配料和菜肴都能在适当的时候准备好，并做出足够的分量供每个人享用。他必须提防毒药或其他危险，与此同时还要进行社交活动，玩得开心，并鼓励他的客人们也尽情享受。[369]

他解释说，在战斗中的成功至关重要，但并不足以建立一个帝国。战士也必须知道如何用言语发现智慧并进行有效的治理。如果胜利者不能控制他的新国家，那么赢得这场战争是徒劳的。他告诉他的儿子：“你将统治广大的土地，但一个统治者必须比他的臣民更讲纪律，关键是要用头脑征服身体。”他告诉他的追随者：体力坚强，只能战胜独夫；意志坚强，才能战胜万众。“如果你想要在我之前或之后都征服，那么在征服了身体之后，你还要征服灵魂。如果你控制了灵魂，身体还能去哪里呢？”[5]

在年轻时，成吉思汗致力于战事，因此曾经分心，并没有完全集中精力培养他的儿子，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越来越成熟，变成了充满爱心、懂得关心别人的祖父。当他发现他人到中年的儿子桀骜不驯固执己见时，他在与他孙子的交往中发现了更大的乐趣，与他们相处他觉得更轻松，他尤其喜爱他的孙子——察合台汗和妻子也速伦哈敦所生的长

子莫图根。虽然成吉思汗派遣他的儿子到偏远的前线，但他在战争中把莫图根留在身边，不打仗时和莫图根一起狩猎。他喜欢莫图根陪伴自己，而他在自己的父亲、兄弟或儿子陪伴时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成吉思汗“温柔地爱他，因为他发现在莫图根身上有良好品格的所有特质”。[370] 莫图根是他年老时的喜悦。

莫图根总是渴望战斗，激情四射，深受他的士兵热爱。在他还不到二十岁时，就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战场上的英雄。妇女很崇拜他，他也经常给她们机会来表达对他的爱，因此他除了与自己的妻子生过孩子外，还和其他妇女(包括他战友的妻子)生过孩子。有一次，他被一个随从人员的妻子迷住了。“他把她带到一个角落里，并且与她交合。当他得知她可能会怀孕时，便命令她和她的丈夫分开。碰巧她确实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不里。然后她被送还给她的丈夫”。[371]

尽管莫图根生性好色放荡，传出很多绯闻，但他的祖父还是很爱他。也许他在莫图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如果他出生时家庭条件更好的话，他或许也会如此。他不会去捉地老鼠，或与他的兄弟争夺一条鱼，他本来可以成为深受祖父青睐和溺爱的王子，尽情享受生活。在他眼中，莫图根就像正午的星星一样罕见。莫图根“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他精致的白脸，他黑白分明的清澈的眼睛溢满了春水般的泪水，举手投足极尽优雅，就像另一个男人的妻子”。[372] 他总是一马当先，故从未尝过尘沙。[373]

成吉思汗在他孙子身上看到了他儿子所没有的特质，因此他特别注重对莫图根的军事训练，似乎是要培养其将来有一天成为大汗。在追杀扎兰丁的阿富汗战役中，他把他的孙子带在身边陪伴。他们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一连串的城市，但扎兰丁躲过了他们的追杀。1221年初，成吉思汗派遣莫图根前往阿富汗中部山区的巴米扬，那是一条干燥寒冷的山谷。七个多世纪前，这里曾居住过数千名佛教僧侣，大多数人住在山洞里，并在山洞里画满了绘画。僧侣们在悬崖峭壁上雕刻俯瞰山谷的巨大雕像，俯视着那些生活在它们阴影下的芸芸众生。这个地方有着朴素的美、悠久的历史和生机勃勃的文化。而对莫图根来说，这里也是一个出击的好地方，他可以开始实践祖父亲自教他的有关领导艺术的功课。

***

一开始，在阿富汗城市进行的战役比在平原的战争更加平和。拖雷耐心地围困赫拉特，这座城由国王派来保护整个地区的军队重兵把守。成吉思汗像在中国那样，吩咐他的军人寻找睿智的宗教领袖，以便他们可以为蒙古人服务或启发他们。在围困赫拉特城期间，一位受人尊敬但笨拙的伊玛目——卡子·瓦希德丁，从城墙上摔了下来，并被直接拖进蒙古军营。战士们把他送给拖雷，然后又送给大汗，成吉思汗发现这个俘虏是一位宗教学者，于是和他就伊斯兰教和道德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此人后来回忆道：“在服务于成吉思汗期间，我很蒙恩。我一直守在他的门口服侍，而他不断询问我有关先知的经外传说。”成吉思汗问这位

伊玛目，先知穆罕默德是否曾经预言到他和蒙古人的到来。这位伊玛目回答道，先知曾经预言“突厥人入侵”，然后伊玛目批评蒙古领袖杀害穆斯林，并警告他，如果没有人幸存下来，就不会有人记得他，讲述他的故事。

成吉思汗对此嗤之以鼻，并自信地告诉他：“世界上其他地区存留的人和其他王国的君主将会讲述我的经历。”他厌倦了他的新客人，便把这位伊玛目打发回家。[374]

同时，尽管赫拉特的防御工事似乎坚不可摧，但城内的居民决定站在蒙古人一边，他们偷偷打开了城门，迎接入侵者。他们厌倦了花剌子模皇室的朝令夕改和暴政，尽管扎兰丁是一位穆斯林同胞，但对他们来说，他几乎是和蒙古人一样的异族人。蒙古人会解放他们，他们只需要付出极小的代价，因此他们已经没有动力去捍卫扎兰丁了。蒙古人屠杀了士兵，但赫拉特的居民幸免于难。

扎兰丁仍在遥远的东方，并且在为战争作准备。这位新登基的苏丹曾设法在阿富汗各部落找到盟友，并招募土库曼、康里和其他突厥群体来到他的麾下。他从自己父亲危在旦夕的首都希瓦逃离后，一路来到阿富汗的群山中。在加兹尼，他与康里城的总督结盟，并娶了总督的女儿。他的岳父带来五万异教的康里新兵加入抗击蒙古人的行列。穆斯林的哈拉吉部落的首领也带来四万军人，此外还有当地的许多古里士兵，他们渴望胜利和战利品，他们知道击败满载宝藏的蒙古军队就会发大财。

扎兰丁把临时总部设在阿富汗东部的加兹尼，靠近现代巴基斯坦的边界。此地海拔七千英尺以上，周围是兴都库什山脉，加兹尼的气候非常严酷。酷爱旅行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造访此地，他写道：“此地气候极其寒冷，居民在寒冷季节移往距此地三夜路程、大而繁荣的坎大哈镇居住。”[375] 扎兰丁在1220年至1221年之交的冬天就在加兹尼居住，计划对蒙古人发动一次反击，解放他失去的王国，并把成吉思汗打回他的草原老家去。术外尼写道：“他的境况现在是蓄势待发，他有一支大军和部属听他指挥。”然后，在1221年初，当初春来临百花开始吐艳时，他向前进军到八鲁湾，准备抗击成吉思汗的战役。[376]

蒙古人不会等待扎兰丁来攻击。成吉思汗总是先发制人，掌握主动权。当他听到扎兰丁如何改善了自己的情况并恢复了秩序时，便决定在他的猎物变得强大之前立即发起攻击。他的儿子都在遥远的地方作战，于是他派他的义弟失吉忽秃忽前往，这是唯一一次他没有派自己的直系亲属去作战。失吉忽秃忽是一个塔塔儿部孤儿。与塔塔儿人作战时，成吉思汗在一个废弃的营地发现了他，把他交给了自己的母亲收养。失吉忽秃忽现在是这个家庭中最有学问的人，他是大断事官，能熟练书写畏兀儿字，负责收取进贡，但他并没有获得武士的美誉。然而，成吉思汗也在训练他带军打仗，于是让他统率三万人去对阵扎兰丁。这个选择似乎是合理的，花剌子模军队在面对蒙古人进攻时总是一触即溃。在成吉

思汗看来，尽管扎兰丁有了一个新头衔，但不过是一个亡命之徒罢了。

他派出两名经验丰富的官员陪同失吉忽秃忽作战，但他们似乎对自己承担的任务并不是很认真。失吉忽秃忽后来向成吉思汗抱怨说，他们“不停地开玩笑，漫不经心”，并说“那些以诙谐、恶作剧和扮小丑而闻名的人自认为是英雄，但当需要勇气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一事无成，只会惹麻烦”。根据拉施德丁的说法，他称他们为“小丑”。[377] 事实证明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对抗中毫无帮助。

扎兰丁的军队人数是他的两倍，但失吉忽秃忽深谙蒙古战略战术，似乎急于应用它们。他到了八鲁湾，这里是一条狭窄的山谷，让蒙古人非常不习惯，很局促，难以腾挪。他下令直接对扎兰丁的中军发起攻击。他的战士对中军施加了巨大压力，但尽管蒙古人最初取得了一些进展，扎兰丁的部队还是加强了两翼，并击退了这次攻击。一天下来，未决出胜负，两军扎营过夜。

失吉忽秃忽决定用成吉思汗曾多次用过的行之有效的老骗术。因为蒙古人在作战时总是有大量的备用马，他命令士兵用毛毡制作假人，放到无人骑的备用马背上。第二天早上，蒙古人骑马奔回战场，看上去似乎是来了大批增援部队。扎兰丁识破了这个把戏，命令他的军队站稳脚跟，并再次击退了蒙古人的进攻。

最后，失吉忽秃忽试图采用蒙古战术中的另一个老伎俩。他下令攻击，然后佯装败退，试图引诱敌人出来，并击溃他们。扎兰丁的部下追击逃跑的蒙古人，蒙古人把他们引诱到远离他们据点的地方，突然转身反击已经分散且队列不整的敌军。蒙古人很快杀死了大约五百个敌人，但扎兰丁已准备反击。“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算端(苏丹)像草原雄狮或怒海巨兽那样驰骋”。[378] 他拼尽全力击败了蒙古人。拉施德丁写道：“在该地区的草原上到处坑坑洼洼，所以，很多蒙古战士从他们的马背上被甩下来。”但苏丹的马似乎能够更灵巧地穿过这种地形。[379] 成吉思汗的军队首次遭受重大挫败，这种失败直到四十年后才重演。四十年后，埃及的马穆鲁克军队在艾因贾鲁，即今天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和叙利亚边界的歌利亚泉，也曾取得过类似的胜利。

失吉忽秃忽与他的大多数部下逃脱了，但扎兰丁捕获了许多逃跑的蒙古人。蒙古人终于有了一个可怕的敌人，似乎像他的对手一样决心取胜。扎兰丁既勇敢又足智多谋，但他无法控制名义上归他指挥的军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他的臣民，反而觉得自己是他的救命恩人，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要恢复花剌子模帝国，而是掠夺蒙古人的财富。他的一些穆斯林盟友鄙视这些异教徒，虽然不得不和他们并肩作战，但认为他们并不比蒙古人好到哪里去。他们发疯似的捕捉蒙古马，窃取蒙古人从陷落的城市掠夺的赃物，并很快开始相互争斗。扎兰丁的岳父负责指挥康里部落异教徒组成的右翼，他因与左翼的穆斯林指挥官争夺一匹名马，用鞭子打中了对方的头部，胜利开始转向混乱。

成吉思汗和他的部队从来没有折磨过他们的敌人。他们可以迅速施行惩罚，使一个又一个城市变成瓦砾，但他们永远不会制造不必要的痛苦。与此相反，扎兰丁下令对蒙古人施以最残忍的处决方式。他知道蒙古人害怕失去他们的灵魂，如果在死亡的那一刻自己的鲜血流在地上，他们的灵魂就失去了。他们宁愿被勒死、窒息而死或被任何其他方式杀死，只要把他们的血液和其他承载灵魂的液体留在体内，寄存不朽灵魂的头部完好无损就好。扎兰丁把俘虏一个接一个拉出来，命令他的士兵用铁钉或木楔钉进他们的头，让他们慢慢流血而死，他们的灵魂也随之流出，流进沙土里消失无踪。

取得这次胜利后不久，扎兰丁逃往印度。起初，成吉思汗忙于治理他的帝国，因而没有去追击扎兰丁，但他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蒙古人的失败。他带着失吉忽秃忽和部分士兵前往战场视察。他们向成吉思汗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最后，成吉思汗没有惩罚失吉忽秃忽，只是向他解释说，他犯了策略上的错误，一开始就不应该在难以撤出或逃生的狭窄的山谷作战。接着，成吉思汗给失吉忽秃忽分配了更适合他发挥的工作，派他去加兹尼，在1221年下半年进行战败后的人口普查，他奉命负责把挑选的工匠和掠物运往蒙古。

***

蒙古人被扎兰丁的军队击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前花剌子模帝国。虽然与过去两年他们自己的失败相比，蒙古军队的这次失败微不足道，但他们深受鼓舞，因为这终于证明野蛮人也是有软肋的。尽管只是一小股蒙古军队被击败，然后幸存者又被杀死，但这暴露了蒙古人的弱点。消息由难民和商人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那些仍然坚持抵抗蒙古人的人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而很多之前投降的人现在反叛了。他们杀害蒙古人安插在当地的官员。即使他们是穆斯林，是他们的突厥同胞，或者波斯人，也一并杀害。被征服的花剌子模人抓住每个机会抵抗蒙古人，洗劫他们装满掠物的大车。

蒙古军队从来没有分散到如此广大的地域上，他们周围的城市人口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数。从这一点上说，协调一致的叛乱或有组织的军队是可以打败他们的。成吉思汗迅猛地镇压了起义，以免形成有组织的反抗运动。

以财富和学问闻名于世的巴尔赫城起来反抗，这里曾是嫁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公主罗克萨娜的故乡。术兹札尼告诉我们，之后“剩下的一些人，在整整一年时间里，不得不吃狗肉、猫肉和人肉维持生命，因为成吉思汗的部队出于这个原因已烧掉所有的商店、谷仓和粮仓，连一粒玉米也没有留下，任何耕作都没有了”。[380] 大约五万人被杀，但也有许多家庭逃难避祸，其中一家就是最伟大的波斯诗人和神秘主义者——扎兰丁·穆罕默德·巴尔希(在西方通常称之为鲁米)。他一生花了很多时间逃避蒙古人，从你沙不尔到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最后定居在现代土耳其的科尼亚，在那里他成了一名著名的学者和苏菲派老师。

鲁米以其精神上的慷慨大度和深刻的灵性闻名于世，尽管蒙古人给他带来了诸多苦难，但他似乎坦然接受了这种苦难，并几乎原谅了蒙古人。他能在所发生的一切中发现美好，因此似乎很欣赏被迫逃离家园作为难民所经历的动荡生活。

哦，如果一棵树能用足漫游，用翅膀飞翔!

它将不会遭受斧头的砍削和锯子的创伤! [381]

***

1221年，在雕刻有巨大佛像的美丽的巴米扬山谷，一支由“命运的拇指”发出的利箭射中了莫图根。 [382] 穆斯林史家写道，由于莫图根深受他祖父的喜爱，而巴米扬穆斯林的顽强抵抗让他又气又急，因此“他把自己暴露在最大的危险之下”。 [383] 根据一个说法，“这位年轻的王子死在他祖父的脚前”。但他的死不太可能那么富有戏剧性，像很多其他的士兵一样，他只是在毫无意义的残酷战斗中被杀而已。

成吉思汗惊呆了。他一生都在鏖战，但从没有失去一个儿子、妻子或女儿，也从来没有失去一位将军。在他成年的生活中，他身边的每个人似乎都享受到了保护他的上天同样的祝福。他已经取得空前的成功，攫取了空前的权力，在这个时刻，命运怎么能夺走他最可爱的亲人呢？他再也不能与他的孙子策马并行，闻到孙子的气味，听到孙子的笑声了，再也看不见孙子在战斗中熠熠闪亮的眼睛了。在成吉思汗一生的战斗、追逐和逃亡中，他曾忍受过可怕的饥饿、火烧似的冻疮、锐利的箭、毁灭性的棒击和锋利的刀剑，但他也明显知道，人生最大的痛苦就在于看到所爱的人深陷痛苦却无能为力。他曾追求的目标、他曾追逐的梦想、他曾怀有的希望开始消散，犹如雪花飘落、被火融化。他满饮忧伤之杯，淹没在哀痛之中。

他开始担心他全家都面临危险，而他的帝国可能毫无前途。他一生的奋斗可能突然被一支命运的箭头击碎。成吉思汗不相信一些哲学家的说法，痛苦和快乐是简单的幻觉，而痛苦可以借着冥想、同情、牺牲或克制得到舒缓。从他一生的经验中，他知道，虽然快乐总是转瞬即逝，但痛苦却总是残酷地从天而降，没完没了。人类无法拒绝痛苦，就像他们无法拒绝风、雨或冰雹一样。在童年时代，他看到了周围的那些人在痛苦中挣扎并死去，但当他成为一个男人后，他学会了如何把这种痛苦从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身上转嫁给他人。他成了加害者，而不再是受害者，从而征服了史上最大的帝国。

在他的成年生活中，他精心筹划的进攻策略曾保护了他的家庭和国家，但现在痛苦突然汹涌而来。他不再是一个伟大的征服者，他只不过是个不幸的受害者。伏尔泰曾引用成吉思汗的话说，“命运战胜一切”。 [384] 无论他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他都明白这种痛苦的真实性。莫图根的死所威胁的不只是他为他的帝国制定的计划，也威胁着他最深的精神

核心。如果上天真的赐福给他，给了他这么多的成功，为什么要夺走他的爱孙呢？为什么他的命运让他在巴米扬的悬崖边上遭受这么大的失败呢？

命运决定了死亡的时刻，但他重申自己的意志，把他内心的悲伤转化为对世界的报复。他禁止了哀悼，按照蒙古传统，人们不能提说阵亡者的名字，但他更进一步，禁止任何人提及莫图根的死亡，以免敌人知道皇室成员的死讯。甚至后来撰写帝国历史的蒙古史家也拒绝提到莫图根的死亡或随后的复仇行动，所以我们必须依赖穆斯林的观察家才能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成吉思汗命令，蒙古人不许哭号，即使莫图根的父亲也不许哭泣。成吉思汗不会让他儿子流下一滴泪，也不许他哀悼。相反，他让本地人在恐怖中号啕大哭，在痛苦中大声尖叫，徒劳地乞求永远得不到的怜悯。成吉思汗把他灵魂中巨大的痛苦淹没在他人所遭受的苦难之中。术外尼这样解释，他“向左右、东西遣师，把它全部征服”。“刹那间，一个遍地富庶的世界变得荒芜，土地成为一片不毛之地，活人多已死亡，他们的皮骨化为黄土”。因此，“俊杰被贱视，身罗毁灭之灾”。 [385]

他“下令，所有生物，从人到野兽，都要杀死，不留活口，不要任何俘虏，即使是在母胎中的孩子也不能幸免”。 [6] 他的部队摧毁了一个又一个城市。拖雷匆匆赶往梅尔夫，镇压那里的叛乱，该城的难民人满为患。他把城里所有居民杀尽。拖雷曾以慈悲怜悯的态度对待赫拉特，但这个城市也叛乱了，派去恢复秩序的将军也如法炮制，杀死所有人。蒙古人挥刀进入一个又一个城镇，身后只留下灰烬。

亚美尼亚历史学家乞剌可思写道：“满目凄凉，死去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的尸体彼此横陈，像一堆粗糙的石头，有老人、年轻人、儿童和青少年，还有很多处女。”在整个平原上，“土地饱饮伤者的血脂，曾经用肥皂清洗的柔软的身躯又黑又肿地躺在地上。那些没逃出城的人赤脚被掳走了”。没什么好说的了，“一切都结束了”。 [386]

蒙古人精心选定当地的贵族，这些贵族的祖先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就在此地统治。他们把难民赶到了印度和波斯。尹湛纳希写道：“在那些日子里，蒙古人认为战争是欢乐和美丽的。” [387] 他们征服了每个奋起反抗的城市，把它们付之一炬，并把居民杀光。没有反叛分子可以活下来再对成吉思汗构成威胁。

在夏末，仍在为失去爱孙而痛苦不已的成吉思汗向前进军，继续追杀扎兰丁的行动。医治痛苦的唯一办法是让别人遭受更大的伤害。术外尼写道：“因为那个国王是一条想复仇的公龙，一朵象征灾难的云。”成吉思汗“为击败他和报仇雪恨而出兵，像闪电或激流，他心怀愤怒，率领一支多如雨滴的军队”。 [388]

***

他在现代巴基斯坦加拉巴格附近伊斯兰堡西南的申河岸边追上了扎兰丁。扎兰丁已经被两个争吵不休的盟友抛弃，率领着一支不足七百人的军队，正准备乘小船渡河。当他看见蒙古勇士在地平线上出现时，知道自己被困于“水深火热中，这头是申河水，那头是一支像烈火一样的军队”，但他没有投降，“他给复仇之马加鞍，一心要投入这场厮杀”。[389]

成吉思汗军队的包围圈越缩越紧，挤压着四面楚歌的扎兰丁。扎兰丁马上知道他必败无疑。他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叫来，向他们告别，他“心如火焚，目中流泪”。 [390] 然后他采取了一个勇敢的行动，他迫使自己的坐骑从悬崖上跳进汹涌的河水里，游到了对岸。这一行为颇受穆斯林作家的赞扬。在抗击蒙古人的战争中，他们迫切需要这样一位英雄。蒙古弓箭手冲到悬崖边上，向他们追杀的目标射击，但成吉思汗阻止了他们。他允许他们射杀其他逃亡的男子，但命令他们让扎兰丁逃生。

当成吉思汗骑马高高地站在申河岸边，看着他最大的敌人的儿子、唯一在战斗中击败过蒙古人的外国人凫水而去，他在想什么呢？他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在战争中很少表现出柔情，但这个出人意料的怜悯行为并不符合他的为人，也和他在类似情况下的所作所为不一致。在阿富汗各地屠杀了成千上万无辜人民之后，他却让这个人自由逃脱。他正在做的是否正是几十年前他曾希望为他的结义兄弟札木合做的？他给扎兰丁留一条性命作为一个特别的礼物，是否是为了他心爱的孙子所失去的生命？他是否在遵循蒙古狩猎传统，在结束一次成功的狩猎后，总是把一些动物放生？还是这个垂垂老矣的征服者在这鲁莽的一跳中，看到了他希望给予尊敬的某种素质呢？

他默默看着扎兰丁游到印度，用术外尼的话说，直到“像一头怒狮泅过那条大河，安抵对岸”。 [391] 他没有解释自己的行动，但他转向他的儿子。莫图根死后，他把他们召来阿富汗参与狂暴的复仇行动。他严肃地说：“为父者应有这样的儿子。” [392] 成吉思汗没有继续追杀扎兰丁，他从未渡过申河。扎兰丁在印度找到了安全之地，并在随后的几年间继续在整个中亚骚扰蒙古兵，但蒙古人从来没有伤害过他。最后，他死于穆斯林同胞之手——库尔德刺客于1231年将他刺杀。

第十二章 山野来的人

成吉思汗开始感觉到了蒙古人称之为“那桑达拉大卡司”(Nasand daraydax)的事实，即年龄终将战胜身体。

虽然他击败了花剌子模军队拒不投降的最后一位领袖，但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他的军队只战败过一次，但这场失败让他失去了他最爱的孙子。1221年标志着他人生的转折点，远离家乡的他已经累了。他的长子术赤不听他召唤，待在尽可能遥远的地方，他的其他几个儿子继续在互相争吵，好像他们的父亲已经死了，他们已经接管了帝国一样。

他亲眼看到了世界，亲自体验过最好的和最坏的文明，亲身体验过人性的善与恶，他已经攀上权力的巅峰，又沉到绝望的情感深谷，他现在正踏上新的个人精神之旅，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役。他没有转向内心进行哲学思考，或寻求巫术仪式来求得内心的和谐与平静。相反，他的新追求促使他走出自我，超越自己，寻找当时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最著名的精神导师和最聪明的头脑。他非常熟悉自己的精神特点和个人习惯，但他要着手研究其他更正式的有组织的宗教，去寻找某种他不曾拥有的能缓解痛苦的知识和奥秘。他正在进行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探索，他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寻找什么，但他希望找到以后能认识它。

蒙古人喜欢在冬天作战。冬天天寒，战士们和马匹不太容易疲倦，且精力充沛、斗志昂扬。在夏天，酷热会使人马脱水，弓变得疲软，箭就失去杀伤力。在漫长的夏日里，马儿不停地吃草以储存冬季战役所需的能量。男子在白天享受摔跤，狂饮马奶酒，在夜间唱歌。在夏末的夜晚，当炎热的一天过后，成吉思汗有机会坐下来以一种更悠闲自得的方式进行交流。在蒙古人的营地，夏天是玩游戏和谈论哲学的季节。

1222年春季，一个道教学者代表团抵达他位于现代喀布尔附近的兴都库什山脉脚下的营地。几个星期前，巴尔赫刚刚遭到毁灭，成吉思汗两年前召见的中国圣人和他的门徒曾经经过那座城市的废墟。丘处机的一个门徒语焉不详地写道：“其众新叛去，尚闻犬吠。” [393] 当杏花和桃花盛开的时候，这位道士到达蒙古人称之为雪山南麓的蒙古营地。

在经过阿富汗的激战和痛苦之后，花季的景观有助于疗伤止痛。耶律楚材仍然一如既往忠诚地为成吉思汗效力，他写道：“千岩竞秀清人思，万壑争流壮我观。”山上的景色激发创造力，他的思想与此融为一体，“一度思山一度看”。 [394]

道教已经从有关精神和自然力量的民间信仰中脱颖而出，但经过几个世纪，它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哲学，有着得道高人以及精细完备的仪式，也有相互竞争的不同教派，各教派都有自己的大师。道教是中国老百姓的本土宗教，而儒教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所遵循的生活方式。

这两种宗教都源于中国，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摩尼教则是从外国传入的。道教在哲学方面不像儒教那样复杂，没有儒教那样众人皆知，也不像佛教那样玄奥，但蒙古人发现道教崇尚自然、崇拜本地诸灵的信仰似曾相识，而且道教的许多教义与蒙古的传统信仰一致。

成吉思汗早期的汉人盟友中就有一些人是道士。早在12世纪90年代，契丹王室家族的成员已经逃离中国北方加入他的阵营，他们带来了中国的文学和精神文化的优秀知识，其中就包括对道教的热切欣赏。在成吉思汗与王罕的关系跌宕起伏的危险时刻，他们一直忠实于他。 [395] 早年与道士的交往使得成吉思汗激赏他们的忠诚，并认识到他们的价值，因为他们能帮助他赢得中国百姓的支持。

为此，在1219年入侵中亚之前，他召见了当时最著名的圣人、备受尊崇的老道长丘处机领导下的道士。他的子弟称丘处机为山野之人。 [7] 在蒙古人入侵中土前不久，丘处机承担了全真教派的领导责任。全真教，顾名思义，即完全真实或完美的教派，是相互竞争激烈的道教派系之一。在中国社会暴力盛行、道德沦丧的时代，他逐渐以乡间诗人和山野哲人的身份而出名，他远离皇宫的政治内斗和城乡的动荡，以怀旧的语气歌颂淳朴的乡村生活。他的忠实信徒声称他知道长生不老的秘密。

成吉思汗承认他需要良法，也因为这位老圣人“体真履规”，是一个按照“古代君子之肃风”生活的圣人，因此他召丘处机离开家乡，前来提供咨询服务。他写信给丘处机说：“今者聊发朕之微意万一，明于诏章，诚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无不庶，亦岂违众生小愿哉!” [396]

丘处机天生不爱旅行。他最初对这次旅行的主要抱怨是他发现旅伴中还有一批年轻的汉人慰安妇，这些女人被征召去提振在阿富汗和伊朗前线作战的蒙古军队的士气。作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哲人，他担心与这些女人同行会让人说闲话，也可能使他的门徒受到诱惑。他写信给大汗，认为最好“不去看激发欲望之物”。蒙古人满足了他的要求，另外安排一个车队护送他。 [397]

作为中国著名的圣人，丘处机曾见过前金朝皇帝，而最近在北方新登基的金朝皇帝和南方的宋朝皇帝都已传召并邀请他前往他们的宫廷，但他都拒绝了。他认识到蒙古帝国是一个新霸权，将可能取代这两个朝廷，并统一全中国，因此明智地接受了成吉思汗的邀请。当时他没想到，直到三年之后他才能从移动的蒙古总部(他恭敬地称之为“龙庭”)回到家乡。他年事已高，他从这趟长途旅行中很难获得任何个人好处，但他希望大汗能够保证善待他的教派和门徒。

这位圣人的弟子撰写了这次旅程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思维习惯已经定型的老人很难接受他所看到的新鲜事物。无论丘处机遇到的是什么，都只是强化了他早年已经得出的结论，或者和他长期持有的偏见相吻合。他不断发出抱怨，从沙漠中昂贵的小麦价格到崎岖不平的道路，他觉得眼前的一切一无是处。丘处机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在中国北

方的冒险行动，而且在他这样的年龄，他对任何新的或陌生的事物都感到不自在。他对当地气候和景物的观察是一个怠倦的老人做出的平淡无趣的观察，他的评论多出于无聊乏味，而不是出于对周遭的地方、文化、人物或历史的兴趣：山很高，沙漠尘土飞扬，太阳太热，河流太湿，雪太冷，而沼泽里满布邪灵。

这位圣人鸡蛋里面挑骨头，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居然成功地找到了可厌之处。当他翻过一座山，看见一个像彩虹一样的大湖，他却说："令人凛凛生恐惶。"他在白天赋诗，然后交给他的弟子在晚上欣赏。他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得意，因此无论多么琐碎的小事都要记录下来。在前往觐见成吉思汗途中，他在一个湖上把三只雏鹅放生后赋诗一首：

养尔存心欲荐庖，

逢吾善念不为肴。

扁舟送在鲸波里，

会待三秋长六稍。

唯一让这位老圣人感到慰藉的似乎是一路上供应的新鲜水果、酒和柔软的纯棉面料。一天晚上，酒足饭饱之后，一些当地男孩击剑舞蹈，并表演长杆上的平衡技巧，这些娱乐活动让他很高兴。除了大量的抱怨和虚浮的散文外，我们只知道人们怀着兴奋的敬畏之情接待他，被这位大师的虔诚和哲学深深打动，在他离开的时候泪如雨下。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或宗教生活，不过他却很高兴地注意到，外国人见到他的水桶的精巧和优良时有多么惊讶，至于为何如此，没人能解释清楚。 [398]

***

丘处机终于到达蒙古营地的时候，成吉思汗刚刚遭受过人生的痛苦，他最喜爱的孙子死了，他的继承人不断争吵。他对人性和他自己必死的命运日益感到绝望，他希望能找到一些终极的真理或根本性的原则来指导他和他的帝国。像以前的回鹘和突厥领袖一样，他顽固地坚持法律原则、公正权力的理想，而这个原则恰好也是道教教义的核心观念。虽然蒙古人一般把公正权力同国家和可汗联系在一起，但是道家更关心的是个体的精神追求。早期道教学者把中文的"道"翻译成蒙古术语"脱勒"一词。 [399] 他们对道的追求类似于成吉思汗对正确的法律道德原则的追求。

很难想象蒙古营地究竟给这些中原访客留下了什么印象。出于礼貌，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们没有记录任何负面看法，但其他一些作者记下了初进蒙古营地的观感，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用一种既敬畏又蔑视的复杂态度描写蒙古军营的生活："只要有机会，他们便贪得无厌地又吃又喝，但当不可能暴食暴饮时，他们便只满足于温饱而已。他们吃各种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并特别珍视马肉。他们会把马肉切成块加

以烹调，或者不加盐烧烤，然后他们会把肉切成小块，蘸盐水吃。有些人像骆驼一样跪着吃，有些人坐着吃。”亚美尼亚习惯于皇室成员间泾渭分明的等级差别，因而对蒙古人的平等方式感到惊讶。“吃饭的时候，主人和仆人共享同样的饭食”，当喝发酵马奶酒时，“其中一人先拿一只大碗，然后从中取一小杯酒，把酒洒向天空，然后再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洒酒。洒酒者自己喝一些，然后再让贵胄喝”。 [400]

***

有关成吉思汗与这位道教圣人之间哲学讨论的记录比他的任何其他宗教对话记录都要详细。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录分别由两个主要的参与者写成，他们两人都是大约三十岁，都受过很好的中国文史哲教育。丘处机的观点由李志常记录下来，后者是在漫长旅程中陪伴丘处机的十八位弟子之一。 [8] 作为老大师的记录者，李志常出席了与成吉思汗的会见，仔细地听了并记录下了他被翻译成汉语的话。

七年后，即1228年，在成吉思汗和丘处机死后不久，李志常发表了他的《西游记》(请不要与更著名的同名中国小说、关于孙悟空的《西游记》相混淆)。 [401] 但不久之后，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却对这位学者的访问作了截然相反的记录和说明。耶律楚材写了一本有关他在中亚服务蒙古人的回忆录，旨在纠正他所声称的这位道家圣人和他弟子的谎言。 [402] 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李志常的记录是成吉思汗与这位圣人之间讨论的唯一记录，因为耶律楚材的记述从中国的图书馆和档案中消失了，以至于学者开始怀疑，这个记录从不存在。后来在1926年，一位细心的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教授在日本的帝国图书馆发现了一本。

众多宗教学者涌向蒙古汗廷，其中也有大量间谍。有一批佛教僧侣从日本抵达，借口寻求来自中国的宗教稿本，供日本繁荣兴旺的佛教界教育之用。然而，他们却竭尽全力搜集任何有关蒙古汗廷的信息。由于耶律楚材的书既涉及宗教，也谈到了政治，正合乎他们的需要，因此充当间谍的僧侣就带了一本回到日本，这本书在那里受到了重视，也得到了保护。而在中国，由于宗教和政治形势变幻莫测，加上疏于保护等原因，这本书有限的版本逐渐被毁，不传于世。这部书手稿的意外发现，提供了成吉思汗谈话的新的第一手资料，学者可以借此从不同角度比较道教和蒙古人的观点。

耶律楚材是一位具有贵族气质、仪容高雅、学识渊博的学者，他是中国北方被推翻的辽朝皇族的后裔，他以自己的祖先为骄傲。他接受过古典的中国教育，深谙儒家思想，并对失去的往昔充满怀旧的渴望。他相信，历史前进的道路总是回到从前的社会和精神的和谐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成吉思汗攻陷他所居住的金朝首都后不久，他便加入了蒙古阵营，他希望他们能够恢复他的契丹祖先的荣耀。

***

耶律楚材曾热情地支持成吉思汗把这位道教圣人召到蒙古汗廷的决定，但他很快便对这一决定感到后悔了。当他见到这位享有崇高声誉的老人时，他发现丘处机让人感到厌恶。“予与丘公，友其身也，不友其心也；许其诗也，非许其理也。奏对之际，虽见瑕疵，以彼我之教异……故心非而窃笑之。”但他当时并没有提出这种批评。“若攻之则成是非。”[403] 他解释说，并为自己辩护。他认为丘处机不只是宗教的离经叛道者，而且是一个贪婪之人、一位伪装成圣人的物欲横流的伪君子。总之，丘处机是个骗子。

蒙古人对道教代表团十分恭敬，至于他们的反应，耶律楚材的记载和道教的记载有显著差异。成吉思汗没有直接驳斥这位德高望重的智者，而是轻轻地逗弄他，并漫不经心地和他开玩笑，以至于这位圣人产生了误解，而他的门徒对此只字不提。[404] 他召见这位圣人，是为了使他的帝国“享祚长久”，[9] 并寻求这位圣人的智慧来建立一个有效率和有道德的政府，但这位圣人很快承认，“战事与理政，非吾所能也”。[405]

成吉思汗关心不朽的问题，但正如他在许多场合表明的那样，他所关心的是他的帝国的不朽和他的家世的生存，而不是他必死的身体。另一篇蒙古纪事把这位中土圣人的访问直接与统治“众多风俗习惯不同的百姓”的需要联系起来。他希望学到“掌控政府并护持生灵之法”。[406] 他懂得指导游牧生活的规则，也明白武士之道，但是他需要寻求帮助来治理他的帝国中的农业和城市地区。

丘处机和他的教派不懂管理公共事务的实际原则，主要推销通过法术获得长寿之法。这位圣人设法通过身体内部的化学变化延长寿命，用道士炮制的长生不老药代替被禁止的食物，并通过秘密的技术来保护男性体内的精子(妇女似乎不需要也不值得不朽)。道教炼金术士不像医生那样用植物和动物制作药剂，而是用坚硬的不会腐烂的物质制作他们的长生不老药，包括朱砂(红汞)、玉石、珍珠、黄金叶以及其他似乎能存到永远的宝石。如果黄金的灵魂可以使它永远存在而不变色，照此逻辑，吃它的人也可能活得更长久。

为了促进他们这个“制药行业”的发展，道教的医师和圣人散布故事，说道士的灵丹妙药包治百病，让人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年龄。据说有些人，比如丘处机，能够永生不死。丘处机的信徒断言他已经三百多岁了，仍然活蹦乱跳。于是几乎全中国的有钱人都来找他的门徒帮助延长寿命。

***

与重礼节和仪式的大多数皇宫不同，进入成吉思汗的内宫和踏进蒙古牧民的帐篷非常相像。道士们并没有叩头，或跪在他面前，他们只是“倾斜身体，合掌走进他的帐篷”。[407] 道士们感到稀奇，这次与伟大的世界征服者的会面更像是聊天。李志常说：“他们的蒙古主人甚至提供

大碗的马奶酒让他们放松。当圣人抱怨说他不吃肉也不喝马奶时，大汗便招待他猛吃瓜果蔬菜，猛喝葡萄酒。”

蒙古汗廷轻松的不拘一格的气氛使得成吉思汗的客人放松，让他能够对他们的个人品格作出快速而明确的评价。道士们准备好了发言稿，打算讨论他们认为最迫切的哲学问题。在聆听专题演讲之前，成吉思汗问了他们一些最简单的同时也是看似最天真的问题，让他们回答，然后作出判断。他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家庭、出生地等，都不是谦虚礼貌的客套或闲聊。访客如何回答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他对他们的评价。他使用了一个带点欺骗性的简单策略，先用花言巧语的奉承来向客人提出问题，当客人在心中慢慢地品尝赞美的滋味时，舌头便开始不由自主地转动了。

会谈开始，根据李志常的记录，成吉思汗首先对大师不辞辛苦长途跋涉来访表示感谢。成吉思汗告诉圣人，“吾深感荣幸”。然后成吉思汗问丘处机，自己应该如何称呼他，因为丘处机有各种各样的荣誉头衔。这位圣人似乎并不了解他的主人讨厌花哨的头衔。译员用蒙古语翻译他的汉文头衔，说“人们称呼你为腾日蒙哥肯” [408] ，字面上的意思是天上永生的人，类似于不朽的圣人。这个头衔似乎赋予这位圣人某种神性，好像他拥有替神说话的权威，但成吉思汗似乎对这种超自然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以前在蒙古人中只有阔阔出有过这样的头衔，结果他被上天抛弃了。

“是你自己选择了这个名号呢，还是别人送给你的呢？”成吉思汗问。

这位圣人还沉浸在大汗的恭维里，以为这又是一个恭维。他以貌似谦卑的口吻自夸：“我，一介山野隐士，没有给自己取这个名字，是别人给我取的这个名字。”

这位蒙古大汗是在不儿罕山的灌木丛中长大的，也曾和乌果海山人一起生活过，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山野之人，但并没有问这位来自城市的圣人为什么也自称为山野之人。后来成吉思汗派遣一位官员再次去问这位道士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你过去叫什么名字？”同样，这位中土圣人不愿告诉他自己的真实姓名，只回答说，人们叫他“仙圣或仙师”。[409]

成吉思汗接下来讨论了有关这位老人已经活了几百岁的奇谈怪论。丘处机出生于1148年左右，在1166年他十八岁时出家修道。当他见到成吉思汗时已经七十岁出头了，成吉思汗比他年轻十四岁。当被直接问及他有多大年纪时，这位圣人含糊其词，声称他不知道自己的年龄。然而，没过几天，这位道士的弟子在一个大果园举行聚会，庆祝他的生日。他的弟子李志常写道：“十有九日，父师诞日，众官炷香为寿。”[410]

蒙古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年龄，而且似乎对此也并不是很在意，但

汉人用十二生肖记岁，因此大多数人，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肯定知道自己出生的年份。一个一门心思给人算命的道士，对出生的年日和时辰是十分重视的。耶律楚材写道："伪云不知，安有明哲之士不知甲子者乎？" [411] 至此，耶律楚材对这位圣人产生了断然否定的看法，但成吉思汗习惯于应付各色人等，对他含糊其词的回答比较宽容。耶律楚材声称，如果圣人不能诚实地回答最简单的问题，那么他的意见又怎能被信任呢？耶律楚材对这位道士的欺骗行为感到愤怒，但成吉思汗只是礼貌地逗弄这位道士，决定用玩笑话称他为"神仙"。

当问到实际的问题，比如打雷和闪电的原因时，这位圣人用神学概念喃喃地回答说，雷声和闪电之所以出现，是大自然在对不当行为进行惩罚。他建议蒙古皇帝举行道教仪式，以便安抚祖灵，而他根本不知道这对于成吉思汗是一个多么敏感的话题，因为他曾被禁止参与祭祖仪式。成吉思汗默然不语，在无拘无束的聊天过程中，这位圣人似乎觉得自己的智慧感化了蒙古人，他为此感到很高兴，于是建议蒙古人洗澡并洗衣服，而蒙古人却认为这样做会污染自然母亲。他还建议他们对膳食加以限制，以避免地震、雷击以及类似的灾害。 [412]

因为圣人的门徒声称他已经活了三百多岁了，成吉思汗请他分享长寿的秘诀。他回答道，永生的秘密并不是服用长生不老药，而是遵循正确的方法，然后他对此进行解释。由于他的全部名声和他教派的兴旺都来自推销长生不老药，因此后来他的竞争对手便嘲笑这个圣人的答案。这位老人主张通过心理和精神的戒律，剥夺身体的快感，也要克服身体的欲望。这位德高望重的智者一再给成吉思汗提建议：停止狩猎，停止做爱，停止向道士征税。最后，大汗只同意了三项建议中的一项。

除了他们的私下聊天外，成吉思汗还安排圣人向他的幕僚和儿子布道，除了培养他们的军事技能外，他非常希望向他们灌输道德知识。不难想象他们的反应，经过一天的战斗后，大家盘腿坐在地上，听这个干瘪老道士传讲克制的美德。丘处机于1222年11月19日发表了他最重要的演讲，十年后，他的门徒将演讲内容付梓。 [413] 他的讲道解释了宇宙的起源，把传统道教各方面内容与摩尼教的二元论结合起来。"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从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余生平弃亲出家，惟学此耳"。

他冗长的布道概述了道教信仰的历史，介绍了其伟大的先师，并讲述了他自己生命中的轶事。他分享了道家创造的故事："道生天地开辟而生人焉。人之始生也，神光自照，行步如飞。"生命开始时，身体和灵魂处于完美的精神和谐状态，人类与自然之间也处于完美和谐状态。然而，人类犯了致命的错误，吃了神秘的蘑菇，打乱了神圣的和谐，并结束了地上原始的乐园。"地生菌自有滋味，不假炊爨，人皆食之，此时尚未火食，其菌皆香，且鼻嗅其香，口嗜其味，渐致身重，神光寻灭，以爱欲之深故也"。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人必须"去声色以清静为娱，屏滋味以恬淡为

美”。他的教导强烈地反映了摩尼教有关食物的力量破坏灵性的教义。“眼见乎色，耳听乎声，口嗜乎味，性逐乎情，则散其气”。人们不仅感到奇怪，他怎么能如此鼓吹节欲节食的重要性，因为当他到达蒙古营地时，就一直在抱怨供应给他的食物。[414]

他接着谈到了性对“气”的危害，声称性对“气”的威胁比食物更甚。他说，“故学道之人首戒乎色”，并警告说，“贪婪色欲则耗乎精神，亦散其气”。道包括两个方面，“轻清者为天，天阳也，属火；重浊者为地，地阴也，属水”。蒙古人理解这种区别，但对他们来说，土和水也是两种纯物质，和火一样，只有人类的活动才会把它们弄脏。对他们来说，阴阳结合在物质和精神上似乎是完全自然的。

这时，这位圣人的话头更具体地转向成吉思汗。他告诉成吉思汗，即使是只有一个妻子的普通男人，如果与她发生太多性关系，也可能毁了自己。他问道：“况乎天子多畜嫔御，宁不深损？”虽然大家都知道成吉思汗曾派使节寻找智者来提供建议，但这位圣人指责他实际上命令这些人到“中都等拣选处女以备后宫”，他专门提到了首先向成吉思汗推荐他的那个人，指责那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皮条客，而且错误地认为在马车上的那些舞女都是要进入大汗后宫的妇女。他告诉他的主人，最好不要看到这样的女人。“‘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既见之，戒之则难，愿留意焉。”他特别建议成吉思汗独自一人睡觉一个月，“服药千朝，不如独卧一宵”。

在布道结束前，他讲到了另一个个人轶事，大概是要提醒他的听众，他们的领袖并不是他见到的第一个皇帝。他对他的听众讲述了三十多年前他与金世宗会谈的情形，当时这位皇帝六十岁，而成吉思汗现在也是六十岁。在那次会面时，那位金朝老皇帝几乎不能走路，如果没有助手一边一个帮助他，他就无法登上御座。丘处机说，他给那位衰老虚弱的皇帝的忠告和他现在给成吉思汗的忠告一样，就是避免美食和性。那位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然后“自后身体康强，行步如故”。他骄傲地说着，并以此作为他智慧的证明，然而他的教义并不像他所说的那么神奇。汉学家阿瑟·韦利在研究这位智者的文章中指出，他“有点不诚实，因为他并没有提到，他于1188年与那位皇帝谈过话后，那位皇帝在1189年便一命呜呼了”。[415]

除了禁止性和各种各样的食物之外，这位圣人还反对狩猎和其他形式的剧烈运动。成吉思汗礼貌地听着，却不为所动。蒙古人不喜欢说“不”，所以大汗慷慨地接纳了这个建议。“易俗非易也，朕谨记神仙之言”。[416] 他后来又告诉这位圣人说：“朕已深省，神仙劝我良是。我蒙古人，骑射少所习，未能遽已。”他向这位道家圣人保证，圣人的话已原原本本用汉语记录在案，并翻译成蒙古文，以供日后学习，但说他会继续像从前一样骑马狩猎。

成吉思汗最想讨论实际的管理问题，但在这方面，圣人很少能提供建议，只是对蒙古人把统治精英尽行毁灭感到惋惜，并声称他们留下的

土地上已经没有合适的统治者。谈到当下世界时，他抱怨说："如今它属于普通百姓。"他不建议创建一种新形式的政府，而是劝成吉思汗按照金朝模式，任命地方官员，直到蒙古人可以向他们学习为止。他的一些建议都是很好的常识，包括蒙古人应任命经验丰富的本地官员的建议："有才华的官员了解本地情况，能够很好地治理。"但他提出的绝大多数具体政策都是赤裸裸地为了自己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宣布他的家乡拥有三年的免税期，以刺激经济复苏。[417] 成吉思汗礼貌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解释说这一计划很难实现。

当回到了中原后，丘处机写了一首关于他这次访问的诗，表达他对自己不能发挥更大影响的沮丧："万里乘官马，三年别故人。干戈犹未息，道德偶然陈。论气当秋夜(对上论养坐事，故云)，还乡及暮春。思归无限众，不得下情伸。"[418]

后来，一位中国批评家写了一首短诗来回应他，嘲笑这位老圣人无法全面回答蒙古人的问题："西行万里，不明对主之谈。"[419]

虽然成吉思汗在与这位道教学者的聊天中很少发现有用的见解，但他还是比较容忍这位老人的，而他周围的人就不同了。成吉思汗对这位圣人的纵容激怒了耶律楚材，他抱怨说，圣人"所对皆平平之语"。此外，"书及精神气之事，又举林灵素梦中絜宋徽宗游神书宫等语。此丘公传道之极致也"。

他的同事问："亦有异闻乎？"但耶律楚材想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他说："识者闻之"，听说他的故事，"未尝不绝倒也"。[420] 耶律楚材补充说，尽管对这位年迈的圣人感觉有些同情，但他"不友其心也"。面对成吉思汗的宽容甚至对道家的偏爱，耶律楚材处理得十分谨慎。"许其诗也，非许其理也。奏对之际，难见瑕疵，以彼我之教异，若攻之，则成是非，故心非而窃笑之"。

***

耶律楚材从神学的角度评判这位道长，但成吉思汗并不想评价他的教义是否正确，也不关心他的思想是否与中国传统哲学一致。成吉思汗认识到宗教人士对其信众的影响，因此想要争取这种力量为他的帝国服务。宗教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在哲学讨论的背后，成吉思汗和丘处机都有着具体的、非常重要的政治议程，这些以后会逐渐显露出来。成吉思汗希望这位老道长帮助蒙古人取得中国百姓的支持。到目前为止，他只征服了三分之一的中国，虽然他占领了大部分金朝领土，但还没有开始对南宋王朝的战争。蒙古人还没有完全控制中国，之后还有许多年的艰苦战斗。这位圣人的支持有助于巩固蒙古人在已控制地区的统治，也可能会吸引更多在金朝和宋朝统治下的人的支持。成吉思汗希望这位道长帮助他安抚被征服的百姓，吸引仍未征服的百姓来到他的麾下。作为异族统治者，蒙古人在中土需要某种形式的合法性，坚定地与旧的精英阶层站在一起的儒士没有表现出丝毫支持蒙古统治的迹象，但佛教徒和

道教徒却不然，他们支持蒙古人。

丘处机想劝说成吉思汗皈依道教，从而使道教成为他的帝国的官方宗教。但成吉思汗自己从未考虑过皈依道教。根据耶律楚材的记载，他问道："舍乔木之高迁，投幽谷之贱地？" [421]

丘处机未能说动成吉思汗成为道教弟子，他列出了希望大汗施以特别恩惠的事项。在启程回中土之前，他乞求税收减免和特许权。成吉思汗满足了这位老人的大多数要求与期望，期望道士向社会提供服务作为回报。他请丘处机保证让道士念诵经文为大汗和他的政府恳切祈祷。

耶律楚材曾期望这位圣人为所有僧侣或所有宗教信仰要求免差役，"既云修善出家人，僧道举在是矣"。 [422] 相反，"后数年方知止书道人，不及僧也"。这位道长要求得到一面"格列格"(也叫牌子，就是一面椭圆形的穿上绳子的通行证)，这将使他有权使用蒙古军事系统的驿站和马。它就像一个从来不需要支付的全能信用卡。牌子的持有者可以要求几乎任何类型的商品或服务，不需要付费，甚至不需要说明为什么需要这些货物或服务。在通常情况下，只有高级官员才能拥有牌子，因为它赋予持有者巨大威望和权力。牌子的正面说明，持牌人有从天上和从成吉思汗而来的祝福，而背面则警告，不服从持牌者命令的人"有罪当死"。 [423]

尽管耶律楚材一直对道士保持敌意，但成吉思汗则不同，不管他是否同意这位道士所说的一切，他发现道教的教义并没有害处。相反，它们与成吉思汗的蒙古传统是兼容的，但更重要的是，大汗赢得了这位道长的支持。成吉思汗希望巩固这种关系，所以他答应了道长的请求，正式发布一道圣旨。这位道士被授予显示大汗厚爱的虎头金牌。 [424]

***

尽管成吉思汗在与宗教学者的会见中并未获得太多精神或实用的建议，但他仍然觉得，这些会面在许多层面很有用。他知道，间谍将向他的敌人报告，他正在开始掌握某种神秘知识，而这些秘密或拥有秘密本身就具有某种价值。在当时的中亚人眼中，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充满异国情调的神秘国度，那里的人非常机巧，并拥有秘密知识。事实上，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道士不惜长途跋涉来向这位蒙古领袖分享自己的智慧，这本身就使他的新臣民心生敬畏，也引起了其他人的警惕。

随着成吉思汗的营地在阿富汗领土上不断移动，他也与各种宗教的圣贤和教士进行了一系列对话。为了强调其神秘性，这些会谈都是在高度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在一些场合，还为对话搭建了特别的典礼帐篷，无关人员必须离开。会谈往往在晚上举行，"左右灯烛炜煌"。 [425] 于是有谣言传播，说这位蒙古领导人正在举行神秘仪式，并被授予知识，获得特殊的能力。偶尔他也会邀请一些已向他宣誓效忠的地方官员参加这些仪式。这些官员不懂汉语或蒙古语，更加深了这个行动的神秘性和戏

剧性。

这些场景在穆斯林学者中引发了胡乱猜测，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术兹札尼对蒙古人怀有刻骨的仇恨，因此他的话可信度不太高，他说成吉思汗具有邪恶的能力，并与邪灵频繁交往。他描绘成吉思汗“擅长巫术和欺骗，而有些魔鬼是他的朋友”。术兹札尼把他的行动和能力与萨满相比。他写道：“他时不时陷入恍惚状态，在那种不清醒状态下，各种各样的东西会从他的舌头发出。”在这时候，他理应穿特别的衣服，这些衣服平时装在一个密封的箱子里，只在需要作先知讲预言时才穿上。“每当他接受神的启示时，他的舌头便会说出他渴望发生的各种情况——胜利、任务、敌人是谁、失败、国家陷落等。”书记员会记录他在恍惚中所说的话，当他清醒时，书记员便会把他的话语读给他听，而他“便会按照这些话语采取行动，而事实上，大致上都会成为现实”。[426]

术兹札尼写道，除了能进入这些出神状态外，他也“非常熟悉通过羊肩骨进行占卜的艺术，他不断地把羊肩骨放在火上烧，这样他就会发现羊肩骨的征象”。成吉思汗不太可能亲自穿上特殊的服装进入恍惚状态或亲自解释羊肩骨，但术兹札尼的描述精确记录了有关草原萨满的活动，也使我们看到在他阵营的核心圈子里可能发生的事情。

不管术兹札尼的想象力有多么生动，成吉思汗与宗教圣贤的会面与其说产生了戏剧效果，不如说造成了更多困惑。最后，成吉思汗似乎并没有因这位道士的访问有多少改变，但丘处机则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因新恩准的权威而精神焕发。他带着大汗签署并盖印的免除他的门徒劳役的圣旨。对蒙古人来说，这份文件本身就是神圣的，在它面前，他们会低头表示尊重，因为它代表了大汗的权力和国家的威严。该法令是与成吉思汗的直接联系，由他口授，由书记官记录下来。在一个几乎没有人能阅读的社会，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份文件表明其持有人与大汗有直接联系。

历史上一再发生这样的事：一旦宗教领袖获得一点政治权力，便变得傲慢自大，不可一世。当丘处机一路旅行远离蒙古朝廷时，便开始运用其权力，发号施令，随意索取征用，遣散道士和僧侣，代之以他自己的信徒。他没收了竞争对手的寺院，并强迫信奉其他信仰的僧侣皈依他的门派。他吸引了众多信众，因为他现在有权力承认他们是受戒教派的成员，因而不用纳税。他成了一个无人敢于挑战的小暴君。

这位道长和他的信徒们变得贪婪，并炫耀他们的权力。他的一个下属说：“或不然，常住之物，费用净尽，各操一瓢，乃所愿也。”[427]

丘处机在回家的路上写了一首诗，其中写道：“思归无限众，不得下情伸。”[428] 尽管他的诗充满温情，但是当他意识到，他要养活所有这些忠实的道教弟子时，他的情绪变了。他发布命令说，因为他的一些信徒“已经证明自己是不守规矩，没有原则”，因此他的一位门徒将被赋

予“全权处理此事，一旦发现他们，将予以惩处，以免道门弟子自己妨碍其神秘力量”。[429] 结果他们都被驱逐。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位圣人的权力和他命令的范围不断扩大。他和他的信徒重新诠释了成吉思汗指令中的短语，以便使他们的教派获得高于其他所有道士，最终高于其主要竞争对手佛教徒的权力。道士们把他们神职人员和建筑物的免税特许权扩展到各种类型的生意，由于他们的免税地位，他们的生意迅速增长，其他商人无法与之竞争。每个道观实际上都成了仓库，里面的货物免税出售。[430]

由于获得了特殊豁免权，道家变得愈来愈强大，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相信他们不必服从蒙古法律。寺院成了经营商务、银行和制造业的免税区，其空间多用于存储货物，而非用于崇拜。它们已在帝国境内形成了一连串的免税商业中心。加入该教派的人不用服兵役和繁重的劳役，不用参加道路建设、政府运输以及蒙古地方当局所要求的其他种类的繁重劳动。道教的扩张一度威胁到了统治帝国以及支撑庞大的蒙古军队所需的收入。

这位仙人对他曾向成吉思汗传教感到非常骄傲，他相信自己的道教教派会很快被批准成为蒙古的官方宗教，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其发源地中原。他告诉他的门徒“道院皆赐敕名额”，“吾殁之后，教门当大兴，四方往往化为道乡”。他要求他的门徒“又当住持大宫观，仍有使者佩符乘传，勾当教门事”。[431] 道教也准备像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了。

丘处机很幸运，因为他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做自己的后盾，但他也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耶律楚材的崛起才刚刚开始，他的书只是长期宗教斗争的第一步。这种宗教斗争很快便将支配中国，并在下一代加速元朝的崩溃。

第十三章 儒士与麒麟

蒙古游牧人很少沿着与来时相同的路线返回。成吉思汗是从东北进入阿富汗的，因此他打算走另一条路线回到蒙古，先往南走，渡过印度河，转往东部，翻越或者绕过喜马拉雅山，跨越孟加拉和阿萨姆，然后向北转入中国。如果他走这条路线，便可以一路上继续扩大他的帝国，最后回到西夏王国，在那里他可以对西夏人施以报复，因为他们曾向他投降，然后背弃诺言，并拒绝派兵参加征服花剌子模汗国的战争。

但成吉思汗并没有选择走这条冒险的路线，而是按照来时的路回到蒙古。他作出这一决定可能出于实际的考虑。对他的将士和战马来说，印度实在太热了。湿热的气候削弱了他们的弓的力量，而他的战士经过五年的战斗，都精疲力竭了，他们很想回到故乡。穿过或绕过喜马拉雅山的道路非常漫长，极为艰难，从未听说任何一支军队曾完成过这样的壮举，因此可能仅仅是地理原因才促使他作出了较适当的选择。

但波斯史料的记载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史料里说是由于在阿富汗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才促使他改变了计划。据说正当蒙古军队准备撤离时，成吉思汗的精英保镖在薄雾中看见了一个神秘的影像。据他们说，那个幽灵似的东西似乎是一种绿色的动物，有鹿的身体、马的尾巴，前额长着一只角。

《蒙古秘史》经常提到天地的力量，但它从未提到过麒麟的故事或天上类似的标志。但在中国和欧洲的神话中，独角神兽则频繁出现。[432] 有故事说，亚历山大大帝曾在同一地区遇到过一只独角兽，还有一个传说，亚历山大英年早逝是由于受到诅咒，因为他在亚洲狩猎时曾杀死过一头神圣的麒麟。 [433] 马可·波罗后来曾报道，亚历山大的种马比塞弗勒斯曾与本地母马交配，生出一种独特类型的马，额头上有一个特殊的标记。 [10]

根据那个蒙古人看见麒麟的故事，成吉思汗的士兵并没有犯亚历山大那样的错误。他们并不想把神秘的野兽当成猎物加以伤害。对蒙古人来说，任何动物，尤其是一只狼，出现在一个人面前，总是被理解为一种荣誉和一种祝福，而不是一个威胁。不论是什么动物，蒙古人都会让它安然无恙地过去，然后为它祈祷，后来还会献祭，感谢它出现在自己面前。

虽然穆斯林历史学家也重复了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很可能是耶律楚材创作的，因为这个故事和中国文献记载的孔子的遭遇有相似之处。任何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孔子于公元前551年诞生，在他出生前夕，出现了一只麒麟，据记载，那是只有一只角的鹿，携带玉璋，上书“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五，徵在贤明”。 [434] 麒麟的出现标志着旧王朝的灭亡，也预示着一切都将重归于好。 [435] 另一只麒麟出现在公元

前479年孔子去世前不久。不论耶律楚材是否杜撰了麒麟的故事，但正是他详细解释了遇到麒麟意味着什么。他声称，麒麟出现表明了成吉思汗得到了上天的独特祝福。这一事件发生在漫长的中亚战役即将结束之际，象征着上天对这位年迈的蒙古皇帝一生及其成就的最终认可。他已经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也已经用尽了上天赋予他的伟大命运。但在17世纪，蒙古一位匿名的佛教僧侣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释：麒麟的出现是对成吉思汗的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件幸事。他在《黄册》里改写了这一事件，声称麒麟是上天派来保护圣地——菩萨的家乡西藏和印度的，为了让它们免遭成吉思汗的入侵。 [436]

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大帝都是在他们的生命即将结束之前横扫中亚的，并在阿富汗达到他们征服战争的顶峰。虽然相隔一千五百年，但他们的故事经常交织在一起。《亚历山大传奇》是根据阿拉伯语和希腊语资料写成的寓言，也是最早被译成蒙古语的西方文学作品之一。它叙述了亚历山大寻找长生不老水的神话。在亚历山大传奇的旅程中，他遍历漫长的生命之桥，爬上高山，穿越大地，探索海床，孜孜不倦追求长寿。亚历山大讲述了自己的旅程，并告诉人们："在夕阳西下落日余晖中，我追逐着黑暗。" [437] 即使到那时他已经"一千岁了"，他还想活到三千岁。如今，在他生命的尽头，亚历山大说："没有谁我不曾见过。" [438] 他终于得到了神奇的长生不老水，恰在此时他开始反思，如果他一直活到永远，他的生命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意识到，也许与其说他热爱生命，不如说他爱那些和他共同经历生命的人们。没有他们，生活就不会欢乐。在如此煞费苦心地寻找到这个难以捉摸的长生不老药之后，他却把它倒在松柏树上，于是这种树就变成了常青树。把生命给松柏树就是给了他自己一直苦苦寻求的不朽生命。他说，在那一刻，世上没有哪个国王比他更快乐了。 [439] 在这部史诗的蒙古语版本中，他说："我已经成为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汗曾像我这样享受过生命。" [440] 故事以一个简单的想法而终结："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老人们啊，你们当高兴。当一个人死了，生命走到尽头，一切都是虚空!当一个人死了，生命结束了，一切都是虚空!让我们欢喜快乐吧!让我们幸福快乐吧!" [441]

***

耶律楚材总是能从积极方面解释异常现象，例如夏天下雪以及撞见独角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能力，他作为蒙古帝国幕僚和宣传者的作用才越来越大。了解他的人说他敬业，不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并使用他已经学到的知识改善蒙古帝国的政府管理。一位同事写道："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简傲，及一被接纳，则和气温温，令人不能忘。" [442]

这位诗人是把中华古典思想和实践引进蒙古汗廷的桥梁和纽带。虽然他对佛教保持着尊敬，也赞赏道教的效用，但他特别重视儒家哲学和传统的中国方式。他交游广泛，几经转变，但在内心深处他仍然是一个贵族。当他第一次见到成吉思汗时，还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二十多岁的年

轻人，有着占卜的特殊天赋，渴望冒险和加官进爵。耶律楚材于1219年第一次进入蒙古，几乎与此同时，他开始了转变。在一首诗中，他描写了自己在初抵克鲁伦河时对中华文化的反思。

河水春尽水无声，

靠岸钓鱼羡击冰。

乍远南州如梦蝶，

暂游北海若飞鹏。

梦蝶暗示了中国哲学中的一句名言：庄周梦蝶。道教学者庄子写道，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之后不知道到底是他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它是一个人。耶律楚材现在也迷惑了，他到底是假装蒙古人的汉化的契丹人呢，还是别的什么人呢？在这首诗结束时，他说自己难以前行。“试暂停鞭望西北，迎风羸马不堪乘”。[443]

耶律楚材初出道时还是一位有些天真的年轻人，但当他三十几岁离开花剌子模汗国时，他已成长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大臣和深谙宫廷阴谋的天才。然而他仍表现出怀旧的渴望，那正是他曾接受的经典中国教育的组成部分。从撒马尔罕出发踏上回家的漫长旅途后不久，他写了一首关于这座城市的诗，反映了在他最初在克鲁伦河畔写下那首冰和蝶的诗之后的短短四年里，他发生了多少改变。

黄橙调蜜煎，

白饼糁糖霜。

一从西到此，

更不忆吾乡。[444]

这位古典学者内心深处很想家，但他不只是渴望舒适的家，而是渴望他青年时代精神上的纯洁无瑕。几年后，他更忧郁地写道，不管他如何“强而坚”，他仍因远离家乡“忍不住感到悲伤和沮丧”。[445] 他已经变了一个人，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仍是一个年轻的学者，急于重温历史上伟大的精神导师孔子、佛陀和老子的核心教训。他认为这些原始教义已由于摩尼教的流行和道教圣贤虚浮的名气而被败坏了。他写道：“但以去圣逾远，魔伪逼真；紫实乱朱，玟常混玉。自非上智，畴克考明。所以鼠璞滥名，周人一其贵贱；鸡凤殊状，楚俗迷其是非。故有守文曲流，拒为异端之说；巧言邪道，引为同己之谈。”[446] 在这些堕落的教派中，他明确拒绝摩尼教，但他并没有公开声明，因为成吉思汗仍然活着。他只是巧妙地称摩尼教徒和相关教派为“香社”或“白袍社”。[447]

耶律楚材认为，人们只须研究某种宗教的原典，而不是训诂和解释，但他承认，即使是对受过最好教育的学者来说，这也可能是巨大的挑战。“夫古人之文章愈深，则人愈难知耳”。[448] 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

有相通之处，虽然成吉思汗试图把所有国家都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下，但耶律楚材寻求把帝国的各种宗教统一成一个单一的集合声音。虽然成吉思汗试图保护他帝国内各种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但耶律楚材认为，只有通过统一不同信仰，人类才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才能在一个和谐帝国内和平共处。

尽管他支持所有三个已确立的中国信仰：佛教、儒教和道教，但对它们并非一视同仁。他认为佛教教义最坚实、最明晰，能提供高度个人化的道德指导，指明通往教化之路，给人心灵的平安。但是，耶律楚材认为，要引导社会、管理国家，孔子的建议是最好的。道教的价值在他心中好像不甚清楚，但他似乎认为这种宗教能给普通百姓以适当的指导。

接受传统教育的儒家学者面对成吉思汗的蒙古统治时感到精神错乱，很不舒服。儒家思想认为任何外国领袖都不能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更不用说从草原来的夷狄了。在成吉思汗生前，中国一直有两个皇室：北方的金朝和南方的宋朝，各有自己的皇帝。儒家学者教导人们，中国皇室有责任和义务去不断征服夷狄。中土以前曾被异族统治过，但在蒙古人到来之前，所有异族统治者都承认汉语言和文化的优势。他们竭力赋予儒士提供文化和精神指导的特殊地位。儒家从来没有在比中国更大的帝国中发挥过作用，当然更没有在以中国为附庸国的帝国中发挥过作用。对成吉思汗来说，中国只不过是他庞大帝国中的一个地区而已，而他的帝国幅员辽阔，其中有些地方儒士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些学者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以往难以想象的情况，所以他们多半罔顾现实，仍然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没有一个地方是留给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因此成吉思汗也没有在他不断扩张的帝国管理中为他们留下一席之地，这并不令人感到非常惊讶。 [449] 耶律楚材有双重困难的任务：一方面要设法使儒家思想和汉文化合乎成吉思汗的口味，同时也要使中国的新君主成吉思汗至少能够被儒士所忍受。

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非耶律楚材莫属。他的祖上曾是草原游牧民族，虽然他们已经适应了汉语言和文化，但他仍与自己的祖先保持着强烈的精神联系，他也是最后一个能用他祖先的契丹语言读写的人。他坚定地认为，成吉思汗获得了统治中国和世界的天命。在与宋朝皇帝特使会晤时，他说得很清楚：“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 [450] 在他看来，中国统一的步伐还不够快。这种追求成为他的一项指导原则，因此使他成了中国学者中一位颇受欢迎的人物。

***

就像成吉思汗有自己的怯薛军团护卫一样，耶律楚材也有一队聪明机敏的卫兵保卫，大约二十位极为聪明的人担任他的光明会成员。 [451] 他们大多数来自草原，或他们的祖先曾来自草原。所有人都能读写回鹘文字、蒙古语和其他语言。其中一位幕僚是镇海，一位来自突厥语族的基督徒，能讲汉语和其他部落的语言。这些人与穆斯林和汉人都不同，

穆斯林的特长主要在财政、税务方面，而汉人则擅长技术服务和医药，有时也可充任出色的军事指挥官，而这些人的种族或宗教则较难确定。他们的文化取向倾向于中国，但是他们保持着精致的世界主义精神，以一种高度折中的方式，根据他们个人的风格，把许多文化的思想结合起来。

成吉思汗认同耶律楚材提出的一些儒家教导，如忠于职守、生活中言行一致等。他认为，背弃责任、怯懦、说谎和懒惰是所有罪孽中最可耻的，他赞扬那些把个人荣誉置于个人幸福甚至生命之上的人。他知道他决不能依赖那些热爱财富过于荣誉的人。术外尼写道："这些人卑鄙、怯懦，他们都是个人本性的奴隶。成吉思汗鄙视他们，毫无怜悯地毁灭他们。"[452] 他教导他的儿子们，不要羡慕历史上那些只知道存储黄金白银的君王，并解释说："他们愚昧无知，因为他们不明白那些财宝和尘土一样。"这样的财宝不能带来任何"好处"，也不能"避祸"。他说："对我们来说，为了我们的好名声，我们应把我们的财富藏在人们的心坎内，并不得为明天留下任何东西。"[453]

然而，尽管他对这些基本的儒家美德有好感，但并不像他的谋士那样对儒学抱有很高的兴趣，反而规避儒学的某些最基本的教义。这种拒绝可能是出于感性，而非理性。儒家学者强烈反对一些蒙古人的习俗，如一个人死后，他最近的男性亲属应娶他的遗孀为妻。在蒙古人眼中，拒绝这样做似乎是残忍和自私的，但儒家谴责这种乱伦婚姻，尤其不能容忍儿子娶继母的行为。成吉思汗认为，这是心胸狭隘的观点，他觉得这种观点违反了有关怜悯和责任的最基本的法律，因为一个寡妇如果不被收继，就可能没人养活她。他自己母亲被遗弃的痛苦经历肯定影响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儒家哲学中没有真正的神，其信徒也没有能力去控制天气、预测未来，也不会治病。如果上天不和他们说话，那么他们是怎么和上天说话的呢？他们的仪式很正式，一般人不能接近，让蒙古人难以接受，因为蒙古人已经习惯于骑在马上参加仪式，随意走动，以便和朋友聊聊家常、叙叙旧，也不影响崇拜。蒙古人的仪式结束时总是大吃大喝一顿。即使是最严肃的礼仪性聚会，也允许男人和女人聊天、吃喝、调情，而且可以一醉方休。一个宗教场合是一种庆祝，而不是一种庄严的国家仪式，必须有趣好玩，并能满足一些个人需要。如果萨满或牧师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那么他的表演能否吸引神灵的注意便是令人怀疑的。相比之下，儒家仪式真是太枯燥乏味了。

成吉思汗尊孔子为历史上的圣人，但他不喜欢那些自称为孔子门徒的学者。他们的教导对他来说是讲不通的，而他们对帝国征服和改造提不出任何建言。孔子的著作强调维护旧秩序的重要性，而成吉思汗则试图破坏旧秩序，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儒家教导人们不惜代价服从统治者，而成吉思汗则曾经背叛他的主人并推翻了他们；儒家强调父权制以及对亲人和祖先的义务，但这些人正是成吉思汗一生中给他带来最多麻烦的人。他的氏族抛弃了他，并阻止他参加他们对祖先的崇拜仪式，但

他克服了这一残忍虐待，并成为部落乃至世界最强大的领袖。

在他一生中的某些时候，他一度违背了儒教的大多数基本戒律。他杀了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违抗他的母亲，并奋起推翻了他的主人王罕。即使才思敏捷、出口成章的耶律楚材也发现，很难把新主人的行为与儒家教义相调和。孔子强调，在社会中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男性血统都有着优先地位，但成吉思汗由于被男性亲属虐待过，更多地依赖女人并赋予她们权力。蒙古女人拥有财产，包括帐篷和牲畜。她们不仅有权继承亲属的遗产，而且也能在和平或战争时期通过自己的服务获得报酬，而她们常常获得支配男人的权力。成吉思汗的母亲、女儿和妻子都有她们自己的宫廷，并管理自己的土地、水域和男人。成吉思汗只有约一百万蒙古人，要控制超过一亿人的帝国，他就不得不把每个人的才能发挥到极致。由于大多数男人都要参军打仗，所以他依赖妇女来管理他的家园，控制贸易和金融，并统治许多被征服的国家，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带。

这些做法使得儒教徒形成了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草原野蛮人就是文明人的对立面。在他们看来，蒙古人就是一个部落，自称是狼和鹿的后裔，简直不能算作人。蒙古人不能适当区分辈分、阶级或性别，不懂礼仪，也不理解传统。蒙古人的政府系统完全违反了儒家观念，因为在儒家观念中，只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人才能统治，而战士和商人应排在社会结构中的低层次。成吉思汗在怯薛卫士的协助下统治帝国，因此怯薛卫士不仅拥有军事指挥权，还拥有法律、行政和宗教的相关权力。在他看来，教育和精神训练都是工艺，和织地毯、做陶器或种地一样。每种工艺都有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但这些职业都不适合蒙古人，他们天生以捕猎作战并统治别人为生。

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狂热信徒都希望推动普世宣教，但儒家经文仍然顽固地植根于中国传统中。一个人不必是阿拉伯人才能转信伊斯兰教，也不必是印度人才能修行，但似乎要实践儒家思想就必须是一个中国人。儒家教义集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要求一个领袖严格遵守一套既定的规则。成吉思汗觉得上天赋予强大的领袖固有的权力去统治他们的臣民，尤其是他们征服的臣民。他的确有兴趣倾听宗教人士的建议，但他会自己判断他们的教义是否有效和实用。他认为那只是建议，而不是命令。成吉思汗是最终发出圣旨、法律和命令的人，他对遵守别人的戒律不感兴趣。

成吉思汗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似乎远在他遇到耶律楚材之前就已经定型了，而一旦他的想法确定了，他就不愿意做出改变。耶律楚材在蒙古汗廷的地位稳步上升，并在他服务蒙古人的三十年间，坚持不懈地提出儒家思想，引用儒家的见解和做法来解决当时面对的问题。他的影响力一度是相当大的。

成吉思汗死后，耶律楚材在他的阿富汗回忆录中写道，他的目标是“首赞朝廷行文教，施善道，使流风仁政，高跨前古”。[454] 为此，他

提出一长串的细节："请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如此，他将能够创造"太平"。 [455]

因为耶律楚材对佛教和道教教义以及儒家思想都感兴趣，因此他设法把各种宗教结合起来，以取悦成吉思汗。他说他所接受的不同经典的训练如同沐浴在"汪洋法海"。不同的宗教都被当作"法"，每种宗教都是以各自独立而又类似的经文为基础的。 [456] "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老氏之道养性，释氏之道修心，此古今之通议也，舍此以往皆异端"。 [457] 总之，在他看来，这三个信仰形成了哲学和宗教的三足鼎立之势。"所需要皆三圣人之教，屹立于世，如鼎之三足，彼此没有压迫和掠夺彼此，各自和平相处"。 [458]

尽管他与丘处机意见相左，但耶律楚材一直比较看重三种宗教：道教、儒教和佛教。他自己认为这三种宗教是汉人的宗教。他排斥外来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认为它们可能存在危险。在蒙古社会的层级结构中，基督徒大多是妇女，或者是大汗实力较弱的女婿，而耶律楚材最初认为他们的威胁较小。相比之下，汗廷中穆斯林日益扩大的影响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他似乎很喜欢耍些小动作设法贬低他们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所谓的专业知识，而这些专业知识正是成吉思汗最钦佩的。据记载，有一次耶律楚材很开心地向人们说明，穆斯林预测的一次日食是错误的，而第二年，耶律楚材的预测被证明是正确的。

***

成吉思汗已经免除所有僧侣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但他并不像耶律楚材那样对他们有信心。他说太多和尚像寄生虫一样，依赖别人的辛苦劳动过活，却不能做点有用的事情作为回报。除非他们能证明他们真正遵循自己声称所遵循的信念，否则免除他们的兵役和赋税是毫无道理的。耶律楚材曾受过古典中国教育的系统训练，参加过科举考试，因此他建议蒙古政府考验这些僧侣，以确保他们有资格免纳税与兵役，至少看看他们能否阅读。但即使是这些简单的标准也遭到了僧侣的抵制和愤怒的反对，他们说，认字和他们的工作无关，他们只需凭记忆背诵经文即可，而阅读只是那些不够聪明、记不住经文的人的作弊手法。

一位佛教领袖反对道："僧侣怎么能像年轻学生一样参加考试呢？"一位不识字的喇嘛抱怨，他承认："我是一个粗和尚，从不看经文，也不识一个字。"他指出，蒙古官员并不知道如何读或写，然而他们做事并没有困难，那么为什么出家人就必须能读写才能履行他的职责呢？ [459] 因此，这项法律从未实行过。

耶律楚材也受到了他的同胞中国学者的诟病，因为他帮助夷狄，特别是把道教圣人带到蒙古汗廷，并授予他过度的特权。为应对他们的批评，也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他惩罚了道士，承认自己的错误："吾过

矣!吾过矣!”他在他的书中声明，这些经历迫使他更加致力于研究并推广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他敦促他的主人采用汉人的制度，即把帝国行政管理赋予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学者，但是成吉思汗并没有表现出恢复科举考试的兴趣。他选人是基于他们在生活中的成就和在战场上的功勋，而不是在教室里的成绩。他更看重勇敢坚定、积极行动的人，而不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的人。

虽然耶律楚材在学术方面所进行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但他设法把汉人行政管理的许多重要做法引入了日益扩张的蒙古政府系统。蒙古人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失败王国的集合体，其中没有一个王国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入侵，而蒙古领袖对采用其失败的传统和习俗也没有多少兴趣。耶律楚材常常不得不使用隐晦曲折的方式提出一些建议，竭力隐瞒这些思想起源于中国的事实，只是将之作为简单的常识提出来。他没有把它们作为屡试不爽、行之有效的中国思想或儒家思想，而是用含糊不清但振奋精神的词语描述它们，解释“善道”是“为政之本，纵有强军，若失民助，国将不存”。[460]

耶律楚材主张改革税收并使之系统化，这样国家收入就会稳定，并具有可预测性，但他遇到了成吉思汗皇室成员的反对，这些人只想从税收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他在蒙古汗廷中一直是亲中派的核心，受到一些穆斯林官员的强烈质疑，这些人是在花剌子模汗国被吞并后进入蒙古汗廷的。这些穆斯林官员仍然受到大汗后代的欢迎，因为他们无情地甚至是残忍地从中国农民手中榨取最后一分钱，因此效率很高。耶律楚材把他们的税收征管方法描述为“恶徒之法，害之甚矣。望禁之”。[461]

尽管耶律楚材努力影响蒙古汗廷，使之更加温和，以符合中国传统的治理之道，但由于生活在成吉思汗的汗廷，他个人不由自主地也发生了改变。根据记录蒙古统治的官史《元史》的记载，有一次在皇宫参加宴饮，耶律楚材喝醉了，离开庆祝现场，在一辆车中昏睡过去。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汗也喝醉了，看见他醉卧车中，便登上车用手推他，想唤醒他。耶律楚材睡得正香，眼也不睁，很生气，嘟囔着说不要打扰自己。窝阔台汗斥责他独自醉酒，不和大家在一起玩，于是把他拖回庆祝活动中。他衣冠不整，跌跌撞撞，这个严谨的儒士此时只是一个酗酒的官僚而已。[462] 耶律楚材来见成吉思汗时还是一位中国学者，但多年过去了，他已变得有点像蒙古人了。

***

当成吉思汗离开阿富汗的时候，他已经认识到，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他庞大帝国的管理中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他们有一些有用的技巧，但是他们敏于言而拙于行。成吉思汗寻求的是常识，而他们寻求的是启示。被带进蒙古汗廷的祭司、僧侣、毛拉和巫师经常使成吉思汗感到沮丧。他们认为，应该以讲道和教义作为所有问题的答案。每个问题都需要更多的思考、研究和分析，但成吉思汗管理亿万之众的庞大帝国，不得不需要立即拿出方案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即使这些方案并不完美，

也聊胜于无。成吉思汗的一位幕僚指出，应该等待“良机”或“行教化之前”的平静形势，宗教人士和学者总是想等待。但他的问题很紧迫，他并没有充裕的时间来等待启示。一位汉人大臣抱怨说：“以吾观之，此乃真误矣!”一个人不能只是“延宕以待良机” [463] ，而必须做得更多。他批评一位道士说，“汝平静自足，束手以待宁静”，但是这种虚伪的不作为犹如“冀缓饥寒，却弃粮绢”。

20世纪初，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亚洲手稿部的管理员在检查术外尼关于成吉思汗生平的一个最古老的版本时，在书稿背面发现了四行简短的题字。每行题字都是一首短诗，用中亚地区蒙古统治者所用的四种语言——蒙古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畏兀儿语写成。蒙古语题字是最古老的蒙古诗歌之一，用优雅的语言赞美知识和法律胜过财富和珠宝的价值：

知识乃一片洋海，宝石遇之则隐，知识之法，智者知之。 [464]

在关于成吉思汗生平的第一本书上加上这句话作为后记，概括他生命最后几年的追求，似乎是恰如其分的。在他离开阿富汗的时候，他几乎对所有关于战争和征服的事情都了如指掌，他也积累了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多的财富，但他仍然不得安宁，他还在寻找智慧。

[1] 据说他打发使者去西藏宣布一项法令：“现在，我，作为汗，为了完成国家大业，需要邀请喇嘛及其信徒来到我们蒙古，支持他们传播佛教。”

[2] 海云曾任蒙哥汗和忽必烈汗的幕僚。

[3] 关于尼扎里派，除了马可·波罗的神话外，最有影响力的现代作品是20世纪30年代斯洛文尼亚作家弗拉基米尔·巴尔托尔的寓言小说《阿拉穆特》。写作目的是为了反对意大利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后来用作对世界各地的独裁者和极权制度的批判。这部小说后被改编为歌剧。

[4] 撒因：蒙古语，好。——译者注

[5] 这段引文出现在不同的蒙古史籍中，有的说是成吉思汗的话，有的则说是忽必烈汗的话(忽必烈汗可能曾引用他祖父的话)。

[6] 莫图根的名字并未出现在《秘史》中，可能是因为成吉思汗禁止提及他的死亡，因此对《秘史》作者产生了影响。

[7] 丘处机：又称做长春。

[8] 丘处机的旅伴李志常详细描述了这次会面，并出版了《玄封庆会录》。

[9] 成吉思汗希望找到一种长生不老药的说法似乎是中国古代神话的翻版，秦始皇(前259—前210)就曾寻求这样一种灵丹妙药，以便能够永远统治世界。在《亚历山大传奇》中也记载了这位希腊征服者几乎相同的故事。

[10] 随着《亚历山大传奇》的传播，亚历山大的生平和虚构故事被改头换面

进入各地的民间传说中。在史诗《格萨尔王》中，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的故事融合在一起了。英雄格萨尔是其他真实和神话人物的结合体，有时被称作格萨尔成吉思。

第四部分 成为神

库尔穆斯塔，众神之皇，转世为幸运的圣成吉思汗。

——17世纪一部蒙古史籍扉页上的话

第十四章 最后的战役

1223年，成吉思汗六十二岁了，他决定回家，以便能在发源于不儿罕山的土拉河畔度过晚年。与他开始入侵中亚时的闪电速度不同的是，他从阿富汗返乡的旅程缓慢而悠闲，有时在一地停留很长时间，并进行史上已知的最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四年作战期间，他的军队征服了从印度河到伏尔加河的广大领土，包括今天的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伊朗、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俄罗斯南部和巴基斯坦的部分土地。他的军队已经厌倦了战争和掳掠，都想要回到家园。

返回蒙古后，蒙古将士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与家人和朋友团聚，举行狂欢庆祝活动。老兵们讲述着遥远地方的奇闻轶事和壮烈的战斗故事。孩子们见到了从未见过或不再记得的父亲。很多年轻男孩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作为胜利归来的战士，他们急于炫耀自己的财富并找到妻子。年轻人四处求爱，女孩们一边取笑他们，一边和他们调情，而朋友们则嘲弄这些年轻的士兵们。这些士兵满不在乎，只管骑在马背上炫耀自己的骑术，摔跤，玩掷踝骨游戏，并享受母亲的厨艺。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在庆祝，军队凯旋时还带回了许多囚犯，包括被击败的花剌子模国王的母亲及其家族成员。由于他们公然反抗蒙古人，因此被降为奴隶，受尽了羞辱。花剌子模国王的家族成员逐渐湮灭无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陌生而严酷的草原环境中经历了可怕的苦难，因而短命。蒙古人拥有这么多的奴隶，因此每个人都很富有，不用工作。他们终年狂欢。

当成吉思汗结束第二次远征回到自己的祖国后，他从童年时就认识的人绝大多数都早已死去了，但那片土地依旧。他的妻子一切安好，事业蒸蒸日上，每人都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自己的宫廷。孛儿帖控制着克鲁伦河流域及其相邻的大草原，那里是她出生的地方。这个曾经被绑架到篾儿乞部，并被强迫嫁人、几乎沦为奴隶的女人现在是女王了，而被废黜的皇后与公主成了她的仆人。忽兰管理着不儿罕山的高地和斡难河，也遂掌管着土拉河，而也速干则统治着鄂尔浑河上游和杭爱山。

虽然成吉思汗的征服改变了世界，但他的祖国几乎面貌依旧。他出生时，草原没有城市、要塞、寺庙或其他定居生活的迹象，而他有意使之保持原貌。他的百姓继续住在游牧民的帐篷里，随着季节变化放牧他们的牲畜：马、牛、牦牛、绵羊、山羊和骆驼。他们观测天象，以便知道什么时候转移到下一个牧场。

他拒绝担当征服英雄的角色，却把功劳归给他的军队和上天的祝福。他宣布："我要向腾格里，我的圣父祈祷。"然后，"他登上山冈，摊开他的毡鞍布，把他的皮带挂在脖子上并祈祷"。他的话语简单、谦逊、

直截了当：

> 我非因刚毅之美德而称帝，
> 皆因我父腾格里命我为帝！
> 我非因奇妙之美德而称帝，
> 皆因我父腾格里命我为帝！
> 长生天为我征服外敌！[465]

成吉思汗并没有为他自己史诗般的征服战争建立纪念碑，也不允许刻写碑文。他的功绩本身就已足以证明一切。然而，他却及时地把功劳归于别人，并命令建立一座纪念碑，纪念1225年夏天那达慕比赛上最优秀的射手。蒙古人把伸开胳膊时两个指尖之间的距离称作奥德(ald)，合撒儿的儿子也孙哥射中了335奥德之远(超过480米)的目标。 [466] 这样的壮举史无前例，因此值得立碑纪念。

戎马倥偬几十年，成吉思汗征服了远近的众多民族，在此过程中，他仔细审查了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发现每个宗教都有宝贵的真理，无论是基督教、佛教、道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有可取之处。正如每一片土地出产特定的农作物和水果，每个宗教也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价值。几个世纪后，尹湛纳希在《青史演义》中写道："每个民族的书籍和写作方式都表现出各自的民族特性，并且在主题和观点上表现出不同。例如，这个世界上最香、最美丽的东西是花朵，但并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相同，它们都有着特殊的颜色。水果好吃，但味道各异。" [467] 诗歌在任何语言中都很美，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写作方法和规则。"汉人使用尾韵，蒙古人使用头韵，藏人使用节奏，女真人在演讲中使用骈体"。

所有的宗教都声称自己擅长教导和启迪。它们喜爱真善美，崇拜神和上天。它们教导美德、诚信、责任和公义。它们谴责邪恶和不法行为，谴责贪婪、嫉妒、占有欲和伤害他人的本能。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细节，在于对如何做到这些细节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在圣地，信徒应该按照顺时针方向走呢，还是逆时针方向走？他们应该忌食牛肉、鱼、禽鸟或洋葱吗？祈祷时他们应该穿黄色、黑色，还是白色呢？他们在祈祷前应该脱下鞋子呢，还是解下腰带？应该戴一顶帽子呢，还是光着头？她们应该把脸遮盖起来呢，还是素面朝天？死人应该土葬呢，还是火葬？挂在树上呢，还是喂给狗和鸟？处死一个犯了死罪的人，是砍掉他的头显得更尊重呢，还是把他勒死更尊重？神喜欢什么样的祭品？是一只羊呢，还是米和酒？是一束鲜花呢，还是一片信徒的肉？神是更喜欢听到他们用阿拉伯语诵经呢，还是用拉丁文吟唱？是用藏语诵经呢，还是用汉语祈祷，还是只是跳舞？

成吉思汗认识到，宗教信仰与实践能够满足人们普遍的精神渴望，而这种渴望超越国家和民族边界。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都存在明

确的普世主义原则，这种原则似乎已成为大多数宗教信仰的基础。这种普世主义信息正是他所渴望的，因为他正要创建一个世界帝国，但他决定，他的帝国将不仅仅基于一位先知、一种经文或一套信仰。

他与巫师、祭司、门徒、僧侣、毛拉进行了很多对话，在对话结束时，他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虽然有些人显示出了真正向善的倾向，但是他相信，没有人真正明白道德、生命的意义，或神圣的性质。他们和他一样，都只是人，竭力去理解世界。他们那点有限的研究并不能使他们更接近上帝，经文、圣歌、舞蹈、仪式、药物或祈祷也无法揭示一个秘密的方式、一个隐藏的路径以找到人生的正确道路。他认为，人们不需要从先知、教师、开悟的大师、萨满或他们的经文中获得秘密知识。每个人内心都拥有相同的指南针。每个人生来就有能力通过深思熟虑、内省、简单的常识和感悟去发现和培养道德。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种信仰都可能有所裨益，但他发现，没有任何一种信仰能保证绝对能将人们引向正确的道路。[468]

每种信仰的虔诚信徒都希望人们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来判断他们，而不是根据他们真实的行为或者他们行为的真实后果来判断他们。他们虔诚地把善行都归功于自己，却把恶行都归于那些犯错的人、那些误解了教义或故意作恶的失信者。成吉思汗的世界观太重实效了，以至于无法把思想和行为分开。他不根据话语作出判断，而是根据行为作出判断，确定的目标，只有用已取得的成就来证明才能算数。

他发现每个宗教都有其不足之处和虚假的教导，都有某种荒唐话和圈套。每一种宗教都有缺陷，当其领袖不受监督，有权管理自己的事务，并滑入独裁贪婪的深渊时，这种缺陷就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坚信，抬高一种宗教置于其他宗教之上会伤害他的帝国。尽管它们自称拥有全部真理，但是每种宗教都是地方性宗教，植根于特定的区域、语言和文化，而他所要创建的帝国则是世界性的，包括所有的土地、人民和神明。每一种宗教都拥有一些重要的真理，但无论是他们的老师还是他们书中所载的，都没有唯一的、终极的道德真理。有着同样信仰的学者，读着同样的经文，却不断争吵，甚至因为或大或小的问题互相残杀。他们同时解释相同的文本，却作出相反的判断。人们怎么能信任他们，把管理社会的最重要的实际职责交到他们手上呢？只有严格的法治和强有力的统治者才可能阻止那些所谓的具有共同信仰的信徒像饥饿的小狗争夺一根骨头那样相互厮杀。答案究竟是什么？是加强控制还是减少限制？当成吉思汗进入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些关键问题困扰着他。

操练德行，就像学习射箭或骑马一样，需要身体锻炼和精神力量，而这些并不是按照规则和指示产生的。道德并不是从书本中产生的，它来自积极的实践。道德是一种能力，只能通过实践学到并加以完善。成吉思汗没有从学者、牧师或宗师那里获得分辨是非的能力，而是从身边单纯的人身上学会了道德和价值观。在他的童年时代，这些人是他的母亲和山里的札儿赤兀歹老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人变成了他周围的同伴和战友们。在《蒙古秘史》中，他对职务虽低但智慧超群的人

说："我行是则尽其力焉，我有非则直谏止焉。"[469] 他公开承认，他卑微的同伴，如博尔术和木华黎的教导"乃使我至此位矣"。[470]

成吉思汗拒绝接受任何一个流行的宗教的做法使得一些学者认为，他对宗教态度冷淡，但俄罗斯学者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在20世纪初清楚地分析了宗教在蒙古成功征服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多么核心的作用。他写道："作为一个无畏地、无条件地履行其职责的人，他必须坚信——不是从理论上讲，而是凭直觉完全相信——他个人的命运，与他人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一样，掌握在无可指责的更高存在的手中。这样一个存在一定是神，而不是人。"只有一个奴隶才会服从另一个人的权威，但道德高尚的人会在众生等级分明的结构中服从神的旨意。"遵守纪律的士兵，能心甘情愿地服从上级下达给下属的命令，他并不会因此而失去他的自尊，而是从内心自发地服从无形的超然的第一因。这与奴隶完全不同，奴隶只是出于对尘世的恐惧，为着尘世的荣华和虚荣而服从上级"。在他一生中，"成吉思汗认为只有那些具有真挚而深刻宗教情怀的人才是对他的国家有价值的人"。[471]

在他年轻的时候，成吉思汗最亲密的伙伴一直是每天陪伴在他身边的怯薛成员。在他成为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的统治者之后，他和他的那些怯薛伴当都渐渐老去，这些人大都分散到很远的地方领军作战，从中国、伊拉克直到俄罗斯。他们的儿子、孙子，以及越来越多纳入蒙古帝国的部落可汗的儿子成了怯薛主力。虽然随着帝国的扩张，怯薛的作用日益重要，但成吉思汗和这些年轻人之间很少有情感纽带，因为在他通往权力顶峰的漫长斗争中，他们没有和他一起并肩作战。于是他越来越多地转向其他人，转向内部的管理圈子和怯薛之外的人。

***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成吉思汗似乎充分意识到，他在尘世的时光很快将结束，而他也越来越感到沮丧，因为他还没有完成征服世界的神圣使命。宋朝依旧在中国的南方紧握政权，他的士兵刚刚勉强到达俄罗斯、西藏地区、伊拉克、朝鲜和印度的边界，欧洲、拜占庭、叙利亚和埃及仍然不在他的掌控之内。

但是，只有一个国家让他一直寝食难安，那就是自称为"大白高国"的西夏王国。早在十五年前，即1209年，他们曾宣誓永远效忠于他，但蒙古军队离开后不久，当西夏统治者接到命令，派遣士兵加入蒙古军队征服花剌子模汗国的战役时，他们曾经轻蔑地嘲笑这位蒙古领导人。西夏统治者回信说，如果成吉思汗真的是世界统治者，他就不需要西夏的帮助。如果他觉得自己的士兵无法击败花剌子模国王，那么他就不应该发起攻击。

西夏统治者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使成吉思汗感到愤怒和屈辱，但在当时他未能惩罚西夏，因为他迫切需要把重点放在征服花剌子模汗国的战役上。他推迟了惩罚傲慢自大的西夏的行动，但他永远不会原谅或

忘记。现在，他已接近生命的尽头，他决心要为他们的背叛而惩罚他们。

在1226年初的冬天，他出发了。他选择了他的塔塔儿妻子、聪明贤惠的也遂哈敦伴他出征。她的宫廷将成为他的总部。对蒙古人来说，战役开始时的寒冷是一个好的迹象，就如当他越过阿尔泰山去袭击花剌子模国王时就刚经历了一个炎热的夏季，正好遇上特大暴雪。但这一次的暴雪特别严酷。他们不得不给马裹上毡毯，以防止冻僵，他还命令士兵把羊毛塞进本已很厚重的袍子里，戴上狼皮帽子。[472] 他从位于土拉河的营地策马出发，此地在现代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附近的黑森林地区，空气清新，但很寒冷，细小的冰晶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烁，像飘浮在风中的钻石一样闪闪发亮。吼叫的公牛拉着大车，骆驼队中发出咕噜声，众多战马打着响鼻喷着气，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层雾，在大军行进时犹如一层保护云。

不到一周，蒙古军已到达唯一流入戈壁滩的汪吉河，并沿着河向南行进。[473] 虽然在冬季穿越砾石遍布的戈壁滩很艰难，但对人和牲畜来说，还是要比在炎热的夏天穿越容易得多。士兵从汪吉河中凿出大块的冰，放在牛车或骆驼背上运输。当他们在路上需要水时，便把冰块放进大锅里用牛粪火融化。

在离开汪吉河之前，成吉思汗决定停下来去打猎，猎物是一种名叫忽兰的蒙古野驴，可以在穿越贫瘠冻结的土地之前用来作军队的补给。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狩猎。他骑着一匹红灰色的战马出发追击野驴。[474] 当他策马飞驰追逐猎物时，他的马受到乱窜的野驴惊吓，突然拱背猛跳，并突然前冲，把他摔倒在地。他严重受伤，痛苦不堪。领袖人物任何时候从马上摔下来都不是好征兆，而在重要军事行动开始时发生这样的事对他麾下的士兵来说可能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即便是聪明的耶律楚材也无法把这样的事故解释为吉兆。

也遂哈敦马上意识到了以他那样的年龄率军出征的严重危险性，并急切地恳求成吉思汗推迟入侵西夏的计划，返回蒙古大草原疗养，但他拒绝了。这种撤退将使他的百姓更加担惊受怕，削弱他们对他的信心，助长敌人的气焰。他命令军队继续前进，穿越戈壁，跨过被称为三美人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向西夏进军。

成吉思汗明确地作出了他的选择，而且是有意为之。他宁愿在胜利的前夜死去，也不愿在必然的失败中死去。他不会在家中病榻上等待死亡，病榻四周围满诵经的医师和哀悼的亲人，而他的整个民族将会无所事事地等待着，看着他的每一次呼吸。他要死在征途上，继续为着命运曾应许他的一切而战。如果他不能像他的孙子莫图根那样在战斗中倒下，那么至少要以相似的方式死去，从而将他自己变成坚定的榜样激励他的部下。

***

西夏的国教是一种类似于藏传佛教的宗教，其神圣的国王取了个神的名字——不儿汗。在成吉思汗入侵时其统治者是依路出不儿汗，意即胜利之神。不儿罕山是神的圣山，但在蒙古人看来，人类自称神的名字是偶像崇拜。人类，即使是一个国王，也不能成为神。

作为一位活着的神，西夏统治者受到臣民虔诚的敬拜，而他又通过神奇的法术使自己的神性得以强化，声名远播。据传他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变形人。清晨，他“变成一条黄斑毒蛇”，中午，“变成一只棕斑老虎”，到了晚上，他“变成一个英俊的黄皮肤男孩”。[475] 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他可以成为天王库尔穆斯塔[476]，据说“一只名叫库不勒的黑鼻黄狗陪伴着他”。[477]

丝绸之路贯穿西夏境内，因此西夏拥有丰富的财富。西夏周围有大片的沙漠，因此他们感到安全，可以高枕无忧地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享受着精神颓废的生活。西夏统治者建造宏伟的庙宇，竖起宝塔让自己备受荣耀，里面装饰着超过真人身高的彩绘雕像和绘画。杜松和黄油灯燃烧的气味飘荡在他们举行的仪式上空，伴随着铿锵作响的铙钹、巨大喇叭的低鸣以及撼人心魄的鼓声。身穿珊瑚般鲜艳僧袍的僧侣们缓缓而行，他们用西夏版本的汉字出版插图书籍，把他们的祈祷印在迎风飘动的长丝横幅上。西夏人制作美丽的玉花瓶、雕刻木祭坛，用珍贵的金银塑造他们的神像，也用面粉、黄油、糖和沙子塑造易碎的塑像。西夏的宗教仪式抚慰视觉、听觉和嗅觉，使感官平静，甜美的言语和柔和的吟诵使人安宁。

对成吉思汗这样的蒙古人来说，在开放的山顶或在空旷的草原上祈祷会凸显个人的渺小，同时也使礼拜者直接与长生天接触。佛教徒和基督徒用砖、石和木材建造寺庙和教堂，上面覆盖着厚重的屋顶，好像他们不想让神看见或不想与上天进行个人接触似的。平民只有通过牧师才能与神联系。辉煌的艺术和建筑让站在高台上的祭司备受荣耀，那里似乎是宇宙的中心。

西夏佛教仪式和寺庙尊崇人造的物件，比如雕像、绘画和宝塔。当他们声称要崇拜一座山或一个洞穴时，他们就在那里立起人造图像和建筑，结果把山和洞穴弄得面目全非。他们更崇敬他们的祭司、僧侣和圣人，而不是崇拜上天，他们更愿意听人的声音，而不是他们的神的声音。他们的墙壁隔绝了自然，却放大了人的声音，使其在墙内回荡。蒙古人喜欢露天的地方，在那里，无论人类的声音多么响亮，永远比不过席卷大地的风声、河流的咆哮声，也压不倒狼嚎声、杜鹃不住的啼鸣和黑啄木鸟的敲击声。

佛教僧侣不仅把持信仰、主持仪式，他们还占据了大部分西夏王国政府的高级职位，并充当信使、秘书、外交使节和间谍。因为他们不能结婚，因此无法为自己的后代积蓄财富，转让权力，因此他们对国王和王室构成的威胁不大。佛教寺院是一种国家机构。每个宗教任命都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所以实际上所有僧侣都担任着国家官员的职务，而他们

的讲道、布道和写作都受到严格监督。未经国家批准，任何建筑物或宗教场所都不得建造，未经书面授权，甚至连一口井也不能在寺院的土地上挖掘。惩罚是迅速而严厉的，任何威胁国家或国立神职人员利益的行为将被判处死刑。 [478] 西夏王国和佛教信仰是合一的，因而他们的神和国王也是同等的。

国师赞助印刷了许多密宗经卷，称为“双修”，强调性活动，这样他才能借此产生“身体的大喜乐”。在写于元代末年的《黑鞑事略》中，一位记录蒙古征服西夏的观察家写道：“某向随成吉思攻西夏，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 [479] 成吉思汗很厌恶这种做法，“成吉思灭其国，先脔国师。国师者，比丘僧也”。 [480]

在征服西夏战役的大部分时间，也遂哈敦都在管理蒙古汗廷，让成吉思汗的伤病及其恶化的情况不为人所知。成吉思汗一直住在她的营帐里，外人无从窥见。他与他的来自兀良合部的大将速不台共同指挥战役。他们采取传统的进攻模式，首先攻击小城市，但他们遇到了比预期更顽强的抵抗。当夏天到来时，酷热影响了成吉思汗的恢复，于是也遂哈敦把汗廷撤到山上。他仍然在指挥，下令手下在夏季继续施加压力，他们攻下了几个小城市，但他们需要等待天气转寒之后再围攻首都银川。当河流再次冰冻时，他们于1227年初围攻首都。

西夏人处于绝望之中，但明白如果投降等待他们的下场，因此竭力抵抗，但是蒙古人的进攻更加猛烈。依路出不儿汗无法通过宗教权柄打动蒙古人，于是决定对他们大肆表示精神赞美。他急切地搜集神圣的经文、佛像以及其他珍贵的物品去献给大汗，希望能软化大汗的愤怒并乞求大汗的宽恕。当西夏统治者来投降时，成吉思汗已处于弥留之际，他拒绝接见西夏统治者，也不允许西夏统治者的宗教物件进入皇家营帐。在临终之际，他不需要敌人的经文或偶像。如果它们无法帮助这位西夏国王走上道德之路，保住他的王国，那么现在对他也没有什么用处。用《蒙古秘史》的话说，“成吉思汗心甚恶之”。 [481]

成吉思汗传了个话给等候在帐门口的西夏国王说，他已经被上天抛弃，因此不能再用不儿汗这个神圣的名字。他是一个凡人，不是神。成吉思汗命令他取个新名字——士都儿古，意思是归正者。名义上把西夏统治者带回道德之路后，成吉思汗判处他死刑。西夏佛教徒教导说，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命运犹如“夏花”或“秋露”一样脆弱和短暂。一个人或整个国家的命运无非就像“浪潮中的泡沫”一样。 [482] 不仅西夏统治者的末日降临，他的王朝和他的国家也同样遭遇了覆亡的命运。

西夏相信轮回转世的说法，因此在杀死国王之前给他一个适当的称号可以使他投胎转世有新的机会去做正确的事。为了确保被处决的国王将来不会投胎在王室，向蒙古人复仇，成吉思汗下令灭掉整个皇室家族。他说：“自唐兀惕百姓之父母直至其子孙之子孙，尽殄无遗矣。” [483] 他下令把西夏王献给他的礼物和金碗赠给刽子手。接着，蒙古勇士

把他们的愤怒转向西夏人，向他们施行了惨烈的报复。他们怨恨西夏迫使成吉思汗出来作战，说西夏应该对危及他生命的那场事故负责。蒙古勇士不知道自己的领袖是死是活，只管把他们自己的恐惧和哀哭变为愤怒。

成吉思汗已经气息奄奄，无法感受到这种愤怒。他叫停了杀戮，饶了其余人的性命，并委托在此次战役中辅佐他的妻子也遂哈敦照管西夏百姓。因为西夏已不再有王室成员，她将统治他们。他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使命，使西夏民族返回正义的道路。一些蒙古史料错误地记载，说他娶了西夏国王的寡妇，但如果他那时还活着，他的身体条件肯定不允许他结婚。同样，也有记载，西夏王后自己投进黄河淹死了，但故事的细节似乎直接从虚构的元杂剧《汉宫秋》而来，而不是来自历史记载。

据《蒙古黄金史》记载，随着成吉思汗的死期临近，他曾表示，希望他身边的好伴当和他一起去阴间，但他很快又意识到，他们需要留在世上继续进行帝国的工作。“你们如今不必死了。”他在咽气前这样命令他们。他要求他们帮助他的后裔统治这个国家。他要求学识渊博的大臣为他的百姓“在平川之地指示水源，崎岖之境指示道路”。 [484]

***

蒙古人忌讳用“死”这个字眼，代之以委婉语“成圣”。因此，在1227年8月，成吉思汗成圣了。在也遂哈敦的监督下，他的遗体被用毛毡卷裹，由他的私人护卫带回家乡安葬。他死时既非佛教徒、穆斯林、基督徒，也非道教徒或任何一种宗教的信徒。他死时是一个蒙古人。他仔细观察了他所知道的每个宗教的真假圣人，和他们有过长时间交谈，他没有谴责任何信仰，但他也没有在任何宗教中找到安慰。在他于1206年创立蒙古民族时，没有外国人参加仪式，在他死时，他也不允许任何外人挨近他。他吩咐把他的遗体送回圣山不儿罕山，那里曾是他的避难所，也是他一生中精神重建的圣山。在生前和身后，蒙古人都属于自然。他不需要陵墓。成吉思汗的纪念碑不是刻在石头上，也没有珍贵的宝石装饰，他的纪念碑立在他所创建的民族的记忆里。他的纪念碑是律法之歌。

他的家人聚集在一起纪念他，和他告别，但护送他回家安葬的是他忠实的怯薛伴当们，他的墓地正是他第一次遇到札儿赤兀歹的地方。现在，札儿赤兀歹的孙子也孙脱指挥着护送大汗灵柩的卫兵回家。半个多世纪前，当铁木真离开不儿罕山时，还是一个受虐待被遗弃的孩子，当他返回家乡时，他已经是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大帝。当年，老札儿赤兀歹是他的道德导师，而如今，札儿赤兀歹的孙子则是运送他遗体回家的向导。

他的一位战士代表整个蒙古民族向他们的领袖致以最后的敬礼。战士直接对成吉思汗说话，好像他仍活着一样，告诉他，他的手下正在送他返回生他养他的土地和水源。战士饱含深情地对他渐行渐远的灵魂喊

道："你那用枣骝马鬃编制的旗纛和'苏勒德'，你的战鼓、号角、军笳，都在那里!最重要的是，你的完整而且伟大的邦基、法律，乃在彼处!"[485]

他会死，但他的民族仍将存在。[486] 他的尘世生命不会长过一"奥德"，也就是两只胳膊伸开之距离，虽然他已成为强大的汗，但他和普通人一样都会死去，因此，在死时，他带走的并不比别人重要多少。然而，他的民族，可以囊括整个世界。《宝明经》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他的一生："铁木真生于天意，肇基上国，一统寰宇，终以圣成吉思汗闻名于世。"[487]

蒙古人为成吉思汗而哀伤，一位吊唁者在成吉思汗死后不久向这位已故征服者表达他的国人共同的痛苦，他们以前从未见到过这样一位领袖。他哭诉道："你抛弃普土大国驾返而去了。""你迷路了吗，我的主？""你竟似飞翔的鹰羽而逝去吗？"他代表全民族恳求，问道："你就把可爱的故土蒙古国遗弃了吗？"

静止的空气中弥漫着哀伤的挽歌。但对于那些记性好的人来说，成吉思汗早在四年前，在他从前线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中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 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488]

第十五章 内外的战争

盖棺才能定论。可以说，佛陀、耶稣、穆罕默德或政治人物如亚历山大、恺撒以及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最大的成就并不在于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们的遗产，在于他们启发他们的追随者所做的一切。成吉思汗最持久的影响来自他所制定的法律和他为他庞大而不断扩张的帝国注入的巨大能量。他的帝国在他去世后继续扩张了六十多年，之后又延续了一个世纪。

按照成吉思汗的愿望，他的人民没有用石头或木头建造纪念碑，也没有建造陵墓或庙宇来纪念他们的领袖。他死后，他的大多数百姓继续像在他统治时一样劳作。他的四个寡妇继续在他曾居住的蒙古包里发号施令。为他保留和使用的马儿可以随意吃草，仿佛在等待他的召唤。他的继承人继续以他的名义发布圣旨、签署信函。

按照他的指示，他的每个儿子将成为自己领土上的汗，但窝阔台将成为大汗，也就是众汗之汗。

他的遗孀和女儿都分到了土地、水域和百姓。土地的分配是按照他后代的出生先后顺序，从东向西依次进行的，而大汗继承人的领地处于正中间的位置。拖雷继承了帝国的东部，包括中国北方大部、东北和包括不儿罕山的蒙古东部地区。窝阔台汗继承了西蒙古地区，与拖雷的领地相毗邻。再向西(或者再向右，蒙古人以右为西)是察合台汗国，即现代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地区。术赤在他父亲去世前不久就死了。术赤的死和他的出生一样神秘蹊跷，但显然使得继位计划变得简单了许多。他的继承人继承了帝国最西端的领土，后被称为金帐汗国，现在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1228年，鼠年(据《蒙古秘史》记载)的春天，或1229年，牛年的夏天(据术外尼和后来的汉文记载)，蒙古人在一起集会，举行新的大汗窝阔台汗的登基典礼。他选择了达赖汗作为头衔，以便和自己的父亲区别开来。达赖在蒙古语中意思是海，这样，他就和阿提拉一样，将成为世界上四海之内所有土地的皇帝。窝阔台汗做的第一件事是重申他父亲的法律："成吉思汗原来颁布的法令和敕旨，应予以维护、支持和保卫，不许恶意改动、篡改和混淆。" [489] 他保留了父亲的将军和重要的军事人员，以及他的土尔扈特守卫，但他小心翼翼地把他父亲的怯薛军团从政治中剥离，指派他们永远担任他父亲的守陵人。

随着新政府成立，人们开始狂饮和宴乐。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大肆庆祝，以至于"天空一片喧闹，大地一片欢腾"。 [490] 窝阔台汗打开国库大门，慷慨地把财宝赐给他的追随者。术外尼写道，当时"草原上花草已茂盛"，因此"大地露出笑容"，而"他们内心毫无猜忌和欺诈的念头" [491] ，但有权势的人似乎很少能摆脱欺诈和嫉妒的念头。尽管漂亮的好话说

尽，比喻连连，一场斗争已经开始了。窝阔台汗登基典礼上的醉酒狂欢是即将到来的混乱的预演。

***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已经得到了各自的领地，但现在他们都想控制未来，这就造成了问题。他们是否应该派军队去攻击宋朝、高丽、印度、欧洲或伊拉克呢？每个兄弟都一心想拓展属于自己的领土，而不是扩张整个帝国。既然无法达成统一的目标，每个兄弟便指挥自己的军队，各自从不同方向分头出击。他们发动的战役在当时几乎相当于一场世界大战。

蒙古军队四处开辟战场，从高丽一直延伸到匈牙利，似乎这个帝国很快就会分裂。即使帝国的创始人成吉思汗也没有在相距如此遥远的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把兵力如此稀薄地分散在两个大陆。这些兄弟们都是既顽固傲慢，又鲁莽、冲动、爱冒险，这种性格本来很危险，但有时命运就是青睐傻瓜。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大胆的计划取得了成功。尽管遭遇了一些挫折，但蒙古大军在各条战线上都对敌人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他们似乎比在成吉思汗指挥下更加战无不胜。在窝阔台汗统治时期，蒙古勇士征服了从现代印度的克什米尔到波兰和德国的边界、从西藏高原到维也纳郊区的广袤领土。大部分的征服更像是一系列的大规模突袭，蒙古军队所到之处肆意洗劫，但现在他们太分散，难以把他们占领的庞大土地组织成为一个能有效运作的大帝国。

虽然蒙古军队赢得了战斗，但不一定赢得了战争。正像术赤在他生前公开宣称的那样，每个儿子似乎都急于征服和掠夺新领土，而不是管理已经征服的领土。一旦成吉思汗从中亚撤出，他的盟友尼扎里派便试图取代他，获得花剌子模领土的控制权。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人与阿萨辛教派的联盟很快宣告终结，起因是尼扎里派暗杀了蒙古指挥官察合台豁儿赤。[492] 根据穆斯林的史料记载，暗杀的目标是成吉思汗在西夏战役结束时收养的一个年轻的孤儿。但是，拉施德丁声称，这个男孩是成吉思汗和一个西夏女人所生的儿子。[493] 不管哪个说法是对的，只要此人和成吉思汗存在这种亲属关系，就意味着蒙古人不得不与尼扎里派断绝关系。

此后不久，为了进一步密谋反对蒙古人，尼扎里派同巴格达的哈里发联合于1238年派特使去见英格兰和法国国王，试图建立伊玛目、哈里发和教皇之间的联盟，共同对抗蒙古人。[494] 这个特使团以失败告终。

随着新征服的领土越来越多，财富滚滚流向蒙古，但帝国的心脏已经开始腐烂。在幕后，兄弟们争吵不休。作为大汗，窝阔台自然是最有权力的，他蚕食了他弟弟拖雷的领土，并下令建造边界墙，以免猎物逃走，尤其是阻挡大群的草原羚羊迁徙到他弟弟的领地。这对兄弟在互相争吵的同时，也逐步侵占了他们的姐妹、叔叔和他们父亲年迈遗孀的领地。与此同时，一代全新的妇女掌握了权力——她们是成吉思汗为儿子

们精心挑选的妻子，当她们的丈夫出外作战时，她们留在后方管理汗廷事务。直到1260年忽必烈崛起的前三十多年内，这些妇女维护了帝国的统一。

这批崛起的女人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是窝阔台汗的妻子——脱列哥那哈敦，她原是乃蛮部的公主，先嫁给了一个篾儿乞部领袖，后来又嫁给了窝阔台汗。她选任大臣、执行法律、划拨资金、听讼断案，管理相当于帝国政府的汗廷。虽然她是一个基督徒，但她资助伊斯兰学校，并慷慨捐钱资助道教经典出版发行。大部分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飞黄腾达的官员在窝阔台汗和他的妻子脱列哥那哈敦统治下继续飞黄腾达。虽然道家受到了汗廷的一些优待，但所有信仰都被允许自由崇拜。

在成吉思汗的一生中，耶律楚材曾劝他放弃一些旧的蒙古传统，采用汉人的政府模式。他缓慢而坚定地推行自己的理念，正如他说的，“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495] 窝阔台对儒家文化表现出比他父亲更积极的态度，在他的统治下，耶律楚材更加公开地推广中国思想，他的政策也取得了成功。1233年，窝阔台汗授予儒士与道教徒及佛教徒同样的税务豁免权。他还在他的蒙古首都哈喇和林建造了第一座孔庙。

耶律楚材招募有才能的儒士为官，管理帝国，并帮助他把权力从蒙古幕僚手中转移出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怯薛失去了断案的权力，他们的级别也不再高于军队统帅和政府大臣。高丽人最终被招募来取代窝阔台汗的一些蒙古卫士。为了保持大臣之间的权力平衡，成吉思汗曾聘用不同信仰和文化的人来充任职位，同样，在1229年，窝阔台汗招募耶律楚材的宿敌李志常，并任命他为国师。李志常曾作为一个年轻的道家弟子在阿富汗见过成吉思汗。[496]

尽管蒙古皇室家族中纷争不断，但李志常和耶律楚材对蒙古统治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使得汉人和周边受传统汉文化影响的民族比较容易接受蒙古人的统治。耶律楚材率领的汉人集团在汗廷仍不断与中亚穆斯林和基督徒发生冲突，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种族和文化上的摩擦而不是宗教冲突。他坚持将更多汉人政权的文牍做法引入汗廷，并在文件中使用一些儒家词语，使其对汉人来说不那么陌生，有助于改善蒙古人在汉人中的形象。总之，耶律楚材对蒙古帝国产生的影响远超过那些宗教领袖们，虽然他们曾见过大汗并设法引导他，但就其影响来说，则相形见绌。即使诋毁耶律楚材的人也认识到他的重要性，用其中一个人的话说，耶律楚材的话语“盟犹在耳，皎如星日”。[497]

窝阔台汗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中，致力于征服金朝的战争，但他似乎也在不断与他的弟弟拖雷争夺。拖雷似乎很享受作为摄政王的短暂时光，希望在窝阔台汗之后成为乾纲独断的统治者。

窝阔台汗并非没有认识到拖雷和他的四个强大而睿智的儿子对自己的统治构成的威胁。拖雷的儿子在他们的母亲唆鲁忽帖尼别吉领导下团结一致，而窝阔台汗却和他的儿子们不断争吵，他的儿子们之间也不断

争吵。[498] 他的儿子贵由和所有人都合不来，经常与人吵架，根据《蒙古秘史》的说法，窝阔台汗说他是一只臭鸡蛋，希望他像一只臭蛋那样腐朽(独卵其朽乎)。窝阔台汗曾希望自己最喜欢的孙子失烈门继承帝国，但他并不具有他祖父所期望的本事。

1232年，在终于击败金朝的前夜，拖雷突然死了。有人说，他像往常一样只是喝醉了，在昏迷中死去了。但《蒙古秘史》却提供了冗长和奇怪的说法，说开始时窝阔台汗病倒了，不能说话。宫廷萨满的诊断结果是，因为汉地水土之神主作祟。[499] 萨满为其神主献上金、银、牲畜、粮食、奴仆等任何他们想要之物，只求他们释放大汗，但病情只是一味地加重。最后，他们通过“检查受害者的内脏”占卜出，只有献上他的家人作为牺牲，这些神灵才会放弃让窝阔台汗瘫痪的诅咒。据说窝阔台汗突然醒了，要水喝，问自己这是怎么了。当巫师告诉他，神灵释放了他，代价是必须牺牲他的一位家人时，窝阔台汗环顾四周，目光落在他弟弟拖雷身上。

巫师为拖雷准备了一杯“诅水”，他顺从地喝下并死去。《蒙古秘史》还记载了一段据说是拖雷死前的讲话，这段发言像诗一般美丽，声称他想要为哥哥献出生命。在这个情节中，受害者大概是自愿求死，而这一段插曲和札木合死时的事件类似，当成吉思汗给他自由时，他却选择了死亡。

***

窝阔台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忠诚地伴随着他的士兵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1234年，在近五十岁的时候，窝阔台汗退出了战斗。他离开战场，回到了蒙古故乡。他的健康状况因为酗酒而不断恶化，他回到了草原，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在此期间他似乎饱受他弟弟鬼魂的搅扰。他可能中风，或被其他严重疾病所折磨，因此他的妻子脱列哥那掌管汗廷，正如在成吉思汗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也遂哈敦所做的那样。攻陷金朝之后，脱列哥那以她患病丈夫的名义发动了新的征服战争，试图征服南宋、高丽、钦察和西藏。当窝阔台汗的儿子和将军们出去作战时，脱列哥那和她的大臣们管理帝国，以她自己的名义和权威颁布法令。

在脱列哥那统治时期，蒙古帝国建立了第一个首都——哈喇和林，西方比较熟悉的是其突厥语名称——喀喇昆仑(Karakorum)。它坐落在流经杭爱山的鄂尔浑河畔，早期的突厥部落曾在此建都，但是现在此地成为庞大的世界帝国的首都了。城内居住着来自花剌子模和波斯的金匠、来自中土的文书和陶匠、来自俄罗斯的士兵、来自高丽的职员和造纸匠，昔日的皇室女主人如今成了女佣，曾经住在豪华宫殿的人如今成了拾粪人。他们中间甚至有一位来自巴黎的金匠。各种宗教的占星师、僧侣和祭司都蜂拥来到蒙古汗廷。这里有基督教教堂、穆斯林清真寺和佛寺、道观，除此之外，访客还可以看到孔庙和儒学学院。

窝阔台汗在1241年驾崩后，脱列哥那成为监国，并在其后的五年间

统治着世界史上最大的帝国。虽然今天在蒙古之外很少有人记得她，但没有任何男人或女人曾统治过如此广大的领土、如此庞大的人口。直到16世纪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统治开始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和她所统治的帝国相比肩；直到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兼并印度和缅甸之前，没有任何一位君主统治过如此广大的地域、如此众多的臣民。

脱列哥那的“塔穆嘎”(tamgha)，即烙上她的牲畜身上的印章，是一支风格独特的弓箭，这个印章成了她的官印，取代了她丈夫的S形官印。她的弓被刻在钱币上，以不同语言发行，醒目地宣示她的权威。在帝国内部最常用的语言突厥语的硬币上刻有Ulugh Mughul Ulus Beg，即“大蒙古国统治者”字样。

***

窝阔台汗死后，耶律楚材逐渐失去了青睐。虽然他年仅五十四岁，但已经成为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活化石了。尽管他依然受到尊重，但他的意见不再被重视了，他在宫廷生活中的作用已无足轻重，取而代之的是其他保证能搜刮更多税赋和奢侈品的幕僚。这些人并没有跟随成吉思汗参加漫长的征服战争，在夺取胜利的征途上无尺寸之功，但现在却来摇着尾巴，急切地想盘剥他的臣民。耶律楚材于1244年死于哈喇和林，据报是因成吉思汗继承者的施政方向而心碎，伤心而死。

耶律楚材死后不久，兀良合部的速不台也退休了。他是老札儿赤兀歹的侄子，也是尚存于世的成吉思汗核心幕僚圈子中最受尊重的一位。他是在不儿罕山铁木真青年时代就认识成吉思汗的最后一个人，他在他的朋友去世后继续征战长达二十年之久。速不台从中国一路打到匈牙利，征服的城市比任何其他蒙古将领都多。在晚年，年轻的皇室成员不太情愿地授予他尊荣，除此以外就再也不理他了。他对蒙古政治很是反感，于是也像耶律楚材一样退出了。勃朗嘉宾修士报告说曾在1247年看到过他，据说当时他的体重增加很多，但也有人说他回到了匈牙利，1241年他曾在那里取得过一场大胜利。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兀良哈台，以纪念他们部落的起源，如今兀良哈台已经成长为一位成功的将军，在东欧作战。 [500] 有人说，这位老武士想和他的儿子一起在多瑙河畔终老，但这个传奇故事只是基于传闻。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是有人故意编造的，目的在于掩盖速不台对他亲手协助建立的蒙古帝国的失望。1248年速不台去世了，那个帝国的老卫士走了。

***

随着时光流逝，即使是最结实的绳子也会松开，维系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金索也不例外。表面上一切如常，一如既往，但黄金家族内部的政治倾轧在加剧。1246年，脱列哥那已经巩固了帝国，并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接下来她打算把大权交给她那位不受欢迎也很无能的儿子贵由手中。贵由登基的那个夏天冷极了，下了雪暴和致命的冰雹，哈喇和

林周围地区发起了洪水。因为凛冽的寒风，甚至可能是一场龙卷风，造成了很大破坏，大汗登基仪式不得不推迟到八月底。

蒙古汗廷允许而且鼓励外国人参加这次登基大典，这是史无前例的。根据不同的史料，多达两千位外国官员及其两千名仆从出席了大典。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是蒙古人的诸侯了，其他人则试图讨好这个新的世界强权。虽然汗廷不允许外国人参与选举或见证实际的登基典礼，但允许他们在贵由登基之后进贡，并表示效忠。1246年的哈喇和林大会是第一次各国元首和大臣参加的国际峰会。拉施德丁写道："埃米尔、宗王、使节和代表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来到他的斡耳朵。" [501] "从未有人见过，类似者不见诸史册的集团。"他们来自远方的新德里苏丹的宫廷、罗马教廷、土耳其苏丹塞尔柱的宫廷以及巴格达哈里发的宫廷。格鲁吉亚两位王位竞争对手(都叫大卫)前来致敬，并恳求任命自己为新的格鲁吉亚国王。亚美尼亚国王的兄弟来了，俄罗斯大公和他的儿子大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王子也来了。两千顶帐篷搭建起来接待众多客人。

人们担心，登基大典时的恶劣天气预示着暴风雨般的统治，实际上也是如此。贵由没有接待一些来访的使节，直截了当地断绝了与尼扎里阿萨辛教派伊玛目的所有联系。术外尼写道："至于阿拉木特的使者，他不屑一顾地把他们打发走，对他们携来的信函的回答，采用了相应严厉的措辞。" [502] 贵由太忙了，此时还顾不上处理尼扎里教派，但他们先前的背叛行为已经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我们很幸运，有个特殊的目击者亲历过贵由汗的选举和登基仪式。没有人料到，甚至根本没有人注意到，1246年7月22日，在混乱的选举期间，罗马教宗英诺森四世派出的首位特使不顾军队的威胁，与前所未有的大群外国人一道抵达鄂尔浑河流域。英诺森已命令方济各会的两位特使分别走不同的路线前往东方。他们的任务是与蒙古人取得联系，和他们谈判，带回急需的有关他们的政治意图和军事实力的信息。教皇派出了葡萄牙人劳伦斯，但此人似乎去了小亚细亚，然后就杳无音讯了。教皇还派出乔凡尼的勃朗嘉宾修士，他早年曾是亚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的弟子之一，当时已六十五岁了。身体肥胖的修士于1245年复活节当天从法国里昂出发，陪同他的是波希米亚的斯蒂芬。他们完成了从欧洲到蒙古的首次使命。和其他外国人一样，勃朗嘉宾发现蒙古政治和礼节相当令人困惑。他显然试图把教皇的信交给贵由，但却被礼貌地带到脱列哥那的宫廷，因为她仍在统治着帝国。勃朗嘉宾惊讶地写道："脱列哥那哈敦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帐篷，可容纳两千多人，在她宫帐前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官员和求助者。"勃朗嘉宾在她的宫廷里待了四个星期，坚称周围有约四千人熙来攘往。由于语言障碍，他并不确切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认为蒙古人正在举行选举。 [503]

蒙古汗廷里欧洲人的人数之多超乎勃朗嘉宾的预料。蒙古人刚刚结束在匈牙利和波兰的战役，因此蒙古汗廷充斥着"懂得拉丁语和法语的罗塞尼亚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国人)、匈牙利人、罗塞尼亚教士和与鞑靼人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其中一部分人三十年来一直和鞑靼人

一起征战或从事他业，他们熟悉鞑靼这一民族的全部历史，因为他们懂得鞑靼语，某些人与他们一起连续生活了二十年，另一些人也达十年之久，时间长短不一”。 [504]

在这些效力于蒙古汗廷的欧洲人帮助下，勃朗嘉宾设法为贵由汗翻译了教皇的信。由于贵由汗有一位基督徒母亲，因此，他显然比较了解基督教，起码比基督徒对蒙古人的了解要多得多。事实上，大汗有一个私人教堂，“在他的大帐幕前一直设有一个基督教的小教堂，无论那里聚集有多少鞑靼人或其他人，他们仍如在其他基督徒中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唱圣歌，以希腊的方式敲钟报时”。 [505] 通过侦察，蒙古人清楚地知道教皇既不能代表欧洲，也不能代表基督徒，因为他既没有统治欧洲，也没有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基督徒的效忠。

大汗试图派蒙古使臣随同勃朗嘉宾一起回到欧洲，但遭到了勃朗嘉宾的强烈反对。他不想让蒙古人看到欧洲人是如何分裂的，也不愿为他们的性命承担责任。蒙古人没有坚持。为了表示善意，脱列哥那送给他们用狐狸皮和丝绸缝制的外套，以缓解漫长返国旅程中的疲累。 [1] 蒙古人在当时很少接受“不”作为答案，尽管勃朗嘉宾拒绝陪同蒙古使臣前往欧洲，但蒙古人还是打发他们回家了。

英国教士马修·帕里斯在他的一生中记下了每年发生的大事，据他报道，蒙古代表于1248年抵达罗马。“同一年的夏天，两位来自鞑靼的特使由他们的王子派来见教皇。但他们来的目的秘而不宣，教廷里无人知晓，文员、秘书以及其他人，甚至那些和教皇熟悉的人都一无所知”。由于语言障碍，欧洲人和亚洲人很难相互理解，“他们带给教皇的信在使节向西行进过程中被翻译了三次，从不熟悉的语言翻译成较熟悉的语言”。 [506] 蒙古人声称，成吉思汗是上天在地上的代表，依照他的律法，蒙古人保护并尊重所有宗教。但基督教会对此难以接受。教会官员赶紧把异教徒传达的这个非基督教的消息隐藏起来，以免人们得知。

傲慢、骄傲和贪婪很快就分裂了蒙古皇室。贵由重申他祖父和父亲的法律，并且继续使用和他父亲同样的头衔：达赖汗。他这么做可能并不是出于忠诚，而纯粹是偷懒而已。他贪婪地寻求权力和财富，却对管理帝国并不怎么感兴趣，他让政府官员和使节到他母亲的宫廷，而且似乎满足于让她继续管理政府。拉施德丁写道，“他大部分日子里昼夜纵情酒色”，除了少女，“他在位期间，心情忧郁，没有社交的兴趣”。 [507]

他的母亲为他铺就了通往大汗之路，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快就爆发了。当他清洗她母亲的宫廷时，她试图抵抗，但她当时年纪可能已经六十多岁了，健康状况也不佳。母子之间的斗争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脱列哥那皇后突然死了，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她驾崩细节的记录文字。她可能是自然死亡，但也可能死于一个针对她的阴谋。我们将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位传奇皇后的死亡真相。

***

尽管贵由汗曾公开宣布要遵守他祖父制定的法律，但他仍然处决了一些成吉思汗指派来帮助治理中国的穆斯林官员。他对这些人的敌意似乎并不完全是基于信仰，而是为清除牢牢控制政府的老臣们所进行的一种努力。这些突然的变化营造了一种恐怖气氛，因为每个群体都觉得自身已经或即将成为无辜的受害者。何为谣言和谎言，何为事实，几乎无法分清。每个宗教派别似乎都害怕其信徒可能被消灭。历史记载了不同信仰的信徒如何竭力让其他宗教遭到取缔。一些汉人官员主张取缔佛教和道教， [508] 天主教徒想消灭被他们贬斥为异端的亚洲基督教——景教。有报告声称，一些佛教僧侣曾向贵由汗建议，屠杀蒙古人控制下的所有穆斯林，而很多人对此坚信不疑，这普遍反映了人们的偏执心理。

但贵由汗并不打算这样做，于是他们又劝他阉割穆斯林男子以防止他们生养众多子嗣。据术兹札尼的记载，贵由汗曾起草了阉割穆斯林男子的法令，但是当一只狗攻击一个佛教僧侣并咬掉他的生殖器后，这个法令被撤销了。 [509] 据说这是所谓的安拉决心保护穆斯林的信号。无论这样的故事多么不可能，它们还是进一步激发了双方的对立情绪，并加剧了权力斗争。

贵由汗宣布："凭借上帝的恩典，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所有的土地都赐给我们了。若没有上帝的命令，人能做什么呢？" [510] 但《蒙古黄金史》告诉我们，成吉思汗的后裔享受着他的劳动成果，却破坏了他一生的工作。

贵由汗的生命很短暂，他的死亡很神秘。他只做了十八个月的大汗，便于1248年春天死去。当时他的军队正穿越蒙古西南部，向他的堂兄拔都汗位于现代俄罗斯境内的领地进军。他死时年仅四十二岁。他是怎么死的？是死于毒药、酒精、发烧还是战斗？还是死于疲惫、创伤？有很多猜测，但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他的遗孀——信奉基督教的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气质与能力和他完全一样，成为摄政者。她的统治持续了三年，两倍于她丈夫的统治时期，但她缺乏她已故婆婆脱列哥那那样的政治技巧和眼光。

斡兀立海迷失越来依赖她的基督徒幕僚管理她难以控制的政府，而她则和一群萨满一起，通过占星术和烧焦的羊肩胛骨的裂缝占卜未来。

用术外尼的话说，她整天跟萨满在密室策划"以实现他们的妄念和狂想"。 [511] 她不住在新都哈喇和林，而在中国西部的额敏河沿岸建立了她的游牧宫廷，此地靠近她丈夫去世之处，远离她的主要竞争对手——东方的拖雷家族。

贵由汗死后，皇室家族内部的冲突开始公开。龃龉日益以宗教对抗的形式呈现出来，贵由汗的两个儿子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宫廷，相互竞争，都希望成为大汗。术外尼写道："智者之悟性在那思虑的泥潭中挣扎而不能找到出路。" [512] 宗教上的分歧不是引发冲突的根本原因，但宗教是其他竞争对手借以表达异议的工具。蒙古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它

还要再延续一百二十年，但已经开始腐烂。蒙古人可以打败任何敌人，但他们不能控制自己。

1250年，斡兀立海迷失接待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也称为圣路易斯)派来的特使，多明我会的修士隆瑞莫的安德鲁，并充分彰显了她的贪婪和愚蠢。这位特使此行并不是作为附庸向蒙古人输诚的，而是希望找到一个可能的盟友，并建立一个反穆斯林的蒙古欧洲联盟。虽然斡兀立海迷失的军队并没有进攻法国或在战场上同法国士兵作战，但她傲慢地假定，安德鲁是代表他的国王向蒙古人交出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或至少交出法国的。她给国王路易九世的回信中充满了恭维话，但却没有对他派出特使长途跋涉表示赞赏。相反，她狮子大开口，提出非分要求，并自吹自擂地发出威胁。她罗列了一系列因未能取悦她而被处决的君王名单，然后命令法国君主："每年多多送来你们的金银，如果你们不从，上述君王就是你的下场。"法国国王根本不理这封信。有一个流传下来的说法，他的反应只是：他很后悔派出了这个使团。 [513] 一个人的失败往往使另一个人的力量得以增强。斡兀立海迷失的弱点让别人得到机会参与进来，这是一个远强于她的女人，她战胜了皇室家族中的所有男人。在争夺汗位的残酷斗争中，唆鲁忽帖尼别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她是成吉思汗的基督徒妻子亦巴合别吉的妹妹。她也是一位基督徒，是成吉思汗最小的儿子拖雷的遗孀，她养了四个才华出众的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

1251年夏天，唆鲁忽帖尼别吉与拔都汗通过秘密谈判结成同盟。拔都汗是创立俄罗斯金帐汗国的术赤汗的儿子，颇有领袖才具，他本来可以成为大汗宝座强有力的争夺者，但由于他父亲术赤的生身父亲是谁存有疑问，他失去了资格。因此术赤系便与拖雷系联合起来，一致对付窝阔台系懦弱、分裂、酗酒成性的后裔。在唆鲁忽帖尼的精心策划和详细指导下，她的四个儿子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夺取了蒙古帝国的控制权。

她的长子蒙哥成了新的大汗，并夺取了本已授予皇室家族其他成员的领土。她的其他三个儿子瓜分了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忽必烈负责统治蒙古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包括西藏的大部分地区；旭烈兀控制了中亚直到克什米尔和西藏西部的地区；最年轻的阿里不哥负责统治蒙古故土。这四位兄弟控制了除俄罗斯以外的整个帝国，由于唆鲁忽帖尼与拔都汗结盟，因此拔都汗及其家族保留了对其领地的控制权，逐渐成为独立的汗国。

唆鲁忽帖尼在丈夫去世后曾长期监国，统治华北和蒙古东部，她本来可以仿照脱列哥那和斡兀立海迷失的先例，自己也成为女王。依她的才华，她几乎可以肯定地成为一位最伟大的蒙古皇后，但现在她已经六七十岁了，接近蒙古人所说的"岁月圆满"。她拒绝使用唆鲁忽帖尼哈敦这个头衔，一直坚持使用唆鲁忽帖尼别吉，即公主的头衔。她一生都在奋斗，就为了这一天，让她的儿子成为大汗，而她也决定帮助他们继续前行。

在长期的意志较量中，斡兀立海迷失作为合法当选的摄政者，拒绝参加选举蒙哥汗的忽里台，也拒绝承认他为大汗。她坚持只有窝阔台汗的后裔才可成为大汗，在她看来，成吉思汗已把汗位永久赐予窝阔台家族了。在这场斗争进行之际，唆鲁忽帖尼于1252年春去世了，而年轻的术外尼也在此时首次抵达哈喇和林。因为他的父亲已经为蒙古人效力，二十六岁的术外尼有机会在蒙哥汗登基仅仅几个月后便访问哈喇和林。作为亲历者，他对新政府的观察记录很宝贵，但无疑有些过度粉饰。

术外尼对蒙哥汗的赞誉甚至比对成吉思汗的赞誉还要夸张，而他从未见过成吉思汗。他写道："世界是一座蔷薇园，季节绚丽光灿。" [514] "当世界皇帝已吉祥地登上帝国的御座，有如在权力的极峰的太阳。"蒙哥汗下令："人们不得踏上冲突和争斗的道路。百姓不应当相互械斗和打架，而应愉快过活，高高兴兴。" [515] 术外尼铺张了十几页的篇幅描写蒙哥汗统治的美与善，直到庆祝活动结束。"在诸王启程，他们的事情发落完之后，他把他的注意力转向朝政，校枉纠偏，惩奸平叛"。 [516] 这些华丽的辞藻并不能证明即将在蒙古汗廷展开的恐怖行动有任何正当性。

直到此时，窝阔台系和拖雷系之间的斗争大都是语言之争、政治游戏和虚张声势，但蒙哥汗母亲的去世似乎使他摆脱了所有的约束。他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他母亲长期的竞争对手斡兀立海迷失。他把她和窝阔台汗幸存的遗孀一起逮捕。斡兀立海迷失肯定有很多缺点，诸如无能、傲慢和贪婪，但她不应该遭受如此残酷的虐待。蒙哥汗把她带到法庭，扒光衣服，公开折磨。折磨够了，在她还活着时，把她"裹在毛毡里，扔进了河里"。

对她的正式指控是巫蛊，但在1254年1月，蒙哥汗私下告诉法国特使鲁布鲁克，她是最差劲的女巫，"比狗更卑鄙，她是个'贱货'"。蒙古帝国的最后一位监国皇后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517]

鲁布鲁克被当时极端的偏执狂和草木皆兵的气氛所震惊。蒙古汗廷戒备森严，大汗和他的官员疑心很重。每个外国特使抵达后都会被传唤，要求交代他的生平和旅行的详细信息。威廉在他的旅行记录中作了解释："他们对我们的询问最详细，我们从哪里来，来干什么，我们的工作是什么，等等。" [518] 他认为这种小心翼翼的举措是因为害怕尼扎里教派的暗杀，该教派当时跟蒙古人实际上处于交战状态。他写道："提出这项要求，是因为蒙哥汗接到报告，四十个刺客已用各种伪装进入城内，并伺机杀他。" [519]

虽然其他与会者也讲过关于尼扎里刺客的类似故事，但这有可能是蒙古人自己编造并散布的谣言，目的是强化安保措施。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人因此而被逮捕，对斡兀立海迷失或刺客威胁的指控成了加强保安措施的借口，但事实上，蒙哥汗廷的官员只是在迫害自己的蒙古同胞，大多数受迫害者就是他们自己家族的成员。

***

蒙哥汗已经夺取帝国的控制权，但他需要确保自己对权力的控制。要做到这一点，他想彻底摆脱所有反对派的干扰。他审问了几乎所有与窝阔台汗和他倒霉的儿子贵由汗执政有关联的人，并清洗了他的许多堂兄弟、配偶、子女和盟友。威廉写道，他“命令他们所有人都被绑起来投进监狱，并对他们的命运想了一会儿”。他自诩是成吉思汗法律和传统的捍卫者，但在蒙古法律下，他并没有合法借口来折磨囚犯或惩罚他们，只有一个由整个皇室家族代表组成的议会才可以决定处决一名黄金家族成员。相反，蒙哥汗决定成立一个由他自己控制的法官组成的法庭审判他们。

失吉忽秃忽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仍然担任蒙古民族的最高法官，他担任此职务已经长达四十年之久。成吉思汗曾特别宣布，任何人不得改变失吉忽秃忽记录的法律，形容他为“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窝阔台汗还任命他为唆鲁忽帖尼统治的中国北方领土的首席大法官。在大清洗发生时，失吉忽秃忽还活着，几乎可以肯定他仍是政府里最受人尊敬的官员，但他很快被解除了职务。 [520]

成吉思汗同父异母的兄弟别勒古台也曾是一名法官，也还活着，但他也被排除在权力圈子之外。成吉思汗的怯薛成员曾负责执行和维护法律，但现在他们的权力只是保护他的坟墓。蒙哥汗似乎决心要消灭任何与他祖父关系比较紧密的人。蒙哥汗逮捕并处决了老札儿赤兀歹的孙子也孙脱，后者曾一路护送成吉思汗的遗体返回不儿罕山。 [521] 老镇海，一位曾如此忠实地服务于成吉思汗的基督徒大臣，也被抛弃了。根据拉施德丁的记载，镇海“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困惑，没有人听他的话语和建议”。 [522] 最后，1252年秋天，镇海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遭到处决。

蒙哥汗任命了新法官和官员进行起诉。他不想看到周围任何人与成吉思汗有直接联系。他知道，若要推翻他祖父的法律，他需要去寻找一些更权威的先例。据拉施德丁记载，他在记录亚历山大大帝冒险故事的《亚历山大传奇》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蒙哥汗的一位幕僚为他读了其中一篇文章，当面对叛军的时候，亚历山大曾派信使去见他以前的老师亚里士多德，问“他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他们”。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用话语来回答，而是连根拔起一棵大树，说明老的必须拔出，新的才可以成长。 [2] 根据拉施德丁的说法，蒙哥汗“非常满意这个故事，意识到这些人必须废掉，其他人保持原位不变”。也许这个故事是虚构的，而且它明显违背了成吉思汗的法令和教导，但这些都无关紧要。蒙哥汗发出了他的判决。

***

蒙哥汗从不儿罕山成吉思汗的长眠之地运来了他的斡耳朵，这些帐篷曾属于成吉思汗的妻子，如今已成为圣所。蒙哥汗把这些帐幕搭建在他统治的首都哈喇和林附近的草原上。他要在这些帐幕里审判他的亲

族。根据拉施德丁的记载，蒙哥汗到达成吉思汗的帐殿中，登上座位，亲自审讯他的皇家堂兄弟、亲王和王子。[523] 当时的人们相信，成吉思汗灵魂的一部分仍住在这些帐殿中，既然他不制止这样的审判和惩罚，那么想必他会祝福蒙哥汗的统治和审判。

蒙哥汗的检察官用了一种有效的技术，开始时不直接问问题，直到被告意识到情况不妙时才开始来真的。这就像猎人让猎物奔跑，直到它累了，就可以很容易地捕获一样。检察官会在几天里慢慢审讯，让被告尽量多说，知道他们最终会暴露一些东西，可以定他们有罪。拉施德丁写道："他们问得很仔细，直到最后在那些人的言辞中发现矛盾，他们的大逆不道行为已确定无疑为止。"[524]

对堂兄弟姐妹们的公诉持续了很多天，其间证人都被毒打，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出卖他人。审讯沦为公开的酷刑。当畏兀儿的佛教统治者被带进来并否认对他的指控时，"他们拼命拧他的双手，使他筋疲力尽扑倒在地，接着又用木拶紧箍他的前额"。[525] 其他人被带进来指证他，"吃够鞑靼粗暴鞭笞之苦头后，吐露实言，讲出心里隐藏的东西"。这位畏兀儿统治者被送给他的百姓公开处决，他的兄弟被勒令把他斩首，而他的同伙"被锯为两半"。

"共有七十七人，都被处死"。还有其他数百人受到其他处罚。皇室成员不能流血而死，但蒙哥汗似乎决心要使他们的死亡尽可能的残忍可怕。两个被告兄弟"被用石头塞进嘴里杀死"。然后他们的父亲被逮捕并"与他的儿子们相会了"。[526] 以这种方式处死，被定罪的人就不能发声做最后的祷告，使他不朽的灵魂脱离他的身体。

也许是出于嫉妒，知道成吉思汗一直青睐他的孙子莫图根，因此莫图根的两个儿子被挑出来接受特别残酷的虐待。蒙哥汗故意选择了仇恨他们的法官审讯他们。拉施德丁写道："警吏已像索命天神般地从天而降。"[527] 莫图根的一个儿子不里，曾在欧洲作战，并从德国带回一个团的撒克逊矿工传授他们的技能。他被讥讽为酒鬼、恶霸，并被遣送到俄罗斯秘密处置。莫图根的另一个儿子与他的妻子一起被带到法庭。当着她丈夫面，妻子被折磨和审讯。法官"内心充满了宿怨"，在一番敷衍了事的审讯之后，"他命令把她踢成肉泥"。[528] 这两名男子的死亡方式没有具体说明，但是以复仇为目标的法庭似乎颇为乐意为被判处死刑的每个人设计一个特别可怕的死亡方式。

起初被逮捕的皇室成员人数是77人，随着起诉遍及整个帝国，人数很快增加到数百名，更多的敌人被发现。在清洗皇室成员和高级官员后，蒙哥汗似乎决心扩大清洗的范围，任何与他的祖父有过宗教或精神联系的人都被清除。新的统治者都是他的骨血之子，他们不想自己身边有任何人还能声称与成吉思汗有更直接、更个人的联系。

根据术外尼的记载，有一位廷臣"戴着枷锁，被关押近两年，在这段时间，遭受了各种各样的审讯和惩罚，他对生活的乐趣绝望了"。最

后“他想一死了之，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命运安排，供认了他从没有犯下的罪行。他被投进河里，而他的妻子和孩子被剑所杀”。[529] 术外尼像他的父亲一样，是蒙哥汗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仍记下了在蒙哥登上汗位后所进行的大清洗中很多这样的暴行。举一个例子，他写道，蒙哥汗下令把一个犯人“从左侧打到右侧，直到他的四肢被打烂。于是，他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沦为奴隶，遭受屈辱”。[530] 当蒙古皇室家族彼此倾轧互相戕害时，帝国的边境不断遭到蚕食。一旦蒙哥汗完成了他的内部清洗，便决心恢复成吉思汗的帝国。他派军队对外发起了新一轮的征服，夺回失去的领土，并扩展到新的土地上。他对家族成员的无情处置只是他的计划的前奏，他希望建立一个更大更好的蒙古帝国。他的外敌有充分理由担心最坏的结果即将到来，而蒙哥汗已准备把他们最恐惧的事情变成现实。

第十六章 燃烧的书籍

在所有曾见过成吉思汗的宗教学者中，只有年轻的道家弟子李志常得益最多、活得最久，但注定要以最残酷的方式死去。他的教派在阿富汗与成吉思汗会面之后得到迅速发展，李志常已成为道教最受尊敬的人物。他出版了一本关于他与成吉思汗之间论道的书。因为他与这位征服者的亲密关系，他备受很多年轻的蒙古人尊崇。

1251年，蒙哥汗任命李志常掌管蒙古人统治下的所有道教机构，并传唤他到哈喇和林。蒙哥汗想要一举完成两件事。他希望给人一种印象，自己是忠实于成吉思汗并遵守他的法律的，邀请一位以前曾与他的祖父共事的人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他试图在他相互脱节、杂乱无章的帝国的各个环节巩固权力，把李志常召到汗廷对加强新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对宗教团体的控制至关重要。

虽然哈喇和林贵为蒙古帝国的首都，但李志常来到这里，发现它并不比一个用土墙围起来的草原村庄大多少。

蒙古精英宁愿住在城外空地上搭起的自家蒙古包里，因此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真正住在城里。哈喇和林是侍者生活的地方，为汗廷服务的官僚和工匠住在那里。首都有一个汉人工匠居民区、一个穆斯林市场区，另一个用于储藏物品，还有一个长长的仓库装满了贡品和宝藏。尽管缺乏宏伟的建筑，看上去也不是很美，但哈喇和林却有许多崇拜场所，生动地体现了成吉思汗的宗教宽容政策。法国特使威廉·鲁布鲁克和李志常差不多同时抵达哈喇和林，据他说，他看到了十二座宗教建筑，包括一座教堂和两个清真寺。城里也有道家、儒家和佛教寺庙。

尽管存在这些宗教机构，而且他母亲还是基督徒，但蒙哥汗和他的兄弟们却依赖传统的萨满。新汗和他的宫廷大部分时间住在草原上用毡毯围成的蒙古包里，远离有着众多神灵的封闭的都市。中华、欧洲和穆斯林世界来访的宗教代表们经常嘲笑蒙古汗廷依赖这些巫师和算命先生。[531] 威廉颇不以为然地写道："其人民和政府依赖占卜。"蒙哥汗告诉他："他(神)赐给我们占卜师，我们按照他们的话行事，我们过得平平安安。" [532] 威廉证实："占卜家说的任何话，都必须马上去做。"萨满"预测做任何一件事的吉凶，因此如无他们的允许，蒙古人就不调集军队或进行战争"。[533]

蒙哥汗在他的宫廷中养了如此多的萨满，以至于在1253年，他不得不将他们分成两组：治病的和算命的。他任命他最喜欢的萨满祭司阿忽察监督献祭。萨满有许多专长，有人特别擅长控制天气、预测未来，有人则擅长举行食肉仪式和其他典礼。威廉·鲁布鲁克抱怨阿忽察是算命先生的教皇，他的帐篷离大汗的宫帐只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距离。[534] 萨满与汗廷的关系比聚集在首都的外国僧侣、祭司和伊玛目要密切

得多。

在哈喇和林城里，不同信仰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住在一起。这让基督徒深感不便，威廉很不高兴，因为他将不得不与从格鲁吉亚、俄罗斯、叙利亚、希腊和亚美尼亚来的东正教教士住在一起，并在强制性的和谐气氛中举行基督教仪式。他们都声称敬拜同一位神，但似乎没有一个基督徒很喜欢其他派别，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从没有在一起崇拜过。在两百多年里，东正教基督徒和天主教基督徒几乎没完没了地打仗。他们互相开除对方的教籍，并诅咒对方的信徒下地狱。当天主教徒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无法打败穆斯林时，他们经常向东正教发泄愤怒，抢劫东正教的教堂，甚至洗劫君士坦丁堡大教堂。

威廉从欧洲来到蒙古汗廷，并没有按照蒙古宫廷礼仪呈上礼物，只是高傲地吹嘘他的基督教教派代表神说话。蒙古基督徒很清楚，首先承认耶稣的礼拜者是从东方来的三个博士，因此亚洲基督徒才是耶稣的第一批门徒，而不是欧洲的天主教徒。此外，亚洲基督徒所用的圣经是用耶稣曾用过的同一种语言写成的，在他们举行的仪式上也是用耶稣曾用过的同一种语言，而欧洲人还要把耶稣的话语翻译成自己的拉丁语。宗教信仰自由，尽管被夸得天花乱坠，似乎只是鼓励不同信仰的人士更加不信任他们的对手。

萨满在汗廷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士则凌驾于其他外国宗教之上。成吉思汗在阿富汗会见老神仙丘处机后，道士一直享有特殊的地位。脱列哥那、窝阔台汗和唆鲁忽帖尼曾支持穆斯林、基督教、道教以及佛教机构，但只有道家有资格宣称，成吉思汗是自己教派的赞助人，而李志常正是那种特殊关系的亲眼见证者。

在成吉思汗去世三十年后，道教已成为蒙古帝国仅次于皇室家族的富裕机构。在李志常的领导下，他们与窝阔台汗的家人紧密地站在一起。如果唆鲁忽帖尼的儿子想要掌握所有的权力，那么他们将不得不大张旗鼓地打击道家。若要完成针对窝阔台汗和他家人的革命，只杀掉直接的对手是不够的，蒙哥汗也需要摧毁他们家庭以外的盟友网络。因此李志常必须除掉，但他的案子需要特别处理，因为他行使的权力直接来自成吉思汗。

蒙古人殄灭了西夏，中国境内的道士不断攻击佛教僧侣和寺院，人们对此记忆犹新，这一切给蒙古汗廷带来了一个战略性问题。道教基本上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但要征服金朝和宋朝领土周边的几个小王国，或者与它们结盟，蒙哥必须设法获得佛教徒的支持。所有周边的王国都信奉佛教，包括喜马拉雅山的西藏、高丽、大理王国(在如今的云南省)，以及再向南的缅甸蒲甘王朝、位于现代越南境内的所有王国和老挝、柬埔寨。如果这些王国视蒙古人为反佛教的，那么他们就可能与南宋皇帝联手推翻蒙古汗廷。若要获得他们的支持，或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蒙古人必须表现得似乎是支持佛教的。为了平息佛教徒的怒气，除了李志常个人必须剪除外，整个中国庞大的道教网络都必须摧毁。

蒙哥之所以青睐佛教徒、讨厌道士，还有一个原因——佛教僧侣都是极为熟练且机灵的战士，这一点很出人意料。1232年在高丽的一场战斗中，一个和尚射了一箭并杀死了一位蒙古指挥官。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一个和尚竟然把一个蒙古指挥官干掉了。那个高丽和尚金云湖承认，自己的作战经验很少，说："在战斗的时候我连弓箭都没有。" [535] 也许他过谦了，一个未受过训练的和尚居然把一位强大的蒙古将领射下马，这显示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给蒙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这个和尚的成功是因为他的作战技能还是来自神的启示，都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道家所提供的长生不老药方在佛教僧侣的武技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后者知道如何战斗。蒙古人想让他们成为盟友，而不是敌人。

蒙哥汗无法延揽高丽武僧加入他的阵营，便传令古老的河南少林寺的方丈福裕长老来到哈喇和林，筹建他的武术寺庙。邀请李志常和少林寺方丈住在同一座小城，他们俩注定要触发对抗，但那似乎正是蒙哥的目的所在。

佛教徒不能声称与成吉思汗有任何个人联系，因为没有哪个著名的佛教领袖曾见过他，他也没有给予佛教任何特权，但佛教武僧有一个名叫金刚手菩萨的守护神。佛教徒一般不吃肉，但少林和尚不仅允许而且坚持吃肉，这和蒙古传统信仰完全和谐。少林和尚吃肉的理由基于一个古老的传说，说的是金刚手菩萨是如何成为他们的保护神的。据说有一天，金刚手菩萨向一个刚入寺不久的少林和尚显形，问："小孩儿，你想变得强壮吗？"这个男孩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于是金刚手菩萨告诉他必须吃肉。

"和尚不能吃肉。"男孩说。

金刚手菩萨端起一碗肉，举起"他的长刀"把肉强灌进小和尚嘴里，但他拒绝咽下去。金刚手菩萨威胁，如果他不听话，就用自己的霹雳棒杀了他。小和尚吓坏了，不得不吞下了肉。

突然，男孩活动了一下肌肉，"露出了他强健的肌肉和骨骼，他看起来几乎像神一样"。 [536] 然后，金刚手菩萨把武术的神圣秘密教给了他，从此，佛教武僧开始竭力捍卫其宗教的全新传统。

***

李志常对福裕方丈和他的少林和尚不感兴趣。佛教徒是舞刀弄棒的僧侣，而李志常则是一位学者。他对语言的武器比较有信心，而对这些新来者的武艺一窍不通。李志常一生都在著书立说，这有助于他在蒙古的等级结构中一步步爬升。他的名望主要来自一本他描写自己会见成吉思汗的书，但在其后几十年里，这本书的重要性逐渐消失了。于是他决定再写一本新书。为了对付人们对道士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李志常出版了一本书，从学术角度有力地证明他的道教对其他宗教，特别是佛教所具有的宗教优势，但这一举措被证明是一个可怕的战术失误。

他的新书对道教和佛教起源的历史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让他的门徒分发他的《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他按照《老子八十一化图》，提出了一个更清晰也更石破天惊的观点，即佛教是道教的一个分支，老子曾经是佛陀的老师。[537] 在他含有大量插图的书中，李志常称，佛陀只不过是受到点化的几个西方胡人之一，并不是像他的信徒声称的那样，是自己顿悟成佛，而是由于老子教导和点化才成佛。李志常把佛教描绘成对道教的模仿，而且是不完美的模仿，而道教才是正宗的纯粹的宗教。少林僧人被这种亵渎激怒了，指控说，所谓的老子八十一个化身中有五十个是从佛教剽窃的，在一系列化身中，唯一真正的化身只有一个，就是老子自己。[538] 把老子和佛陀相比，就像把一只牡鹿和一头麒麟相比一样。佛道之争正式开始。[539]

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官员不能指控李志常或道士犯罪，因为他们获得了成吉思汗的个人支持。但这本新书的出版为他们提供了指控的理由。李志常声称，一种宗教可以优于另一种，这直接违背了成吉思汗的教导和法律，使得他的敌人有了指控他犯法的借口。

佛教徒发现了道教徒的弱点，也找到了尽量削弱成吉思汗与道教关系的方法，他们攻击道士最强有力的权力声索，他们开始嘲笑李志常的师父——当年曾在阿富汗见过成吉思汗的老神仙丘处机。这位圣人的弟子虔诚地声称，这位圣人与成吉思汗同年去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祷告，并且在他临终的时候“异香满室”。佛教徒反驳道，这位道教大师是在茅厕里去世的，因为他拉稀，他的床已被搬到厕所里。尽管他声称自己是不朽的，但他却一直无法治愈自己的痢疾。他们散发了一首讽刺诗，揶揄他的名字“长春”，讽刺道教徒自称得道，自欺欺人。

一把形骸瘦骨头，

长春一旦变为秋。

和濉带屎亡圊厕，

一道流来两道流。[540]

李志常本来希望自己的新书能够保护道家被赋予的特权，没料到他却掉进了一个自己挖的陷阱。蒙哥汗召见他，要求他证明在他新书中引发众怒的有关老子和佛陀的神学见解。被激怒的佛教僧侣要求他公开收回他的谎言，全部销毁他的书，没收道教财产，转送给佛教徒，作为其诽谤的赔偿。

遗憾的是，虽然术外尼当时正在哈喇和林，但他对汉人之间的神学争端没有多少兴趣。他正忙着协助他父亲为中亚战役作准备，这场战役试图将蒙古人的统治扩展到尼扎里派的土地，直至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术外尼似乎更关心蒙古朝廷的财政与哈喇和林商人们的交易，而不是来来往往的僧侣。事实上，金融问题才是他最急于关注的重中之重，僧侣们引起他的关注，只是因为别人都要纳税，而他们不用纳税。

术外尼写道，一旦蒙哥汗“稳居汗位，他的注意力不再顾及那些自私自利者和嫉妒者的案子后，他把他的思想转向征服世界上最遥远的东部和西方”。1252年，他把忽必烈派往包括契丹在内的东部地区去继续征服中国，然后他着手安排和组织他的另一个兄弟旭烈兀的事情，委托其征服西部地方，即中亚地区。 [541]

术外尼是在1253年秋天离开的，但就在几个月前，另一个外国人已经来到，而他对宗教问题有着浓厚兴趣。

***

威廉·鲁布鲁克于1253年春天到达哈喇和林，虽然这两个伟大的蒙古历史学家在长达六个月时间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我们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们曾见过面，或互相认识。和术外尼相反，威廉不仅见证了这场宗教冲突，而且还参与到了其中。他写道，蒙哥汗派人送信给基督徒、穆斯林、道教徒和佛教徒说：“你们各自说自己的教义是最好的，你们的文书——就是书籍也是真的。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汇聚一处，举行一个辩论会，写下各自的教条，让我本人能够知道真理。” [542] 他召集他们举行大辩论，遵守明确的规则。一位蒙古官员告诉参赛者：“这是蒙哥汗的旨意，谁都不得说神的命令与它不符。”“禁止辱骂别人，或者喧闹而妨害这次辩论，违者斩首。”僧侣们洗耳恭听，噤若寒蝉。

蒙哥汗没有传召萨满参加辩论，因为他们的宗教强调的是行动，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和想法。正如蒙古圣歌所唱的那样，他们的宗教是“无书之宗教，无纸之宗教，无字之宗教”。他们的宗教依赖“鼓和鼓槌，以及口舌相传的经文”。 [543] 萨满声称直通上天，无须争论或辩论。辩论都是外国人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宗教是书本上的宗教。萨满只是这场经文大战的旁观者。

在正式辩论之前，蒙哥汗给了相互对立的学者一定的时间研究、冥想、准备他们的意见，并进行辩论前的演练。组织辩论的蒙古人把鲁布鲁克分配到基督徒一方，但在模拟辩论中，他却扮演佛教僧侣，反对基督教。“让我们假设我是属于那个教派，因为他们说上帝不存在，现在我们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他告诉他的队友，他知道摩尼教的思想已渗透到佛教神学里。他说“他们都信奉下面的摩尼教邪说，事物一半是恶，一半是善”，并相信转世的灵魂“从一个肉体转移到另一个”。

蒙古人似乎把所有相互竞争的其他教派都看成了同一个宗教。一位蒙古官员曾恳求路易九世国王遵照成吉思汗的教义，平等地对待基督徒兄弟。这位官员在给国王发出的命令中，认真地解释道：“世界之王已经颁布命令，在神的律法中，拉丁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聂斯托里教徒和雅各教徒，以及所有那些崇拜十字架者一视同仁。因为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要求我们伟大的国王不区分他们，他将用虔诚和仁慈统治所有的基督徒。” [544]

更令这位法国特使厌恶的是，到了准备辩论的时候，相互对立的基督教教派不仅被分在同一个辩论团队里，而且他们还与穆斯林混为一体，于是辩论会上只有三派：道士、佛教徒和基督徒-穆斯林。儒士没有被列入其中。对手们很难实际上就这些问题进行辩论或比较不同的信念，因为每个小组都只想引述自己的经文，他们都觉得自己引用的经文足够充分，可以作为无可辩驳的证据。他们都以自己的根据为基础进行推理，三方一个接一个侃侃而谈。

***

辩论会开始于1254年夏天，当时正是蒙古每年的那达慕运动会季节。这一年除了蒙古人最爱的三个体育项目——射箭、赛马和摔跤外，还有神学辩论，而这场辩论可能会吸引生活在该市的外国外交官和使节。然而，真正的观众则远远超出蒙古首都居民之外。蒙哥汗希望，有关这场辩论的信息能够传遍他的帝国内外，见证蒙古人的公正和宗教宽容，从而有助于赢得整个蒙古帝国佛教徒的更多支持。

和其他在户外举行的活动不同的是，辩论会定在大汗新搭建成的宫殿举行。鲁布鲁克写道："这座宫殿就像一座教堂，中间是中殿，两边排列着两排柱子，有三个门向南打开。大汗坐在很高的地方，坐南朝北，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他，通向他的宝座是两行台阶：一个人端着他的杯子从一边台阶上去，从另一边的台阶下来。"附近"站立着端杯子的人，还有献礼物的使节，而他自己像神一样坐着"。男人坐在西侧，女人坐在东侧。"在南边，柱子的右侧是一排升高的凳子，像一个平台一样，他的儿子和兄弟坐在那里。在左边，安排得像时尚表演，他的妻子和女儿坐在那里。只有一个女人坐在他旁边，不过她的位子没有他的那么高"。[545]

辩论很大程度上遵照蒙古摔跤规则。在每一轮辩论结束时，会宣布获胜者，随后大家大喝一通马奶酒。没过多久，基督徒-穆斯林队被淘汰。他们并不是认真的竞争者，但他们最初的亮相使这场辩论看上去更公平，不会被认为仅仅是道教徒对抗佛教徒的辩论。

佛教徒赢得了第一轮辩论的胜利。为了锁定胜局，他们对道士发出了刑事指控。这些指控理由充分，促使蒙哥汗下令进行司法调查。辩论刚结束，司法调查便开始了。道士已成为被告，而佛教徒则是控方。

道士最主要的罪名是传播虚假经文，其他指控还包括毁坏佛像和圣物，抢夺佛教财产，对佛教造成物质和精神损害。[546] 李志常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佛教徒一直嫉妒他的特权地位，但过去的两位大汗及其官员一直站在他一边保护他。他未能及时明白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没有做出积极努力，针对指控的罪行进行有效的辩护，而只是一再提醒人们成吉思汗曾赐予他的教派特殊权利。当被问到他和他的追随者是否犯有指控的具体罪行，如滥用权力、没收佛教财产、伪造证件、散布虚假信息、强迫佛教徒皈依道教、滥用其免税地位等，李声称

他对这些过犯一无所知； [547]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过，那也是别人做的，他没有参与其中，也没有批准过。

少林寺方丈就这些指控全面挑战李志常。方丈要求解释，既然李志常并不清楚他的下属的不法行为，他如何能声称自己是道教掌门人？要么他知道并批准过他们的不法行为，因此犯了罪，要么他不知道，因此犯有渎职罪。无论是哪种情况，他显然不能胜任服侍大汗的重任。李志常没料到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受如此公开的羞辱，更何况是在大汗面前。此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身处险境。在夏天的酷热中，他开始汗流浃背、面红耳赤、理屈词穷。 [548] 他在法庭遭受了彻底的羞辱，现在他要面对他的第一个处罚。

1255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蒙哥汗颁布圣旨，命令收缴李志常的所有诽谤书，交给佛教喇嘛，所有被摧毁或损坏的佛像必须等价复原。 [549] 蒙哥汗羞辱了道士，但他的判决是有限的，并未完全解决谁将成为主导宗教的问题，因此佛教徒并不满意。经过这种初步的司法调查，蒙哥汗认为，由蒙古法官主导一场全面的刑事审判，像他对他的皇室成员那样，并不能服众。由蒙古人主导的审判可能被解释为对道士的迫害，甚至是对汉文化的攻击。蒙哥汗试图挑动道士对抗佛教徒，这样每一方将直接把敌意朝向对方，而不是朝向蒙古统治者。

蒙哥汗认为，如果他组织新一轮的公开辩论，让对立宗教相互攻击对方，他将能更有效地赢得中国的公众舆论。这样他将不必对一个宗教派别进行审判，因而冒犯汉人普遍尊重的一种信仰，于是他也就不必为此承担责任了。他会表现得好像支持蒙古宗教宽容政策，同时让竞争对手互相削弱对方。与任何战斗一样，谁在新一轮的辩论中取胜就显示出天意，并影响公众舆论。

到目前为止，佛教一方是由少林寺方丈代表的，他所修习的宗派在华北、高丽和日本很流行。但蒙哥想要在南方地区，特别是在西藏取得支持，这些地区一直由窝阔台家族所控制，直到最近才被蒙哥汗攫取。藏人修习的是一种更深奥的密宗佛教，该教派也在不丹和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地区广受欢迎。蒙哥汗有时会采取一种策略，即强迫竞争对手联合起来一起工作，因此他选择了一位来自克什米尔的佛教喇嘛那摩和少林方丈合作。 [3] 那摩会说流利的蒙古语，这是少林方丈不具备的优势。

汉人极力批评这一决定。传统中国史书《资治通鉴纲目》是一部经过增订的史书，其中就包括了元代史。该书在一则长篇评论中概述了对那摩的批评："君权之存在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各司其职。""唯此那摩，出身异域……游方为生，无以养亲。剃发敝怀，乃不知忠君之职。不婚无嗣，故不知为夫为父之责。蹲踞足踵，故不尊长者。离群索居，消极遁世，故不知朋友之职，无经邦济世之能。虽获'和舍'之号，何所教也？焉能为人师也？" [550] 批评者粗率地总结了他对那摩和其他僧侣的评价，写道："物以类聚。" [4]

***

下一轮辩论定于1256年7月在哈喇和林之南的帝国营帐举行。蒙哥汗把辩论安排在蒙古首都之外举行，目的是撇清自己和辩论结果的关系。 [551] 辩论变成了摊牌，少林寺方丈率领一众和尚控诉道士们。 [552] 一位汉人宗教学者和另一位汉人宗教学者对抗，蒙古人则是中立的旁观者。事实上，蒙哥甚至没有出席这次辩论会。

当蒙哥正忙着准备入侵南宋的时候，他的弟弟旭烈兀也调集军队向西进军，进攻穆斯林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辩论的结果现在已不成问题了，按照传统，蒙哥汗把控制蒙古本土的重任交给了他的幼弟阿里不哥，当蒙哥、旭烈兀和忽必烈出外征战时，阿里不哥留在后方。阿里不哥所要做的就是主持辩论，然后宣布胜利者是佛教徒。

阿里不哥是四个兄弟中最传统的。他是草原人，喜爱旷野上生气勃勃的蒙古生活方式。他对神学观点争论不怎么感兴趣，自己的哥哥们在遥远的土地上发动战役时，他却不得不待在家里监督争吵不休的僧侣们，他为此闷闷不乐。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战士，而不是一名裁判。当他的哥哥们率军在亚洲大陆驰骋时，辩论却在他的控制下停滞不前。

***

术外尼的写作总是很生动，辞藻华丽，而当他叙述自己参加的摧毁波斯北部尼扎里教派的战役时，他的语言顿时更加鲜活起来。他怀着对尼扎里教派难以抑制的强烈仇恨加入了旭烈兀的军队。他描述了战役中引人入胜的细节，介绍了该教派的简单历史，叙述了对这个一度坚不可摧的堡垒令人难以置信的征服过程。尽管尼扎里教派曾与成吉思汗结盟，但术外尼并不掩饰他对该教派的仇恨。

占领阿拉穆特之后，蒙古人按照惯例开始对其中的一切进行彻底的调查。作为一位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学者，术外尼设法得到许可，占有珍贵的图书馆和档案，那里收藏了几个世纪的书籍和记录。他“收到并执行命令，检查他们的库房所存之物，以及图书馆收藏之物，看看其中是否存在有价值之物”。这项任务他干得很起劲，“现在我正在审查图书馆，他们曾在此存放图书很多年了，其中充斥着有关他们信仰的说谎论著和错误的教义(其中也夹杂着高贵的《古兰经》和很多好书，正如善恶交织在一起一样)，我希望从中发现珍稀资料”。从这些记录中，他急切地“把切合实际又适合放进这段历史中的一切都复制下来……引用已经被确认和验证过的事实”。 [553]

无论是研究有关阿拉穆特的尼扎里教派历史，还是研究成吉思汗和伊玛目哈桑三世之间交往的历史，术外尼的记录都是唯一的原始史料。史家有时会篡改历史记录，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信仰，但很少有人有机会完全毁灭证据。作为一个天才的学者，术外尼却有着令人惊讶的道德缺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他毁掉了许多记录。 [554] 并不是只有野

蛮人才烧书，术外尼烧毁了许多文件，理由是它们含有异端和亵渎神明的文字。他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成吉思汗与伊玛目之间的关系似乎是相当重要的，但他竭力降低这种关系的重要程度。术外尼的破坏行为只增加了这个谜团的神秘性。

术外尼选择与后人分享的只是这些异教徒的邪恶，而他对这个教派的失败感到欣喜异常。他引述了伊玛目与哈里发的秘密谈判，但却没有提到伊玛目与成吉思汗的联盟。[555]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包含有尼扎里教派伊玛目和成吉思汗之间的首次会议记录，而他一定读过这些记录。但他决心竭力降低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因此把它们全都毁灭了。他发现了精彩的记录，挑出了他想要的。“至于剩下的内容，涉及他们的异端邪说，既无圣传为根据，又无理性作支持的书籍，我全部付之一炬”。[556] 他几乎是在炫耀自己做了件好事。他把尼扎里教派的覆灭和他们的图书馆的毁灭描绘成上帝的伟大作为。“这样，被他们的邪恶污染了的世界被清理了”。[557]

***

旭烈兀捕获了尼扎里派的伊玛目，把他和他的家人一起押解到蒙古，在那里他们被处决。伊玛目的追随者被打死，该教派被消灭殆尽。在消除这一障碍后，蒙古人现在做好了准备，继续向巴格达进军。

尽管旭烈兀的哥哥忽必烈在中国的战役进展缓慢，屡遭挫折，但旭烈兀对穆斯林世界中心发动的进攻却进展神速。他穿过了他祖父以前曾入侵过的领土，指挥他的军队策马驰过乌兹别克斯坦并跨越波斯北部。现在他要征服属于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领土，作为他计划中的入侵叙利亚和埃及的第一步。虽然成吉思汗征服的一些国家在后来的三十年中脱离了蒙古人的统治，但没有一个国家在人口、经济、文化上完全复原。旭烈兀基本上是在重新确立蒙古人对已征服领地的统治。现在他的主要目标是巴格达，那里执政的哈里发在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的战争中保持中立，至少是一个心照不宣的蒙古盟友。

这时，哈里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当成吉思汗入侵中亚时，蒙古人没有继续前进攻占巴格达，故而他不相信他们现在会这么做。当旭烈兀的军队威胁到他正在衰败但依然奢华的都城时，哈里发以为来自所有国家的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会起来保卫他，因为他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领袖、先知穆罕默德的继任者、上帝选定的在地上的代理人。然而，没有人来。

当蒙古人包围巴格达时，哈里发只组织起一小支军队，由库尔德指挥官率领来捍卫他和这个城市。绝望的库尔德将军说：“敌人已到了大门口，但在巴格达只有区区几个骑兵与我们同在，而异教徒人数却有二十万之众。”他建议哈里发逃离：“圣主最好登上一艘船，指引藏匿他的宝物的方向，让他的家人上船，而我们也同样将在船上服侍圣主。”他催促哈里发藏身在巴士拉附近的岛屿，“直到万能的上帝来拯救他们，将异教

徒打败”。[558]

旭烈兀就像一场风暴，在战斗开始之前散布可怕的心理恐怖。渡过底格里斯河后，他的军队在巴格达周围挖了一条沟，并建造了一堵墙，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城中居民就像鸟儿被困在一张网中，插翅难逃。然后，他们开始慢条斯理地装配他们的攻城机械和强大的进攻武器，而弓箭手则发射宣传单飞过城墙，进入城市。[559] 一些箭头载着安全通行证，供所有宗教学者和文人使用，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或任何其他信仰的信徒，都可使用，但哈里发例外。

哈里发曾把大量金钱花在建筑宫殿和搜罗后宫美女上，而不是在军事上，此时他依然沉溺于幻觉，声称“真主已赐给我们胜利”。过去他总是不给他的军人发军饷，于是现在很多人已经弃他而去了。一位阿拉伯诗人抨击他，说他是自作自受，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高官们忙于聚敛财富”，而“侍从们有时喝得烂醉，有时鼓瑟弹琴”。他抱怨说，哈里发的继承人沉溺于性爱，“到处都有皮条客与妓女”。在巴格达，亵渎被提升为伊斯兰教教义，这个城市没有法律公正或真正的宗教。[560]

巴格达的守军难逃覆灭的命运，但他们无法理解，一支异教徒军队如何能征服伊斯兰世界的首都，于是他们出城准备决战，但他们第一个致命错误是在低洼地上扎营。蒙古人善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总是能找到任何战胜敌人的优势并将之扩大。旭烈兀的工程师很快使河流改道流往低地，所以“洪水在半夜涌向他们。他们开始逃离洪水，丢盔弃甲，剑鞘泡进水里”。这些士兵一触即溃。

哈里发给蒙古人献上了丰厚的贡品，包括“钱币、宝石、珠宝、织锦、漂亮的衣服、金银花瓶和其他精致的物件”。他答应如果能饶他们一命，他就让旭烈兀做苏丹。[561] 他从监狱里释放了一直扣押在那里的蒙古使节，给他们穿上漂亮的衣服，送给了他们大量的黄金和阿拉伯马，然后把他们送还给蒙古人，希望能博得蒙古人的欢心。他求旭烈兀饶了“他的儿子和女儿”的性命，并竭力把责任推给他人，可怜兮兮地为自己找借口，“所发生的那些事都是邪恶的幕僚所为”。哈里发承诺，如果蒙古人同意，穆斯林“将成为他的奴隶和臣民，并且进贡”。[562]

旭烈兀对苏丹这个外国头衔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只有蒙古大汗才有权授予别人头衔，也只有蒙古人才能得到上天的全力支持。旭烈兀向哈里发发出的信息严酷而无情：“除非你的灵魂之眼已使你盲目了，否则你应该看看太阳和月亮的作为，看看大地和时间之王把什么赐给了成吉思汗。” [563] 蒙古人占领了这座城市，俘虏了哈里发和他的儿子。他们“给他戴上脚镣”，把他囚禁在一个帐篷里一周，在此期间，旭烈兀在思考如何处置哈里发。旭烈兀在给他的囚犯判刑前，“亲自到哈里发的宫殿视察宝物和新旧奢侈品。这些东西曾被藏在别处的仓库里，他把这些珍宝全部找到了，把它们挖了出来”。

旭烈兀判处哈里发死刑，下令处决他。在他被蒙古靴踩死之前，他

的手下把他放在毛毡或皮革的地毯上，把周边缝起来像一个麻袋，这样，他的血就不会洒到地里。穆斯林声称蒙古人害怕让穆罕默德的继任者流血，但事实是，他们认为他的血是如此邪恶，会污染大地、玷污日光。旭烈兀赦免了哈里发的女儿和小儿子，但把他年长的儿子以同样的方式处死。

经过四十天的洗劫，死者塞满了街道。雨后，这个城市发生了瘟疫。腐烂的尸体生出了无数的苍蝇，臭气弥漫空气，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法呼吸。蒙古人粉碎了哈里发王国，建立一个新的政府统治巴格达，其官员包括基督徒、犹太人以及不同的穆斯林教派，包括逊尼派、什叶派和神秘的苏菲派。

1258年夏天，消息传到蒙古汗廷，旭烈兀占领了巴格达城，并杀了哈里发和他的继承人。术外尼再次接管了该城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在蒙古统治下的巴格达，书籍价值很高，因为食物和钱币奇缺，幸存者把书本当作钱币。 [564] 然而，尽管书籍如此有价值，术外尼仍然毁掉了他不喜欢的或者与他想要描写的历史相抵牾的书籍。

阿拉穆特和巴格达惨遭破坏，哈里发和伊玛目惨遭杀害，这一切都是对成吉思汗宗教宽容法令的嘲弄。与此同时，在蒙古本土，对宗教自由的另一种致命一击即将发生。

***

当兄长们出去扩展帝国疆域的时候，阿里不哥一直无法平息道士和佛教徒之间的纷争。最后，他把互不相让的双方召来开会，但他却不习惯于扮演公正的角色，很快便把这场辩论弄得乱七八糟。他不仅没有使人们相信蒙古统治的公正性，反而强化了人们心目中的印象——蒙古人根本不懂宗教情感。

佛教徒来见阿里不哥，呈上一个佛像头，指控道士锯掉了它。阿里不哥命令把一位道教官员带到阿里不哥面前，不是平静地问他问题，而是非常愤怒，吼叫着责问他，之后，阿里不哥突然开始用鞭子抽打那个倒霉的道士，要他招供罪行。过了不多久，阿里不哥又拿起佛像头开始砸他。阿里不哥愤怒地叫喊着，而那个道士痛得尖叫起来，鲜血从他头部涌出。 [565]

史书没有记载被打道士的名字，他很快被带离法庭，不久便一命呜呼了，他的门徒匆匆把他埋葬。只是后来才传出消息，被杀害的道士不是别人，正是李志常。他的死亡使双方都进退两难。道家被羞辱了，因为李志常被认为和他的前任一样，是不会死的。而佛教徒则声称他并没有死，这只是道家编造的小把戏罢了，目的是为了避免辩论失败。 [5] 为了证明李志常的确死了，阿里不哥命令把他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在草草验尸后，蒙古人宣布，他并不是死于人为的创伤。正如当年通天王的死被归因于上天的愤怒一样，官方解释这位道士死于雷击。在蒙古

人眼中，这是最糟糕的死法，就像上天定点处决一样，对道士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预兆。

道士们失去了领袖，对汗的愤怒极为恐惧，一个个垂头丧气，不知所措，陷入混乱。他们不敢再参加下一场预定的辩论。阿里不哥没有表现出蒙古朝廷的贤明和大度，只是坐实了人们普遍的怀疑，蒙古人不过就是诉诸暴力解决所有问题的野蛮人而已。佛教徒看来已经通过残暴的武力赢得了辩论。蒙古汗廷竭力掩盖事实真相，以免人们知道这场辩论是以血腥方式宣告结束的，这样人们便会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道士的罪行上来，而不是他们的领袖被谋杀这个事实。

蒙哥汗不能允许辩论以这种血腥的方式宣告结束。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并修补对汗廷声誉造成的损害，他决定把解决这场辩论的重任从阿里不哥手中转交给他的弟弟忽必烈。他本人正忙于在华南的战事，无法亲自处理这种情况，而忽必烈已回到北方。忽必烈在几个兄弟中受的教育最好，但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像蒙哥汗或旭烈兀那样显赫，也没有取得耀眼的战绩。他首先决定暂停诉讼程序，然后提出在一个新的地点重新开始辩论，以免受到上次辩论丑闻的影响。

忽必烈决心不像他弟弟一样冲动鲁莽。他选择了把辩论场地移出由阿里不哥控制的哈喇和林，向南转移到他自己在内蒙古的上都。他设计的辩论要营造一种客观和深思熟虑的氛围，因为他知道，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将决定他在中国的声望。忽必烈决定，不再邀请基督徒和穆斯林参加辩论。相反，他请儒士加入这场精心设计的辩论会。这一招非常精明，让儒士参加辩论显示了蒙古人对中国传统的新态度。儒士总是权力的维护者，他们接受邀请，有助于蒙古对中国文化和知识精英统治的合法化。

三百位佛教徒和两百位儒士联合起来反对两百位道士，结果不言而喻，但这次，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精心策划。少林寺方丈继续率领佛教代表团，他选择了十七个僧侣作为他的团队领导人和辩论会主讲人。忽必烈考虑非常周到，确保所有地区，尽可能多的大城市和寺院都能派代表出席。除了这位方丈，他还从克什米尔请来了那摩，从西藏请来了十九岁的八思巴，而后者命中注定要成为忽必烈的重要喇嘛，还有其他来自云南以及遥远的中国西部绿洲城市鄂尔多斯的代表。[566] 如此众多知识渊博的学者与会，使得几个会议记录得以出版，包括作为佛教团队十七位领导人之一的汉人方丈祥迈撰写的《至元辩伪录》（1264—1284），该书出版于1291年。[567]

忽必烈在开幕式的讲话中解释说，尽管我们没收并焚烧了李志常的神学作品，但是还有很多道士没有改变他们的想法或内心的感受。他宣布，输的一方必须采用获胜一方的生活方式、食物和服饰，这就意味着道士将不得不剃光头，或者佛教徒要留头发。新加入的儒士似乎被豁免了这些有辱人格的惩罚。尽管严重寡不敌众，但是道士们认为他们可以重新开始，能够捍卫他们宗教信仰的基本信条。据祥迈记载，他们急于

开始战斗，“时先生每凫跃鹤列蓝袍锦绣，攘臂争前”。 [568] 随着他们与佛教徒的辩论进行，也由于儒士加入作为最后仲裁者，他们兴高采烈的舞蹈并没有持续多久。

道士倾向于把所有讨论和证据都限制在中文文本或中文翻译的外国经典内。忽必烈不同意，表示汉文经典只是很多伟大的历史经外传说之一。在比赛中，他承认引用任何语言的经文作为证据。如果道家引述中国皇帝的话语作为权威资料，那么别人也可以引用印度国王的话语作为权威资料。只懂汉文的道士不得不面对一群国际佛教僧侣，他们引述各种语言的文本。忽必烈批评道士不懂外语，告诉他们：“老君之名但闻此处，佛之名字普闻天下，何得与佛齐耶？” [569]

***

佛教徒和他们的儒士盟友在最后一轮辩论中轻松驳倒了垂头丧气的道士。被击败了的道士因他们所谓的罪名和罪行被公开羞辱。他们的书大部分被禁止，他们的很多经文被公开烧毁。他们的特权被取缔，他们的道观被没收，道士被驱逐，也许损失最大的是，他们现在必须像任何其他的商业活动一样开始纳税。

忽必烈正在进行一场公关战，而他的两个兄弟则在战场上继续扩大蒙古人的统治地盘，但其成就却大不相同。当巴格达正遭到抢掠的时候，蒙哥汗继续在华南向前推进。他缓慢而稳定地在四川与宋朝军队作战，这场战役可能是地球上最复杂也可能是最大的一场战役。虽然长时间的对抗使蒙宋双方都付出了整整一代人的生命，但任何一方都不愿意退让。1259年，蒙哥打破蒙古人只在冬天作战的传统，决定在夏天继续战斗。蒙古人和他们的马匹在炎热的夏天战绩不佳，他们的弓在炎热而潮湿的南方变得缺乏杀伤力。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蒙哥汗在仲夏开始发烧病倒了。1259年8月11日，他死了。此时正好是他的祖父去世三十二周年，而成吉思汗当时也是正在中国进行类似的战役。

烧书的人也可以轻易地烧死别人。术外尼已成为蒙古人的审查官和宣传员，旭烈兀很欣赏他的忠诚，于1259年任命他为巴格达总督。这位用充满激情的笔触书写历史的学者现在变成了任性滥权的酷吏。成吉思汗的正义感和失吉忽秃忽严禁使用酷刑的训令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术外尼无所不用其极，竟然把一个对手钉在一个小笼子里，以确保他完全招供。一位叫作伊本·佛瓦提的匿名历史学家记录了当时在巴格达发生的日常事件，他写道，审问者打了被指控的男子一记耳光，“用一只鞋打他的头，对着他放屁，并在他脸上撒尿”。同时，把笼子拖到巴格达街头让人观看。他的舌头已被刺上了一根金属签，“他不能再说话”，这算是对他嘲笑执政当局的报复。最后，“他们砍下他的头，把一只留着胡子的羊头安在尸体上，然后再次在城里推来推去”。 [570] 其他持不同政见者面临被肢解的命运，有一个人被公开肛交强奸，然后被鞭打。

现在生活在外国土地上的很多蒙古人已不再是成吉思汗所认识的那

种蒙古人了。他们已成为城市居民。当帝国的重心转移到遥远的城市，蒙古人抛弃了草原，旭烈兀在经营巴格达和大不里士，而忽必烈在建造他的新首都大都。哈喇和林又变成了牧场，山羊和奶牛四处游荡，而那里当年何等繁华，外国使节在大汗宝座前战战兢兢，美酒从巨大的银制喷泉中汩汩流出。如今城中的寺庙和教堂都已颓败化为废墟，消失在地里，掩埋在青草底下。当年这里曾充斥着僧人的诵经声、宣礼员呼召祈祷的声音以及基督徒的赞美声，而如今这一切都被呼啸的寒风所取代。如今这里唯一的祈祷来自在星空下或篝火旁萨满偶尔的击鼓、舞蹈和歌咏。

穆斯林哈里发已经死了，尼扎里派的伊玛目死了，道士李志常也死了。阿拉穆特的书、巴格达的书和道教经典都被焚毁了。成吉思汗所缔造的世界帝国仍在扩张，但他的法律的精神已经被无知和偏狭的火焰吞噬了。 [6] 如今赞美他的那些人却忽视他的教导。他们向他致敬，却忘记了他的话；他们崇拜他，却破坏了他的律法。蒙古帝国现在只是名义上的成吉思汗帝国，宗教冲突已经开始把它拆散了。

第十七章 死后的来生

成吉思汗以闪电般的速度建立了他的帝国，帝国不断扩张，直到他的孙子忽必烈汗于1294年去世为止，然后便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衰败过程，像一条搁浅的鲸鱼在阳光下慢慢腐烂。忽必烈统一了中国，并在1271年建立元朝，自称新大汗，其帝国扩展到俄罗斯一带，囊括了从高丽到现代土耳其的所有领土。然而他实际控制的地盘只有中国，而且还在竭尽全力才能维持对他的蒙古故土的控制。他接受了儒家传统的祖先崇拜，并尊他的祖父为元朝的奠基人。1286年，忽必烈任命他的孙子甘麻剌管理蒙古，并在不儿罕山上建了一座庙。1292年，他把济农的新头衔赐给了甘麻剌。甘麻剌负责管理不儿罕山周围的圣地，并负责节制怯薛军团。他收集成吉思汗皇后的旧蒙古包并把它们改造为便携式神祠。他还用砖瓦建造了一个小小的中国建筑风格的庙。他在那里布置了一千名老卫兵防守，主要是兀良合部的男人，指示他们不得让任何人入内。该地区成为元朝皇帝的官方墓园。

中亚地区的蒙古领土陷入了混乱，因为不同的蒙古部族和派系之间互相争斗。到了14世纪中叶，蒙古人在伊拉克和伊朗的统治衰落了。1368年，元朝的末代皇帝被一个由佛教僧侣领导的叛乱集团所推翻，此人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明朝。元朝为何衰亡？解释各不相同。有人认为是因为汉人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有人认为是因为苛捐杂税、社会失序，有人则认为是由于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才导致元朝的崩溃。但事实是，一种腐败种子早已深深渗入蒙古帝国朝廷的灵魂并蔓延到帝国各地。后来的元朝皇帝们忽略了统治帝国的重任，被皇宫里的政治、宗教和性的种种戏剧性事件耗尽了精力。在成吉思汗开始入侵宋朝159年后，他的后代又回到草原上过上了游牧生活，好像一个半世纪的光阴纯粹是一段插曲似的。他们重操旧业，但在晚上，他们会给人们讲起他们从前的伟大故事，梦想昔日的辉煌再现。

光阴荏苒，成吉思汗的影响开始在人们根本意想不到的地方浮现。意大利诗人但丁以《神曲》闻名于世，该剧完成于1320年，但在其早期的杰作《帝制论》中，他曾认为，所有人类都是一体的，因此人类只应有一位世界统治者，其权力应超越宗教。他写道：“当所有人统一在一起，人类只有一个，除非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君王的臣民，并服膺于其圣意，否则国家显然不可能建立。”[571] 但丁勇敢地对教会权力提出了深刻的批评。他认为统治者的权力应直接来自上天，而不是依赖像教皇那样的宗教领袖作为中介。他的意见是：“帝国的权威并不取决于教会，帝国的权威直接来自上帝。”[572]

在那个基督教会经常折磨并处决批评者的年代，挑战教会权威非常危险。但是但丁预言，未来世界的国王即将到来，他将驱除邪恶，带来和平。这位神秘的未来征服者和蒙古大汗非常相似。他将出生于“两块毛毡之间”，被称作“格兰卡诺”，他的意大利同胞马可·波罗曾用同样的名

字称呼成吉思汗。这位未来的格兰卡诺将充满“智慧、爱和美德”，像这位蒙古大汗一样。 [7]

但丁是第一个用意大利语而非拉丁语来发表重要文学作品的作家，他的榜样也激励了杰弗里·乔叟用英文写作。乔叟离罗马教会更远，故而毫不犹豫地提起成吉思汗的名字，并赞美他的宗教法律。乔叟称赞成吉思汗为英雄，甚至比亚历山大还要伟大。在14世纪末创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他几乎公开地把成吉思汗与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国王进行比较，宣布，成吉思汗“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勇敢、贤明、丰富、虔诚、正直的”。 [8] 他接着说：“至于他出生时就信奉的宗教，他恪守他发誓要信守的律法。”

***

蒙古帝国解体后，草原游牧民再次居住于一个封闭的孤立家园，在那里，他们继续崇拜山川、天父和地母。帝国来了又去，但每天早晨不儿罕山上的太阳照样升起。杭爱山上百花怒放，年轻人在那里采集草莓、蘑菇和雪松果，而老人们在那里寻找叶片和根茎炮制药材和茶。在冬天，白雪覆盖着山岭，在夏季，则是漫山遍野的雪绒花。生活依旧。

几个世纪以来，怯薛成员们一直在警惕地守卫着不儿罕山的成吉思汗墓地。尽管最早的怯薛成员已经故去，怯薛的作用已经降低，但他们的儿孙们继续在墓地周围一大片地区巡逻，仿佛成吉思汗会随时回来，要在他的森林里再打一次猎，或在空旷的草场上放牧他的马。蒙古人认为，成吉思汗的卫士会在他们的后裔中投胎转世，他们同样相信，他的马也会投胎转世。在草原的早期时代，送葬者为了纪念死者，会献上马作为牺牲，但在成吉思汗死后，一个新传统诞生了。他最喜欢的马，以及转世的马，可以自由地在草原上漫游，被大家尊崇为世上最圣洁的马。当一匹马最后老死时，与它相貌、步态和气质相匹配的另一匹马就会被选中，饲养这匹马的牧民会为这个最高的荣誉得到重赏。 [573]

虽然明朝皇帝自从1368年驱逐元朝后就一直统治中国，但蒙古人从未正式投降，而成吉思汗的后裔们仍顽固地声称自己是合法的皇帝。在15世纪末，蒙古最伟大的女王满都海哈敦决定入侵明朝。由于她的第二任丈夫仍是一个小男孩，她把他装在篮子里，绑在骆驼一侧，前去作战。为激励她的追随者，并证明自己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她随身带着成吉思汗的便携式蒙古包和一些遗物穿越戈壁。当她返回时，她把它们重新搭建在黄河河套地区，那里离成吉思汗在西夏作战时去世的地方不远。这些蒙古包和遗物成了今天成吉思汗陵的基础，如今在满都海安置它们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到。成吉思汗陵周围地区被称为鄂尔多斯，是从蒙古语“斡耳朵”演变而来的，即皇宫之意。 [9] 在未来几十年里，蒙古人在满都海女王和她丈夫达延汗的领导下，征服了内蒙古大片地区和丝绸之路部分沿线地区。她从来没有对明朝构成真正的威胁，但她成功地重新确立了对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贸易网络的部分控制权。

对成吉思汗陵的控制成了所有想要统治该地区的蒙古氏族或外族强权竭力争夺的目标。最早一位试图控制该陵墓的外族人是五世达赖喇嘛。他的大批藏人随从参加了在黑龙年（1652年）农历十月举行的重要仪式，当时一千多蒙古骑兵出席了仪式。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描述道："当我们抵达奥兰布拉格，我受到了天命所归的成吉思汗的后裔——白帐部落首领的接待。" [574]

佛教高僧精心设计了一个复杂的仪式，让成吉思汗从蒙古泛灵教徒皈依为佛教徒，其中包括把他的灵魂系在一个无形的圣索"马奇各"上。成吉思汗与他的伴当和大臣都受邀坐在"用无与伦比的珍宝做成的宝座上，地毯上装饰着八朵莲花"。 [575] 然后，他被确认为少林武僧的守护神金刚手菩萨的转世。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家谱，把他与西藏和印度的君王联系起来。 [10] 蒙古史书《白史》 [11] 首次确认成吉思汗为金刚手菩萨或秘王转世。从那时开始，成吉思汗既可以在神祠受到崇拜，也可以在佛寺中作为金刚手菩萨化身接受崇拜。为巩固成吉思汗在佛教万神殿内的地位，西藏喇嘛，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为他撰写了许多佛经，包括一些祈祷词和赞美诗，比如，"你是八万四千个国王中最好的一位，你有宇宙大王之权柄。你是佛教公敌的征服者。我们屈膝向你敬拜赞美，全能的守护神"。 [576]

随着蒙古人皈依佛教，他们撰写了新的历史，把成吉思汗的生平纳入佛教历史和神学之中。于是，成吉思汗说："当我遵佛陀之命出生时，右手握着龙宫的宝玉印章。如今全能神因陀罗已赐给我盛满圣酒之玉杯。难道我不正是神所命定之主吗？"

在新发明的仪式中，成吉思汗与他的怯薛卫士一起修炼。其中一种错误的仪式要求崇拜者把酒与被杀敌人的血、杀人铁棒上刮下的铁屑、面粉、黄油、牛奶以及红茶混合起来，再把这种混合物洒在或涂抹在旗帜上作为献祭。参与者要"搅拌敌人的白色脑汁像搅拌酸奶一样，喝敌人的血，彻底消灭恶人"。 [577] 这样的描述纯粹是对佛教传入之前的生活场景的想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吉思汗与金刚手菩萨变得如此相像，以至于金刚手菩萨的颜色——蓝色，成了蒙古人的神圣颜色。 [578]

也有人把成吉思汗当成不同的神，即古代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的神明阿胡拉·玛兹达，蒙古语中叫作库尔穆斯塔。一本史书中描写道，当库尔穆斯塔神赐给成吉思汗一杯神圣的饮料后，他就成了神。另一部史书则干脆称他就是库尔穆斯塔的儿子。 [579] 出于神化他的目的，关于他的故事一再被拔高，而他的缺点则不那么明显了。《蒙古秘史》里记载的那个可怜的男孩一路奋斗，最后爬到蒙古社会等级制度的顶端，现在他成了上天神圣的代理人，下凡颁布天命。

第十八章 未完的法律

当欧洲从文艺复兴发展到启蒙运动时，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大家需要某种程度的宗教宽容，主要是指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宽容，偶尔也包括犹太教徒。在这种语境中，人们根本没有提到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宗教宽容，而且似乎也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如果但丁的观点真的是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启发，那么对他的观众来说，这方面的联系也已经失去了，蒙古人似乎已经淡出了历史。

鼓吹宗教宽容的早期启蒙哲学家撰写了大量关于普世教会、多元主义以及所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著作，逻辑严谨，文辞优美，令人信服，但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创建一个社会，或者如何制定法律来实现这一理想。1669年3月1日，约翰·洛克在《北卡罗来纳基本法》中的提议就证明这一点。尽管爱德华·吉本声称，洛克的思想是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启发，但是，事实上洛克所建议的法律更多的是约束，而不是鼓励宗教宽容。

在这个有着一百二十项条款、涵盖公民政府所有方面的文件中，洛克用了近一千字，列了十五项条款专门讨论宗教问题。[580] 虽然他泛泛地肯定了所有宗派的基督徒、犹太教徒和“异教徒”崇拜的权利，但他对这些自由加上了严格的限制。他建议美国应由世袭贵族统治，并要求每个人都积极参加崇拜。他写道：“在卡罗来纳州，若不承认独一神，不虔诚崇拜上帝，任何人都不得成为自由人，不得拥有房产，不得迁居。”然后他宣布，应采用英国模式，设立英格兰教会为“唯一真正正统的国教机构”。他的结论是，所有信仰的纳税人必须支付维修其建筑的费用及其祭司和官员的薪金。洛克没有为他建议的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提供道德上的论据，相反，他认为，给予其他宗教有限的宗教自由也是应该的，是一个聪明的办法，有助于说服非基督徒接受基督教的优势地位并皈依基督教。“犹太人、异教徒以及其他不接受纯粹基督教信仰者，可能……被说服，由衷地接受真理”。

洛克认为，应禁止一种宗教的信徒批评或骚扰其他宗教的信徒，禁止任何宗教的信徒批评政府及其高级官员。任何违反这些规则的团体“都不应被视为教会，而应视为非法集会，并作为骚乱而受到惩罚”。最后，他坚决捍卫持有任何信仰的奴隶主蓄奴的权利。“卡罗来纳州的每个自由人，无论其信仰何种宗教，持有何种观点，均对其黑人奴隶拥有绝对的权力”。洛克的法律只对少数人提供了非常有限的宗教自由。

洛克无法把他关于自由的高雅的哲学著作变成简单的法律，这在17世纪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其他政治哲学家做得也不怎么好。尽管洛克的社会模式存在局限性，但他仍然得到了一些哲学家的高度赞扬，而这些人正在寻找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蓝图。伏尔泰在他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论文中，曾引用鞑靼(当时对蒙古地区的俗称)作为例子，说明其社会为

人民提供了宗教信仰自由。然而，他坚持认为，洛克的著作为西方的宗教自由指出了一条道路。在对鞑靼人所做评论之后的第三页，他大肆赞扬洛克宪法中关于宽容的思想："请注意在地球另一端的卡罗来纳州!那里的法律是由博学睿智的洛克起草的。"[581]

***

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近五百年后的17世纪，意外地出现了一个重新介绍他观点的声音。欧洲出版了几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关于成吉思汗的书，该书作者和她所传达的消息一样异乎寻常。安娜·德·拉·罗氏·圭尔汗是一位法国新教徒，她把成吉思汗描述为"喜爱德行之人"。成吉思汗的敌人总是把他描绘成野蛮人，而她却写道，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美德充满了尊重，因此他在亚洲非常有名"。[582] 当时在西方很少有人了解成吉思汗生平的细节，因此她的书只能诉诸浪漫的想象，对成吉思汗生平的描写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然而，对当时只熟悉基督教传统以及罗马和希腊古典文明故事的读者来说，她的书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介绍了一个新的传奇人物。

这位作者不懂亚洲语言，她的生活主要是在法国、荷兰和英国度过的，但她知道宗教迫害，并从她自己的痛苦中获得灵感，因此她写作了《成吉思：一个鞑靼人的身世》。她是一位胡格诺派信徒，1685年，路易十四世废除了亨利四世制定的宗教宽容法律，她的信仰被取缔，因此她被迫逃离她的祖国法国。[12] 她的家庭一直教导她的崇拜突然成了可以判死刑的罪。她发现成吉思汗是一个有远见的领袖，而她感到在欧洲实在缺乏这样的领袖。她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出生，和他拥有同样的语言和文化，但这位法国国王和成吉思汗形成了鲜明对比。她这样写道："他们仍把我们看成斯基泰人，就是说，属于没有法律、没有神也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因此，她可能一直在写关于她自己的国家和蒙古人的书。[583]

她用和乔叟相近的词语，把成吉思汗描述为"高雅、公正和稳健的人，一位优秀的丈夫、父亲、朋友和老师，一个伟大的将军"。他之所以"驰名亚洲"，是因为他无法忍受不公正，他"没有过犯，而有太多的优点"。《成吉思：一个鞑靼人的身世》再次把成吉思汗介绍给新的一代，不是作为一个肆意掳掠城市的莽夫，而是一位贤明、善良的立法者。

安娜·德·拉·罗氏·圭尔汗重塑了成吉思汗的形象，使他在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出名。当时欧亚之间的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亚洲文化和历史的兴趣也在增长，而她为这种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兴趣提供了一个聚焦点。她的影响力将持续整整一个世纪，在此期间，以神秘的蒙古大汗为主题的文学、音乐和历史作品接连出现。成吉思汗的主题成了一种新的时尚，因此，圭尔汗的书也进入位于弗农山的乔治·华盛顿的图书馆。

当时的欧洲正处于对外部世界觉醒的阶段，因此圭尔汗的作品引起

了欧洲大众的兴趣。1710年，法国翻译家和学者弗朗索瓦·佩蒂·德拉·克罗瓦，以他的父亲所做的研究为基础，写出了第一部权威的成吉思汗传记——《成吉思汗大帝传：古代鞑靼人的开国皇帝》。佩蒂·德拉·克罗瓦以波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希伯来语的原始资料为基础，采用了新兴的客观学术历史研究方法，仔细研究了这位蒙古大汗的生平和法律。在仔细考察成吉思汗的法律的细节之后，他告诉读者，正是成吉思汗的法律使其有别于其他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版本的蒙古法律开宗明义地写道："依照原始法律，我们相信，天地间只有一位神，它创造天地，赐下生命和死亡、财富和贫穷，随己意赐予和拒绝，对一切生灵拥有绝对的权力。" [584]

在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写作和出版的主要语言是法语，但克罗瓦的书很有趣，因此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作家佩内洛普·奥宾把它译成英文，并于1722年出版，但英语学者对法国人痴迷于东方思想总是不屑一顾。有人嘲笑佩蒂·德拉·克罗瓦的成吉思汗传记，把它描述为"又一个白菜园，制造历史的人依赖它来填料"。 [585] 但美国人可没这么傲慢，他们相信蒙古人和北美土著部落有相似之处，甚至可能有遗传关系。而这些印第安人部落也接受了个人自由和精神开放，和欧洲基督教狭隘的传统形成了对比。 [13]

***

在佩蒂·德拉·克罗瓦的书在巴黎出版的同时，"成吉思汗"再现了，或至少他的一个转世轮回发生了，他作为西藏的蒙古王出现了。西蒙古和硕特部落的首领拉藏汗自称是成吉思汗转世，试图作为一个征服者以及所有宗教的守护神继续他的工作。在清朝皇帝的支持下，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的后裔中产生的三个可汗相继控制了中亚的大片地区，北到俄罗斯西伯利亚边境，南至印度和不丹的边界，包括西蒙古、华西的畏兀儿人和穆斯林地区，以及西藏中部地区。为了强调他们与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联系，新汗重新使用帝国称号，如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汗和孙子曾用过的"达赖汗"，意即四海之内的统治者。当和硕特部落的新达赖汗于1701年去世时，他的儿子拉藏用"成吉思汗"的称号即位。

为了恢复西藏的秩序，拉藏成吉思汗率领一支军队，而他强大的妻子杰林拉丝率领另一支军队进军拉萨。 [586] 他们二人都是达赖喇嘛的黄帽派强有力的支持者。在那个时代，一些僧侣公开过着堕落的世俗生活，而黄帽派一直提倡回归藏传佛教最基本的价值，非常强调端正的品行，坚持僧人应独身、禁欲。然而，在他们入侵西藏几年前，黄帽派也世俗化了、堕落了。为了保持自己手中的权力，西藏摄政王不久前选立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仓央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本来以为他年龄小，会比较柔顺，易于控制，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这个感性、英俊、叛逆的少年，热爱体育、音乐和性，喜欢酗酒，对当和尚没有兴趣，也不愿放弃夜晚在拉萨畅饮的自由。他拒绝把他漂亮的长发剃光成为一个喇嘛。

蒙古人取得胜利后，杰林拉丝王后的军队抓住了一直掌握西藏实权的摄政王。她把他召来见她，尽管喇嘛求情，她仍于1705年9月6日将他处死。[587] 汗和他的王后随即清除了其他上层喇嘛和官员，把一些人流放，处死了另一些人，同时厚赐他们的支持者，如班禅喇嘛。之后，杰林拉丝王后只活了几年时间便于1708年去世。拉藏在清朝皇帝的支持下成为西藏唯一的统治者。

虽然拉藏并不想重复成吉思汗的征服，但他想重振成吉思汗世界大帝国的精神。他把他的新都建在拉萨，立即恢复了成吉思汗制定的自由贸易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成吉思汗拉藏的统治下，拉萨成为亚洲最开放的、世界性的国际中心之一。当时住在那里的一名基督教牧师写道："拉萨市人口稠密，居住着本国人和大批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包括鞑靼人、汉人、莫斯科人、亚美尼亚人、克什米尔人、印度斯坦人和尼泊尔人。" [588]

拉藏效法成吉思汗，开放他的宫廷和西藏给各种信仰的信徒：基督徒、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以及西藏的传统宗教苯教教徒。他鼓励外国人来拉萨的佛教学校学习教学，并邀请欧洲不同基督教派的教士来拉萨居住。蒙古人把所有这些宗教领袖都称作喇嘛。欧洲人从意大利、葡萄牙、德国和其他国家到这里工作和学习。他让他们住在色拉寺并举行每日的弥撒，基督徒在那里很快学会了藏语。

基督徒在西藏享受着蒙古统治者的保护与恩惠，对他交口称赞。其中一位写道："他以自己的豪迈气概使所有人敬畏，包括他自己的臣民和外国人。""他的性格很幽默，和蔼可亲，对所有人都很友好，随时接见并给人以安慰，性情非常随和。他对外国人尤其热情，距离越遥远，他越关心他们，他对我的厚爱使我很感动，不得不钦佩他。他的才智很敏锐。" [589]

尽管外国人奉承拉藏，对他充满了感情，但是藏人却讨厌他，因为他的妻子杀死了他们的摄政王，而他则杀了达赖喇嘛。成吉思汗拉藏拘捕了二十三岁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并把他带走，声称要把他交给清朝政府，或者把他重新安置在蒙古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但这些都没有发生，年轻的达赖喇嘛在前往他未知目的地途中神秘地死了，或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一名在拉萨的意大利耶稣会成员伊波利托·德斯德利写道："直到约1707年，这位西藏大喇嘛都是一个性情古怪、生活放荡的年轻人。""因为他是西藏最高的权贵，极受藏人尊敬，所以他的恶习对人特别有害。成吉思汗通过训诫和威吓都无法改正这位大喇嘛和教主对他王国造成伤害的放荡行为，他决定把喇嘛处死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通知了清朝皇帝，然后借口护送喇嘛前往清朝，派遣大批国王的鞑靼人随行，在途中把喇嘛斩首。"

因此，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这位生活、爱情和诗歌的狂热追求者，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基督教牧师关于这位喇嘛结局的说法。一些蒙古人认为，他已经逃到蒙古的安全之地，在那里活了很久，建立了一个新的寺院，从那以后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转世。西藏人声称他的灵魂逃回了西藏，他在那里偷偷地转世。拉藏选择了新的第七世达赖喇嘛，有一些人认为实际上那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在清朝皇帝的支持下，他下令，任何拒绝承认新达赖喇嘛的人将被处死。 [590] 随着西藏中部被制服，秩序得到维护，他率领他的蒙藏军队向周边地区推进，但1714年他在不丹军队的激烈抵抗下遭到失败。他深信他的领土范围已达到极限，于是便集中精力发展西藏。

***

在拉藏统治下的西藏，基督徒非常活跃。弗朗西斯科·拉齐奥·奥利维耶里·黛拉·朋纳，一位来自意大利中部的方济会托钵僧传教士，编写了一部藏语词典，并把藏语作品翻译成拉丁文，而乔瓦其诺喇嘛则在其社区当西医。在18世纪西藏最多产的基督教学者是伊波利托·德斯德利，他献给这位蒙古统治者一部他所写的系列对话录，像柏拉图的《对话录》一样，不过是用藏语写成的，书名是《黎明：驱散黑暗的曙光》(Daybreak: The Sign of the Dawn That Despel Darkness)。 [591] 他的目的是促进基督教的传播，驳斥拉藏成吉思汗的说法，即每一种宗教在其最纯粹的形式里，都能引导人们达到向善的目标。德斯德利毫不掩饰地指出，他的目的是要“证明目前在不信教者中间流传的说法，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遵守他自己的教法而得救，实在是虚假的，并确立这个更重要的真理，就是只有一个律法能引导人们进入天堂，获得永远的拯救”。 [592]

德斯德利写道：“1716年12月底，我在上帝的帮助下完成了这本书，由一位行家编排次序，并制作了一份副本，把它献给了国王。”他在1717年1月6日把书献给了国王。这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日子，即天主教的主显节，这个节日是纪念东方三博士从亚洲带着礼物来朝见在伯利恒的婴儿耶稣，天主教徒会举行盛宴进行庆祝。在西方人的信念中，蒙古人就是三博士中其中一位的后裔。因为三博士已经接受了基督教，德斯德利希望在这个场合成吉思汗拉藏也能皈依基督教。

拉藏汗当着一大群佛教喇嘛的面，从基督教喇嘛手中接过那本书，并开始用藏语朗读。他发现那位基督徒用藏语写的东西很拗口，难以理解，所以他把这本书交给助理继续朗读。 [593] 德斯德利解释说：“国王仔细听了一会儿，然后把书拿回来，对我说，其中有几个原则与他们教派的原则相左，然而他觉得是最公正的，并值得认真和深入地讨论……他思维敏锐，智力超群，因此针对书中的这些观点提出了各种难题和反驳。”“他继续以这种方式讨论这个话题直到中午，他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于是转向所有的观众，极力表扬我。然后，他把所有的注意力转向我，说他很高兴收到那天我送给他的那本书，他很重视，也很尊重我的书。他补充说，他还没能看完这本书，但当他有更多闲工夫的时候，他会慎重考虑，他也想请一些更杰出、聪明的喇嘛来阅读和研究这本书，

在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他会在方便的时候让我知道结果，即他认为哪个宗教更灵验。”换句话说，拉藏汗一点都不喜欢这本书。

在仔细审查这本书的内容后，拉藏汗“决定举行一次辩论，我自己为辩论的一方，而那个国家的喇嘛和大学的宗教学博士为另一方。他很明白此事的严重性，不想让我因为不知道对手可能攻击我的武器而措手不及。因此，他不想让我立即投入战斗，而是让我尽可能彻底地了解该教派的教义，阅读他们的经典著作，并熟悉他们的论证和辩论的方法……他想让我花一些时间待在某些大学，参加那里经常举行的讲座和辩论会。为此他下令，我可以自由出入该国任何寺院或大学”。[594]

他还没能完成他的学习，辩论还没有进行，西蒙古的一个敌对部落准噶尔部就入侵了西藏。大多数藏人站在侵略者一边，因为他们仇恨拉藏成吉思汗，特别憎恶他对达赖喇嘛的处置。德斯德利写道：“这些都是起初的火花，经过多年的策划和密谋，火焰点燃了，吞噬了国王的性命和他的王国。”[595]“国王被残酷地杀害，他的家人和他大部分忠实的大臣被杀害，首府拉萨遭到洗劫，人们惊呆了，陷入哀悼。”[596]

为了恢复秩序，清朝官员开始封锁西藏。成吉思汗拉藏死后，外国人开始离开，但他们带去了迄今为止关于这片土地的鲜为人知的信息。他们的著作向外面的世界介绍了西藏文明的奇迹，包括香巴拉的概念，这是指遥远北方的神秘土地，即在西方广为人知的香格里拉。

弗朗索瓦·佩蒂·德拉·克罗瓦写道：“他们的母语是藏语，但也讲鞑靼语和汉语，他们的智力很高。”这位圣方济会托钵僧有时被称为“白发喇嘛”。[597] 虽然基督教牧师说藏语，不说蒙古语，但在他们的作品中描述该国时，他们使用更熟悉的蒙古语名字。“Thibet这个名称是外国名，在这个国家只有蒙古人和亚洲的穆罕默德部落才使用，这个词语似乎源自土耳其语”。[598] 他们用蒙古语的称号“达赖喇嘛”，而不是藏语的嘉措，来称呼黄帽派的首领，因此，从那以后，这一教派的僧侣在国际上就被称为西藏的达赖喇嘛。

***

在18世纪，绝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是文盲，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越来越迷恋于成吉思汗和其他东方君主。剧作家创作了好几部作品，把他的征服战争搬上舞台。1741年，意大利歌剧《成吉思汗：蒙古的鞑靼皇帝》举行首演。[599] 三年后，一艘英国轮船被命名为“成吉思汗”。[600]

戏剧是描写成吉思汗生平最好的艺术形式。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戏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饱读诗书的中国学者贬斥这种常见的娱乐形式，但普通人则趋之若鹜，经常看戏，把它看作一种艺术。当时的一部重要作品是纪君祥创作的《赵氏孤儿》。1735年，耶稣会传教士约瑟夫·亨利·德普莱麦尔将该剧译成法文，这是用欧洲语言出版的第一部中国作品。伏尔泰很欣赏这部作品，于是进行了再创作，用爱的故事取代

其复仇主题，并把主人公换成了成吉思汗，于1753年出版了《中国孤儿》。他的版本于1755年夏季搬上了巴黎法国剧院的舞台。 [601]

佩蒂·德拉·克罗瓦和安娜·德·拉·罗氏·圭尔汗在其作品中极力称赞成吉思汗。伏尔泰的作品恰恰相反，形容他是“万王之中的暴君”，他把亚洲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他对成吉思汗极尽辱骂之能事，说其“浴血而来，掌控世界”。他嘲笑成吉思汗的宗教，说那只不过是野蛮人的自然神崇拜而已，没有经过教育或文明的“教导和改良”。

在伏尔泰的笔下，衰老的成吉思汗对他的征服深感失望，认为这些征服并没有给他或他的臣民带来任何道德上的好处。“这些是我应许的快乐吗？这是我所有的劳动果实吗？自由在哪里？我渴望的安息在何方？我只感觉到权力的重压，却没有感觉到权力的快乐……到处都是没完没了的烦心事，到处都是危险、阴谋和敌人，令我无暇旁顾。强硬的对手、任性的国民，都在逼迫我；当我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时倒比如今更快乐。” [602] 伏尔泰把成吉思汗对宗教价值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方法戏剧化了。他让成吉思汗这样告诉他的朋友圈子：“是时候了，我的朋友，是时候让剑入鞘，让被征服者喘口气了，我曾四处播洒破坏和恐怖，但我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和平……今后我们将不再毁灭他们引以自豪的杰作、他们的艺术品和他们神圣的法律，出于宗教情感他们尊敬自己发霉的经卷，出于迷信他们的祖先崇拜它们。”在这里，宗教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认识到，宗教“让百姓有事干，会让他们更顺从”。 [603]

这出戏引起了巨大轰动，除了演出外，还举行了公开朗读。有一幅名画描绘了一位名叫列凯恩的演员在玛丽泰雷兹·罗德乔芙兰沙龙里朗读的场面。这幅画名叫“在乔芙兰小姐沙龙里朗读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其中有五十多位当时最伟大的文人和名流，包括让·雅克·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男爵、艾蒂安、埃蒂耶那·博诺·德·孔狄亚克、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以及蒲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等，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成吉思汗的故事。 [604]

这出戏在巴黎获得了空前成功，好评如潮，票房收入也很好。受其启发，在英国立刻出现了几个模仿的英语版本，其中最成功的当属由爱尔兰剧作家阿瑟·墨菲改编的《中国孤儿》，它更接近于元杂剧的版本。在英国第一位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的大力支持下，这出戏于1759年4月在伦敦的德鲁里巷剧院举行了公演。这场演出受到了极大重视，以至于当时的英国桂冠诗人威廉·怀特黑德要为每场表演写一首诗作为前奏。这出戏试图拓宽观众的文化视野，使他们从陈腐的经典主题中走出来。怀特黑德在他的前奏曲开头几行中声明：“够了，希腊和罗马!两国的宝藏已经枯竭，魅力不再。” [605]

墨菲承认妇女在蒙古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在他的戏剧中再现了她们的重要性。伏尔泰曾把蒙古公主和皇后描写成多愁善感渴望爱情的人。 [606] 墨菲和他不同，用行动取代了情感。他批评了成吉思汗的野蛮

法律和他不愿或无法接受儒家思想的缺点。

这出戏公演后一个月，当时最受尊敬的文人之一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在《评论》上撰文说：“第一天晚上，整个剧场都很兴奋，非常兴奋，而且人们有理由感到兴奋。” [607] 在1759年6月，这出戏公演后仅两个月，一位评论家在《每月评论》上写道：“到此为止，每个人都已经看了或读了《中国孤儿》，大多数人都赞赏它。” [608] 第二年，这出戏在都柏林的两个剧场同时演出。

其他描写成吉思汗的戏剧迅速出现。最成功的当属在1768年至1769年之交的冬天在伦敦舞台上首次亮相的一出，由苏格兰剧作家亚历山大·道琼斯创作，他曾经是一名在印度服役的英军军官，从波斯和莫卧儿史料中了解了蒙古历史。这出戏的广告声明它是献给“那些并不熟悉亚洲国家历史的人”。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世界观是有限的，因此发现蒙古领袖及其历史是大开眼界的事。他在一个注释中说：“成吉思汗，无论我们把他看作征服者还是立法者，他都可能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帝王。”“他不仅确保把他的亚洲帝国传给他的子孙后代长期统治，即使在今天，三分之二的亚洲大陆仍然被他的后代君王所统治……中国皇帝、印度的莫卧儿、鞑靼大汗和克里米鞑靼的君主……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人。令人惊奇的是，在亚洲一度有五百位君主出自他的家族。” [609] 1769年1月7日在《伦敦纪事》上发表的一篇评论用同样的语气赞美道：“成吉思汗的性格新奇、庄重，意志坚定、果决，但同时也表现出慷慨和高贵的品质。”

并非每个人都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位善良的立法者，很多人仍然把他描绘成一个残忍野蛮的暴君。在这出戏的结尾，旁白解说员说出了一番颇具讽刺意味的话，对剧中表现的亚洲征服者优于古典欧洲主人公的题材表示质疑和反对。他问道：“剧评人，你们愿意摒弃罗马和希腊吗？”“我讨厌鞑靼人，讨厌他们粗鄙的宗教”，因为“他们没有灵魂”。他响亮地宣告：“我爱希腊人和罗马人!” [610]

大多数观众喜欢这出戏，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热情。一位评论家觉得这个主题沉闷乏味。他写道：“这场悲剧中的一些台词写得很好，这出戏整体上也不能说太坏。”然后他抱怨说，这出戏的作者“选的这个主题实在是太糟糕了。有人对鞑靼人的事情不感兴趣，有人对出现的一大堆野蛮人的名字感到厌恶”。 [611]

大约在1783年，意大利诗人和剧作家乔瓦尼·巴蒂斯塔·贾斯提写下了《成吉思汗》(或《鞑靼诗篇》)的史诗，全诗共408节，该诗也表现出蒙古大汗优于欧洲君主的倾向。他在1829年的作品似乎同情刚刚在美国和法国发生的革命。 [612] 贾斯提把他的诗寄给了在维也纳的神圣罗马皇帝约瑟夫二世，请求出版许可，这位罗马皇帝被成吉思汗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情绪所激怒，紧接着便公开斥责作者，并建议他离开祖国。 [613] 他接受了暗示，选择离开。

几年以后，莫扎特在维也纳哈布斯堡宫廷的对手、意大利作曲家东尼奥·萨列里，与贾斯提合作创作了一出歌剧，表达了类似的情绪，只不过剧中的主人公由成吉思汗换成了他的孙子忽必烈。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萨列里完成了《鞑靼人的忽必烈大汗》的音乐。但法国大革命很快让位于暴政和恐怖。歌剧描写了俄罗斯宫廷的腐败，影射哈布斯堡宫廷，因而有人认为搬上舞台太危险。二百二十年后的1998年，这出自由派歌剧终于在德国维尔茨堡的梅弗兰垦剧院首次公演。

在新近对成吉思汗产生兴趣的人们当中，有些人是基督徒，但他的声望在自称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们当中最高，比如伏尔泰和亚历山大·道琼斯这样的人。许多启蒙学者在反对教会权威的同时，也欣赏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精神价值。他们重理性，轻仪式，重思想，轻信仰。这种没有教会的灵性被称为自然神论。这在西方属于新事物，但一些人认为它类似于东方思想，具体说来，与萨满教或草原游牧民族的信仰体系相类似。正如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追随者查尔斯·米尔斯所说的："成吉思汗的宗教是最纯净的自然神论，而基督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和偶像信徒则在不受干扰的安全环境中讲道和祷告；拉比、伊玛目和祭司免税，也不受战争搅扰。" [614] 成吉思汗与欧洲基督教统治者形成了鲜明对照，因而受到一些较新宗教派别的拥护，他们拒绝有组织宗教的许多规则，寻求正义与和谐，强调人性的重要性。

***

虽然西方对成吉思汗重新发生兴趣始于17世纪的法国学者，但他的遗产对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影响最大。殖民地领袖对远在英国的国王统治感到很不满。在追求独立的斗争中，美国革命者寻求欧洲经验范围以外的历史模型。在18世纪，从查尔斯顿到波士顿的殖民地商人都出售了关于这位蒙古领袖的书籍。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一位法国文化鉴赏家和自由思想的自然神论者，在他主办的报纸上为佩蒂·德拉·克罗瓦的成吉思汗传记大做广告，通过邮购方式从费城向整个殖民地出售。

18世纪的美国学者，由于没有自己真正的思想史，因此急切地寻找西欧经验之外的公义政府和司法模式。为了寻找不同的概念，他们广泛阅读了有关亚洲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墨菲的戏剧首次公演期间，本杰明·富兰克林正在伦敦，他不仅为他的图书馆购买了一本该剧作，还买了一本关于墨菲和伏尔泰之间为争夺该剧的著作权而互相责骂的"名人骂战"通信录。 [615]

1764年3月，《中国孤儿》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皇后街的新剧院上演， [616] 其后，费城的萨瑟克剧场1767年举行首演，1768年在纽约的约翰街剧院举行了首演。在美国革命的高潮中，这出戏在纽约被英军占领期间曾用英国士兵作为演员演出。 [617] 1789年，该剧在新选定的首都费城举行了演出，并继续流行了五十年。 [618]

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话题产生了新的兴趣，托马斯·杰斐逊就是

其中的一员。他在1771年8月3日写给他姐夫罗伯特·斯基普威思的一封信中，并没有提到墨菲和伏尔泰所写的关于成吉思汗的戏剧，而是建议其直接阅读用法语翻译的元朝版本。 [619] 杰斐逊深受佩蒂·德拉·克罗瓦所写的成吉思汗传记的影响。他也察觉到在所有的宗教里都有一些好的东西，但任何一个宗教都不够好。之前他已经买了几本法语原版的成吉思汗传记，他自己留下了几本，其余的送给别人作礼物，也送给他的女儿一本。 [620] 其中一本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首批藏书之一。英国人在1812年战争中烧毁了新都华盛顿，并毁坏了国会图书馆的三千卷图书，于是杰斐逊提议把他的藏书卖给国会，成立新的国会图书馆。有些国会议员试图阻止收购他所收藏的“亵渎和不道德的书，宣扬异教徒哲学的法国哲学家的作品”以及用“很多人看不懂，多数人不该看”的语言写成的书。 [621] 当杰斐逊拒绝从收藏中剔除任何一本书时，国会图书馆委员会一名成员建议，把有问题的书挑出来，“委员会应把这些书烧毁”。

托马斯·杰斐逊在读到成吉思汗法律之前很久就支持宗教自由和宽容的思想。实际上，当时政治哲学思想界的许多圈子里都流行宗教宽容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家却找不到一个简单、具体的例子，说明宗教自由究竟应该如何实行。在当今的美国，宗教自由的原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却是理智、道德和政治长期斗争的成果。哲学家们都同意这是一个值得称许的目标，但又有哪个社会曾经成功地使这个想法付诸实践呢？成吉思汗的法律提供的模式正是那个时代所寻找的一个例证。

佩蒂·德拉·克罗瓦的成吉思汗传记突出了他的宗教宽容。他写道，“远在决定对不属于他所在教派的人进行任何处罚或迫害之前”，他严禁任何人“因宗教打扰或骚扰他人，并希望每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愿望保留宗教信仰的自由”。 [622] 这句简洁高尚的话吸引了杰斐逊的注意。

杰斐逊于1777年开始撰写他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但花了近十年才找到适当的措辞，该法案于1786年1月16日在弗吉尼亚州议会正式颁布。虽然他的建议引起了激烈辩论，并经过编辑和修改，但最后的关键词语接近于成吉思汗最初制定的法令。杰斐逊的新法律规定：“没有人应……因其宗教观点或信仰而受到迫害；但是，所有人应皆可自由表达……其对宗教事务的意见。” [623] 这些话从中亚一路流传到美国，先是从蒙古语翻译成波斯语，然后再译成土耳其语、法语，最后翻译成英语。虽然它们可能不是成吉思汗的原话，但完全体现了他在上下求索寻求神的过程中所秉持的包容精神。

在一份保存在国会图书馆的未注明日期的备忘录中，杰斐逊要求只把他取得的三项成就刻在他的墓碑上。他写道，这些事情是“我最希望人们记住的”。他罗列如下：“美国《独立宣言》作者、《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案》作者与弗吉尼亚大学之父。” [14]

杰斐逊的法律最初是在弗吉尼亚州颁布的，因此只适用于该州，但它后来被纳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多年来，它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

宪法和法律。通过术外尼、拉施德丁以及巴·希伯来斯、乔叟、拉·罗氏·圭尔汗、佩蒂·德拉·克罗瓦等人的文字，成吉思汗关于宗教自由的思想影响了托马斯·杰斐逊乃至整个世界，宗教自由作为国家的基本原则得以传播开来。在今天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在宗教多元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都在崛起的今天，公民能否坚持并弘扬该法律的精神，将是我们历史的下一篇章，这一章我们仍要继续书写。

[1] 勃朗嘉宾花了一年时间才返回罗马。马修·帕里斯在1247年纪事中记载，教皇特使已返回。但在他的条目中并没有提到勃朗嘉宾的名字，他反而对蒙古大汗自称具有最高权力的说法嗤之以鼻，写道，教皇“收到鞑靼国王的命令，要求他称臣”。“这位国王的信中充满了大胆和亵渎的话，声称他是不朽的”。帕里斯给人的印象似乎蒙古大汗是在引用圣经，声称“他和他的追随者正是经上所写的”。“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诗篇》115：16)帕里斯和许多其他人有点糊涂，他们连蒙古历史都不清楚，便假定蒙古人就是犹太人，以色列失去的支派之一。

[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六个世纪之后，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普希金把蒙古人描述为“没有亚里士多德或代数的阿拉伯人”。

[3] 汉文资料显示，那摩是克什米尔人，但他修习藏传佛教。他早就认识到的蒙古人的重要性：“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盍往归之。”

[4] 这段引文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未查到原文，故按照英文意译。——译者注

[5] 李志常死于1256年，但也有人说他死于两年之后或二十年之后。

[6] 俄罗斯学者尼克雷·古米列夫写道：“古老的蒙古传统已经向外摊得太广、太薄，难以保持完整统一，从这一泉源流出的河流无法也不想沿着一条河道流动。”19世纪蒙古作家尹湛纳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写道：“我们蒙古民族之所以衰落，是因为生活太舒服”，然而“当人们试图解释这一事实时，他们还没张口，就被指控为异教徒或异端”。

[7] 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不承认这是蒙古象征性的符号，认为它是从古典的希腊和罗马概念发展演变而来的。

[8] “他从一出生就志向高远，信守诺言；他坚韧、坚定、丰富、高贵、公正，永不改变……”(乔叟《乡绅的故事》)

[9]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期内，这些卫兵禁止外国人接近陵墓，只有为数不多的蒙古人能进入。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第一次有两个比利时人设法看到陵墓并描述了它们。根据他们的报告，帐篷里“有各种珍贵物件，金鞍、盘子、杯子、三脚架、水壶和许多其他器物，都是用纯银制成的”。另一位访客形容陵墓为“两个并排的大型白色毡帐，类似于现代蒙古人的帐篷”。由于圣地保密严格，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成吉思汗的遗骸就在帐篷里。其中一份报告声称：“有红色的帷幕，当拉开时，可以看到盛放皇帝骨灰的银棺，放在第二个帐篷的地上。”成吉思汗被埋葬在不儿罕山，尽管便携式神社收藏着属于他的遗物，但他永远不会再离开他心爱的山。

[10] 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在阿富汗崛起的希腊王国中，赫拉克勒斯成了佛陀称为金刚手菩萨的保护神。赫拉克勒斯经常在艺术和硬币上被描绘为成年时期的

完美体现，根据希腊神话，他通常手持一根大棒，在他第一次的英勇行动中他打死了一只狮子。在希腊-佛教艺术和宗教的合成形式中，赫拉克勒斯和他的大棒代表菩萨金刚手菩萨和他的霹雳，他借此保护佛。他的名字意思是“雷神”。

[11] 《白史》：据称这个史料成书于13世纪末忽必烈统治期间，在16世纪末被奇迹般地重新发现。这本书最有可能是在16世纪写成的，但某些原始资料可能来自13世纪。

[12] 1685年10月18日，路易十四发布了《枫丹白露敕令》，废止了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的赋予胡格诺教派宗教权利的《南特赦令》。

[13] 亚当斯在1813年6月28日写给杰斐逊的一封信中，将成吉思汗的战术比作美洲印第安人的战术，把蒙古围猎术比作苏格兰的围猎术。

尾声 上帝的霹雳

我们已经写完了他们的历史，记录了在他们书上发现的一些有关他们的信仰和宗教的东西；我们把它记录下来，是作为一个令人惊奇的事物，而不是作为确定的真理。

——阿塔·马里克·术外尼，《世界征服者史》，巴格达，13世纪

神话可能比真理更能鼓舞人心，特别是在危机四伏时期。当旧的思想体系已不敷所用，有些人便会采纳在较稳定时期看来完全不理智的想法。越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就越容易突然间被人信以为真。在20世纪势不两立的意识形态冲突和狂飙突进的宗教运动中，成吉思汗吸引了一些爱好和平的人，也吸引了其他的好战分子。

***

1921年，三十岁的罗马人尼古拉·马克西米利安·冯·恩琴·斯滕伯格，俗称疯子男爵，率领一千五百名反布尔什维克骑兵，打着黄色的纳粹旗帜，从西伯利亚抵达蒙古。骑兵中包括哥萨克人、俄国人，中国西藏人和蒙古人，还有几个日本人和中国汉人。他自称是匈奴王阿提拉的佛教后裔和成吉思汗转世，支持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俄罗斯复辟。当沙皇和他的家人被处决后，他以为他能在蒙古开启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而日本天皇将会是新的世界统治者，西藏的班禅将成为新的精神领袖。他穿着红色丝绸上衣和蓝色裤子，趾高气扬，乘坐菲亚特轿车在首都库伦(今乌兰巴托)横冲直撞，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雪茄，一边发出死刑判决，命令人们去捡垃圾，射杀任何吃死人的狗……他在蒙古统治了一百天，直到被苏联红军抓住处决。

蒙古发生的恐怖事件让一些人感到兴奋，也使一些人感到厌恶，但也激发了一些人的想象力，有些人渴望进入这个奇特的世界，那里有着活佛、疯狂的革命者和遍布龙骨(即恐龙化石)的丘陵。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两次从纽约到戈壁沙漠的探险活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J.P.摩根和约翰·洛克菲勒以及其他财团的财政支持下，赞助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前往蒙古寻找最原始的人类化石，因为他觉得人类一定起源于蒙古，那里是“科学的伊甸园”。安德鲁斯没有发现人类起源的证据，但他的确发掘出了许多无与伦比的恐龙化石以及之前不为人知的恐龙蛋。

十年后，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发表了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向世界介绍了一个名叫香巴拉或香格里拉的神话般的地方。受希尔顿小说的启发，一些神秘主义者开始把蒙古看作宇宙的精神中心，并认为香格里拉不久将从其山下某处浮现出来。似乎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块神秘的土地会在蒙古的什么地方被发现，但寻找香格里拉的行动吸

引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追随者。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最低谷时期，美国悄悄地开始寻找成吉思汗的秘密。美国官员资助这场探险，想找到佛教圣物吉祥三宝——其中之一据说是在成吉思汗出生时就被握在他手里，另一个目的是寻找香巴拉或香格里拉地下世界的入口。

从1934年到193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悄悄提供政府资金给他饱受争议的精神导师——俄罗斯艺术家尼古拉斯·列里赫，此人自称是五世达赖喇嘛转世。在华莱士的支持下，列里赫计划寻找香巴拉并挖掘佛教史上所说的成吉思汗出生时握在手里的宝石。二人称他们的项目为“东方神圣联盟”。他们知道，人们会觉得他们的寻宝行动有些异想天开，尤其在国家处于困难之时，肯定会引起纳税人的不满，于是他们给他们的项目取了一个代号“堪萨斯”，和一个很有名的美国故事联系起来，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堪萨斯女孩出发去寻找奥兹的神秘魔术的经历。列里赫打的官方幌子是去寻找抗干旱的草，以便移植到美国中西部沙漠地带，但其真实意图是去寻找宝石和香巴拉。 [624] 该行动是他宏大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能在1936年启动世界和平新秩序。

这次探险的装备由艾伯克龙比与惠誉公司提供，由一帮白俄罗斯杂牌军护送，武器则由美国战争部提供。列里赫率领的骆驼队开启了穿越中亚之旅。尽管这支探险队被指与日本间谍有联系，但他们打的旗帜却是“绑在蒙古长矛”上的美国星条旗，他们称之为“救世之矛”。 [625] 列里赫希望找到宝石，这样他便能够奇迹般地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难题，与俄国苏维埃、日本帝国主义者、德国纳粹、西藏佛教徒、蒙古共产党人、美国资本家，以及其他所有在思想、意识形态或宗教方面发生冲突的人实现和平，开展合作。他相信，他可以通过这项工作说服“亚洲高层和美洲高层携起手来”。

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暗助华莱士的工作，在1940年大选中，富兰克林·罗斯福选他做副总统。华莱士标榜自己为“实用的神秘主义者” [626] ，他当上副总统后，大权在握，成了第一位访问蒙古并寻找成吉思汗陵的美国高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的1944年夏天，华莱士秘密地从阿拉斯加飞往西伯利亚，然后换机辗转抵达兰州——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腹地。

在中国军阀的帮助下，佛教寺院的僧侣攫取了成吉思汗陵，暂时将其纳入他们的崇拜活动，以保护它免受日本军队的破坏。 [627] 华莱士长途跋涉到那个寺院去拜访成吉思汗陵。

蒙古人认为任何寻求神圣权力的人都需要去成吉思汗陵祈祷。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蒙古可汗和王后纷纷来到该陵寻求成吉思汗的祝福。此陵无形的神灵答应了一些人的祈求，但很多人空手而归。实际上有几个人在该陵神秘死亡，或在参拜该陵不久后死亡。

华莱士是在1944年民主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参拜成吉思汗神社的。他空手而归，什么都没有得到。事实上，他参拜成吉思汗陵后不久就开始走背运了。他在共和党内的批评者看到了他写给列里赫和其他成员关于他的秘密探索活动的部分所谓的“大师信件”，这批信件总数达250多封。丑闻爆发，媒体指责他为他的秘密项目浪费了金钱。群情激愤，罗斯福总统被迫撤销华莱士的副总统职务，不太有名的哈里·杜鲁门代替了他。华莱士始终没有当上总统，而他也从没有发现那块神奇的石头、圣杯、神矛，也没有找到世界和平或香巴拉的入口。相反，杜鲁门成为了首位投下核弹的美国总统。

***

在整个20世纪，成吉思汗一直是亚洲力量的象征，激发各民族奋力挣脱欧洲殖民统治。受他启发的运动形形色色，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既有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有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相互对立的政治派别的领导人都能在他的事迹中得到启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泽东为成吉思汗的陵墓题词，形容他为“天之骄子”。[628]

虽然毛泽东和华莱士都对成吉思汗表示了敬意，但在故乡蒙古，成吉思汗却在很大程度上湮灭在历史之中。蒙古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时，他的名字和图像始终被禁止。任何被怀疑和他有亲属关系或者公开对他表示兴趣的人都会受到迫害。在漆黑的夜晚，戴绿帽的秘密警察，穿着黑色大衣，带着明亮的手电筒，会把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拖走。任何人试图美化成吉思汗，或者仅仅提到他的名字，都会被谴责，并贴上形形色色令人厌恶的标签：反动封建主义、右翼民族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或西方资本主义等。中国人赞美成吉思汗，日本人为他建起新的纪念碑，尊成吉思汗为泛亚细亚之父，美国副总统拜访他的陵墓，这一切只能使俄罗斯人更加偏执。20世纪中叶，在蒙古，只要保留一份与成吉思汗有关系的族谱，就足以被判处死刑。成吉思汗的后人，只要能辨明身份者都被处决了，喇嘛、萨满以及其他被指控为封建主义、反革命、日本间谍的无辜平民也被处决了。

蒙古人不能崇拜他们民族的奠基人，但他们学会了偷偷向他表达敬意而不提他的名字，向他祈祷却表现得若无其事。曾留学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勇敢的革命诗人达希道尔吉·那楚克道尔吉把这个秘诀展示给他的民族看。那楚克道尔吉对在文学中嵌入秘密信息很感兴趣，因此翻译了埃德加·爱伦·坡的《黄金虫》——一个有点古怪的故事，表现的是在寻宝过程中涉及到的复杂编码字母，这促使他仿效成吉思汗的做法来写诗。成吉思汗要求他的士兵们用诗歌、歌曲以及省略语作为军事通信的主要手段。那楚克道尔吉现在则用诗歌作为抵抗政治压迫的手段。

他的忠诚受到了怀疑，因此被囚禁，1932年末他出狱，并发表了一首诗，这首诗后来实际上成为宗教荒漠的社会主义蒙古的圣典。《我的祖国》一诗中没有戏剧情节，也几乎没有动作。外人读起来，这首诗似乎是静态的，只是一味地用现实主义新文体无聊地数点蒙古各地风光。

诗句非常老套，犹如陈腐的旅游广告：蓝色的河流清澈见底，青青草原一望无际，沙漠犹如海洋，青草覆盖草原，牛马肥壮健硕。这首诗最后赞美飘扬在蒙古历史上的红旗。

和但丁用编码文字来欺骗教会监视者一样，那楚克道尔吉也在诗中嵌藏了斯大林的审查官完全看不懂的代码。他把蒙古历史的要点嵌进了这首诗的诗节中。第一个单词是肯特，即围绕不儿罕山的周围地区，此处是成吉思汗的诞生地。第二个是杭爱山，一个神圣的森林地区，匈奴人、突厥人和回鹘人发源于此。每一个词里都隐藏着一个故事，标出蒙古的领土和这个民族创始人的生平。那楚克道尔吉的诗是现代蒙古族文学的开山之作，1937年，年仅三十岁的他悲惨而神秘地死去，据说是死于酒精中毒。此后，其他作家纷纷仿效他的风格，他们把关于成吉思汗的旧体诗和歌曲加以改编，用景观特征取代他的名字。他们的诗保留了蒙古民族的历史和真正的信仰，抒发了对自己民族的敬仰。在20世纪漫长的极权统治的冬天，这些诗人让成吉思汗的精神依然活着。

1989年12月，随着苏联的衰落，新一代的蒙古人聚集在首都乌兰巴托列宁博物馆前的广场上，要求从苏联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在寒风中，每个人呼出的热气汇聚在一起，形成一层朦胧的薄雾，而他们的声音也汇聚成一个：要求民主。七十年来，关于成吉思汗的记忆一直受到抑制，但他们仍然求告他的名来带领他们，希望从他那里得到鼓舞。蒙古人再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一同歌唱赞美他们民族的奠基人。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发出了同一个声音。

对于一些忠实的信徒来说，“我们蒙古人的圣主成吉思汗”的历史尚未结束。 [629] 19世纪，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的守陵人曾预言，在八到十个世纪之后他会回到他的出生地， [630] 而现在正是他缔造他的帝国之后的第九个世纪。

对于那些等待他归来的人们来说，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只是宇宙永恒精神之旅的一个阶段。在13世纪，世界还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帝国，在这个帝国里，相互对立竞争的宗教相互合作从事公益事业，直到今天，世界也没有准备好实现这样一个梦想。

虔诚的信徒相信，在不儿罕山耀眼的旭日阳光中，成吉思汗会在圣主库尔穆斯塔之圣城显现，完成蒙古征服世界的壮举。他再次显现时，他将像上帝的迅雷一样，骑着石马，鼓着风翼，紧握神圣的救世长矛，率领百万圣斗士从香巴拉的大门出来，穿过充满晶莹宝石的昊天之海，把我们从腐败、罪恶和被魔鬼控制下的黑暗世界里解放出来。 [631]

他手握坚韧的绳索，挥舞着权力的金鞭，将迫使所有宗教返回正确的道路，并把它们系到北方的金星上。当他的军队惩罚邪恶之徒，并联合高洁之士后，人们翘首期待的未来之神将从云雾中显现，擦去往事的记忆，清除历史的陈迹，荡涤罪恶的知识，统治善和光的净土。 [632]

蒙古人说，诚心所愿!

参考资料和进阶阅读

《蒙古秘史》现已出版了几个译本。最权威的英文《蒙古秘史》研究成果当属罗依果(Lgor de Rachevoiltz)的著作，长达1500页，分两大卷，再加一个较短的附录。最容易读的是内蒙古达斡尔人乌尔干奇·奥农(Urgunge Onon)的译本，篇幅较短。由于他自己是蒙古人，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并对文化和文字背后的含义作出了深刻的解释。最糟糕的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弗朗西斯·克里夫(Franics Woodman Cleaves)的译本。克里夫试图逐字逐句直译，同时采用莎士比亚和《圣经》的文体风格，但似乎有些过头，其结果不仅是对《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侮辱，也是对蒙古语的侮辱。不过这个译本仍值得花点工夫读一下，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证明这样的翻译还不如不做。好在保罗·卡恩(Paul Kahn)修改并删节了这个译本，使之成为最文雅的英语译本，他的诗体译本是很好的《蒙古秘史》入门读物。

穆斯林的记载分成了亲蒙古和反蒙古两大对立派别，而他们几乎都采用两个名字相似但观点相反的历史学家提供的史料。文学造诣极高的波斯人阿塔·马利克·术外尼，像他的父亲和许多男性亲属一样，曾忠实地服务于蒙古人。他出生于1226年，刚好在成吉思汗去世前不久，他在青年时代的一段时间一直生活在蒙古首都哈喇和林，后来做了蒙古驻巴格达总督。术外尼详细地描写了蒙古汗廷，并试图证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行为符合《可兰经》的教义。他权威的著作是《世界征服者史》，迄今为止仍然是描写成吉思汗的最好史料，不仅因为该书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也因为作者所使用的丰富美丽的波斯语言。他过度地使用了富有想象力的隐喻，这可能会使一些爱挑剔的文人感到不快，但我很喜欢，并试图尽可能多地借用。

他的竞争对手——博学的闵哈依·奥·西拉杰·术兹札尼，曾奋起抗击蒙古人，从心底极其痛恨他们，认为他们是地球上最卑劣、最邪恶的生物。术兹札尼于1193年出生于今天的阿富汗，与成吉思汗同时代，但从未见过他。他逃过了蒙古入侵，最终逃到德里避难，在那里他严厉地警告穆斯林，蒙古人是他们宗教史上的最大威胁。他描写了蒙古人几乎超人的力量，并提供令人难以置信的统计数字，声称从不超过十万居民的城市竟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屠杀。

格雷戈里·巴·希伯来斯，1226年出生于今天土耳其的一个犹太家庭，与术外尼同岁。他成了一位牧师、主教，最终在叙利亚东正教教堂被封圣。他写了许多神学和历史著作，包括《世界历史》，他一直称赞蒙古人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拯救基督徒脱离穆斯林的压迫。

在所有历史学家中，记述最全面而且可能是最公平的当属拉施德丁，他写成了一部世界历史，称为《史集》。他曾遭受过命运最严厉的打击。他的一生从1247年开始，至1318年结束，跨越了蒙古人在今天

的伊朗和伊拉克几乎全部的统治时期，而他则成了蒙古政府中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他本来是犹太人，后皈依伊斯兰教，却为蒙古人工作，因此受到了很多既不信任犹太人又痛恨蒙古人的人的反对。当他的保护人伊儿汗国的完者都汗于1316年去世后，拉施德丁的敌人抓住机会整他，指控他毒死了汗，并于1318年把他处死。虽然他最初是作为一个穆斯林被埋葬的，但宗教激进分子最终亵渎了他的坟墓，他的尸骨在15世纪初被移葬到了犹太公墓。如果不是蒙古人出手相救，他所撰写的蒙古史手稿也可能被毁掉了。蒙古人用了一些史上最漂亮的微型画插图装点这部书。

拉施德丁的很多手稿都遗失了，或尚未翻译，但《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含有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虽然他的散文不及术外尼，但他作品的插图版包含了一些最精彩的波斯微型画，因而被频繁复制。

在西方，几乎所有关于蒙古人的早期信息最初都来自两位特使，二人都是天主教神父，他们在成吉思汗死后不久访问了蒙古，当时很多认识他的人都还活着。乔瓦尼·勃朗嘉宾是圣弗朗西斯早期的弟子之一，他在1245年作为教皇英诺森四世的特使和间谍被派往蒙古。虽然身体肥胖，年过六旬，但他还是设法返回述职，并撰写了一份简短而宝贵的报告，记录他此行的经历和他遇到的蒙古人。陪同他旅行的波希米亚人斯蒂芬对他的叙述作了补充和评论，他的报告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但着重对蒙古人进行批评和谴责，而不是描述和分析。

第二位天主教特使是威廉·鲁布鲁克，他于1253年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遣前往蒙古。他比勃朗嘉宾年轻，也受过更好的教育，他在蒙古汗廷和首都哈喇和林也受到了较好的接待，而他的叙事风格也更生动。他很喜欢描述蒙古宗教思想和其他宗教思想，以便证明他们的错误和他自己高明的逻辑，只是他的说法通常并不令人信服。

每种记载都在某些方面存在严重偏向，大多数史料诋毁蒙古人，但也有些激烈地为他们辩护。这些史料是用多种语言写成的，包括蒙古语、汉语、拉丁语、波斯语、亚美尼亚语、阿拉伯语和俄罗斯语等，从道教、伊斯兰教、儒教、基督教和佛教等不同的角度对成吉思汗生平和蒙古文化进行了丰富和多维的观察，各有其独到的见解。

中文史料方面，南宋使臣赵珙、彭大雅和徐霆的原始报告是记录蒙古崛起的最原始的亲身见证。尽管这是一份向皇室提交的篇幅简短、语言枯燥的官方报告，但它提供了一些最可靠的信息。面对蒙古入侵的可怕威胁，使臣特别着重描述了军事信息。1370年，元朝灭亡后，明朝皇帝下诏编撰《元史》，该书从成吉思汗开始记载，是一部权威的官方蒙古史册。虽然编撰的时间很短，存在相互矛盾之处，蒙古名字写法也不一致，但它仍然是关于蒙古帝国的比较权威的著作。其中只有很少部分被译成了英文。

从17世纪开始，蒙古人皈依了佛教，有几位学者撰写了很精彩的蒙

古历史。后来的蒙古史书很少记载有关蒙古传统宗教习俗，因为这些书都是由佛教僧侣和学者撰写的，力求使蒙古早期历史符合他们自己的教义。这些二手史料，有时转录成多个版本，版本之间略有差异，但这些差异却很重要。书名类似，多用贵金属或宝石命名，如《黄金史》《宝石史》《珠史》《宝明经》等。有些已经译成英语，但翻译死板僵硬，把最激动人心的故事弄得暗淡无光、了无生气。

19世纪，亚洲大部分地区正遭受着欧洲的殖民压迫，当时的学者和活动分子开始把成吉思汗看作第一位泛亚主义统治者。曾就读于剑桥大学的日本学生末松谦澄撰写了一部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论文，1879年在伦敦出版，书名为《伟大征服者成吉思汗的身份与日本的英雄义经》(The Identity of the Great Conqueror Genghis Khan with the Japenese hero Yoshitsune)，后被译成日语。末松谦澄声称，成吉思汗其实就是12世纪的日本武士英雄源义经，他伪造了自己死亡的假消息，逃到北海道，然后前往蒙古，在那里，他组建了军队并开始征服世界。[633] 这种离奇的说法出现于日本的工业崛起时代。日本在历史上长期闭关锁国，此时却打算谋求自己在世界上的一席之地了。成吉思汗是日本人的说法突然提高了日本在世界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其他作家继续发挥这一想法，把日本和蒙古联系起来，并声称成吉思汗帝国是新的亚洲帝国的历史先驱。

但有一位作家与众不同，他就是19世纪的成吉思汗后裔、生活在内蒙古的尹湛纳希。他就像现代版的耶律楚材，曾被训练成为一位中国学者，一度非常忠于他的蒙古民族，同时也对蒙古人进行了激烈批评。他的父亲留下了一部尚未完成的关于成吉思汗的小说，尹湛纳希在此基础之上写成了一部关于蒙古族哲学和身份认同的最深刻的著作。这部书的书名叫作《青史演义》，它与佛教书写形成了鲜明对照，是一部哲理性小说。《青史演义》是继7世纪前的《蒙古秘史》之后最重要的蒙古文学作品。[634]

《青史演义》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是篇幅很长的前言，概述了尹湛纳希关于哲学和宗教的思想。他生活在清末，亲眼看到了自己周围的腐败和失败。虽然他生于富裕之家，但因煤矿投资失败以及自家庄园发生的农民起义，失去了很多财产。身处毁灭性的混乱环境中，他从成吉思汗更自由、更有序的社会思想中得到启发。成吉思汗的范例表明，亚洲人不需要向西方寻找关于自由、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思想，他们在自己周围就可以找到伟大的亚洲领袖的先例，如孔子、佛陀、老子、成吉思汗等。他没有直接抨击清朝官员，而是援引先哲的教导对他的中国同胞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他们懦弱、伪善和虚荣。他认为，亚洲曾经是历史的驱动力，只要遵循这些先哲们的理想并付诸行动，它就可以再次成为世界的哲学和政治中心。

在尹湛纳希的精神感召下，今天，新一代的蒙古族学者正在书写他们自己民族的历史。我希望并期待，他们的分析将超越前人的著作，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著作，勾勒出一个更完整的成吉思汗画像，这样，他

独特的远见卓识就有可能在未来的风暴中为我们指引方向。

译后记

杰克·威泽弗德不愧为一位说故事大家，善于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总是能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发现令人惊诧的历史秘密。他的前两本蒙古史著作《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和《最后的蒙古女王》出版后都引起了很大反响，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已经用二十多种语言出版发行。这本《成吉思汗：比武力更强大的是凝聚力》一问世，便得到普遍好评。《华盛顿邮报》书评称："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具有威泽弗德的才华，能把深入的历史研究变得鲜活生动，贴近现实。"

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中，威泽弗德认为，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不仅划分了现代世界的版图，而且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在《最后的蒙古女王》一书中，他认为，在蒙古大军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蒙古女王不仅是蒙古帝国新征服领土的实际统治者，而且一度是蒙古帝国全球经济网络的操控者。在本书中，威泽弗德则探讨了一个更为复杂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主题：宗教问题。他发现，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几百年后曾以某种迂回曲折的方式影响了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很多读者来说，这种观点有点匪夷所思，难以置信。但是，细读本书，不能不说，作者持之有据，并非凭空杜撰。这是一本广征博引，资料翔实，观点新颖，值得一读的好书。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但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他们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宗教。他们周围的草原部落有的信奉基督教，如克烈部和乃蛮部，而摩尼教的传统依然普遍存在。在征服西辽并进军花剌子模汗国的过程中，他们又遭遇了伊斯兰教和佛教。在13世纪的欧亚大陆和欧洲，宗教的权势和影响都很大。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等各据一方，相互竞争，蓬勃发展。但随着成吉思汗的征服战争，各种宗教信徒在蒙古帝国，甚至在蒙古汗廷被迫走到了一起，宗教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统治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宗教政策，以保证帝国境内和平稳定。他的政策便是各宗教平等。成吉思汗下令，"人人均可信仰自己的宗教，遵守自己的教规。"同时，从信仰的角度，他认为，所有形式的崇拜目标是一致的，都在向同一个神圣的存在说话。宗教是普世性的，但表现形式则千差万别，各有千秋，就像在一个统一的帝国内部，人们的语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政府管理模式等各有特色一样。在蒙古帝国，各种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道教等地位平等，按照法律，它们必须和平相处，力避冲突。任何一种宗教的信徒都不允许迫害其他宗教的教徒。同时，他也为他的帝国确定了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绝不允许任何宗教凌驾于汗权之上。

纵观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征服者，他们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他

们金戈铁马、摧枯拉朽般的征服战争和战绩，而且在于他们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在作者眼中，成吉思汗正是这样一位伟人，他的征服带着一种道义的力量，他对花剌子模汗国的征服就是因为对方背信弃义，杀害蒙古使团和商人，偏离了天道。成吉思汗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在帝国境内建立的商业网络和推行的宗教政策。他在帝国境内建立驿站，降低关税，鼓励商人跨境贸易。同时，他也认识到，马上可以打天下，但马上不能治天下。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他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同时也需要比法律规则更强大、更具约束力的宗教。

从《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到《成吉思汗：比武力更强大的是凝聚力》，威泽弗德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很大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前一本书着重于物质的东西，后一本书则探讨深层次的东西，涉及精神、心灵、灵魂、理智等方面的内容。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是因为成吉思汗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蒙古帝国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与此同时，宗教冲突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今天，在第二波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之际，恐怖袭击也愈演愈烈，从纽约双子座到巴黎、伦敦街头，恐怖袭击手段多样化，防不胜防。作者认为，今人需要古人的智慧来处理当今世界面临的棘手问题。今天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当于当年的蒙古帝国，但美国的决策者却缺乏成吉思汗那样的全球领导力。成吉思汗并没有一套意识形态，他只是制定公正的法律并坚持实施，言必信，行必果。蒙古人以区区百万人口征服了数亿之众，靠的并不仅仅是金戈铁马，血雨腥风，而是更重要的软实力。尽管征服战争是残酷的，但通常在几个月的血腥征服后，便会带来一个和平的世纪，称为蒙古大同。作者指出，成吉思汗的成功“来自于他寻求真理和维护最高命令的终极原则和法律而作出的努力”。正如他在《蒙古秘史》中所说的，“我朝立于众国位之上，因我常思真理之圣道、大法”。在21世纪，美国几乎一直在进行反恐战争，在成吉思汗当年征服的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却并没有带来一天的和平，这是需要反思的。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笃信萨满教，崇拜天地和各种自然现象。他们承认有一个最高主宰，这就是长生天腾格里。在他们看来，天不仅主宰着一切自然现象，而且掌控着人类的命运，赋予人类灵魂，是至高无上的。成吉思汗相信神，但他对宗教抱持着实用主义态度。他要求各种宗教的领袖为他祷告，保佑他和他的军队平安；他鼓励他的儿子和基督徒妇女结婚，因为他觉得她们可以成为好母亲，来教养他的孙子。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对信仰的追求愈加迫切，他在他的流动军事指挥总部设立了一个哲学和宗教沙龙性质的论坛，邀请各种宗教学者和思想家翻山越岭，从遥远的地方赶来会面，其中就包括长春真人丘处机。成吉思汗的目的并不是要由此皈依某种特定的宗教，而是为了探索如何利用宗教的力量来统治世界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帝国。比如，他赐给长春真人特权，掌管天下道教，就是要利用道教在华北汉人中的影响力，为他的帝国统治服务。

本书犹如一个比较宗教的百科全书，书中涉及了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宗教，令人大开眼界。比如，作者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蒙古高原上各种宗教的此消彼长，介绍了最初信奉摩尼教的回鹘人在回鹘帝国崩溃后是如何逐渐皈依伊斯兰教的。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些历史介绍和分析很有启发性。

作者广征博引，但所引用的有些史实在蒙古史料和外文史料中的记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比如铁木真名字的出处，据《蒙古秘史》记载，也速该是用他所俘虏的一个塔塔儿武士的名字为刚出生的儿子起的名，但作者在本书中采用外文史料的说法，认为也速该是用他杀死的一位塔塔儿武士的名字为新生的儿子起的名。作者怀疑《蒙古秘史》曾被后人有意删改过，也许后人认为用一个活人的名字比死人的名字更吉祥一点，因此作了改动。译者在文中相应地方作出注释，提醒读者注意。

本书探讨的重点是形而上的宗教，涉及的问题非常庞杂，因此翻译难度颇大，加之作者广征博引，更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信达雅”是翻译的三个层次，严复对此解释道：“翻译作品内容忠实于原文谓信，文辞畅达谓达，有文采谓雅。”因此，第一步要做到“信”。对译者来说，本书的难度并不在于引用的外文资料，而在于中文资料，查找中文原文耗时费力，有时为了找到一句话就要反复查阅整部书，颇有点大海捞针之感。尽管译者作出了很大努力，但还是有一些找不到原文，只好按照英文意思译成中文。本书译完之后，又花了不少时间修饰润色，力求达到“达”和“雅”的层次，但反复修改之后，仍有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可能存在错漏之处，万望读者见谅，并祈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赵清治

2017年12月

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注释

序言　成吉思汗、托马斯·杰斐逊与上帝

[1] .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I, chap. XXXV.

[2] . Ibid., vol. VI, chap. LXIV. The correct modern spelling of Genghis Khan's title in Mongolian is Chinggis Khaan, but outside of Mongolia, his name has been spelled in many different ways: Chingiz in Arabic and Persian, Chingischam Imperator in the irst Latin references in Europe, Cambyuskan in the earliest English writings of Geoffrey Chaucer. There are several systems of Romanization for the Mongolian language and a variety of spellings are used in this book according to what seems easiest for the reader to pronounce or easiest to use for further research. Similarly, Chinese and Arabic names and words are usually presented according to the spelling of the English-language sources, without forcing all of them into one system. Alternative spellings and forms of Romanization are presented in notes as deemed helpful to the reader.

[3] . A facsimile reproduction of the manuscript has been published as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dated July 21, 1669 draft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John Locke, foreword by Justice Sandra Day O'Connor, (Charleston: Charleston Library Society, 2012).

[4] . Books in the Mount Vernon library: http:// librarycatalog.mountvernon.org/ cgi-bin/koha/opac-detail.pl ? biblionumber＝4983&shelfbrowse_itemnumber＝5995#shelfbrowser. Zingis, historie tartarie appeared simultaneously in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issued by separate London printers as Taxila or Love prefer'd before Duty and Zingis a Tartarian History.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author's life, see Alexander Calame, Anne de La Roche-Guilhen: Roman-cière huguenote (1644–1707) (Geneva: Librairie Droz, 1972).

[5] . Thomas Jefferson, 1783 Catalog of Books (circa 1775-1812), 32, Thomas Jef- ferson Papers, electronic ed. (Boston: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2003). www.thomasj effersonpapers. org; http://catdir.loc. gov/catdir/ toc/becites/main/ jefferson/88607928.toc.html. As late as May 26, 1795: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 28, 1 January 1794-29 February 1796, ed. John Catanzariti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357-59.

[6] . Pétis de la Croix, Histoire du grand Genghizcan: premier empereur des anciens mogols et Tartares, published in 1710, 78-90. Jefferson bought several copies in French.

导言　众神的愤怒

[7] . Minhāj Sirāj Jūzjānī, Tabakāt-i-Nās. irī: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 vol. 2, trans. H. G. Raverty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1881), 1078-79.

[8] . Kirakoz Gandzaket'i's History of the Armenians, trans. Robert Bedrosian (New York: Sources of the Armenian tradition, 1986), 234.

[9] . Peter Olbricht and Elisabeth Pinks, 69.

[10] . Injannasi, 59.

[11] . Hend Gilli-Elewy, 353-71.

[12] . Eric Voegelin, "Mongol Orders of Submission to European Powers," Byzantion 15, 1940-1941.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5; Published Essays: 1940-1952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133.

[13] . Ibid., 96-98.

[14] . Voegelin, "Mongol Orders of Submission to European Powers," 95-96.

[15] . Juvaini, 105.

[16] . Pétis de la Croix, 214.

[17] . Bar Hebraeus, 355.

第一章　吃人的牙齿

[18] . The oldest known copy of the Secret History consisted of 281 numbered sections; most translations into most languages use this same system, making it easier to use the § (section) rather than page number. Editions by Arthur Waley and Paul Kahn are easier to read and are also listed in the bibliography.

[19] . The Pearl Rosary (Subud Erike), trans. Johan Elverskog (Bloomington, IN: The Mongolia Society, 2007), 36-37, 43-45.

[20] . "Olqonud kemekü ulus-un ciletü mergen-ü gergei -elüng ekener-i buliyan abuγad qatun bolγabai . . . γurban sar-a-tai daγaburi kuu arban sar-a güicejü. . . . t-r-gsen temüjin." Quoted from manuscript, "History of Four Parts" (Dorben j-il-n te-ke 15/96: 10, 1094/96: 10). Explained in Kápolinás Olivér, "The Identity of Chinggis Khan's Father According to Written Mongolian Accounts," Mongolica, vol. XIV, St. Petersburg, Russia, 2015, 62-66.

[21] . "Nid-rmegchi mergen Jarchigudai," Injannasi quote from Walther Heissig, Geschichte der Mongolischen Literature, 285.

[22] . Het'um 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Tartars: The Flower of Histories of the East, trans. Robert Bedrosian (Long Branch, NJ: Sources of the Armenian Tradition, 2004), bk. 3, § 16. Author was also known as Hetum and as Hayton of Corycus. https://archive.org/stream/HetumTheHistoriansFlowerOfHis toriesOfTheEast/Hetum_djvu.txt.

[23] . Secret History, § 149.

[24] . Ibid., § 66.

[25] . Ibid., § 71.

[26] . Igor de Rachewiltz, Secret History, § 72.

[27] . Lubsang-Danzin, § 23.

[28] . Secret History, § 72.

[29] . Igor de Rachewiltz, Secret History, § 101.

[30] . S. Cojmaa, “Die PersOnlichkeitsmerkmale Cingis Chaans,” in Cingis Chaan und Sein Erbe, ed. U. B. Barkmann (Ulaanbaata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 2007), 216-32, 229. Мах идэх шvд аманд аюу (баймуй). Хvн идэх шvд сэтгэлд аюу. “Чингис Хааны бие хvний онцлог,” Ш. Чоймаа, in Чингис Хаан хийдээг Тvvий Ов, 27.

[31] . Burgi: Bŭrgi.

[32] . Old woman: Qo’aqchin or Qo’aγchin, Secret History, § 103.

[33] . Volker Rybatzki, “Die Personnennamen und Titel der Mittelmongolischen Dokumente,” 10, 317, 716. The name is related to Modern Mongolian words such as zasag, the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zasakh, to improve; and zarchimlakh, to establish or follow a principle.

[34] . Universal Mother: G. Mend-Oyo, Altan Ovoo, trans. Simon Wickham-Smith (Ulaanbaatar: Mongolian Academy of Culture and Poetry, 2012), 173-76.

[35] . “The Orkhon Inscriptions: Being a Translation of Professor Vilhelm Thomsen’s Final Danish Rendering,”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5, 1930, 864.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ala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69 (Bloomington, IN: Mouton, 1968).

[36] . Rashid al-Din quoted in John Andrew Boyle, “Turkish and Mongol Shamanism in the Middle Ages,” Folklore, vol. 83 (1972): 177-93, 182.

[37] . “It was from a naked prophet, who could ascend to heaven on a white horse, that he accepted the title of Zingis, the Most Great, and a divine right to the conquest and dominion of the earth.” Edward Gibbon, vol. III, chap. XXXVI.

[38] . Nora K. Chadwick, “The Spiritual Idea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Tatars of Central Asi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66 (1936): 291-329.

[39] . Juvaini, 56.

[40] . Secret History, § 254.

[41] . Ibid., § 204.

[42] . Ibid., § 149.

[43] . A person's power, strength, and humanity were symbolized by the belt or sash they wore. To remove one's belt was to stand powerless before another person or a sacred spirit. Ibid., § 103.

第二章　上天的金鞭

[44] . Secret History, § 79.

[45] . Ibid., § 80.

[46] . Ibid., §§ 79-81.

[47] . Sulde: сҮлд sülde.

[48] . Hend Gilli-Elewy, 364.

[49] . Knowledge learned while growing up becomes like the morning sun: Өсөхөд сурсан Өсөхөд сурсан. Janice Raymond, Mongolian Proverbs (San Diego: Alethinos Books, 2010), 214.

[50] . Injannasi, 41-42.

[51] . Secret History, § 103.

[52] . Ibid., § 104.

[53] . Abui Babui: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 174; also see Igor de Rachewiltz, 630.

[54] . Secret History, § 104.

[55] . Jūzjānī, trans. Raverty, 1078–79, quoted in George Lane, Genghis Khan and Mongol Rule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4), 37.

[56] . Juvaini, 38-39.

[57] . Igor de Rachewiltz, Secret History, § 97.

[58] . Secret History, § 110.

[59] . Ibid., § 112.

[60] . Igor de Rachewiltz, Secret History, § 113.

第三章　草原的智慧

[61] . "Mao-tun's title 'T'ang-li ku-t'u Shan Yü' means, literally translated, Shan Yü with the charimsma (kut) of the Heaven"—Later "during the reign of Lao-shan, the Hsiung-Nu sovereign was called 'the Great Hsiung-Nu Emperor installed Heaven and Earth and born of the Sun and Moon.'" Elçin K-rsat-Ahlers, "The Role and Contents of Ideology in the Early Nomadic Empire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s, ed. Henri J. M. Claessen and Jarich G. Oosten (Leiden, Netherlands: E. J. Brill, 1966), 141.

[62] . Sophia-Karin Psarras, “Han and Xiongnu: A Reexamination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II),” Monumenta Serica, vol. 52 (2004): 56.

[63] . Kürsat-Ahlers, “The Role and Contents of Ideology,” 141.

[64] . Sima Qian, “The Account of the Xiongnu,” The History of Mongolia, ed. David Sneath and Christopher Kaplonski (Folkestone, Kent, UK: Global Oriental, 2010), 48.

[65] . Joseph P. Yap, Wars with the Xiongnu: A Translation from Zizhi tongjian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09), 170.

[66] .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Roman History of Ammianus Marcellinus, trans. C. D. Yonge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94), 572-82.

[67] . Seers: μάντεις read omens and predicted the future; shamans, referred to as ’ερεις or priests. Names of high-ranking officials such as Ataqam, Άταχάμ meaning Father of Shamans, or Eskam, Έσχάμ who was the father of one of Attila’s favorite wives, further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shamans in Hun culture. Ott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Studies in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268-69.

[68] . Attila: Αττίλας, Atala, Atalum, possibly meant Father Ocean.

[69] . According to Jordanes’s Getica, a summary of the otherwise lost work of Cassiodorus on the Goths. Hunnorum omnium dominus et paene totius Schthiae gentium solus in mundo regnator. Latin quote from Theodor Mommsen, ed., Jordanes (Jordanis Romana et Getica) (Berlin, 1882), 178, also quoted in Omeljan Pritsak, “The Hunnic Language of the Attila Clan,”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vol. 6 (1982): 444. Als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277.

[70] . The name Tengis is variously transcribed by Greek and Romans as Dengizich, Denzig, and Tengizich, Δεγγίχ, Δεζίχιρος, Δεζίριχος, Δεγιρζίγ. Pritsak, “The Hunnic Language of the Attila Clan,” 446.

[71] . Kharbalgas in Mongolian, but also known as Karabalghasun, Mubalik, the Bad City, and Ordu-Baliq, City of the Court or Capital City.

[72] . For the most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these Turkic inscriptions transcribed, transliterated, and translated, see this Kyrgyz Web site: http://bitig.org/ ? lang = e.

[73] . Nwm snk: inscribed on the Bugut Stele, Volker Rybatzki, “Titles of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44 (2000). Some scholars incorrectly translated snk as Sanskrit samgha, referring to the Buddhist religion, but its meaning has been clariied by two Japanese re- searchers, T. Moriyasu and Y. Yoshida,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Recent Survey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Inscriptions from the Turkic and

Uighur Period in Mongolia," Studies of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vol. 13 (1998): 129-70.

[74] . Jonathan Karam Skaff, 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 Culture, Power, and Connections, 580–88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20. Also see Huis Tolgoy Memorial Complex inscription: http:// irq.kaznpu.kz/ ?
lang=e&mod=1&tid=1&oid=3.

[75] . "The Orkhon Inscriptions: Being a Translation of Professor Vilhelm Thom- sen's Final Danish Rendering,"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5 (1930): 862, 867. Also see Peter B. Golden, "The T-rk Imperial Tradition in the PreChinggisid Era," The History of Mongolia, ed. David Sneath and Christopher Kaplonski (Folkestone, Kent, UK: Global Oriental, 2010), 79, note 67, 87. Tal-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69, 1968), 261-73.

[76] . Öze Kök : Teŋiri : asïra : yaγïz : Jer : qïlïntaquda : ekin ara : kisi : oγulï : qïlïn-- mïs : kisi : oγulïnta : öze : ečüm apam : Bumïn qaγan : Estemi qaγan : olurmïš : olurupan : Türük :buduniγ : Elin : törüsün : tuta : bermis : iti : bermis : http://irq.kaznpu.kz/ ?
lang=e&mod=1&tid=1&oid=15&m=1.

[77] . Juvaini, 54-55.

[78] . Sinor, Studies in Medieval Inner Asia, I-306.

[79] . Ibid., I-312-15.

[80] .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283-90.

[81] . "When the sword gets rusty the warrior's condition suffers, when a Turk assumes the morals of a Persian his flesh begins to stink." Robert Dankoff, "Inner Asian Wisdom Traditions in the Pre-Mongol Perio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01 (1981): 87-95, 90-91.

[82] . From Kashgari's Diwan Lugat at-Turk (c. 1075), quoted in Robert Dankoff, "Kāšġarī on the Beliefs and Superstitions of the Turk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95 (1975): 70. Spelled Tängri in original.

[83] . Tenger in Modern Mongolian, Tenggeri in Classical Mongolian.

[84] . E. Denison Ross and Vilhelm Thomsen, "Being a Translation of Professor Vilhelm Thomsen's Final Danish Rendering,"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6 (1930): 37-43.

[85] . "The Orkhon Inscriptions: Being a Translation of Professor Vilhelm Thom- sen's Final Danish Rendering,"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5 (1930): 870.

第四章　冲突的自我

[86] . Secret History, § 116.

[87] . Sülde, Secret History, § 201.

[88] . Ibid., § 118.

[89] . Ibid.

[90] . Ibid., § 123.

[91] . Thomas T. Allsen, “Mongolian Princes and Their Merchant Partners, 1200- 1260,” Asia Major, vol. 2 (1989): 86.

[92] . Secret History, § 123-25.

[93] . Ibid., § 126.

[94] . Ibid., § 127.

[95] . Ibid., § 129.

[96] . Ibid.

[97] . Ibid., § 204.

[98] . Leland Liu Rogers, 75.

[99] . Peter Olbricht and Elisabeth Pinks, 12, 60.

[100] . Jautau: For the etymology and meaning of this term see Secret History, § 134.

[101] . Secret History, § 53.

[102] . Igor de Rachewiltz, Secret History, 302. Also see Denis C. Twitchett, Herbert Franke, and John King 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332.

[103] . J. Kroll, “The Term yi-piao and ‘Associative’ Think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93 (1973): 359.

[104] . Ibid., 46.

[105] . Arga: apra, Secret History, § 166.

[106] . Pétis de la Croix, 44.

[107] . Secret History, § 150.

[108] . Bar Hebraeus, 352.

[109] . Lev Gumilev, Searches for an Imaginary Kingdom: The Legend of the Kingdom of Prester John, trans. R. E. F. Smit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0] . Igor de Rachewiltz, Secret History, § 189.

[111] . Secret History, § 195.

[112] . Ibid., § 242.

第五章　光明的使者

[113] . Michael R. Drompp, 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2005), 226.

[114] . The Greek words coming into Turkic and Mongolian were mostly (κοινή) Hellenistic words. Volker Rybatzki, 2006, 633.

[115] . Kutadgu Bilig, quoted in İsenbike Togan, Flexibility and Limitation in Steppe Formations: The Kerait Khanate and Chinggis Khan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1998), 53.

[116] . T’ang hui-yao quote from “Shiruku rōdo to songudojin” (“Silk Road and the Sogdians,” Tōyō gakujutsu kenkyū 18, 1979, 30, quoted in Mariko Namba Walter, “Sogdians and Buddhism,” Sino-Platonic Papers, vol. 174 (2006): 11.

[117] . Togan, Flexibility and Limitation in Steppe Formations, 53.

[118] . Heuser and Klimkeit, Studies in Manichaean Literature and Art, 158.

[119] . Cyril Glassé,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Isla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63.

[120] . Quoted in Sinor, Studies in Medieval Inner Asia, V-10.

[121] . Manichaean Texts from the Roman Empire, ed. Iain Gardner and Samuel N. C. Lieu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8.

[122] . Samuel N. C. Lieu, 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Tübingen, Germany: J. C. B. Mohr; 2nd ed., rev. and expanded edi- tion, 1992), 282.

[123] . Colin Mackerras, “The Uighur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ed. Denis Sino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35.

[124] . Hans-J. Klimkeit, “Buddhism in Turkish Central Asia,” Numen, vol. 37, Fasc. 1 (1990): 57.

[125] . Tsui Chi, “Mo Ni Chiao Hsia Pu Tsan, ‘The Lower (Second ?) Section of the Manichæan Hym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11 (1943): 174-219, verse 238.

[126] . Hans-Joachim Klimkeit, in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93), 216.

[127] . Johann Jako, Philip Herzon, Albert Schaff, et al., The New Schaff-Herzog Encyclopedia of Religious Knowledge (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1910), 153-62.

[128] . Klimkeit, in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178-81.

[129] . Manfred Heuser and Hans-Joachim Klimkeit, Studies in Manichaean Literature and Art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1998), 193.

[130] . Richard Foltz, Religions of the Silk Road, 2nd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 millan, 2010), 78.

[131] . Cologne Manichaean Codex; http://essenes.net/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 &task=view&id=649&Itemid=926.

[132] . Secret History, § 217.

[133] . Tasaka Kōdō, “Kaikotsu ni okeru Manikyōhankugai undō,” Tōhō gakuhō, vol. 11, no. 1 (1940): 223-32. Quoted in The Uighur Empire: According to the Tang Dynastic Histories, ed. and trans. Colin Makerras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72), 9, 152.

[134] . Hans-Joachim Klimkeit, “Manichaean Kingship,” Numen, vol. 29 (1982): 17-32, 23.

[135] . Wen Jian Lu quoted in A. G. Maliavkin, Materialy po istorii Uigurov v IX–XII vv: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the Uighurs IX–XII Centuries (Novosibirsk: Izdatel’stvo “Nauka” Sibirskoe Otdelenie, 1974), 92.

[136] . Anatoly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258.

[137] . Quoted in Resat Baris Unlu, “The Genealogy of a World-Empire: The Otto- mans in World History,” Ph.D. dis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te Univer- sity of New York, Binghamton, 2008), 65.

[138] . Peter Olbricht and Elisabeth Pinks, 16.

[139] . Tatar Tonga also spelled as Tatar-Tong’a, Tatatungga.

[140] . Juvaini, 7.

[141] . Mongolian words: Болор, сахар, чихэр архи, болд, титим, чинжал, саван, анар, тоть, шатар, алмааз, маргад, инжир эрдэнэ. Борчууд in Modern Mon- golian. Bells (tsan from Persian chang), notebook (depter from Persian defter from Greek δίπτυχα—related to English diptych). Similarly the Uighur word for sweat began to be used for wages. The Mongols also eventually used their word for sweat хөлс similarly to signify pay, wages, hire, and concepts that had not previously existed.

[142] . Mongol division of people into good and bad: People were either el, peaceful allies and subjects who kept their eyes, or they were bulqa (Modern Mongolian булга) or dayijiju (dayijiju qarchu odu’at, those who have gone out or departed); Igor de Rachewiltz, Secret History, § 188.

[143] . Klimkeit, “Manichaean Kingship,” 26.

[144] . Mary Boyce, The Manichaean Hymn-Cycles in Parthi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101. See also Mary Boyce, A Reader in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Leiden, Netherlands: Acta Iranica 9, 1975), 165. Other translation in Klimkeit, "Manichaean Kingship," 17.

[145] . Secret History, § 21. In another Manichaean influence on the Secret History and the tale of Alan Goa, a Parthian fable attributed to Mani described a man on his deathbed who called his sons together and told them the tale of the bundle of sticks. Available in German translation: "Der Apostel erzählte dem Turan-Schach ein Gleichnis: Es war ein Mann, und es waren sieben Söhne. Als die Stunde des Todes gekommen war, rief er seine Söhne. Sieben—uranfängliche—und—Treibstock—gebunden. Er sprach: '[Alle] zugleich zerbrecht!' Keiner war dazu [imst]ande. Darauf öffnete er [das Band—]." In turn this Manichaean story possibly was taken from (or shared a common source with) the Greek tales of Aesop. R. Merkelbach, "Eine Fabel Manis,"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vol. 75 (1988): 93-94.

[146] . Plato, The Republic, trans. Benjamin Jowett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3), 211.

[147] . Ibid., 42-50.

[148] . Klimkeit, in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356-62.

[149] . Ibid., 356. For further explanation of ichtin nom, tashtin il, the religion within and the state without: Heuser and Klimkeit, Studies in Manichaean Literature and Art, 286.

[150] . Ibid., 225.

[151] . Klimkeit, in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22, 274.

[152] . Nomos: Sogdians adopted the word from Manichaeism, and Sogdian Buddhists used it as a translation for the Sanskrit dharma. Volker Rybatzki, 633.

[153] . King of the whole law: Nom quti̇̈ kadilmiš and qamaγ nom iligi, refers to all law, religious and secular. Klimkeit, "Manichaean Kingship," 17-32, 26.

[154] . Tsui Chi, "Mo Ni Chiao Hsia Pu Tsan, 'The Lower (Second ?) Section of the Manichæan Hym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11 (1943): 174-219, verses 76, 84.

[155] . Klimkeit, "Manichaean Kingship," 17-32, 29.

[156] . Golden cord: altan argamj, Secret History, § 254.

[157] . "The term Sog was an abbreviated ethnonym for Sogdians (Sog dag) during the imperial period and became an ethnonym for Mongols (Sog po) after their rise to power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Hor, or Hor pa, a Tibetan ethnonym origin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Uighurs during the imperial period, was later used to identify Mongols in general beginning from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ater still the term was used to designate speciic Mongol tribes that underwent

varying degrees of Tibetanization and settled in the regions east and northeast of central Tibet” (Rolf Alfred Stein, Tibetan Civil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34). Also see “Representations of Eficacy: The Ritual Expulsion of Mongol Armies in the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Tsang (Gstang) Dynasty” by James Gentry, in Tibetan Ritual, José Ignacio Cabezón,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8.

[158] . Dīn al-Majūsīya, referring to the fire-worshipping Magi of Persia. Dīn al-Nijashīya, religion of the auditors. Walter J. Fischel, “Ibn Khaldūn’s Sources for Jenghiz Khā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76 (1956): 99.

[159] . For examples of the use of Magi by Christians as the term for Auditors, see Johann Lorenz von Mosheim, Robert Studley Vidal, and James Murdock,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on the State of Christianity during the First Three Hundred and Twenty-Five Years from the Christian Era (New York: S. Converse, 1853), 400.

[160] .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324. Also, Volker Rybatzki, “Die Personnennamen und Titel der Mittelmongolischen Dokumente,” 234.

[161] . Bar Hebraeus, 355.

[162] . Charles R. Bawden, Mongolian Literature Anth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318.

[163] . Bayan Khan Mani’s tale is collected in Ordos but relates to a hunting trip of Temujin near the Bogd Khan Mountain on the Tuul River. Marie-Dominique Even, Chants de chamanes Mongols (Paris: Société d’ethnologie, Université de Paris, 1992), 307, 434.

第六章　草原的耶稣

[164] . Secret History, § 186.

[165] . Peter Olbricht and Elisabeth Pinks, 1980, 3, 31.

[166] . In my book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 Queens, I attempted to recreate this lost history of the daughters of Genghis Khan, primarily through accounts of the marriages made for them.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can also be found in George Qingzhi Zhao, 2008.

[167] . Christian wife reported by Vincent of Beauvais in Speculum Historiale and Simon of Saint-Quentin. Quoted in Gregory G. Guzman, “Simon of Saint-Quentin,” Speculum, vol. 46 (1971): 233.

[168] . Book of the Tower, Mārī b. Sulaimāb, “The Karaits of Eastern Asia,” D. M. Dunlop,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11 (1944): 276-89.

[169] . Nicholaus of Cusa, “On the Peace of Faith (De Pace Fidei),” trans.

William F. Wertz, Toward a New Council of Florence (Schiller Institute, 1993), § XVI.

[170] . Gumilev, Searches for an Imaginary Kingdom, 368.

[171] . Secret History, § 143.

[172] . Ibid., § 181.

[173] . Bar Hebraeus, 353.

[174] . Secret History, § 208.

[175] . Comment made in reference to Guyuk Khan's court. Juvaini, 259.

[176] . Thomas T. Allsen, 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 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5.

[177] . Taken with slight edits from William of Rubruck, 52.

[178] . Ibid., 38.

[179] . Ibid., 56.

[180] . Secret History, § 208.

[181] . Leland Liu Rogers 88; Lubsang-Danzin, § 28.

[182] . Lubsang-Danzin, §§ 30-32.

第七章　缔造蒙古帝国

[183] . Évariste Régis Huc, Christianity in China, Tartary and Thibet, vol. 1 (London: Longman et al., 1857), 123.

[184] . Meng-Ta Pei-Lu und Hei-Ta Shih-Lüeh, 12.

[185] . The khan's complete epithet consists of nineteen words—Kün Ay Tängritä Kut Bolmish Ulug Kut Omanmish Alpin Ärdämin El Tutmish Alp Arslan Kutlug Köl Bilgā Tängri Xan—Who Has Obtained Charisma from the Sun and the Moon God, Who Is Imbued with Great Charisma, Who Has Maintained the Realm with Toughness and Manly Virtue, Courageous Lion, Blessed Ocean of Wisdom, Divine Khan. Zsuzsanna Gulácsi, Mediaeval Manichaean Book Art: A Codicological Study of Iranian and Turkic Illuminated Book Fragments from the 8th–11th Century East Central Asia (Leiden,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2005), 55.

[186] . Secret History, § 74.

[187] . Grigor of Akner's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Archers, trans. Robert Bedrosian (Long Branch, NJ: Sources of the Armenian Tradition, 2003), § 1; https://archive.org/details/GrigorAkner

tsisHistoryOfTheNationOfArchersmongols.

[188] . Het’um th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Tartars: The Flower of Histories of the East, trans. Robert Bedrosian (Long Branch, NJ: Sources of the Armenian Tradition, 2004), bk. 3, § 16; https://archive.org/stream/HetumTheHistorians FlowerOfHistoriesOfTheEast/Hetum_djvu.txt.

[189] . Alice Sárközi, “Mandate of Heaven: Heavenly Support of the Mongol Ruler,” Altaica Berolinensia: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in the Altaic World, ed. Barbara KellnerHeinkele (Wie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witz, 1993), 220.

[190] . Juvaini, 39.

[191] . Kirakos Ganjaketsi’s History of the Armenian, § 32.

[192] . Secret History, § 202.

[193] . Unity creates success: Evlevel butne.

[194] . Sechen Jagchid and Paul Hyer, Mongolia’s Culture and Socie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79), 255.

[195] . Maria Magdolna Tatar, “New Data About the Cult of Chinggis Qan’s Standard,” Altaica Osloensia, ed. Brent Brendemoen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90), 336.

[196] . Secret History, § 121. The Chinese summaries of the Secret History glossed törö as tao-li, which de Rachewiltz explains as “fundamental matters concerning governance,” 451. For the complicated explanation for the unusual term Nendü Khutukh see Igor de Rachewiltz, 784-85.

[197] . Juvaini, 38-39.

[198] . Put them into the right: shidurkhutkhaju, Secret History, § 202.

[199] . Ibid., § 234.

[200] . Ibid., § 154.

[201] . Hans-Joachim Klimkeit, “Manichaean Kingship,” Numen, vol. 29 (1982): 21.

[202] . Secret History, § 203.

[203] . Ibid., § 203.

[204] . P. Ratchnevsky, “Šigi Qutuqu,” in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üan Period, ed. Igor de Rachewiltz, Hok-lam Chan, Hsiao Ch’i-ch’ing,and Peter W. Geier (Wie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witz, 1993), 75–94.

[205] . Kokochu: Kököchü.

[206] . Secret History, § 204.

[207] . Caroline Humphrey with Urgunge Onon, Shamans and Elder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24.

[208] . The worst of men become shamans: Хүнийг муу бөө болох.

[209] . бөө (бөөбийн), to vomit (бөөлжих), to castrate (бөөрлөх), an opportunistic person without scruples (бөөрөний хүн), and the basic term for lice, fleas, and bedbugs (бөөс). Хvлгийг муу жоро болох. A Modern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ed. Denis Sinor (Indiana University,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150, 1997), 69.

[210] . Nine-tongued people: Yisün kelten iren, Secret History, § 245.

[211] . Minhāj Sirāj Jūzjānī, Tabakāt-i-Nāṣirī: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 vol. 2, trans. H. G. Raverty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1881), 949.

[212] . Lubsang-Danzin, § 21.

[213] . Leland Liu Rogers, 75, 105.

[214] . Dragon snake: gürölgü manqus, Secret History, § 19

[215] . Ibid., § 244.

[216] . Ibid., § 245.

[217] . Jūzjānī, Tabakāt-i-Nāṣirī, 949.

[218] . Secret History, § 246.

[219] . Ibid., § 216.

[220] . Ibid., § 217.

[221] . Original in vol. 27 of the encyclopedia of Shihab al-Din Ahmad b. ‘Abd al-Wahhab alNuwayri (died 733/1333): Nihdyat al-arab ftlfuniin al-adab (“The Highest Aspiration in the Varieties of Cultures”), quoted in Reuven Amitai, “Did Chinggis Khan Have a Jewish Teacher ? An Examination of an Early Fourteenth-Century Arabic Tex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24 (2004): 693. Also see Lyall Armstrong, “The Making of a Sufi: Al-Nuwayri’s Account of the Origin of Genghis Khan,” Mamluk Studies Review,vol. 10 (2006): 154–60.

[222] . Qur’an, 3:49, and Qur’an, 5:110.

[223] . Toriin Sulde: Töriin Sülde.

[224] . Christopher Atwood, Encyclopedia of Mongolia and the Mongol Empire, 10–11.

[225] . Secret History, § 208, minu uruq bidan-u oro sa’uju ene metu tusa kiksen toro setkiju.See Igor de Rachewiltz, Index 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vol. 121, 1972), 119–

第八章　火焰的卫士

[226] . Secret History, § 230.

[227] . Ibid., § 147.

[228] . Ibid., § 124.

[229] . Ibid., § 209.

[230] . Ibid., § 125.

[231] . Leland Liu Rogers, 70-74.

[232] . Secret History, § 125.

[233] . Igor de Rachewiltz, Secret History, § 211. Similarly, Borte was called qutuqtu and sutai, § 111. Also used in the name of Shigi-Khutukhu, § 239.

[234] . Secret History, §§ 230-31.

[235] . The word ordu became known in the West as horde, referring to the large and seemingly wild spirit of the Mongol army, but in India the same word became Urdu, the name of the courtly language and in modern times the oficial language of Pakistan.

[236] . "Die Personnennamen und Titel der Mittelmongolischen Dokumente," 575.

[237] . Aldo Ricci and Luigi F. Benedetto, Travels of Marco Polo (Delhi: Asian Education Services, 1994), 129.

[238] . Peter Olbricht and Elisabeth Pinks, 141, 161.

[239] . Secret History, § 177.

[240] . Lubsang-Danzin, § 22.

[241] . Peter Olbricht and Elisabeth Pinks, 53.

[242] . Yusuf Khass Hajib, Wisdom of Royal Glory (Kutadgu Bilig): A Turko-Islamic Mirror for Princes, trans. Robert Dankof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 2091; § 2098, "Wine is an enemy."

[243] . Secret History, § 195.

[244] . C. Ž. Žamcarano, Mongol Chronicl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ans. Ru- dolf Loewenthal (Wie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witz, 1955), 84.

[245] . If something bad happens, you can ind a way out: Элдэв муу юм болсон бол аргалж болон! Alena Oberfalzerovám, Metaphors and Nomads (Prague: Tri- ton, 2006), 32.

[246] . Secret History, § 208. Also see L. N. Gumilev, Searches for an Imaginary Kingdom, trans. R. E. F. Smit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06.

[247] . Plato, The Republic, trans. Benjamin Jowett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3), 234.

[248] . Ibid., 104.

[249] . Ibid., 59. 25. Ibid., 140.

[250] . Ibid., 59. 25. Ibid., 140.

[251] . Plato, The Republic (San Diego: ICON Classics, 2005), 93.

[252] . Secret History, § 195.

[253] . Plato, The Republic, trans. Jowett, 113.

[254] . Ibid., 85-88.

[255] . Ibid., 91.

[256] . "The Travels of John de Plano Carpini and other friars, sent about the year 1246, as ambassadors from Pope Innocent IV to the great Khan of the Moguls or Tartars," A General History and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vol. 1, ed. Robert Kerr, 148.

[257] . Ibid., 132.

[258] . Kirakos Ganjakets'i's History of the Armenian, § 32.

[259] . Friar Giovanni DiPlano Carpini, The Story of the Mongols Whom We Call the Tartars, trans. Erik Hildinger (Boston: Branden Publishing, 1996), 45.

[260] . Bar Hebraeus, 455.

[261] . Al-Nuwayrī quoted in Amitai, "Did Chinggis Khan Have a Jewish Teacher ? ," 693.

[262] . "Histoire Genealogique des Tartares," vol. I, 51, cited in évariste Régis Huc, Christianity in China, Tartary and Thibet, vol. 1 (London: Longman et. al., 1857), 157.

[263] . Juvaini, 23-24.

[264] . Ibid., 25.

[265] . Ibid., 24.

[266] . Ibid., 23.

[267] . H. Desmond Martin, "The Mongol Arm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1 (1943): 60.

[268] . Injannasi, 44.

[269] . Virlana Tkacz, Sayan Zhambalov, Buryat Mongolians, and Wanda Phipps, “We Play on the Rays of the Sun,” Agni, no. 51 (2000): 160.

[270] . Secret History, § 100. Quoted from expanded edition of Paul Kahn (Boston: Cheng & Tsui, 1998), 35.

第九章　飞鸟的双翼

[271] . Igor de Rachewiltz, “Personnel and Personalities in North China in the Early Mongol Period,”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9 (1966): 98.

[272] . Quoted from a stone stele, Tao-Chung Yao, “Ch’iu Ch’u-chi and Chinggis Kh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6 (1986): 203.

[273] . René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ans. Naomi Walfor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 225.

[274] . Thomas Allsen, 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Philadelphia: Univer- 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6), 26.

[275] . Peter Olbricht and Elisabeth Pinks, 61.

[276] . Minhāj Sirāj Jūzjānī, Tabakāt-i-Nās.irī: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 vol. 2, trans. H. G. Raverty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1881), 954.

[277] . Peter Olbricht and Elisabeth Pinks, 60.

[278] . Marco Polo and Rustichel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Complete Yule-Cordier Edition in Two Volume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93), vol. 1, 238.

[279] . Voltaire, The Orphan of China, trans. William F. Fleming (Start Publishing, 2012), act 1, scene 3.

[280] . Secret History, § 272.

[281] . Autumn of the Palace Han: Han Koong Tsu.

[282] . Igor de Rachewiltz, 36-37.

[283] . The good custom of the Chinese nom: Kitad-unb-nom-un sayin yosun-u sudur nigen-i jalaju abubai. Ibid., 14r5, 110.

[284] . When he had assembled . . . to protect and support living beings: Chasutu agula-yin engger-tür uchiragulju tör-yi tedkükü baruqu. Amitan-i asaraqu tedkükü yosun-i asagauju sayisisyan magtagad.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eb Tenggeri,”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vol. 37 (Wiesbaden, Germany:Harrassowitz, 1967), 248-60, 254-55. Original Mongolian quotes

appear in Altan Kürdün minggan kedesütü bichig 1739, II 4v6-10, and Chinggis ejen-ü altan urug-un teüke Gangga-yin urusqal neretü bichig orosiba (The Book Entitled the Glowing of the Gangaa [Ganges], a History of the Golden Lineage of Lord Chinggis), 54b10-11.

[285] . Secret History, § 263.

[286] . E. A. Wallis Budge,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 or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ravels of Rabban Sawma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28), 124-35.

[287] .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1910), 37-39.

[288] . Y. H. Jan, "Hai-yün,"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üan Period, Igor de Rachewiltz, Hok-lam Chan, Hsiao Ch'i-ch'ing, and Peter W. Geier, eds. (Wie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witz, 1993), 226.

[289] . Li Chih-Ch'ang, 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The Journey of the Taoist Ch'ang-Ch'un from China to the Hindukush at the Summons of Chingiz Khan, trans. Arthur Waley (London: Broadway Travellers, 1931), 7.

[290] . Speakers to heaven: This phrase was recorded in the Chinese version. Maybe, тэнгэрийн итгэглч in Modern Mongolian—which would not be so much a speaker to heaven as of or from heaven. One who clariies or elucidates— илтгэгч. Similar, but different word, itgel. In speaking to Muhali just before he died, Genghis Khan used the phrase "itegelten in'ut," translated by de Rachewiltz in The Secret History as "trusted friends" (ina'ut being the plural of inaq) (page 972), "Now you two, Borc'orču and Muqali, are my trusted friends." Secret History, § 266.

[291] . Arthur Waley, 8.

[292] . Y. H. Jan, "Hai-yün,"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üan Period, Igor de Rachewiltz, Hok-lam Chan, Hsiao Ch'i-ch'ing, and Peter W. Geier, eds. (Wie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witz, 1993), 227. Despite claims in Buddhist chronicles such as the Rosary of White Lotuses that Genghis Khan met with him and with various lamas from Tibet, Genghis Khan was not in the area at that time.

[293] . Thomas Allsen, 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83.

[294] . Nom: Nawm (Sogdian transcription), Bar Hebraeus, 355-56.

第十章　上帝的全能

[295] . 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át, The Tarikh-i-Rashidi: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trans. E. Denison Ross, ed. N. Elias (New York: Cosimo Classic, 2008, reprint of 1895 edition), 293.

[296] . Juvaini, 64.

[297] . Ibid., 65.

[298] . 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át, Tarikh-i-Rashidi: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trans. E. Denison Ross, ed. N. Elias (London: Curzon Press, 1898), 253-55.

[299] . Juvaini, 66.

[300] . Juvaini, 67.

[301] . Ibid.

[302] . Oration in Honor of Julian, Selected Orations, Volume I: Julianic Orations, Libanius, ed. and trans. A. F. Nor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eb Library edition, 1969). The reign of Julian is discussed in consider- able detail by Edward Gibbon in Volume II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303] . Klaus Lech, Das Mongolische Weltreich, German translation of Masālik al-abṣār fī mamālik al-amṣā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8), 95, 193.

[304] . Penalty for killing a person (man tarqaraba bi-li-aṣnān): ibid., 113.

[305] . Juvaini, 26.

[306] . Igor de Rachewiltz, 1962, 25, 37.

[307] . Juvaini, 68.

[308] . Minhāj Sirāj Jūzjānī, Tabakāt-i-Nāṣirī: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 vol. 2, trans. H. G. Raverty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1881), 974-75.

[309] . Juvaini, 78.

[310] . Ibid.

[311] . Ibid.

[312] . Ratchnevsky, 120.

[313] . Juvaini, 79.

[314] . Henry Hoyle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74.

[315] . Juvaini, 79.

[316] . Secret History, § 253.

[317] . V. V. Barthold,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Leiden, Netherlands: E. J. Brill, 1956), 36.

[318] . Juvaini, 19-20.

[319] . Ibid., 80.

[320] . Golden Cord: altan argamj, Secret History, § 254.

[321] . Secret History, § 265.

[322] . Kolgen: Kölgen.

[323] . Igor de Rachewiltz et al.,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47.

[324] . Igor de Rachewiltz, 1962, 19.

[325] . Igor de Rachewiltz et al.,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48.

[326] . Igor de Rachewiltz, 1962, 19.

[327] . Ibid., 24.

[328] . Ibid., 46.

[329] . Ibid., 19.

[330] . E. Bretschneider, "Si Yu Lu (Ye-lu Ch'u Ts'ai),"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1910), 17-21.

[331] . Igor de Rachewiltz, 1962, 58.

[332] . Juvaini, 84.

[333] . Shahnama: also known as Shahnameh, quoted by Juvaini, 86.

[334] . Juvaini, 99.

[335] . Ibid., 92.

[336] . Ibid., 396.

[337] . Ibid., 397.

[338] . Ibid., 398.

[339] . Ibid., 123.

[340] . Ibid., 124.

[341] . Ibid., 125-26.

[342] .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Tarikh-i-Rashidi); http:// persian.packhum.org/ persian/main.

[343] . Muhammad b. Ali Shabankarah'i, Majma' al-ansab, 1986, 227. Quoted in Michal Biran, Chinggis Khan (Oxford, UK: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7), 119.

[344] . Ghiyas al-din Muhammad Khwand Amir, Habīb al-siyār, vol. 1, trans. W. M. Thackston (Cambridge, MA: 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1994), 14. Cited in Richard Foltz, Religions of the Silk Roa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06.

[345] . Jalālu-d-Dīn H. assan III, 1187–1221, imam from 1210 to 1221. Meeting between envoys: Juvaini, 703. Juvaini refers to the imam by the irst part of his name, Jalal-al-Din, but he is not the same person as the shah with the same name.

[346] . Marshall G. S. Hodgson, The Order of Assassins: The Struggle of the Early Nizari Isma'ilis Against the Islamic World (The Hague: Mouton, 1955), 87-88.

[347] . Juvaini, 725.

[348] . Juvaini, 703.

[349] . Timothy May, "A Mongol-Ismâ'îlî Alliance ? : Thoughts on the Mongols and Assassi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rd series, vol. 14 (2004): 231-39.

[350] . Ibid., 235.

[351] . Ibid., 239.

[352] . Devin DeWeese, "Stuck in the Throat of Chingīz Khān: Envisioning the Mongol Conquests in Some Sufi Accounts from the 14th to the 17th Centuries,"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Post-Mongol Central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ed. Judith Pfeiffer and Sholeh Alysia Quinn (Wiesbaden, Germany: Harrassowitz, 2006), 39.

[353] . Ibid., 43.

[354] . Rashid al-Din, Jami' al'Tavarikh, ed. Mohammad Roushan and Mustafah Musavi (Tehran: Nashr Albaraz, 1994), 516. Cited in George Lane, Daily Life in the Mongol Empire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6), 182.

[355] . DeWeese, "Stuck in the Throat of Chingīz Khān," 36.

[356] . Juvaini, 105.

[357] . Ibid., 104.

[358] . C. Ž. Žamcarano, Mongol Chronicl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ans. Rudolf Loewenthal (Wie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witz, 1955), 84.

[359] . Pétis de la Croix, 341-43.

[360] . L. N. Gumilev, Searches for an Imaginary Kingdom, trans. R. E. F. Smit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40.

[361] . DeWeese, “Stuck in the Throat of Chingīz Khān,” 29.

[362] . Lyall Armstrong, “The Making of a Sufi: Al--Nuwayrī’s Account of the Origin of Genghis Khan,” Mamluk Studies Review X-2 (2006): 154; Reuven Amitai, “Did Chinggis Khan Have a Jewish Teacher？ An Examination of an Early Fourteenth-Century Arabic Tex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24, 693.

[363] .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A.D. 1325–1354, vol. 3, trans. H. A. R. Gibb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583. Quoted in DeWeese, “Stuck in the Throat of Chingīz Khān,” 31.

[364] . The Chronicle of Novgorod, 1016–1471, Camden Third Series, trans. Robert Micheli and Nevili Forbes (London: Camden Society, vol. XXV, 1914), 66. Similar sentiments were expressed throughout Europe: “The Influence of the Mongols on the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of Thirteenth Century Europe,” Devin DeWeese, Mongolian Studies, vol. 5, 1978 and 1979, 41-78.

第十一章　命运的拇指

[365] . Secret History, § 33.

[366] . Ibid., § 255.

[367] . Ibid.

[368] . Kirakoz Gandzaket’i’s History of the Armenians, trans. Robert Bedrosian (New York: Sources of the Armenian Tradition, 1986), 195.

[369] . C. Ž. Žamcarano, Mongol Chronicl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ans. Rudolf Loewenthal (Wie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witz, 1955), 84.

[370] . Rashid al-Din, 137-38.

[371] . Ibid., 138.

[372] . Description of a Mongol hero adapted from G. Mend-Oyo, Altan Ovoo, trans. Simon Wickham-Smith (Ulaanbaatar: Mongolian Academy of Culture and Poetry, 2012), 58.

[373] . Mongolian proverb, Энэ морь өмнөүүрээ тоос гаргаж үзээгүй.

[374] . Minhāj Sirāj Jūzjānī, abakāt-i-Nās. irī: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 vol. 2, trans. H. G. Raverty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1881), 1039-42.

[375] . Ibn Bat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 (London: Routledge, 2004), 179.

[376] . Juvaini, 405.

[377] . P. Ratchnevsky, “Šigi Qutuqu,”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üan Period, ed. Igor de Rachewiltz, Hok-lam

Chan, Hsiao Ch'i-ch'ing, and Peter W. Geier (Wie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witz, 1993), 75-94.

[378] . Juvaini, 407.

[379] . Ratchnevsky, 75-94.

[380] . Jonathan L. Lee, The Ancient Supremacy: Bukhara, Afghanistan and the Battle for Balkh, 1731–1901 (Leiden, Netherlands: E. J. Brill, 1996), 15.

[381] . Annemarie Schimmel, Rumi's World: The Life and Work of the Great Sui Poet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92), 158.

[382] . Juvaini, 132.

[383] . Pétis de la Croix, 310.

[384] . Voltaire, The Orphan of China, trans. William F. Fleming (Jersey City, NJ: Start Publishing, 2012), act 3, scene 2.

[385] . Juvaini, 151-52.

[386] . Kirakoz Gandzaket'i's History of the Armenians, trans. Robert Bedrosian (New York: Sources of the Armenian tradition, 1986), 221.

[387] . Injannasi, xx.

[388] . Juvaini, 408.

[389] . Ibid., 409.

[390] . Ibid., 410.

[391] . Ibid.

[392] . Ibid.

第十二章　山野来的人

[393] . Arthur Waley, 111.

[394] . Igor de Rachewiltz, 48.

[395] . Paul D. Buell, "Yeh-lü A-hai (ca. 1151-1223), Yeh-lü T'u-hua (d. 1231),"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d. Igor de Rachewiltz, Hok-lam Chan, Hsiao Ch'i-ch'ing, and Peter W. Geier (Wie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witz, 1993), 112-21.

[396] .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1910), 37.

[397] . Arthur Waley, 23.

[398] . Ibid., 129.

[399] . Igor de Rachewiltz, Secret History, note to § 121, 451. Mongolian: apra.

[400] . Kirakoz Gandzaket'i's History of the Armenians, trans. Robert Bedrosian (New York: Sources of the Armenian Tradition, 1986), 234.

[401] . Travels to the West, Xiyou ji, 長春真人西遊記.

[402] . Changchun zhenren xiyou ji, published in 1228. Igor de Rachewiltz, 1962, 1-128.

[403] . Igor de Rachewiltz, Hok-lam Chan, Hsiao Ch'i-ch'ing, and Peter W. Geier, 145.

[404] . Arthur Waley, 80.

[405] . Tao-Chung Yao, "Ch'iu Ch'u-chi and Chinggis Khan," 209.

[406] . Čingis Boγda olan öber-e yosutan-i erke-degen quiryaγsan,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eb Tenggeri,"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vol. 39 (Wiesbaden, Germany: Harrassowitz, 1967), 254–55.

[407] . Arthur Waley, 1931, 111-12.

[408] . Tengri Mongke Ken: or Tenggeri Möngke kümün, ibid., 101.

[409] . Ibid., 102.

[410] . Ibid., 116.

[411] . Igor de Rachewiltz, 1962, 28.

[412] . Arthur Waley, 115.

[413] . Hsüan-feng Ch'ing Hui Lu, Wieger's catalog of Taoist writings, No. 1410. Arthur Waley, 21.

[414] . Arthur Waley, 22.

[415] . Ibid., 25.

[416] . Ibid., 118.

[417] . Hsüan-feng, quoted in Tao-Chung Yao, "Ch'iu Ch'u-chi and Chinggis Khan," 214.

[418] . Arthur Waley, 126. Li is a measure equal to about half a kilometer or one third of a mile.

[419] . In chapter three of Pien-wei-lu, quoted in Joseph Thiel, 18.

[420] . Igor de Rachewiltz, 1962, 25-30.

[421] . Ibid., 26.

[422] . Ibid., 29.

[423] . Atwood, 433.

[424] . Joseph Thiel, 20.

[425] . Arthur Waley, 112.

[426] . Minhāj Sirāj Jūzjānī, Tabakāt-i-Nāṣirī: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 vol. 2, trans. H. G. Raverty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1881), 1078–79.

[427] . Arthur Waley, 152.

[428] . Ibid., 126.

[429] . Ibid., 130-31.

[430] . Joseph Thiel, 22.

[431] . Arthur Waley, 148.

第十三章　儒士与麒麟

[432] . Anna Contadini, “A Bestiary Tale: Text and Image of the Unicorn in the Kitāb nāt alhayawān (British Library, or. 2784),” Muqarnas, vol. 20 (2003): 17-33.

[433] . The Romanc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y Pseudo-Callisthenes, trans. Albert Mugrdich Wolohoji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126-27.

[434] . Alice Sárközi, “Mandate of Heaven,” Altaica Berolinensia: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in the Altaic World, ed. Barbara Kellner-Heinkel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3), 216.

[435] . Lee Dian Rainey,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West Sussex, UK: John Wiley & Sons, 2010), 12-16.

[436] . Yellow History, Shira Tuguji, quoted in Shagdaryn Bira, Mongoli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1200 to 1700, trans. John R. Krueger, 2nd ed. (Bellingham, W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2), 188-89.

[437] . “An Early Version of the Alexander Romance,” English on p. 60; “dalai ötö-gen-i yeke tenggis-i tenggisün irug[ar-i] tu[gulju] irebe bi Sumur tag-un orai deger-e garba naran singgekü -in jug qaranggu-yi dagaba qoyar od yabuju gutugar on,” Mongolian on p. 44.

[438] . Ibid., 44-45.

[439] .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An Early Mongolian Version of The Alexander Romanc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2 (1959): 1-99.

[440] .“An Early Version of the Alexander Romance,” English on p. 61, “qan bolju aba ane ale gajar deger-e m[in]u metü jirgagsan qan es-e törejü bülege namayi ükübesü dalai-yi nigete bitügülüdkün angqa urida mingan narid ökidi mingyan kü,” p. 45.

[441] . Walther Heissig, A Lost Civilization: The Mongols Rediscovered, trans. D.J.S. Thoms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236-37.

[442] . Igor de Rachewiltz, Hok-lam Chan, Hsiao Ch’i-ch’ing, and Peter W. Geier, 164-65.

[443] . Igor de Rachewiltz, 1962, 46.

[444]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ed. Kang-i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94.

[445] . Igor de Rachewiltz, 1962, 17.

[446] . Ibid., 40.

[447] . Ibid., 41, 84.

[448] . Ibid., 28.

[449] . Yunag-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450] . Peter Olbricht and Elisabeth Pinks, 210.

[451] . Illuminati: Also called a “steppe intelligentsia”; Paul D. Buell, “Činqai,”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üan Period, ed. Igor de Rachewiltz, Hok-lam Chan, Hsiao Ch’i-ch’ing, and Peter W. Geier, 95.

[452] . N. S. Trubetzkoy,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Ann Arbor: Michigan Slavic Publications, 1991), 169.

[453] . Juvaini, 204.

[454] . Igor de Rachewiltz, 1962, 36.

[455] . Ibid., 37.

[456] . Ibid., 38.

[457] . Jan Yün-hua, “Chinese Buddhism in Ta-tu,” Yüan Thought: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 ed. Hok-lam Chan and Wm. Theodore de Ba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384.

[458] . Igor de Rachewiltz, 1962, 35.

[459] . Jan Yün-hua, “Chinese Buddhism in Ta-tu,” 388.

[460] . Igor de Rachewiltz, 1962, 36.

[461] . Ma Juan, “The Conlict Between Islam and Confucianism,” Eurasian Inluences on Yuan China, ed. Morris Rossabi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3), 63.

[462] . Thomas T. Allsen, “Ögedei and Alcohol,” Mongolian Studies, vol. 29 (2007): 5.

[463] . Igor de Rachewiltz, 1962, 36-37.

[464] . http:://www.linguamongolia.com/Muhammad%20al-Samarqandi.pdf. For con- trasting views of the poems, see these two articles: T. Gandjei, “Was Muhammad al-Samarqandi a Polyglot Poet ? ,” Istanbul éniversitesi Edebiyat Fakulteei Turk Dili ve Edebiyatî Dergisi (TDED), vol. XVIII (1970): 63-66; Igor de Rachewiltz, “The Mongolian Poem of Muhammad al Samarqandī,”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12 (1969): 280-85.

第十四章　最后的战役

[465] . Larry V. Clark, “From the Legendary Cycle of Činggis-qaγan: The Story of an Encounter with 300 Tayičiγud from the Altan Tobči (1655),” Mongolian Studies, vol. 5 (1978 and 1979), 25.

[466] . Yesüngge.

[467] . Injannasi, 84.

[468] . The right way: arqacha sayin anu.

[469] . Igor de Rachewiltz, Secret History, 780.

[470] . Ibid., § 205.

[471] . Nikolai Sergeevich Trubetzkoy,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trans. Kenneth Brostrom (Ann Arbor: Michigan Slavic Publications, 1991), 173-74.

[472] . Pétis de la Croix, 364.

[473] . Secret History, § 265.

[474] . Reddish-gray horse: josotu boro.

[475] . Leland Liu Rogers, 108.

[476] . King of Heaven: Ssanang Ssetsen (Chungtaidischi), Erdeni-yin Tobci, Geschichte der Ost-Mongololen und ihres Fürstenhaues, trans. Isaac Jacob Schmidt (St. Petersburg: N. Gretsch, 1829), 101. Also see the Erdeni-yin Tobci adaptation, Paul Kahn (1998), 182-85.

[477] . Leland Liu Rogers, 104. See also Ssanang Ssetsen (Chungtaidischi),

97.

[478] . Evgenij I. Kychanov, “The State and the Buddhist Sangha: Xixia State (982-1227),”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10 (2000): 119-28.

[479] . Weirong Shen,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angut Background of the Mongol Adoption of the Tibetan Tantric Buddhism,” Contributions to Tibetan Buddhist Literature, ed. Orna Almogi (Halle, German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2008), 326-27.

[480] . Ibid., 315-44.

[481] . Secret History, § 267.

[482] . Ruth W. Dunnel, The Great State of White and High: Buddh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leventh-Century X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24.

[483] . Secret History, § 268.

[484] . Lubsang-Danzin, §§ 44-45.

[485] . Ibid., §§ 47-48.

[486] . Ibid., 59-60, translation quoted in Shagdaryn Bira, Mongoli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1200 to 1700, trans. John R. Krueger, 2nd ed. (Bellingham, W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2), 180-83.

[487] . Erdeni tunumal neretü, trans. from Mongolian to German by Karénina Kollmar-Paulenz (Wiesbaden, Germany: Harrassowitz Verlag, 2001), § 2. Also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Johan Elverskog, The Jewel Translucent Sūtra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2003), 63.

[488] . Letter of Genghis Khan to Ch’ang-ch’un, Arthur Waley, 1931, 158. Genghis Khan wrote to the Taoist sage in the eleventh lunar month of 1223.

第十五章　内外的战争

[489] . Juvaini, 189.

[490] . Ibid., 188.

[491] . Ibid., 184-85.

[492] . “A Mongol-Ismâ’îlî Alliance？: Thoughts on the Mongols and Assassins,” Timothy May,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rd series, vol. 14, 2004, 237.

[493] . Juvaini, 181, 256.

[494] . Eagle’s Nest: Ismaili Castles in Iran and Syria, Peter Willey (London: Tauris, 2005), 76-77.

[495] . Igor de Rachewiltz, 1962, 35.

[496] . Klaus Sagaster,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Among the Mongols,” The Spread of Buddhism, ed. Ann Heirman and Stephan Peter Humbacher (Keud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2007), 379-432, 389.

[497] . Igor de Rachewiltz, 1962, 25.

[498] . Secret History, § 276.

[499] . Ibid., § 272.

[500] . Death of Subodei: “A la mort d’Ogodaï, il y eut une grande assemblée de tous les princes de la famille de Tchingkis. Batou ne voulait pas s’y rendre; mais Souboutaï lui représenta qu’étant l’aîné de tous ces princes, il lui était impossible de s’en dispenser. Batou partit donc pour l’assemblée qui se tint sur le bord de la rivière Yetchili. Après l’assemblée, Souboutaï revint à son campement sur le Tho-na (Danube), et il y mourut à l’age de soixante-treize ans. Conformément à l’usage des Chinois, on lui donna un titre qui rappelait ses plus belles actions: ce fut le titre de roi du Ho-nan, à cause de la conquête de cette province qu’il avait enlevée aux Kin. L’épithète honorifique qui fut jointe à son nom fut celle de idèle et invariable. Il laissa un ils nommé Ouri-yangkhataï, qui, disent les Chinois, après avoir soumis toutes les tribus des Russes, des Polonais et des Allemands, fut envoyé pour conquérir le royaume d’Awa et le Tonquin.” Jean-Pierre AbelRemusat, Nouveaus Mélanges Asi-atiques, vol. II (Paris: Schubart et Heideloff, 1829), 96-97.

[501] . Rashid al-Din,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187.

[502] . Juvaini, 258.

[503] . Carpini, Friar Giovanni DiPlano, The Story of the Mongols Whom We Call the Tartars, trans. Erik Hildinger (Boston: Branding Publishing, 1996), 109.

[504] . Ibid., 112-113.

[505] . Ibid., 116.

[506] . Matthew Paris’s English History from the Year 1235 to 1273, trans. J. A. Giles (London: Henry G. Bohn; reproduced ed., New York: AMS Press, 1968), vol. I, 155.

[507] . Angel-faced is translated as peri-faced based on a Persian word for angel. Ibid., 188.

[508] . Oficial was Kuo Pao ? yü: Igor de Rachewiltz, “Personnel and Personalities in North China in the Early Mongol Period,”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9 (1966), 126.

[509] . Minhaj al-Din Juzj ani, Tabaqāt-i nāsirī, vol. 2, trans. H. G. Raverty (Osnabrück, Germany: Biblio Verlag, 1991; 1881 reprint), 1157-58. Cited in Richard Foltz, Religions of the Silk Roa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11.

[510] . Eric Voegelin, “Mongol Orders of Submission to European Powers,” Byzantium, vol. 15 (1940-41),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5, Published Essays: 1940-1952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133.

[511] . Juvaini, 265.

[512] . Ibid., 266.

[513] . Voegelin, Published Essays: 1940–1952, 79, 96.

[514] . Juvaini, 565.

[515] . Juvaini, 569.

[516] . Juvaini, 595.

[517] . Rashid al-Din,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215.

[518] . William of Rubruck, 221-22.

[519] . Ibid., 222.

[520] . Secret History, § 203. For a discussion of Shigi-Khutkhu during this time, see commentary in Peter Olbricht and Elisabeth Pinks, 149.

[521] . Igor de Rachewiltz, Secret History, 832-834.

[522] . Rashid al-Din,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186.

[523] . Rashid al-Din,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210.

[524] . Ibid., 211.

[525] . Juvaini, 51.

[526] . Rashid al-Din,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210-13.

[527] . Ibid., 213.

[528] . Ibid.

[529] . Juvaini, 246. 44. Ibid., 247.

[530] . Juvaini, 246. 44. Ibid., 247.

第十六章　燃烧的书籍

[531] . Elizabeth Endicott-West, “Notes on Shamans, Fortune-tellers and Yin-Yang Practitioners and Civil Administration in Yüan China,” 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egacy, ed. Reuven Amitai-Preiss and David Morgan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1999), 224-39.

[532] . William of Rubruck, 108.

[533] . Comments on shamans made on William of Rubruck's inal audience with Mongke Khan, May 31, 1254.

[534] . William of Rubruck, 239.

[535] . William E. Henthorn, Korea: The Mongol Invasions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1963), 75, 96.

[536] . Meir Shahar, The Shaolin Monaste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36.

[537] . Arthur Waley, "Introduction," 30.

[538] . Joseph Thiel, 34.

[539] . Ibid.

[540] . Igor de Rachewiltz, "The Hsi-Yu Lu 西遊錄 by Yeh-Lü Ch'u -Ts'Ai 耶律楚材 ," Monumenta Serica, vol. 21 (1962): 81.

[541] . Juvaini, 607.

[542] . William of Rubruck, 228-30.

[543] . John Andrew Boyle, "Turkish and Mongol Shamanism in the Middle Ages," Folklore, vol. 83 (1972): 177-93, 178.

[544] . Eric Voegelin, "Mongol Orders of Submission to European Powers" (Letter of Aldijigiddai to Saint Loui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10, Published Essays: 1940-1952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2000), 93-94.

[545] .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53–55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00), chap. XVI.

[546] . Arthur Waley, 20-33.

[547] . Joseph Thiel, 35.

[548] . Pien wei lou, chap. III, 68 r°, col. 12. Ed. Chavannes, "Inscriptions et pi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époque mongole," in T'oung Pao, vol. V (1904), 375.

[549] . Joseph Thiel, 37.

[550] . Zizhi Tongjian Gangmu: Tong Kien Kang Mu or Kangmu, quoted from Sir Henry Hoyle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504-5.

[551] . Ed. Chavannes, "Inscriptions et pi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époque mongole," 381.

[552] . Ibid., 374.

[553] . Juvaini, 666.

[554] . Farhad Daftary, The Isma’ilis: Their History and Doctrin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27.

[555] . Ibid., 682.

[556] . Ibid., 719.

[557] . Ibid., 725.

[558] . Minhāj Sirāj Jūzjānī, Tabakāt-i-Nāṣirī: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 vol. 2, trans. H. G. Raverty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1881), 1245.

[559] . John Andrew Boyle, The Mongol World Empire 1206–1370 (London: Variorum, 1977), 158.

[560] . Hend Gilli-Elewy, 361-62.

[561] . Ibid., 366. “Hulegu seized the treasures of Baghdad, the enumeration of, and amount of which wealth, the pen of description could neither record, nor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contain, and conveyed the whole —money, jewels, gold, and gem-studded vases, and elegant furniture—to his camp.” Minhāj Sirāj Jūzjānī, Tabakāt-i-Nāṣirī: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 1 255–56.

[562] . Bar Hebraeus, 430.

[563] . L. J. Ward, “The Zafar-Nmah of HamdAllāh Mustaufī and the Il-Khān Dynasty of Iran,”Ph.D. dis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Faculty of Arts, October 1983), 76.

[564] . Hend Gilli-Elewy, 368.

[565] . Joseph Thiel, 1–81.

[566] . Joseph Thiel, 40.

[567] . Ibid., 7.

[568] . Ibid., 41.

[569] . Ibid., 43.

[570] . Pseudo Ibn Fowati quoted in George Lane, “Whose Secret Intent ? ,” in Eurasian Influences on Yuan China, ed. Morris Rossabi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ublishing, 2013), 12.

第十七章　死后的来生

[571] . The De Monarchia of Dante Alighieri, trans. Aurelia Henry

(Chesterland, OH: General Bookbinding Co., 1896), book III, chapter VIII, 2, 26.

[572] . Ibid., book I, chapter XV, 4, 196.

[573] . The Pearl Rosary, trans. Johan Elverskog (Bloomington, IN: The Mongolia Society, 2007), 15.

[574] . N. Hurcha, “Attempts to Buddhicise the Cult of Chinggis Khan,” Inner Asia, vol. 1 (1999).

[575] . Ibid., 49.

[576] . Ibid., 53.

[577] . Walther Heissig, A Lost Civilization: The Mongols Rediscovered, trans. D.J.S. Thomson(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86.

[578] . Karl Sagaster, Die Weise Geschichte (Wiesbaden, Germany: Harrassowitz, 1976), 315.

[579] . Larry Moses and Stephen A. Halkovic, Jr.,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History and Culture, Indiana University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49 (Blooming- ton, I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1985), 211.

第十八章　未完的法律

[580] . John Locke,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1669, §§ 95–110.

[581] . Tobias George Smollett, Thomas Francklin, et al., The Works of M. de Voltaire: A Treatise on Toleration, vol. 24 (London: Newberry et al., 1764), 46.

[582] . Anne de La Roche-Guilhem, trans., 9. The book also appeared simultaneously from a different printer with a different title: Taxila or Love prefer’d before Duty. For information on her life, see Alexander Calame, Anne de La Roche- Guilhem: Romancire huguenote (1644-1707) (Geneva: Librairie　Droz, 1972), 44.

[583] . Anne de La Roche-Guilhem, 3-9, 88.

[584] . Pétis de la Croix, 78-90.

[585] . Minhāj Sirāj Jūzjānī, abakāt-i-Nāṣirī: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 vol. 2, trans. H. G. Raverty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1881), 1010.

[586] . Luciano Petech, “Notes on Tibetan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 T’oung Pao, 2nd series, vol. 52, livr. 4/5 (1966): 272.

[587] . Luciano Petech, “The Dalai-Lamas and Regents of Tibet: A Chronological Study,” ibid., vol. 47, livr. 3/5 (1959): 368-94.

[588] . Ippolito Desideri, 229.

[589] . Ibid., 244.

[590] . Ibid., 245.

[591] . Tibetan title: Tho rangs mun sel nyi ma shar ba'i brda. Trent Pomplun, "Nat- ural Reason and Buddhist Philosophy: The Tibetan Studies of Ippolito Desideri, SJ (1684-1733),"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 50 (2011), 388.

[592] . Ippolito Desideri, 185.

[593] . Ibid., 187.

[594] . Ibid., 187-88.

[595] . Mission to Tibet: The Extraordinary Eighteenth-Century Account of Father Ippolito Desideri, S. J., trans. Michael Sweet (Somerville, MA: Wisdom Publications, 2010), 245.

[596] . Ippolito Desideri, 192.

[597] . M. Klaproth, "Account of Tibet, by Fra Francesco Orazio Della Penna de Billi, 1730,"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and Foreign India, China, and Australia, vol. XV (1834): 296.

[598] . Ibid., 298.

[599] . Genghiscano Imperador de' Tartari Mongoli.

[600] . London Daily Post, December 19, 1744.

[601] . Liu Wu-Chi, "The Original Orphan of Chin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5 (1953): 193-212.

[602] . Voltaire, The Orphan of China, trans. William F. Fleming (Jersey City, NJ: Start Publishing, 2012), act 4, scene 1.

[603] . Ibid., act 2, scene 6.

[604] . Portrait of a salon reading of the work: www.histoire-image.org/ etudes/ salons-xviiiesiecle ? i = 1258, Lecture de la tragédie de "l'orphelin de la Chine" de Voltaire dans le salon de madame Geoffrin. The picture shows a gathering of distinguished guests in the drawing room of French hostess Marie-Thérse Rodet Geoffrin (1699-1777), who is seated on the right.

[605] . Arthur Murphy, The Orphan of China, a Tragedy, 3rd ed. (London: P. Valliant, 1772; original publication, 1759), 1.

[606] . Hsin-yun Ou, "Gender, Consumption, and Ideological Ambiguity in David Garrick's Production of The Orphan of China (1759)," Theatre Journal, vol. 60 (2008): 383-407.

[607] . Liu Wu-Chi, "The Original Orphan of China," 211.

[608] . “Review of The Orphan of China, a Tragedy,” The Monthly Review 20 (June 1759): 575, art. 24. Quoted in Hsin-yun Ou, 383.

[609] . Alexander Dow, Zingis a Tragedy, as it is performed at the Theatre Royal in Drury Lane (London: T. Becket & P. A. De Hondt, 1769), 1. Review in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vol. 39 (1769): 40-43.

[610] . Alexander Dow, 85.

[611] . Some Account of the English Stage, vol. 5 (Bath, England: H. E. Carrington, 1832), 220.

[612] . Gio Batista Casti, Gengis Cano or Il Poema Tartaro (Brusselles, Belgio: Presso H. Tarlier, 1829).

[613] . Lorenzo da Ponte, Memoirs, trans. Elisabeth Abbott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0), 142.

[614] . Charles Mills, History of Muhammedanism (London: Black, Parbury, and Allen, 1817), 216.

[615] . I. Pottinger, A Letter from Mons. De Voltaire to the Author of the orphan of China (London, 1759). The Library of Benjamin Franklin, ed. Edwin Wolf and Kevin J. Hayes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006), 815, entry 3535.

[616] . Article from South Carolina Gazette, March 17, 1764, published in “Historical Notes,”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Magazine, vol. 14 (1913): 171-72. Liu Wu-Chi, “The Original Orphan of China,” 211.

[617] . Pennsylvania Gazette, January 15, 1767.

[618] . Harold Lawton Bruce, “Voltaire on the English St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Modern Philology, vol. 8 (1918): 142-43.

[619] . John Kuo Wei Tchen, “George Washington: Porcelain, Tea, and Revolution,” Racially Writing the Republic: Racists, Race Rebel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American Identity, ed. Bruce Baum and Duchess Harri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6. Also see John Kuo Wei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Orientalism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ulture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22; A. Owen Aldridge, The Dragon and the Eagle: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 (Detroit, 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95; Philip Vallenti, “The Orphan of Zhao—A Chinese Inspiration fo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 semi- nar sponsored by the New York Chinese Opera Society, New York, 2015.

[620] . Thomas Jefferson, “1783 Catalog of Books [circa 1775-1812], 32 [electronic edition]. Thomas Jefferson Papers: An Electronic Archive (Boston: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2003), www.thomasjeffersonpapers.org.

[621] . Cyrus King of Massachusetts quoted in Charles Jared Ingersoll,

History of the Second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Great Britain, vol. II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Grambo & Co., 1852), 273.

[622] . Pétis de la Croix, 78.

[623] . "A Bill for Establishing Religious Freedom, 18 June, 1779": Well aware that the opinions and belief of men depend not on their own will, but follow involuntarily the evidence proposed to their minds; that Almighty God hath created the mind free, and manifested his supreme will that free it shall remain by making it altogether insusceptible of restraint; that all attempts to inluence it by temporal punishments, or burthens, or by civil incapacitations, tend only to beget habits of hypocrisy and meanness, and are a departure from the plan of the holy author of our religion, who being lord both of body and mind, yet chose not to propagate it by coercions on either, as was in his Almighty power to do, but to extend it by its inluence on reason alone; that the impious presumption of legislators and rulers, civil as well as ecclesiastical, who, being themselves but fallible and uninspired men, have assumed dominion over the faith of others, setting up their own opinions and modes of thinking as the only true and infallible, and as such endeavoring to impose them on others, hath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false religions over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world and through all time: That to compel a man to furnish contributions of mone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opinions which he disbelieves and abhors, is sinful and tyrannical; that even the forcing him to support this or that teacher of his own religious persuasion, is depriving him of the comfortable liberty of giving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particular pastor whose morals he would make his pattern, and whose powers he feels most persuasive to righteousness; and is withdrawing from the ministry those temporary rewards, which proceeding from an approbation of their personal conduct, are an additional incitement to earnest and unremitting labours for the instruction of mankind; that our civil rights have no dependence on our religious opinions, any more than our opinions in physics or geometry; that therefore the proscribing any citizen as unworthy the public conidence by laying upon him an incapacity of being called to ofices of trust and emolument, unless he profess or renounce this or that religious opinion, is depriving him injuriously of those privileges and advantages to which, in common with his fellow citizens, he has a natural right; that it tends also to corrupt the principles of that very religion it is meant to encourage, by bribing, with a monopoly of worldly honours and emoluments, those who will externally profess and conform to it; that though indeed these are criminal who do not withstand such temptation, yet neither are those innocent who lay the bait in their way; that the opinions of men are not the object of civil government, nor under its jurisdiction; that to suffer the civil magistrate to intrude his powers into the field of opinion and to restrain the profession or propagation of principles on supposition of their ill tendency is a dangerous fallacy, which at once destroys all religious liberty, because he being of course judge of that tendency will make his opinions the rule of judgment, and approve or condemn the sentiments of others only as they shall square with or differ from his own; that it is time enough for the rightful purposes of civil government for its oficers to interfere when principles break out into overt acts against peace and good order; and finally, that truth is great and will prevail if left to herself; that she is the proper and suficient antagonist to error, and has nothing to fear from the conlict unless by human interposition disarmed of her

natural weapons, free argument and debate; errors ceasing to be dangerous when it is permitted freely to contradict them. We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Virginia do enact that no man shall be compelled to frequent or support any religious worship, place, or ministry whatsoever, nor shall be enforced, restrained, molested, or burthened in his body or goods, nor shall otherwise suffer, on account of his religious opinions or belief; but that all men shall be free to profess, and by argument to maintain, their opinions in matters of religion, and that the same shall in no wise diminish, enlarge, or affect their civil capacities. And though we well know that this Assembly, elected by the people for the ordinary purposes of legislation only, have no power to restrain the acts of succeeding Assemblies, constituted with powers equal to our own, and that therefore to declare this act irrevocable would be of no effect in law; yet we are free to declare, and do declare, that the rights hereby asserted are of the natural rights of mankind, and that if any act shall be hereafter passed to repeal the present or to narrow its operation, such act will be an infringement of natural right. http://founders.archives.gov/ documents/Jefferson/01-02-02-0132-0004-0082.

尾声　上帝的霹雳

[624] . John McCannon, “By the Shores of White Waters: The Altai and Its Place in the Spiritual Geopolitics of Nicholas Roerich,” Sibirica, vol. 2 (2002): 183.

[625] . Roerich, Heart of Asia, 3, 119.

[626] . Theodore A. Wilson, “Parsifal in Politics: Henry Agard Wallace, Mysticism and the New Deal,” Irish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vol. 5 (December 1996): 10.

[627] . Nasan Bayar, “On Chinggis Khan and Being Like a Buddha,” The Mongolia-Tibet Interface: Opening New Research Terrains in Inner Asia, ed. Uradyn E. Bulag and Hildegard G. M. Diemberger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2007), 197-221, 211. Photographs of the buildings and surroundings are in the Wallace Collec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http://digital.lib.uiowa.edu.

[628] . “Snow,” 1945, Mao Zedong, Poems (Beijing, 1959); Michal Biran, Chinggis Khan (Oxford, UK: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7), 137.

[629] . Quote from poem in chapter 68 of Book XXIII in Köke Sudur Nova (Injannasi’s Manuscript of the Expanded Version of His Blue Chronicle), Part I, ed. Gombojab Hangin (Weisbaden, Germany: Harrassowitz, 1978), xix.

[630] . Prjevalsky (Mongolia and Tangut; story of Khatun Gol) in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 Henry Yule, 917.

[631] . Shambala, as it is known in Mongolian, comes from the Sanskrit term Sambhala, also known from Tibetan sources by spellings Xembala (used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Portuguese explorers’ reports), Shambhala (often used by English-speaking followers of Tibetan Buddhism), and Shamballa (used by some mystics). It gave rise to the English concept Shangri-la as an earthly paradise.

[632] . One legend predicts that Genghis Khan will return and rule again in a place of precious stones with a holy lake. “A legend about Chings Khan’s ruling in the future,” by Kápolinás Olivér, paper delivered at Summer School of Young Mongolists, Ulaanbaatar, 2011.

参考资料和进阶阅读

[633] . Junko Miyawaki-Okada, “The Japanese Origin of the Chinggis Khan Legends,” Inner Asia, vol. 8 (2006) 123-34.

[634] . Injannasi, 59.

参考文献

Amitai-Preiss, Reuven, and David O. Morgan, eds. 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egacy.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1999.

Atwood, Christopher P. Encyclopedia of Mongolia and the Mongol Empire.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4.Baabar, Bat-Erdeniin. History of Mongolia from World Power to Soviet Satellite. Edited by Christopher Kaplonski. London: White Horse Press, 1999.Baljinnyam, B. Mongolchuudin Buren Tuukhiin Tovchooh. Ulaanbaatar: Admon Publishing, 2006.

Barield, Thomas J. The Perilous Frontier.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2.

——-.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3.Bar Hebraeus. The Chronography of Gregory Abû'l-Faraj 1225–1286. The Son of Aaron, the Hebrew Physician Commonly Known as Bar Hebraeus, vol. I. Translated from the Syriac by Ernest A. Wallis Budge. First published in 1932. Amsterdam: Philo Press, 1976.Bawden, Charles R. The Mongol Chronicle Altan Tobchi. Wiesbaden, Germany: Göttinger Asiatische Forschungen, 1955.

Bazargür, D., and D. Enkhbayar. Chinggis Khaan Historic-Geographic Atlas. Ulaanbaatar: TTS, 1997.

Bira, Shagdaryn. "The Mongols and Their State in the Twelf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V, part 1, edited by M. S. Asimov and C. E. Bosworth.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8.

——-. Mongoli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1200 to 1700, 2nd ed. Translated by John R.

Krueger. Bellingham, W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2.

Biran, Michal. Qaidu and the Rise of the Independent Mongol State in Central Asia. Richmond, UK: Curzon, 1997.

——-. 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Islamic Worl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Chinggis Khan. Oxford, UK: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7.Blake, Robert P., and Richard N. Frye.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 (The Mongols) by Grigory of Akanc."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2 (December 1949).

Boinheshig. Mongolian Folk Design. Beijing: Inner Mongolian Cultural Publish- ing House, 1991.

Bold, Bat-Ochir. Mongolian Nomadic Socie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1.

Boldbaatar, J. Chinggis Khaan. Ulaanbaatar: Khaadin san, 1999.

Bretschneider, E. Mediæ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vol. I.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67.

Buell, Paul 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Mongol World Empire.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3.

Bulag, Uradyn E. 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ield, 2002.

Carpini, Friar Giovanni DiPlano. The Story of the Mongols Whom We Call the Tartars.

Translated by Erik Hildinger. Boston: Branding Publishing, 1996.Chambers, James. Genghis Khan. London: Sutton Publishing, 1999. Chan, Hok-Lam. China and the Mongols. Aldershot, UK: Ashgate, 1999.

———, and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eds. Yüan Thought: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Cleaves, Francis Woodma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Conermann, Stephan, and Jan Kusber. Die Mongolen in Asien und Europa. Frankfurt: Peter Land GmbH, 1997.

Dawson, Christopher, ed. 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55.

Desideri, Ippolito. Mission to Tibet: The Extraordinary Eighteenth-Century Account of Father Ippolito Desideri, S. J. Translated by Michael Sweet. Somerville, MA: Wisdom Publications, 2010.

Elias, N., and E. Denison Ross.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Being the Tarikhi-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át. London: Curzon Press, 1895.Fitzhugh, William W., Morris Rossabi, and William Honeychurch. Genghis Khan and the Mongol Empire. Hong Kong: Odyssey Books, 2013.Ge Menghe. Genghis Khan's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Zhang Fuyong. Lanham, MD: American Academic Press, 2015.

Gilli-Elewy, Hend. "Al-Hawādit al-gˇ āmi'a, A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he Mongol Conquest of Bag¯hdad, 656/1258." Arabica, vol. 58 (2011): 353-71.Grousset, René.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Translated by Naomi Walfor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

——-. Conqueror of the World. Translated by Marian McKellar and Denis Sinor. New York: The Orion Press, 1966.

Gumilev, Lev N. Searches for an Imaginary Kingdom: The Legend of the Kingdom of Prester John. Translated by R. E. F. Smit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Haenisch, Erich. Die Kulturpolitik des Mongolischen Weltreichs. Berlin: Preus- 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eft 17, 1943.

Heissig, Walther. A Lost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D. J. S. Thompso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6.

——-, ed. 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Düsseldorf: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1981.

Howorth, Sir Henry Hoyle.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ondon: Longmans, Green, 1876.

Humphrey, Caroline. Shamans and Eld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and Hurelbaatar Ujeed. A Monastery in Time: The Making of Mongolian Buddh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Injannasi, Vanchinbalyn. Köke Sudur (The Blue Chronicle). Translated by John Gombojab Hangin. Wie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witz, 1973.

Juvaini, Ata-Malik. Genghis Kha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Translated by J. A.

Boyl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Kahn, Paul.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The Origins of Chingis Khan. Boston: Cheng & Tsui, 1998.

Kaplonski, Christopher. “The Role of the Mongols in Eurasian History: A Reassessment.” In The Role of Mig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Eurasian Steppe, edited by Andrew Bel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Khan, Almaz. “Chinggis Khan: From Imperial Ancestor to Ethnic Hero.”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edited by Stevan Harrell.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Khazanov, Anatoly M.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

Klopprogge, Axel. Ursprung und Ausprägung des abendländischen Mongolenbildes im 13. Jahrhundert. Wie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 witz Verlag, 1993.

Lamb, Harold. Genghis Khan. New York: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m- pany, 1927.

Langolis, John D. Jr., e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Lattimore, Owe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Chingis Khan and the Mongol Conquests.” Scienti c American, vol. 209, no. 2 (August 1963).

Lhagvasuren, Ch. Ancient Karakorum. Ulaanbaatar: Han Bayan Co., 1995.

——-. Bilge Khaan. Ulaanbaatar: Khaadin san, 2000.

Lubsang-Danzin. The Mongol Chronicle Altan Tobchi. Translated by Charles R. Bawden. Wiesbaden, Germany: Göttinger Asiatische Forschungen, 1955.

Man, John. Genghis Khan: Lif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London:

St. Martin’s Grifin, 2007.

May, Timothy. The Mongol Art of War: Chinggis Khan and the Mongol Military System. Yardley, PA: Westholme Publishing, 2007.

Olbricht, Peter, and Elisabeth Pinks. Meng-Ta Pei-Lu und Hei-Ta Shih-Lüeh: Chinesische Gesandtenberichte über die frühen Mongolen 1221 und 1237. Wie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witz, 1980.Olschki, Leonardo. Marco Polo’s Precursor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43.

Onon, Urgunge, translator. The History and the Life of Chinggis Kha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1990.

———.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inggis Khan. Richmond, Surrey, UK: Curzon Press, 2001.

Pétis de la Croix, François. The History of Genghizcan the Great: First Emperor of the Ancient Moguls and Tartars. London: Printed for J. Darby etc., 1722.Polo, Marc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lated by Ronald Latha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8.

———.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he Complete Yule-Cordier Editio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93.

Rabban Sauma.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 Medieval Travels from China Through Central Asia to Persia and Beyond. Translated by Earnest Alfred Wallis Budge. London: I. B. Tauris, 2013.

Rachewiltz, Igor de. “The Hsi-Yu Lu 西遊錄 by Yeh-Lü Ch’u -Ts’Ai 耶 律 楚 材.” Monumenta Serica, vol. 21 (1962): 1-128.

———.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3 vols.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2003-2013.

———, Hok-lam Chan, Hsiao Ch’i-ch’ing, and Peter W. Geier, eds.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üan Period. Wie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witz, 1993.

Rashid al-Din.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Translated by John Andrew Boy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Ratchnevsky, Paul. Genghis Khan. Translated by Thomas Nivison

Haining. Oxford, UK: Blackwell, 1991.

Raymond, Janice. Өсөхөд сурсан эрдэм Өглөөний нар мэт. Mongolian Proverbs.Mongolian Proverbs. San Diego: Alethinos Books, 2010.

Roche-Guilhem, Anne de La. Zingis: A Tartarian History. Translated by J. M. London, 1692.

Rockhill, William Woodville. William of Rubruck's Account of the Mongols, edited by Rana Saad. Maryland: lulu.com, 2005.

Rogers, Leland Liu, translator. The Golden Summary of Činggis Qaγan: Činggis Qaγan-u Altan Tobči. Wiesbaden, Germany: Harrassowitz Verlag, 2009.

Rossabi, Morris. Khubi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The Reign of Khubilai Khan." In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The Mongols and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2010.

———. Eurasian Influences on Yuan China.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3. Rybatzki, Volker. "Die Personennamen und Titel der Mittelmongolischen Dokumente: Eine lexikalische Untersuchu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aculty of Arts, Institute for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006.

Sinor, Deni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Studies in Medieval Inner Asia. Brookield, VT: Ashield Publishing Co., 1997.

Skelton, R. A., Thomas E. Marston, and George D. Painter. The Vinland Map and the Tartar Rel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Sneath, David. The Headless State: Aristocratic Orders, Kinship Society, and Misrepresentations of Nomadic Inner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 sity Press, 2007.

———-, and Christopher Kaplonski, eds. The History of Mongolia, 3 vols. Folke- stone, Kent, UK: Global Oriental, 2010.

Ssanang Ssetsen (Chungtaidschi). Erdeni-yin Tobci, Geschichte der Ost-Mongololen und ihres

Fürstenhaues. Translated by Isaac Jacob Schmidt. St. Petersburg: N. Gretsch, 1829.

Tekin, Talât.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69. Bloomington, IN: Mouton, 1968.

Thiel, Joseph. "Der Streit der Buddhisten und Taoisten zur Mongolenzeit." Monumenta Serica, vol. 20 (1961).

Thomsen, Vilhelm, and E. Denison Ross. "The Orkhon Inscriptions: Being a Translation of Professor Vilhelm Thomsen's Final Danish Rendering."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5 (1930): 861-76.Trubetzkoy, Nikolai S.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Translated by Anatoly Liberman. Ann Arbor: Michigan Slavic Publications, 1991.

Vladimirtsov, Boris Y. The Life of Chingis-Khan. Translated by Prince D. S. Mirsky. New York: Benjamin Blom, 1930.

Voegelin, Eric. "Mongol Orders of Submission to European Power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ume 5 and volume 10, Published Essays: 1940–1952.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2000.

Voltaire. The Orphan of China. In The Works of Voltaire, vol. XV. Translated by William F. Fleming. Paris: E. R. DuMont, 1901.

Waley, Arthur, translator. 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The Journey of the Taoist from China to the Hindukush at the Summons of Chingiz Khan, by Li Chih-Ch'ang. London: Broadway Travellers, 1931.

———-.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Other Piece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3.

Zhao, George Qingzhi. Marriage as Political Strategy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Mongolian Royal Marriages from World Empire to Yuan Dynasty.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吉思汗：比武力更强大的是凝聚力 /（美）杰克・威泽弗德著；
赵清治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115-5651-6

Ⅰ．①成… Ⅱ．①杰… ②赵… Ⅲ．①成吉思汗
（1162–1227）—人物研究 Ⅳ．① K82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8673 号

Genghis Khan and the Quest for God:
How the World's Greatest Conqueror Gave Us Religious Freedom
Copyright © 2016 by Jack Weatherford

中文版权 © 2018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8–6982

书　　名	成吉思汗：比武力更强大的是凝聚力
作　　者	（美）杰克・威泽弗德
译　　者	赵清治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林　薇
特邀编辑	徐　成　黄迪音　汪超毅
封面设计	谢明华
插 画 师	赵国栋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65369526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字　　数	318 千
印　　张	22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651-6
定　　价	7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 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